

葛量洪回憶

Via Port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錄



Sir Alexander Grantham
亞歷山大·葛量洪爵士著



311
0423
670

葛量洪回憶錄

亞歷山大·葛量洪著

曾景安譯

趙佐榮編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書名：葛量洪回憶錄

著作：亞歷山大·葛量洪 **譯者：**曾景安

編者：趙佐榮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95-197號廣亞大廈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華風書局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84-6號 電話：5-749495

承印：太平洋（永航）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4年9月版

定價：港幣28元

書號：ISBN 962-226-069-1

此書英文版及版權屬香港大學出版社所有

作者序

香港的報紙常常刊載船運的通告，宣佈某某船隻由香港駛往倫敦，或者到其他地方，經過某些埠等。這本書所述的航程是由香港開始的，也是以香港為終點；所過的埠是我們曾經當過事的殖民地：百慕達，牙買加，尼日利亞，斐濟及西太平洋，當然還有香港。

我並沒有寫日記或者筆記。關於我的故事，我主要是靠我自己的記憶，雖然這樣有時會有錯誤，不過我相信錯誤都限於某點細節而已。我所陳述和批評的事情都是我仍然認為最重要的。

譯者序

前港督葛量洪爵士所撰寫的回憶錄本來祇有英文版。早於一九二二年，他已參加英國殖民地部的海外服務。任職於香港輔政司署，在英籍官員當中僅擔任中級的職位而已。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期間，他曾經一度出任香港的裁判司，可算與香港中、下階層接觸過。他也曾在廣州及澳門等地學習過廣東話。一九三五年他獲英國殖民地部調派往百慕達出任輔政司，其後在牙買加、尼日利亞等地擔任同樣的職位。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首次被委派到斐濟及南太平洋地區擔任總督兼高級專員的職位時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期間。大戰結束後兩年，他出任香港總督，接替楊慕琦的職位，直至一九五七年退休為止。

葛量洪的政治生涯可算是英國殖民地部海外官員的政治生涯縮影。他在書中曾經坦言，作為這樣的官員，最大的願望是爬升到海外殖民地總督的地位。而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所服務的期間也是英殖民地帝國日益走向下坡的標誌。

這本回憶錄在一九六五年出版，印數只是一千五百本，因此知道這本回憶錄的人並不太多。內文分兩部份講述香港的情況，是以他投入殖民地部服務的年份次序而寫的。第一部份是關於香港和他在廣州與澳門的學習和北京之旅行。隨後他到了南美、非洲及太平洋等地區工作。第二部份佔全書的三分之二，敘述他從一九四七年回香港當總督的經歷，直至一九五七年退休為止。作者坦言，他的回憶錄主要是靠他自己記憶在其任內所發生的重大的事故，小節方面可能會有出入的地方。

這本回憶錄可以作為香港四十年代後期及五十年代初期，一個身為香港政府領導人對一些歷史問題的看法；當時遠東政治問題極為複雜，葛氏作為英國派駐遠東的重要代表所面臨的困難、處理這些複雜問題的方法，他都一一加上自己的看法。五十年代由於中、西方關係緊張，他在中英關係較為惡劣的時刻，葛氏是被委任為香港總督。中美之間的過節也從他的著作中反映出來。身處在這段風雲際幻的時刻，作為英國在遠東區的重要代表，葛氏所受的壓力不僅來自一個漸漸強大的中國，而且也來自英國的殖民地部。在書中，葛氏批評了當時在大陸執政的國民黨，也抨擊了後來執政的共產黨；與此同時，他對殖民地部專橫作風也無保留地作了批評。葛氏坦率地指出，對香港的總督來說，中國有了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較之共產黨的執政還重要。換言之，誰在中國當政也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到的是當中國有了個強大的政權，這是會影響英國在香港的地位的。

葛氏不只一次地強調，中國一直沒有收回香港，原因是一直都未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見書第177頁）。他也曾經指出，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政府也好，中國是絕對不會讓新界租約到期後再繼續下去的。另外宋子文也曾經面對葛量洪說，中國在七十年代期間是會收回香港的。基於上述的理由，葛氏指出香港「永遠」不能宣佈獨立：它祇可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或是被中國收回（見書第146頁「政制改革」）。

撇開葛氏的觀點與立場來看，這本回憶錄可算是一篇坦白的自述，作者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都作了坦率的批評，有時他的批評是相當激烈的。葛氏對國民政府的批評，以及反共的言

論，作為一個殖民地的首長當時所處的地位來說，是可以理解得到，不過有點出乎意外的是他在著作中不只一次地批評了殖民地部的處事方式，顯示出在風雲變幻的年代裏，身為總督者也並不十分好過。

此書在翻譯的過程中得到了不少朋友及新聞同業的幫助，尤其是新亞研究所的周栢喬先生，近代中國經濟法律研究所的趙佐榮先生及同業吳志森鼎力幫忙，減輕了譯者的壓力。

曾景安

一九八四年春於香港

目 錄

第一篇：戰前的日子

第一章：香港，1922至1935.....	3
廣州與澳門.....	5
北京.....	12
結婚.....	19
社交及禮儀.....	22
鄉假.....	25
第二章：百慕達，1935至1938.....	28
湯馬士、阿斯理、葛比將軍.....	31
雷金諾·希約將軍.....	37
達斯和飛利浦.....	38
款待.....	39
第三章：牙買加，1938至1941.....	43
阿瑟·李察斯爵士.....	45
畢士塔蒙特.....	47
立法局.....	48
「皇室谷」和其他美麗的地方.....	51
戰爭.....	57

第二篇：戰爭的年代

第四章：尼日利亞：1942至1944.....	63
行政工作.....	72
軍事生活.....	73
社交.....	75
騎馬.....	78
1942年的聖誕節.....	79

訪客.....	81
官式巡視.....	83
總督府.....	87
鄉假.....	89
第五章：斐濟和南太平洋，1945至1947.....	90
忠心.....	93
勞工.....	96
旅行視察.....	97
西太平洋專員公署.....	102
「吉伯爾特」——「埃利斯」羣島.....	106
「所羅門」羣島.....	112
「新赫布里底」羣島.....	117
湯加.....	119
向南太平洋告別.....	124

第三篇：香港，1947至1957

第六章：返埠，1947至1957.....	129
重建.....	135
偏狹性.....	137
香港的統治.....	138
「是的，督憲閣下！」.....	140
行政局.....	142
政制改革.....	146
香港的鄉村地區.....	147
中、小學校及大學.....	149
飛機場及水塘.....	154
社會福利.....	155
公共關係主任.....	156
販毒及貪污.....	158
應酬.....	159
太平紳士.....	163

到廣州、澳門及南京訪問.....	166
九龍城寨事件.....	169
馬來亞告急及其他.....	172
到北京懷舊的旅程.....	174
第七章：共產黨的中國	175
「紫水晶」號.....	179
防衛措施.....	180
顛覆.....	189
邊界事件.....	190
難民.....	197
其他問題.....	203
大陸的醫生及教育發展.....	204
中國民航、「Yung Hao」號及其他	205
在韓國的戰爭.....	209
在美國講學.....	215
重要人物和其他訪客.....	219
遠足.....	226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230
重訪北京.....	233
「百家爭鳴」	240
來了一架國民黨人的飛機.....	242
1956年10月的暴動.....	243
關閉海軍船塢.....	245
第八章：回顧	248
中國和她的鄰邦.....	249
送別.....	252

第一篇

戰前的日子



第一章

香港，1922-1935

在一九二二年聖誕節前幾天的十二月裡的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這艘「約克郡」號的洋船穿過中國海而接近香港。在甲板上站着兩個行政級官員，一個是湯馬士·麥加理，另一個是我自己，兩人都懇切地凝望着快要到達的目的地，同時，欣賞這一展現在我們眼前、包括了海，陸，空的全景。船剛駛過進入海港的鯉魚門狹窄水道。一邊是香港島以及它一連串的山脈，最高處是維多利亞山頂，離地面的維多利亞城有二千呎。在另一邊是有「九龍」之稱的大陸，它連綿的山脈形成一幅燦爛的背景。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個被一個海島和大陸所夾住的海港是被譽為世上其中一個最美麗的地方，我們仍然想不到它是那麼漂亮和繁忙的。洋船沿着九龍倉的碼頭停泊，許多船隻掛着不同國家的旗幟。來自廣州及中國內河的船隻——漆上了中英文的船名——停泊在許許多多的海上浮標之間，正在裝卸貨物；平底船掛着好似蝙蝠翼的大帆在水上疾馳，來來往往的渡海輪，還有穿梭不息的汽艇，響著號角，東來西往，簡直活像一個海上商業繁盛的大舞台。這的確是令人振奮的景像。但是奇怪得很，這些繁忙的活動似乎和那些靜寂及雄偉的羣山相當協調：大自然和人沒有衝突，反而相互配合。海港是城市的心臟，正如後來我們才發覺，即使看不見它的時候，仍然會感覺到它的存在。

船泊好後，我們便要集中忙着把行李搬上岸，因為沒有人來接我們的船，苦力們爭着為我們搬行李，詐騙我們這兩個

無知的外來人。他們不會說英語，而我們又不懂中國話；然而我們還可以使他們明白，我們要過海去香港那邊。我們跟隨他們的意思，上了人力車後，他們拖着我們及掛在車杆上的行李小步地奔跑。人力車夫將我們送到渡輪碼頭，我們便乘坐頭尾相似的「天星」小輪渡海到香港島——全程僅五分鐘。從船上可以看到香港島的全景；當接近對岸時，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由水面冒起，有商業大廈，銀行及店舖，許多建築物還有拱廊，排列在岸邊，而這些建築物的背後便是向上急升的地勢；在這些斜坡上是房屋，愈高便愈稀少而且愈分散，直至到最高的山頂便看見許多漂亮的住宅，這就是山頂區，那時只是保留給歐籍人士居住。當時我感覺到，無論是那一種新的工作，在我們周圍都是美好的東西。

經過些許困難之後，我們找到了「香港酒店」，給他們索取了雙倍的收費之後便打發了搬運行李的苦力。這座是香港殖民地最大的酒店，但是由於年薪高達二百五十鎊，我們仍然住得起。下一步便要向輔政司署報到。酒店的侍役為我們僱了人力轎，沿着皇后道走去，我們沿途看到來來往往混雜在一起的汽車，黃包車，單車和拖着乘客及行李的人力車，也看到狹窄的街道直通到山頂，其中一條正是名符其實的「石板街」。跟着便是滿佈榕樹及蕨類植物的「炮台徑」；很快我的心情便緊張起來，好像我在第一天上課一樣。轎夫把我們停放在輔政司署；我們像兩個學童馬上便要走進校長室舉行第一次會面一樣。在遇到友善的接待和對方因為疏忽而沒有接船的道歉之後，我們便安心了。跟着有人告訴我數天後便要啓程到廣州兩年，學習廣東話。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在香港到處看看和購物。

在我的記憶裏，較爲特出的是乘坐山頂纜車，直達海平線上一千二百呎的山頂，在那些日子，纜車是唯一通到山頂的交通工具，除了有足夠的體力走上陟峭的「山頂道」之外，汽車是不准駛入這條通往山頂的道路的。到達山頂的纜車站後，可以乘坐黃包車或轎子；這裏給予人們的是平靜和舒適的感覺，而景色是一流的，從一邊看去，可以見到山下的城市和海港，而且還可以隱約聽到由下而傳來抑壓感的噪音。從另一面可以看到遠遠的小島好像在緋紅色的黃昏下從鏡子般的海上升起，入夜後更有無數漁船的燈光，像彩色的明燈般閃爍着。

廣州和澳門

從珠江而上大約一百英哩外的廣州，坐火車只需四小時便可到達，但是大多數人到廣州都選擇比較舒適的輪船，行程需要八小時，不論夜航或日航都一樣。我喜歡日航，因爲沿途風景美麗，尤其是接近黃昏的時候，看到農民和船夫成羣結隊地回返家或歸航，這些景像使我想起十八和十九世紀東方色彩的版畫；那些版畫或許沒有圖片那麼真實，但是它們最切實地體現當時那些景像的精神。

我覺得很難用「美麗」的字眼來形容廣州，說它能使人「興奮」還來得恰當。它甚至比香港還要繁忙，珠江和長堤簡直非常熱鬧，無論那一個時刻，到處都是船隻，有帆船、平底拖船、艍明輪船、汽船等，來來往往裝卸貨物和牲口，還有乘客上上落落，混雜着人們的叫聲和喊喝之聲、輪船的笛聲以及豬隻的叫聲。一離開海旁後，市內活動差不多一樣繁忙，可是嘈吵的聲音便不一樣了。



1923年，作者與同僚史葛攝於澳門。

原來的廣州市是由大幅的圍牆圍繞住的，城內沒有行駛汽車的道路，主要的街道也只不過十二呎寬，用大而不整齊的石塊砌成。到一九二二年，所有的圍牆都差不多全部拆光，而通衢大道也築起了。在大道上，汽車響着號角地風馳電掣，那些行人或黃包車阻着它們的去路的話，那就不幸了。這些都只不過是市內的大街，而美麗得像圖畫一般的小街道仍然存在；這些街道有許多店舖專賣一種貨品，有的專賣絲綢，有的賣象牙，有的賣銀器或珠寶玉石，而更有些專賣米、柴等實用物品。在「絲綢街」裏那些金漆的招牌和一匹匹美麗的織綿和綢緞交織成一幅鮮艷的景像。

大概有六個像我們這樣的受訓學員住在「衙門」裡，在清朝的時代是總督的住宅；這裡有兩座草木蔓生的建築物，一座是守衛的宿舍，佔地大概兩英畝，給外牆圍着，從這裡可穿過狹窄的「花塔街」走到一座佛塔。這裡雖然座落在擾攘的市中心，却有一股平靜的氣氛，好像倫敦的「寺」區一樣。其餘的學員都住在沙面；這是一塊四分三哩長、三分一哩闊的土地，有一條支流把它和城市隔開，小島的另一面是珠江。那時「沙面」還是國際租界，自設的市政局把這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條，和廣州其他地區形成一個對比。大部份的領使館和洋行都集中在這裡，好像一個小歐洲附設在一個中國的城市上。可是我却喜歡我們住的「衙門」，而不是沙面。

兩年內不用做所有其他的事情，只集中學習一種語言，要在講，閱讀和書寫方面得到好的成績應該沒有困難的。但是對外人來說，中文的確十分難學，而且在這樣多的方言中，廣州話是最難的了，更糟的是很少老師——我們還要自己找老師——

——懂得怎樣去教好學生。我相信在學習語言方面我已經算是平均的了，我十分用功而且通過了所有的考試；然而學完之後，我僅能在購物時使人明白我所講的說話，閱讀中文報紙最顯淺的部份和寫一封文法錯誤百出的簡單的信。在一個社交的閒談中，只需幾分鐘後我便跟不上對話了。二十年後，當我在斐濟任總督時，我以爲可以試用我的廣東話，在一個離島的村落和一個廣東店員交談，他迷迷糊糊但有禮貌地聽了我幾分鐘之後說：「你還是講英語吧。」在孩童時代學廣東話是最容易、也是最好的方法；有些歐洲人雖然在孩童時代沒有學過廣東話，但學習廣東話却有特別的能力。不過，這類人却甚少。在我學習的時代，太着重閱讀和書寫，而不是會話，這個錯誤現在已經更正過來了。

雖然我們都很認真地學習——或者起碼我們多數都是這樣的——我們還是有很多時間消遣。有些人買了一些矮種馬，價錢一點也不貴，我那一匹是十五「先令」。有時我們騎着馬兒下鄉去，最常去的地方是「白雲山」，那裡有一座寺院，可以和僧人打打交道；在炎夏的季節，我們會在早上天剛亮的時候出發，我們不是獨一無二的一羣早行人，這時正好是人們運載糞料到鄉間去的時候。跟着一隊携着糞料桶的苦力可算得是一個充滿臭氣的旅程；不過在很多事情方面人是可以習慣的，這包括了臭氣。有一兩次我們碰上地區上的內戰駁火，子彈在我們周圍橫飛，碰上這種情形唯有逃之夭夭了。

假如我們在每隔六個月所舉行的全部考試中都及格的話，在香港的當局是不會打擾我們的，而我們做夢也沒想過偷懶。有一次，一個警察學員上了一艘由他堂兄弟當船長的船去了

威海衛，由那裡他再取道去北京；不幸的是，那位由香港來的警務署長與他住在同一間酒店，署長問這名叫史葛的學員來北京幹甚麼——難道他不是應該留在廣州學習廣東話、而不是在北京學「國語」的嗎？還幸這個警務署長是個仁慈的人，而且也有幽默感。

我在廣州住了九個月之後，香港政府決定在舊「衙門」實行局部重建，我們中有兩個人要搬出去；這樣史葛和我選擇到澳門、而不願到沙面去。

由香港坐輪船到澳門要四個鐘頭，由廣州到澳門則要八個鐘頭；廣州是三角形的頂端，而香港和澳門則在東西各佔一角。我們帶同了僮僕、廚師、苦力、自己的傢俬、馬兒、一隻叫「溫黛」的狗、貓、毡酒及啤酒；我們這樣穿越廣州的街道當真引人注目，而且當時還開始下雨，我的僮僕撐開了傘子擋着床墊，那些毡酒和啤酒就放在床墊上，情況十分困窘。

澳門跟香港和廣州都十分不同。在香港大部份都是中國人，在廣州也一樣，但是在澳門却有很多的「歐亞」人，俗稱中葡混血兒；氣候則大致一樣，夏天炎熱潮濕，冬天則晴朗而寒冷。葡萄牙人在澳門已有四百年，他們留下的痕跡是很明顯的：許多狹窄街道和滿佈藤樹的建築物及房屋——有粉紅色的，藍色的，白色或綠色的——給人的印象是地中海的，而不是東方的色彩。隨着香港的開埠，它的天然深水港為澳門作為一個商港敲起了喪鐘，澳門是隨着時間的消逝而落後了，這裡沒有香港所有的那種生氣或者廣州的那種喧鬧聲，在這裡所看到的是一些紈袴子弟倚在市政廳的牆上或者在對面的廣場上一

些年老的「中葡混血兒」懶洋洋地在榕樹下休憩。澳門當時所留給我的印像與我二十五年後再去訪問時一樣：它曾經是一「艷婦」，她的青春和生氣已經過去了，但是她的雍容和魅力仍然存在。我對澳門是頗有好感的。

在我年青的時代，澳門的賭博和鴉片是臭名遠播的。最大的賭博是「番攤」，莊家前面是一堆錢幣——一種小小的中國錢幣，大小跟一個四分之一舊「便士」的硬幣一樣；他從這堆錢幣抓起一兩把，用筷子每四個一數，賭注買剩下一枚、二枚，或者三枚錢幣，又或者買他數定後再沒有錢幣剩下來。我覺得這個賭法十分沉悶，況且，「番攤」館一點也不羅曼蒂克，一點吸引力也沒有，有客人由香港來訪時我們才去「番攤」館走走，在我們看來，它吸引人的地方是免費喝酒。

澳門政府和香港政府當時都有經營鴉片煙的專利權；可是在澳門，這種經營權是分派出去給商人的，而香港方面則由政府來賣，這樣做的公開目的是不鼓吹吸食鴉片煙這種有害的習慣，並且間接地增加稅收。基於這種情況，鴉片煙價錢訂得很高，比之黑市價的還要高，而藏有非政府售賣的鴉片是一種刑事犯罪；不幸的是，這樣使到黑市買賣十分興旺，價錢比之政府所賣的要低，使到去光顧的一些窮人最後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一年，政府決定採取較為現實的態度，把鴉片的價錢大大降低，整個黑市市場隨即消滅了，而政府鴉片的出售量則增加，法庭裡被控與鴉片有關的人也沒有了，不過鴉片的吸食數量和人數依舊一樣；但是此舉被英國一些有好意可是却不大實際的人知道後，殖民地部便受到壓力，跟着便斷然下令，命香港政府回復舊價售賣鴉片。當然，這項命令是要遵從的；不過法庭又再次充滿了與鴉片煙罪有關的被告人，而且黑市又告恢復。我

常常在想，有關鴉片問題的普通常識被人撰述或討論得太少了；吸食鴉片大多是有害的，可是飲酒也是一樣；英國的工人喜歡在放工後喝他「一品脫」的啤酒，而中國的苦力則喜歡吸食一兩口鴉片。香港政府對鴉片的專賣已經廢除很久了，現在藏有鴉片是犯罪的；可是私運毒品的罪惡仍然存在，所不同者是吸食「海洛英」——一種從鴉片提煉出來而更有害的毒品——已經成爲習慣。或者更聰明的做法是不全面禁食鴉片，但是要認真控制它的銷路以及嚴厲打擊私運「海洛英」及其他毒品。

史葛和我却喜歡住在我們在「黑沙灣」的那所兩層半的單邊房子，離開市區以坐黃包車計算僅需廿分鐘的路程。我們勤力學習，但是也享受到騎馬到中國去的樂趣；因爲僅得二點五平方哩的澳門實在太小了，沒有地方馳騁；護照之類的旅行證件全不需要，我們只需由家中出發，沿着海灘走，這一刻在澳門，再一瞬間便在中國境內。不幸得很，我們的馳騁很快便終止了，由於盜賊從石後向我們開槍襲擊。我把馬兒送給了一位朋友，不過他很快便對牠失去興趣；沒法爲牠找到一個仁慈的主人，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決定採取唯一可用的辦法，那就是把牠毀滅；在一天的凌晨，我把牠牽到一個空地上，用手槍把它結果了，跟着便匆快地離開。我不時猜想，不知那些清道夫在市中心碰到一隻死馬時會有些什麼話說？我期望發生的是一個有生意眼的中國屠夫會切開牠，把牠的肉賣掉。史葛有幸爲他的馬兒找到了一個在香港的好主人。

在澳門時我們遇上了一場大得令人很不愉快的颱風；當時我正在等待我的老師，奇怪爲什麼他還不來。我很快便有答案了，因爲整個天空都滿佈烏云，而風力達到強風力量——所錄

得的風速達到每小時一百二十哩；我們的房子面對着一條路，這條路遠遠的一端是一度矮的防波牆，跟着是海灘和海；在正常的情况下，海灣是平靜的，甚至在離岸半哩的地方，水深也不超過六呎；但是刮起颱風時，大浪直打到我們的屋前，我們要堆起床舖和傢俬擋着那些法式的窗門，以防它們被吹開，後院的馬兒幾乎被淹沒，最可怕的是風眼掠過的時刻。當一切平靜的時候，我們發現整條路已被大水冲壞了；有幾個星期我們沒有水和電。幾年後我在香港也遇到另外一股同樣厲害的颱風；在八個鐘頭內，一共下了二十英寸的雨量，夾雜着不停和可怕的行雷閃電，使到晚間的天空如同白晝；我們差點以為這是世界末日，我所碰到的人都說被這股颱風嚇倒。許多破壞是由於傾斜的山坡冲下來的水把石頭和石塊推離原位而滾下山坡，把擋着去路的任何物件撞毀。

北京

一九二五年初，我通過了廣東話課程的最後一次考試後，獲得假期到北京去看望我的母親和繼父文迪將軍（General Munthe）；他和我的母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結婚的，我父親死於戰時。文迪將軍是一個有性格的人，他那一雙北歐人所有的藍眼睛炯炯有神，而他的鬍子是我所見過最大的。他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中國加入了中國海關的工作；一八〇〇年義和團事件時，他組織了第一列國際火車由天津到北京去解救被困的外國駐軍。後來他當了中國第一位總統①袁世凱的顧問，當時他是外國駐地的警務長——這裡的警察全是中國人，他們的白色護腿和正規警察所穿着的是有顯著的分別的。文迪將軍會說流利的「國語」，而多年來更學會了許多中國的事物，而且獲得了一大批的畫，瓷器和雕刻；至今每天吃過中午飯



1925年與未來太太攝於北京後父之家中。



文迪將軍——作者的後父。

後還是有兩、三個藝術品商人被引進他的客廳展示他們的珍藏，當每次他們離去後便多了一件珍品加進「文迪」的珍藏裡去。最吸引人的是一隻青銅碗——記不起是屬於那一個朝代了，安放在客廳裡，間中會自動發出一下清脆的聲音——雖然沒有東西和沒有人碰到它。不知這是否有幽靈給我們一些啓示？文迪現在有部份的珍藏放在「伯根」(Bergen)的博物館，這裡是他出生的地方；有部份則放在洛杉磯的一個博物館裡的「文迪將軍珍藏」展覽館。

當我乘船抵達上海後，才知道到北京的火車服務已因內戰而中斷；在極不高興之餘我惟有訂了返回香港的船票。不過在最後的關頭，我訂到了一艘過份擠迫的日本輪船上的床位，經迴航的路線到達天津，由那裡我轉乘了八小時的火車——通常只需三小時而已——到達了北京。

北京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它被巨大的城牆圍着，每隔一段距離便有城門；大道由北至南，由東至西；在這些道路之間是密密麻麻住滿了人的小街道，活像一個迷宮，那些小巷稱為「胡同」，這就是韃靼人(TARTAR)的京城，皇宮就在城裡面，由桃紅色的高牆圍着；在這個皇城裡面的中央就是「紫禁城」，這裡是從前皇帝和他的宮廷的地方。整座皇城佈局很宏偉——那些蓋着巨大金黃色瓦頂的聽政殿、內宮，和那些闊大的院子給人一個真實帝皇之家的感覺，而且生動地使人想到這裡曾經是一個大帝國的中央所在。

我的母親爲我安排到一些有趣的地方去觀光。有一天我們坐了黃包車到「頤和園」，這座園子坐落在離城僅數英哩的西

郊，是「慈禧」太后花了本來用於建立海軍的軍費，在原來被英法聯軍於一八六〇年時燒毀了的舊園子裡再興建的一個園林。^②

當穿過了美輪美奐的城門後便進入了高牆圍着的園區，跟着看到一羣羣的建築物，分佈在一連串的小山之間，配合着柔色，使整個環境顯得十分和諧。我們沿着在湖邊一個上蓋畫着花鳥及各種景物的走廊踱步；這個走廊另一邊有建築物和庭院^③，亭頂是用顏色燦爛的琉璃瓦砌成，亭角向上彎曲，附有各式各樣盜制的怪獸，目的用來驅邪；佛香閣建在山上，有直達的階梯和欄杆，在光澤的湖面上有一座駝峯形的拱橋；在一個叫「瀛台」的小島上，年青的光緒皇帝曾經在一段日子裡被「慈禧」禁錮在這個地方。「頤和園」對面曾經是皇帝狩獵的地方，這裡原是一座美麗的密林，現在已經蕩然無存了。

另外一天我們去了在北京城裡可算是最美麗的廟宇——「天壇」，以前每年皇帝都到這裡拜祭，祈求豐收。這座三重頂的圓形廟宇座落在一個佈滿密林的公園裡，那裏是在一條由大理石鋪成的綿長的人行道的起點；用天藍色的瓦做頂，配襯着天空的顏色^④在行人道的另一端是「皇穹宇」及用漢白玉石砌成無上蓋的石壇；我們曾經試過在一個有月色的晚上站在這個地方，在那迷濛的月色下，看起來的確有一種在天上的感覺。

我也曾經遊過座落在北京北面的「北海公園」，或是所稱的「冬天的行宮」，是元朝「忽必烈」皇帝最喜愛的離宮。我們在雪松下野餐，溜覽那些沒有人管理的地方，暢遊各個早已失修的宮殿及其它的建築物；各庭院都散佈着墜下的瓦片，又

看到雕刻和破爛的神像；穿過了大湖後我們欣賞到一個還有它原來那種光輝的建築物——就是用琉璃瓦砌成的「九龍壁」，其中四對龍用上雙互配襯的顏色，中間的那條是馬褂黃的色澤，可是由「九龍壁」護守的那座廟宮已經不在了。

在那些日子裡——雖然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北京那華洋混雜的社交生活是令人興奮的，又很世界性的，一切都十分有趣，而且很多是知名之士。外國人在他們那些中國式的房子裏宴客。庭院的四周是單層的建築物；接待的有時是一個考古學家或者一個植物學家，大家都為最近在戈壁沙漠或某個遙遠的地方所發現的古蹟而興奮；接待的也有時是舊畫、瓷器或陶器的收藏家，接待的甚至還有文學家及藝術家；間中一個名聞遐邇的軍閥也會到場露一露面，有時或者是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滿族公主，身穿綉袍來露個面。我有時也參加午餐會，晚宴和雞尾酒會；有時在週末到西郊的寺院旅遊、參觀長城、十三陵、或者到天壇去騎馬，使我忙過不亦樂乎。北京的街道也使人興奮；黃包車、汽車、四輪馬車、驢子車，使到市面極其喧鬧，而婚禮的巡遊更增加了風采；北京的貨運車却是由穿著美麗的馬衣的騾子拖着的；另一景象是一隊隊的長滿長毛的駱駝，穩步地由戈壁沙漠來到京城的街道上；可是每當一部載着軍閥的閃閃生光的「勞斯來斯」汽車響着號角疾馳而至的時候，行人都為自己的安全競相走避。

我們也逛過擺在一些寺廟的院子裡的市集，在那裡花少許的金錢便可以買到一件使人滿意的東西，例如一隻玉刻的馬、一隻鑲有瑪瑙或光玉髓的銀盒子、一件有油繪圖畫的鼻煙壺，或者一棵結着花果的梅花；在這裡討價還價是一種樂趣，對

買家或賣家來說可算是一種消遣。在一處行人道上的晚間市集，商品都陳列在一些旗杆下，用微弱的油燈照着，小販就蹲在地上叫賣。

我到了北京後便決定學習普通話，這是一種北方的方言，後來成爲中國的「國語」。我請了一位老師，他和我那位「廣東話」教師不同的是他懂得如何教學生；除了在文學方面，「普通話」比「廣東話」易學，只有四個「基音」，「廣東話」却有九個；我的學習是有進步的，不過不久之後我對學習「普通話」的興緻便轉移到慕蓮去了。她是一個年青的美國女孩子，來北京住幾個月，在我母親所舉行的茶會裡認識了她。慕蓮陪着我們到各處遊覽；我們時常一起吃飯，又在她所住的北京酒店裏的一隊白俄人樂隊的伴奏下跳舞。在我返回香港前幾天的一個陽光照耀的下午，我邀她一起在圍城上散步——那時人們都喜歡到這裡散步的——在走到一座城門之前，我問她能否適應在國外的生活、在大英帝國海外的領土上生活——即是問她願意嫁給我嗎，使我高興的是她似乎願意了。在走到城門時，雖然黃包車正在等着，我們還是依依不捨地走下了城牆的階梯；人力車伕似乎知道我們心中的喜悅，猛力地一面拖着車子疾跑，一面嚷着叫行人避開，就這樣跑着直至車子突然停在我繼父家那硃紅色的大門前。

我母親和繼父對我要結婚的消息似乎都不覺得驚奇，雖然他們說他們很高興而且還祝福我們。慕蓮回到三藩市去說服她的家人，使他們相信嫁給一個英國人和住在國外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而我在返抵香港後便被派到輔政司署任職。

結婚

在輔政司署的職員數目很是小的，除了輔政司外便是三個行政官員，廿多個文員；一個規模細小的辦事處的好處是彼此之間都會認識；不會像在一個大的辦事處的情形那樣，各人只是一張張模糊的面孔。輔政司施勳（Sir Claude Severn）是位仁慈的人，雖然有點自大，可是在那些日子裏，浮誇是和像輔政司或大公司的主腦這樣重要的人物是分不開的。那時候香港政府的行事是極為笨拙的，什麼都十分講究細節。幾年後當我了解它的運作時，使我吃驚的是，港督、輔政司及一些高級官員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去處理一些應該由較低級的官員去辦的小事。同樣的，輔政司署對各部門的事務那種過分細緻的控制必會使到那些官員們極度頭痛，而事實的確是這樣。假如政府有很多嚴重的問題要處理的話，這種吹毛求疵的做法可能不會發生；那些官員都沒有時間花在小事情上了。不過當時香港在國際及地區的政治方面很少有碰到嚴重的問題，僅有的只不過是行政方面的問題。

政府方面的核心人員都是一些行政級人員；他們不只在輔政司署及庫務署任高級職位，而且在警務署，教育和郵政部門任要職。在殖民地成立初期，這樣做還可以，那時英帝國的殖民警察、教育和郵政服務還未建立起來。可是今天整個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而且各個部門的領導班子逐一地被合資格的人所取代，最後一個被取代的是郵政署署長；在我後來回到這裡任港督時，我樂意地把這職位交給了一位殖民地郵政服務的人員擔任。

整個輔政司署的文員都很能幹和勤力，我相信整個政府內

部都是這樣的；由於他們都這樣勤力以致要立例管制所有文員在沒有特別許可時不准在辦公時間以外留在辦公室，原因是過度的工作會影響他們的健康。他們之所以工作那麼長時間粹純因為是自覺，而沒有額外收入的。那時根本聽也沒有聽過速記員那類職位；那時的文件都是用普通寫法寫好後而由一個中國打字員來打好。然而事物的進步是阻止不了的；雖然總務長反對，一位叫唐曉（Miss Thornhill）的小姐被委任為速記員；那時的确是頗為轟動的事啊！

那個時代我大部份的服務都是在輔政司署，直至被轉派到百慕達為止。雖然有時我因為上司沒有把該是我做的事情留給我去做而感到灰心，我仍然對那份工作有興趣；因為輔政司署是政府的中心，留在那裏使我對殖民地裏所發生的情有更好的認識。不過可惜的是這個工作沒有給我鍛練廣東話的機會；假如我更有進取心和並不是快將要結婚的話，我可能在工餘之後多練習廣東話的；但是我並沒有做到。

我曾經講過，那時香港很少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可是有一件麻煩的事情的確在我到輔政司署上任後不久便發生了，這就是中國在一九二五年對香港實行的杯葛和大罷工行動。問題的起因是在上海的多國控制的市巡捕，其中的一些英籍巡捕向一些中國人開槍^⑤。這件事引致一場全中國的反英的暴力運動，而最終導致全港的大罷工，中國政府更下令禁止香港貨物進入中國以及禁止貨物由中國出口到香港。作為一個低級的官員，事件的政治問題用不着我關心；對我做成不便的是要擔任特別的警務工作，同時因為家中的工人都已離去，要自己做飯和處理家務。後來罷工漸漸消失，可是禁運却延續了好幾個月

，對殖民地做成極大的損害。

初時我恐怕罷工會使到我的婚事延期舉行，可幸的這並沒有發生。慕蓮如期由她的其中一個姐妹陪着乘船離開三藩市，我母親也特別爲我這件終身大事由北京來到香港；婚期選在十月二十八日，那是天氣最好的季節。我的伴郎是史葛，我們在廣洲、澳門和香港都合住一所房子，他爲人友善，平易近人，而且夠高度和英俊，打扮好，看上去有點似貴族的味道，爲人頗爲坦率，甚至到了有點固執的程度，他的頭腦精靈，一般而言比之在警務署的同僚好；但是把這個看法告訴他的話會使他覺得十分窘迫。他和慕蓮的一位姐妹相愛，幾年後結了婚；自一九三五年我去了百慕達之後，我們便很少見面，只有間中在假期時巧合地碰面而已；一九四一年日本人佔領香港時，他還在香港，兩年後被日本人處決了；他的死不獨對我們是一個損失，對殖民警務也是一個損失，因爲在那時他已表現出卓越的才能。

即如在許多婚禮時也有發生過一樣，我的新娘遲到了，這不是她的錯；她是由施勳爵士送嫁的，在結婚那天他出席了一個爲他舉行的午餐會，當他到酒店接新娘的時候，未被人發覺便倒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在樓上的新娘和她的那位姊妹焦急地望着時鐘，開始發覺有些不對，她才跑到酒店樓下大堂，發現了施勳爵士。他被喚醒後，汽車立即把他們載到教堂；儀式過後我們在婚樂聲中走出了教堂的走廊。港督司徒拔爵士把他的遊艇讓給我們使用，載了我們去長洲，這島位於十哩外，那裡有一位朋友借了他的平房給我們渡蜜月。在酒店擺設的結婚接待會完結後，我們在人們拋擲的米和五彩紙花之中步行到綿旗飄

飄的皇后碼頭乘坐遊艇；正當船開始駛離，我們向岸上的朋友揮手告別時，我們聽倒一些突如其來、震耳欲聾的爆竹聲，意思是向我們祝福和祝壽，這是一種中國人習用的方式。一小時後我們到達了長洲的一個小碼頭，由那裡我們穿越一個漁村，走完了一條彎曲的小徑後便到達了建於懸崖上的房子。跟着而來的是快樂的日子，我們在島上到處遊逛，在白色的海灘上沐浴，又為將來計劃；那星期是月圓的時候，從房子的露台上，我們欣賞海上的銀光和在香港島上遙遠的燈光。

回到港島後便做婚後的第一件應做的正經事。我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山頂上的一間平房去，現在這個地點已經變為一幢住宅大廈了。我仍然僱用我單身時的傭人幫助我一起管理家務，因為慕蓮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尤其是在這塊英國的殖民地地上更加沒有做過家務。可是幾個星期後，她建議由她接管家務，說房子打理得不太清潔，而且傭人偷了很多食物；偷一點東西是可以容忍的，大搶便不可以了。她的建議使我吃了一驚，不過她堅持要這樣做，之後便接管了家務。很快我便留意到一些改進，但是那些傭人越來越不開心，最後離去投到別的單身漢家裏去揩油水去了；後來我們另外僱用一些遵照內子吩咐做事的傭人。

社交生活及禮儀

對於年輕的新婚夫婦來說，社交活動是一件容易和使人愉快的事；慕蓮很快便習慣這一切了。香港的社會是很國際性的，除了公務員之外，還有領事人員、銀行及商界人仕。與我們交往的有英國人、中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德國人和一些其他國家的人；我們都喜歡所有的社交活動，唯一例外的是婦女午餐橋牌活動，這些令人害怕的活動是在午後一時正的雞尾酒

會開始，之後是小吃，再跟着是講究的午餐，接着她們開始打橋牌，同時不時交換一些閒言閒語，茶點在三時許開始，接着又是橋牌的時間；最後是鷄尾酒會了，直到大概晚上八時止，客人才回家。慕蓮認為這些活動是一個累贅，簡直是浪費時間，所以她盡可能在不開罪人的情況下少去這種橋牌午餐會。我的入息有限，不過生活費也很低，小規模地招呼一下朋友是一種樂趣；從一開始我們便決定邀請不同國籍的人士參加我們所舉行的聚會，我們發現這樣做十分有益，由那時起我們都一直這樣做。

那個時候的日子裏，香港的社交是十分講究禮節的；大商行的頭頭及政府的高級官員都極為重視自己的地位，部下要對他們尊敬，而我們都服從這種做法，毛姆曾經在他那本“On a Chinese Screen”書裏相當諷刺地描述過東方世界那種社交方面的勢利；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沒有甚麼麻煩，因為我們也沒有意思打進那些「大班」的圈子裏；赴晚宴有時的確是件頗為隆重的事情，我們沒有私家車；即使有的話，通常也不能使用，因為有些房子座落的地方只能靠轎或者黃包車才能把客人送到；假如宴會的地方是在九龍，而天又在下雨的話，我們便先乘轎出發，然後坐山頂纜車，再乘轎到渡輪碼頭，乘船過海，然後再乘黃包車到我們的目的地——一共是五部交通工具；由於我們年青，所以我們不在乎這種跋涉。

我們最喜歡的是夏天的海浴和游泳，以及遊船河野餐。我們在下午出發，當船駛到某個美麗的海灣或者小島的時候，便有茶點，穿了泳衣後我們便輪流玩滑水運動；一小時之後，船便會拋錨讓我們潛水和游泳，或者坐小艇到岸上，體力較佳的

人會去散步。黃昏時晚飯便準備好了；假如那天有日色的話，我們還會繼續游泳一會，才乘船返家。向海港望去，香港島在晚間給人的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景色；數以百計的點點或連串燈光好像是在山頂上掛了一條頸鍊，使人分不開那些是星星、那些是燈光。我們最喜愛的海灘是大浪灣——其實除了在季候風和颱風侵襲的時候，這個名詞和事實不相符，這個彎曲的海灘由兩座山環抱着，背後是一羣山脈；我們在一些岩石後面更換泳衣，因為那時還沒有沙灘帳幕。

在冬天，散步是我們主要的週末消遣，可幸的是慕蓮和我都同樣喜歡這種活動。新界是最好的散步地方。在大陸上的新界的面積有三百五十五平方哩，這塊土地是中國在一八九八年租借給英國的，為期九十九年。⑥在我撰寫此書的時候，新界還完全是一個鄉村地方；唯一例外的是一部份已建設了的地方，但那只不過是九龍市區的伸延部份；除了一兩條村是較大之外，其餘都是郊野和未發展的地方。新界還包括超過二百個大小的島嶼；最大的是大嶼山；面積差不多是香港島的兩倍。長洲是唯一有一條大村落的島，或者可稱為一個小鎮吧。其餘地方的居住人口十分稀落，或者有些根本完全沒有人居住，原因是缺乏食水的供應。香港島的面積是三十平方哩，是在一八四二年割讓的——這和租借不同，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再多割讓四平方哩的九龍半島。⑦

有時在星期日或假日的早上，我們會一早出發到九龍去，然後再改乘火車或鄉村巴士到一些偏僻的地點，從那裏我們便出發到深山步行，這一整天我們上山下谷；攀上一些山頂俯瞰整個鄉野全貌，又爬下險峻的山谷，瀏覽那滿佈在谷內早已收

割好的梯田。我們每經過一些小村落，便和農民們交談；也曾踏過一些古道路面，鋪滿了和山那般古舊的石塊；有時也看見一些小廟宇，座落在渺無人煙的地方，讓過路客停留休息或者燒香，我們也會在這些地方燒香供奉在祭壇上。間中我們還留意到在一棵古老的大樹下有一個神龕，顯然這裡是個神仙棲身的地方。

鄉假

我們從結婚起至離開香港到百慕達去足足有十年的光景。在這段期間，我們有兩次回鄉渡假，一次長達十八個月，一次是十二個月。這樣長的假期是不正常的；這是由於在第一個假期裏我要學習法律，而在第二個假期裏我在皇家國防學院上了一年的課程。三十年代初期尚未成立殖民地法律服務的時候，裁判司的職位都是由行政人員擔任的。假如他們對法律的工作有興趣的話，他們可先取得執業律師的資格，在適當的時候便會被委任為殖民地法官。但當殖民地的法律服務制度成立之後，便沒有人可以這樣地獲得委任了，除非他已經擔任律師的職務達到若干規定的年期。而裁判司同時要是殖民地法律服務人員才可出任。對做官的來說，這條例訂得頗為聰明，因為有些行政出身的法官對法律知識方面比較薄弱，而且甚少有執業的經驗。在另一方面，我認為行政官做裁判司較沒有經驗的大律師出任該職為好。在我得到了執業律師資格之後返港，我被委任為初級裁判司。這份工作除了使人感到有興趣和有人情味之外——因為我出任的地區是香港最為人煙稠密的地方——我對自己可以主宰一切而覺得滿意，原因是一旦坐上了審判席上，一個裁判司在審查事情方面就好像一個國家的君主一樣。這種轉變對辦公室裏的低級職員來說是令人喜悅的。然而法律界竟不

是我注定的職業；沒有在律政方面的足夠資格，再加上我自己喜歡行政的工作，在十八個月之後便重返輔政司署。

在我第二次回國渡假的時候，輔政司署讓我選擇調任殖民地部兩年或者選擇到皇家國防學院攻讀一年，我選擇了後者。這個學院是一所為各方面的公務員而設的學府，被選派到這裡的人員都曾經在為各自的部門而開設的那些學院學習過的，另外還有一些來自海外領土的而數目有限的英國官員及公務員也在這裡就讀。這個為期一年的學習課程是多方面的，使人感到有趣味；對一個殖民地的公務員來說，這算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我是第一個這類的人員被派到這裡上課的，而我從來沒有因為在這裡花了十二個月去學習而後悔。

在第二次回鄉渡假期間，我申請了調職；向一位善解人意的殖民地官員解釋說：雖然我在香港覺得如意，而在我上面的兩位上司也很能幹，我可以見到假如我繼續留在那裡的話，我是沒有晉升的機會的——他們注意到我的請求，跟着我便返回香港去。幾個月後，我就被委任為百慕達輔政司，這件事情的確令我興奮，不過也有它的壞處。我的薪金會少了三份一，而且還要自付自己及太太由香港到百慕達的船費。不過看一看過去百慕達那些輔政司的經歷，我發現沒有一個曾經在該處服務超過三年便被調到其他地方出任一些更高的職位的。慕蓮和我商量過後便決定了這個更使我們覺得有趣、却又有點不明確的路途。就這樣，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們啓程赴紐約，乘坐一艘只裝載十二名旅客，名叫「三色旗」的輪船，沿途經過上海、神戶、大阪及橫濱，穿越太平洋到三藩市，然後再經巴拿運河到紐約——全程需時六個半星期。我從來未嘗試過這樣美好的

航程。遠洋航程我特別喜愛的是乘坐「皇后號」客輪的頭等艙或者只載十二名旅客的貨輪。在紐約我們過了十天愉快的日子，探訪了朋友和觀賞了戲劇；跟着便登上「百慕達皇后」號，在船上我們受到了一次僅次於接待大人物的歡迎儀式，這是我們第一次享受到令人高興的接待禮儀。

第二章

百慕達 1935—1938

百慕達因為從莎士比亞在他的劇本《暴風雨》裡曾經提及過而聞名——阿麗愛對普洛士帕羅說：「你曾經在午夜把我從那兒叫來，去那經常被暴風雨侵襲的百慕達島取露珠兒……」。這些島嶼是西班牙人，百慕達斯所發現的，並因此而得名，可是西班牙却從沒有宣佈擁有及佔有這些島嶼，原因可能是這個島給水下的珊瑚礁圍着，使到航行非常危險；也可能是由於這些島嶼棲息着魔鬼與精靈得到了臭名——其中的一個島嶼就叫做「魔鬼島」。一六一二年，那艘「海上探險」號的船就在這裡觸礁後沉沒，當時她載着一批殖民者由英國去維珍尼亞；從這船留下來的白人就是現在的白種百慕達人的祖先。百慕達的有色人種佔人口的三分之二，是從非洲帶來的奴隸的後裔。

開埠三百六十年以來，百慕達的經歷是多姿多彩的；頭二百年中，航海是主要的職業；航海業並不限於捕魚或運載貨物來往西印度羣島、美洲及英國之間，也包括了私掠巡航，這是一種合法化的海盜經營；這種經營被禁止後，那些足智多謀的百慕達人便改而從事「破壞」船隻。他們用燈光引渡船隻撞上珊瑚礁石，然後去「救」它們，但是船隻要付出一筆報酬給島民。誰能想到廿世紀的百慕達人是多麼慎重地保衛着們的獨立的性格？有誰想到他們的祖先就是這種充滿活力和勇於創業的人？我發現百慕達人是很受人欽佩的民族，當他們認識你之後便會很友善，我十分喜歡和尊重他們。近代有很多百慕達人和美國人及加拿大人通婚，可是百慕達的性格仍然保持不變，這點使

我覺得高興。

「破壞」船隻的經營被迫停止之後，殖民者的生活便發生困難了。他們不大喜歡耕作，後來百慕達的洋葱、馬鈴薯和百合花在美國找到了受歡迎的市場時，生產工作都由速爾羣島來的葡萄牙人承擔起來。美國爆發內戰後為百慕達帶來機會——藉着破壞禁運而謀取暴利，那情形就好像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禁酒時期一樣。

然而百慕達的真正生機是來自旅遊業，現在它已經是殖民地的最大產業。那裏氣候宜人——完全不是莎士比亞所說那種風雨交加的地方——十九世紀末已經開始吸引美洲的遊客；有些美國總統把它當做遠離國家事務的避難所。還有許多作家都來這裡寫作，比方說，馬克吐溫便經常來到這個他說過是「平靜和使人滿意的地方」；一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來這裡的大多是富有的美國人，他們租了房子過冬，這類遊客目前仍然到這裏來，但是百慕達已經發展成爲全年的旅遊地了。

百慕達有很多事物可供人們欣賞：雪松（可惜現在都沒有了，一場疫症將所有的雪松都毀滅了。）、馬鞭草樹、竹以及其他的樹木；也有白色及粉紅色的山毛櫸和夾竹桃，它們那鮮艷的桃紅色與藍寶石色澤的海面相映成趣；還有那木槿屬的植物，百合花及其他的花草等。另外百慕達還有彩色的珊瑚寶庫，白色的頂部在月色下形成十分迷人的景色。所有的島嶼都是由珊瑚礁石形成，上而覆蓋着一層土壤；建房子的話更可就地取材，只須把一塊塊的珊瑚石鋸開，割開的珊瑚石又可以用來蓄水。每間屋都須要儲起落在屋頂上的雨水來飲用，政府立

法規定所有的屋頂每年都要填上石灰，被儲起的雨水由年頭至年尾都是那麼清澈，這可算不簡單的了；假如雨水不夠的話，食水便要由紐約運來，那麼費用就十分昂貴了，不過這種情況甚少發生。

除了英國之外，英聯邦國家中，百慕達的國會假如不是成立得最早的話，也是其中最早的一個，百慕達人都引以自豪。它有下列議院和上議院。下議院，稱議會，全部議員由選舉產生，其中之一位就任「首席議員」；上議院稱立法局，包括當然的官守人員——他們之中有輔政司，其他的是非官守議員；不過主持的却委任了按察司，而非其他任何人士。上下院各有的權力均衡。百慕達的行政大致上是相對於英國的內閣，而總督就是行政局的主席，另外依據職權而當然被委任為議員的官守議員包括輔政司，局內還有其他官守議員，其中有些行政局人員也是下議院的成員，這樣可使行政及立法有更好的聯繫。

百慕達並沒有政黨，我懷疑政黨的存在可曾對這個殖民地帶來好處；也不徵收入息稅，這是故意實行的政策，目的是吸引外商前來登記開業，他們要付登記稅，但與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所支付的稅項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在政府的收入來說，這些登記費也不算是一項巨大的收入。

當「百慕達皇后號」沿着北岸緩緩而駛的時候，我們站在甲板上望着愈來愈近的新居所，看着輪船慢慢通過兩個小島之間的通道進入咸美頓港；沿途經過公主酒店，咸美頓碼頭，皇家遊艇會，首府以及它的主要街道——「海傍街」。在岸上的人大聲對着船上的親友叫喊。這十二月陽光燦爛的景象，配合着碧海藍天；人們穿着白色及花色衣服，街上擠滿了腳踏車、

馬車，構成一幅和剛離開紐約市形成鮮明對比的圖畫。

湯馬士，阿斯理，葛比將軍

署理輔政司和總督副官上船來歡迎我們，跟着上岸乘坐總督的雙座位四輪敞篷馬車經過市鎮和一條兩面種滿雪松的大道，穿過一個斜坡，抵達山上的總督府。那灰色混凝土的外牆實在不敢恭維，不過房子的位置則不錯，有寬敞的花園，一面是市鎮，另一面是大海。總督葛比爵士和他的太太，奧麗花，以最友善的方式在門外歡迎我們。寒暄數分鐘後，總督說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完成五項宣誓，接着帶領我們進入他的書房。「朋友」他說，「讓我們先喝點『毡』酒吧！」我們就這樣每做一個宣誓前先喝一兩口「毡酒」，而這時候只不過是早上九時！那時候百慕達的酗酒情況十分厲害，使到不少有為的人墮落。那些習慣現在已經改正過來了。

在總督府居停期間，我們漸漸了解我們的主人，彼此變得十分要好。湯·葛比是一個多姿多彩的人。高大的身型和高貴的儀容不啻是一個理想軍人的容貌。他通常說話滔滔不絕，而且喜歡說些令人難以容忍的話，以及一些使人大為憤慨的話。有一次晚餐的時候，他對着桌子對面而坐在他太太身旁的主教大聲說：「主教，你知否按察司買緊身胸衣的那間舖子就是我太太買胸衣的那一間？」他對殖民地所有的人都認識，也知道當地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是一個極受歡迎的人物。當我在廿年後重遊百慕達時，很多人還記得他，而且還是那麼喜歡他。除了我對他個人十分欣賞之外，我還發現他是一個好上司。他的太太在容貌和人格方面也是最吸引人的。

輔政司是沒有房屋分配的，要找房子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比較適合的房子都被來這裡避寒的美國遊客租用了。下議院曾經考慮過分配一所房子予輔政司，但是這個提議被否決了。後來有人偷偷的告訴我，理由是假如我獲到分配的話，下議院也要分配一間給按察司，雖然他們是喜歡我，不過按察司却不受人歡迎。我們到底也找到了一間房子，可暫住數月直到葛比上任後我們可以在新總督上任前搬進總督府住。不過，離開在他到任時我們又要再去找房子了。還幸有位美國朋友來解救了我的困境，在她離開渡暑假的時候，將她的房子租給我們，使我們可以繼續有時間去找合適的房子。最後我們找到了一間很美麗的房子—— La Garza ——座落在「佩奇」教區。我們喜歡這座一樓房舍較諸我們曾經所住過的還要多。除了白色的屋頂和欄杆之外，全個房子都是粉藍色的，可能是由十八世紀時一個私掠船船長所建的，所以沒有後來人們所建的屋子那種優雅的格調吧。那間長型的客廳有托盤形的天花頂，法式的窗子，一個來自歐洲的白色大理石壁爐，而飯廳也有兩個壁爐，窗外的風景優美。屋內的傢俬有好，有壞；我們拋掉了壞的，把好的留作自用，同時也增添了自己帶來的傢俬，那些地氈是在香港特別訂做的，其中一張淡白色的放在客廳。

花園裡有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那一小片竹林假如不時常打理的話很容易蔓生開去；杉樹、馬鞭草樹、松樹、棕櫚樹、橙樹、雞蛋花、蝴蝶屬植物、多香果，以及一束束的白和粉紅色的姜花和夾竹桃。春天的時候，許多奶白色，白色和紫色的蒼蘭植物好像玩魔術一樣利時間生長出來。一棵老年而晚間開花的仙影拳已爬到一棵樹的樹頂，附近一個花架已被攀藤植物蓋滿，它那金黃色的蓓蕾可以置於晚宴的餐桌上，然後讓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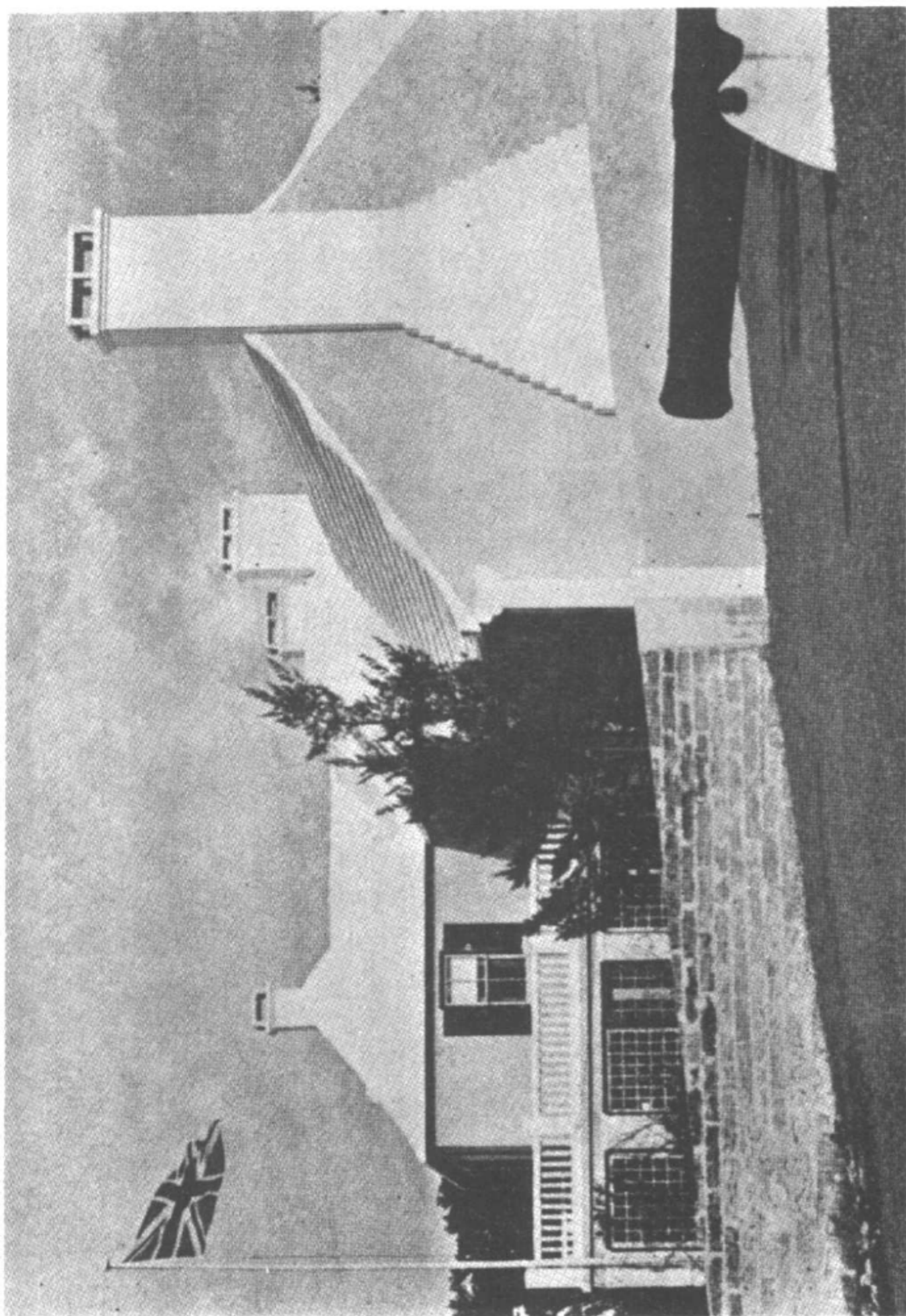
在開花時那「卜」的一聲來娛樂賓客。同樣的，我們也置晚上開花的仙掌拳於桌上，待它慢慢開放；露出杯狀的花蕊，同時散發出一些香氣。

百慕達簡單的生活方式和香港那種複雜奢侈的享受截然不同。除了總督府和海軍司令官邸的晚宴外，一切都是官式的晚宴——到這些場合戴黑領呔便可以了。赴這些宴會唯一的缺點是要騎單車。晚間租用馬車外出是十分昂貴的，我們都很少這麼花費。慕蓮是很感受到這種痛苦的了，因為她的衣服通常被後輪纏住。有一次去赴宴的時候，她從單車上跌下來，衣服也給弄污了。雖然我很少聽到她的詛咒，這次算是其中之一次了。然而她通常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氣，同時還可以不使衣服被損壞。在戰前，百慕達是不准行汽車的；騎着單車沿着珊瑚石的路上踏着，沒有鳴着號角的汽車帶起沙塵來弄污人的衣服，這是件多麼令人痛快的事情！

當葛比將軍退休離去之後，我們搬進了總督府住。大多數殖民地的做法是假如總督有一段長時的期不在的話，如在他的去任後和新總督到任前的那段時間，通常都是由署理總督的輔政司住進總督府的。百慕達的情形却不是這樣，而原因也很明顯。在這裡，大多數的情形之下，總督是一個將軍，而他被分配到的士兵——從僕都是從駐軍那裡派來的。一個署理總督的文官則沒有這些特權。況且甚至假如那些士兵——從僕願意服侍他的話，他們都會表露出一份優越感的態度。此外，總督自己花一大筆費用從英國所帶來的傭人都因為主人放假而自己也跟着放假；另一方面，好的傭人在百慕達很難找到。除了一輛馬車之外，其他的馬和車子都是總督的私人財產。可是為勢所逼



作者和太太攝於百慕達的家中。



在百慕達任職時的官邸。

，我們沒有房子住，只有自己搬到總督府裡去，同時也帶了自己的廚子；另外渴望總督的士兵——從僕會繼續留下工作。回想一下，我們懷疑那裡有能力去應付那種情況，而且怎樣捱過去。有幸的是在無意之中我們便投身進入這個情況。雖然由於我們保持冷靜，外人沒有覺察到，我們很快便知道了自己所處身的環境。其中有一天所發生的事永遠留在我們的心裡。在客人快要到來參加我們的一個盛大午宴的時候，兩個士兵——從僕，一個是管家和一個僕役，說他們不幹了，甚至說不願意留下招呼客人；我用盡了我的所有說服力去使他們願意留下直至宴會完畢為止。此舉不但成功了，而且他們還願意在我們住在總督府這段時間內繼續留下。當我在應付他們兩人時，慕蓮便在廚房去安撫那個正在發脾氣的廚師。在總督府居住那段日子好像渡日如年，可是我們却也捱過了。自此，我在百慕達任內，每當出任署理總督時再也沒有膽量住進總督府裡。當然我們以後便不可以用「總督閣下」的那類排場去宴客了。

在其他方面，做署理總督也有好的地方，而工作也較輔政司為輕。我曾經在一次出任署理總督時草擬了一項非常複雜的退休金法例。每星期日我都會騎單車到不同教區的教堂去聽道。有一次一位教區牧師先向我鞠躬，然後才向聖壇鞠躬，我認為這種優先是不必要的。另一次我須要穿著制服出席一個儀式；由於沒有官服，我坐車到那間建築物的橫門，在那裡下了車後進內，才正式入場參加儀式。在百慕達做一個署理總督並非是一件完全容易的事。

百慕達比香港小許多，政制也完全不同，所以我履行職務的方法也不同，而且在這裡我並不是輔政司內的一名低級職員

，而是它的主管。如香港這樣的殖民地，權力是在總督的手中。百慕達便不同了，這裡總督比較像一位立憲的君主。假如他要履行一項特別的措施時，不論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或者由於殖民地部的督促，他都要做得份外小心。若他要做的事是要徵收入息稅，但若被下議院否決的話，他便不能從心所欲了。葛比是精於進行遊說的活動，可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是百慕達人知道他是一心一意為這殖民地的福利着想。相對之下，他的接班人的處事方法則比較笨拙，而且他不會掩飾對百慕達人一點也不關心的事實，至於對那些作為百慕達經濟支柱的美國人，更不消提了。輔政司的職責是盡力去支持總督的工作，他的地位就好像位總參謀。可幸的是我和大多數人都合得來，而且我發覺下議院的議員都通情達理和十分合作；雖然很多時他們的意見和我的不同，並且一意孤行地去做。文件的處理並不如在香港時那麼繁多，因此我的工作並不辛苦。

雷金諾·希約將軍

雷金諾·希約將軍會出任新總督。一如以往的做法；我寄給他一份有關他到達的安排，這些都是根據以往新總督上任的做法。但是他的覆信使我驚奇，因為他反對我提出的安排，而附上一份另外的安排，必定要我們遵照去做。我祇好將此安排轉致予威美頓市的市長。他是這件事的主要負責人。這位上了年紀而厲害的百慕達市長亨利·蕭令頓爵士不同意那個做法，他說：

「任何適合於接待威爾斯親王的安排當然也適合接待希約爵士的。」

我將蕭令頓爵士所說的詞句加以適當的修飾用電報轉給希

約，而那時他已經啓程離開了英國，他的覆電語氣更爲強硬；堅持要我依他的吩咐去做。我再造訪蕭令頓，可是他不肯讓步。我又再去電給希約；就這樣地電報往還，把我夾在其中，彷彿前有大海，後有惡魔，迫使我盡可能依他的指示去做。私下我也認爲他不對，不過我沒有把這個想法告訴蕭令頓。最後，市長說假如不採用原來提出的計劃的話，他和其他的人都杯葛上任儀式，這樣希約便惟有放棄己見了。很明顯他不了解百慕達人，而事實上，他從來並沒有去了解他們。當他抵埠時，他很清楚地告訴我他對我的看法，這樣做對我們兩人的關係來說決不是一個好的開始；尤其是我其中的一頭狗，達斯，幾乎咬了他一口，這種情形對我們的關係當然一點幫助也沒有。

爲了要有一部汽車，希約想更改現有的法例，不過此做法需獲得下議院通過。當兩次嘗試都相繼失敗之後，他要脅地說假如他的請求不獲准的話，他便辭職。請求最後也沒有獲得通過，而他真的辭了職。希約是個仁慈的人，但是挑選他出任百慕達總督却是個錯誤。然而要找適當的人選却並不容易，因爲那份薪俸根本就不足夠維持一個總督的開支，身爲總督的辦事時要自己掏腰包的！

達斯和飛利浦

達斯有一個孿生兄弟，名叫飛利浦，不過牠們樣貌完全不相似，兩隻看上去都是普通的雜種狗。葛比是在一條溝渠發現牠們的，牠們當時還是很細小。自從收養牠們後，他到那裡都帶着牠們，他知道我們喜歡這兩頭畜牲，所以在離任時留給了我們。每當我騎單車上班時牠們都跟在後面，整天留在辦公室。我們去那裡牠們都跟着，甚至有些地方牠們是不應該去的也

不例外。倘若我們去了朋友家，牠們也有辦法跟踪到來，毫不客氣地佔用了人家門口的地方，好像這是牠們的家一樣。每當我們在家中請客時，都會把牠們關起來，不過牠們總是有辦法走脫的。然後走入飯廳，鑽進枱底，遠離我和慕蓮的座位；牠們好像知道是不應該在那地方出現的。假如我抓着其中的一隻的話，牠會發出可憐的叫聲，好像我是正在打牠一樣。「你真殘忍」，客人會這樣說，眼睛責怪地看着我。當然這些都只不過是那畜牲的惡作劇，使我受窘而已。當牠被牽離的時候，牠對我眨眨眼，似乎對牠的惡作劇感到滿意。牠們最喜愛的社交活動是婚禮招待會，必定會破門而入；避開了我們之後，牠們會在客人之中跑來跑去，找到甚麼便吃什麼。使我們很不愉快的是當我們離開百慕達的時候，要把牠們留下，因為牙買加的法例不准帶狗隻進口。但是我們很高興能夠為牠們找到一處好的歸宿，而牠們日後的生活也很快樂。

款待

當我們在La Garza住下來之後，我們在家中款待過不少朋友，這是我們都喜歡做的；而且我們認為總督希約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應該由我們來彌補不足之處。好的傭人很難找到，所以當我們聘請到一位管酒膳的英籍人，陶費，我們都感到幸運。陶費原來的僱主不久前返回英國，他樣樣皆能，由調酒至烹飪，甚至整理床鋪。雖然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紳士的紳士」，但他有辦法和有色人種打交道，在舉行宴會的時候，我們都到附近的「英華奴利」酒店請臨時幫工。我還記得付了六個先令給每個幫工作為一次工作的報酬。我相信現在的工錢要達到六鎊了。他們和陶費相處融洽，使我們完全不用費神。「留給我來做吧，太太，」這是他常用的慣語。他來後，

只有一次發生問題，其實也可說與陶費無關。事原我們邀請了一些來訪的德國戰艦的官員參加我們的鷄尾酒會。我剛剛穿好衣服便聽到步操的聲音。看見窗外有一大隊德國軍官迎着我的大門而來。我們和在屋裡的客人都趕到樓下迎接他們。他們記錯了時間而早到了一個時辰，距離其他賓客前來赴宴還有一小時，時間實在不短。他們到達之後我的酒會便隨即開始。

這些軍官都很引人注目，他們喜愛交談，有教養和禮貌週週。他們逗留的時間比預訂的長，有許多還受到一些賓客的邀請，一同離開到他們的家裡吃晚飯，跟着再到一間酒店跳舞。第二天我們聽說他們很喜歡百慕達的女孩子，不過應該這樣說，那些女孩子也很喜歡他們。

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家中吃茶點時，坐在窗口的位置，旁邊是一位老處女，她出身於百慕達最有歷史又最受人尊敬的家庭裡。我們兩人都喜愛那種胡桃巧克力方餅——一種細小須要慢嚼的餅乾。我那位朋友拿着這件好吃的餅乾咬了一口；當她拿開尚未咬去的部份時，她那副前段假牙牢牢的被粘在餅乾上，在我眼前搖動，使我嚇了一跳；當時她尚未發覺已失去了一件東西時，我立即把頭轉過去望出窗外，佯作觀看外面的景物，同時盡量抑壓自己那幾乎忍不住的狂笑。當我把自己的情緒控制下來後，再回過頭來，她那副假牙已經被放回原位了。

沒有什麼東西比百慕達的婚禮更令人獲得享受。坐着一部白色滿掛絲帶的雙座馬車，前往那用一品紅聖誕花裝飾的教區教堂，坐在教堂內古老的靠背長椅上，唱着傳統的詩歌，由窗外望出去看到堆堆白雲抹在晴空。當新娘正在那沉長的儀式中宣誓去愛和服從的時候，自己的心却想着別的事情，最後在教

堂的鐘聲中步出大門，受到午後陽光的照射，不啻是件十分羅曼蒂克的事。新娘子的屋子是築在一個梯田形的花園內，在那裡舉行了一個招待酒會，朋友可以大家聊天。新娘子切過禮餅、祝福和演說都完結後，一棵細小的杉樹插在新郎的禮餅上。新娘用過的鮮花被拋送給伴娘們；最後在一陣陣小米散落之中，新娘子仍然穿着白色禮服，登上一部掛滿了鮮花的馬車，前往他們自己選定來渡密月的神秘地點。整過氣氛都充滿歡樂和賦有百慕達的風格。

有一晚正當我和慕蓮在「比蒙采邑」酒店共舞的時候，有人喚我去聽一個一個電話，在電話裡對方說，我會被委派到牙買加出任輔政司。這的確是令人振奮的消息，因為由百慕達轉到牙買加是一個很大的晉升。不過這個轉變感受苦樂參半，因為要放棄自己心愛的家，同時離開我們已渡過了三年快樂的日子的百慕達。但是既然是世界服務的成員⑧之一，我們必須預料到這種情況。慕蓮去了牙買加一段短時間，目的是看看牙買加的房子是怎樣的，那些傢俬和那些地氈可以適用，因為牙買加輔政司的官邸傢具設備一應俱全。不幸得很，我們大部份有的東西都不合用，因此我們盡量把不能再用的東西賣掉。在英渡假三個星期後，我們便乘坐「亞里君尼」號船去京士頓。那十四天的航程是令人感覺舒暢的；當我們再向南行，進入熱帶的區域時，這種感受愈來愈深。我們忘却看見飛魚那種激動的情感，南方的深藍色的天空和那些白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雲層好像絨毛一樣；日落的景像和它初時燦爛奪目的色彩，其後不知不覺地變為青綠淡紫以及橙紅的色調，所有這些都與北方的景像極為不同。我們享受到悠閒的下午，在甲板上閱讀或者聊天。通常我們會縱情享受晚餐前的游泳，這個帆布帳的泳池是設在船後的

甲板上，這樣一直留在水中直至最後的一線陽光消失，而傍晚的第一批星星出現為止。倘若人們是來自溫帶的地區，便會感覺到熱帶的白天和晚間顯得十分清晰的，月亮似乎比較大些，星星也較為明亮。在我們航程最後那幾天，還可以看到那可愛的星座，南十字星座，由水平線冒升起來。

第三章

牙買加，1938—1941

牙買加的名字是取自「阿拉域，牙買加」，意謂「泉源之地」；而事實的確是這樣，到處都是噴泉，河流沿着山谷而下或者由熱帶森林流出，成爲瀑布流向大海。「阿拉域」族是當地的原來居民，他們是一溫和、友善的民族。不幸的是他們太溫和了，以致沒法對付西班牙人而被滅族。

一六五五年正當克倫威爾的時代，雲那堡斯將軍和賓恩海軍上將將西班牙人趕出去，牙買加便被英國統治了；賓將軍的兒子是賓夕凡尼亞州的創建人。

當「亞里君尼」號接近京士頓海港時，我們很興奮地欣賞高聳的「藍山」以及它那深紫色的深淵。一條長的沙堤由海港的入口一直伸展好像一鈎彎月，把水圍着形成一個環礁湖。這裡在十七世紀時是「皇家港」，是牙買加的首都。在奶白色海灘上，棕櫚樹倒影在透明的水深之中，而在那些深紅的熱帶藤從深紅的叢林背景後，突出了它那鮮明的色調。一抹灰色石頭砌成的圍牆和教堂的塔頂遠遠也可以看到。許多商店把各式各樣的奢侈品堆陳在圓石砌成的街道上，而住宅用的房屋則幽靜地隱藏在茂盛的樹林裡。這就是「皇家港」，亦稱爲世界上「最富有和最險惡」的城市，它也是海盜和一些肆無忌憚的冒險家的聚集點。不過在一六九二年，上帝降怒於「皇家港」，在一個星期日的早上，用地震和海嘯向它襲擊。這個美麗的城市過去所留下來的東西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的是幾間被荒棄的建築物和「查爾斯」堡的防禦高牆。其餘的都沉在海底裡

，有人說海潮至今仍然撞擊着沉沒了的教堂的大鐘，發出一些聲音。其中之一個生還者是個牧師，在地震前的星期日，他曾經警告過沒日即將來臨。

這次災難之後，牙買加的首都在「西班牙鎮」上的地方重建，這鎮原來是由西班牙人在一五二三年時創建的，名爲「聖拉維加」。離開京士頓僅有十二英哩，「西班牙鎮」很適合作爲政府行政的地方。首都在一八七一年由那裡搬至京士頓，自那時起一直都沒有搬遷。今日的「西班牙鎮」仍然靜靜地躺在陽光的照耀之下，過去留下來的的重要建築物仍然團團圍着那個廣場。一邊是「皇室行」的正面建築和由白柱支撐着的門廊；對面是過去的議會所在，另一邊是法院大廈，這邊的對面是「羅尼」紀念館，裡面有賓恩上將的石像。廣場附近的是聖公會教堂以及它的墳場，那些古舊的墳墓已經積滿了塵土。裡面的牆和地板都刻滿了紀念文句，雕刻工藝十分細膩，也陳列了過去幾個世紀偉大人物的盔甲。滿佈藤樹的房舍由廣場一路向外伸延，不受陽光散發熱氣的侵襲，一切顯得很靜寂，好像和世界隔絕一樣。這裡沒有商店，行人也難得一見。

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去追憶過去了，我們的「亞里君尼」號郵船已經泊岸；而總督的副官和其他的官員正在等着我們，一些記者也來採訪和拍攝。我們發覺，在牙買加，拍照是差不多無日無之。牙買加有一份辦得頗好的報紙，《每日資料》報。最近又多了一家新辦報紙《標準》報；我不明白爲什麼有人說這張報紙的言論過分激烈。它的生命很短，在我離開這個島之後不久便停刊了。另外有些週刊和月刊也辦得不錯，因爲牙買加有一個文化和藝術的傳統被現代的人保留得很好。當記者採

訪完畢之後，我們乘車到「皇室行」，作為總督李察斯爵士（現在已成為勳爵）和他的夫人的上賓。對我來說，「皇室行」這個名詞比之「總督府」還要好，它意味着是政府辦公大樓的所在。

在「皇室行」渡過愉快的數天停留後，摸懂了一點主人家的興趣和特性；跟着我們便搬到「采邑」酒店，這裡離京士頓六哩，附近是「永遠噴泉」區域，座落在花園的小屋羣圍着一幢主要的建築物，其中一間有個設計美麗的有上蓋走廊，它就是我們屋住了三個月的「家」，在這期間，「皇室谷」，輔政司的官邸，正在進行佈置工作。我們是在走廊的地方吃早餐；每天早晨在特定的時間，看着一個黑黝黝的女侍穿着剛剛漿硬的藍色制服，由舖滿露珠的草坪上行來，頭上頂着一盤雪凍的生果，有菠蘿，巴婆果，葡提子，已削皮的橙中間插着一枝叉，還有芒果和蘋果。

阿瑟·李察斯爵士

李察斯只不過比我早十天來上任，這種新總督和新輔政司在差不多時候一同上任的情形，假如不是因在任的愛德華·鄧咸爵士突然逝世的話，是不會發生的。當鄧咸爵士的棺木過街的時候，街上的羣衆用石頭擲它。牙買加曾經爆發過罷工和暴亂，規模也十分大；所以殖民地部明智地選擇最能幹的人去接替鄧咸。他們選了李察斯，那是最理想的選擇了。他為人比較開明，然而他也認為總督第一個職責是去統治，實在他也做到這點。他為人堅強，對窮人有同情心，政治的見解先進，他不是一個反動或是一個情感主義者，而他在道德方面的勇氣較諸任何其他我曾經為他做過事的人都要堅強，他對愚昧的行爲並不

輕易放過，假如需要的話，他的言詞是很尖酸的，他有一些敵人，有人曾經指摘說他憤世嫉俗，他不是這樣的人，他是個現實主義者，他對政府服務忠心。雖然他是一個苛索的監工，但是一旦須要稱讚人的時候他便會這樣做。倘若他的官員受到新聞界和立法局的攻擊時，他必會站起來支持他的部下；而在牙買加，有些攻擊是極為惡毒的。假如他的部下是錯的，他會以總督應做的責任去處理，但是在對外而言，他會支持這個部下的。我很多時都有這樣想過，李察斯應該委任為殖民地部的次官；他會將之改革，把一些生氣帶進去。或許那裡的官員知道情形會這樣發生，而不想見到它發生。最後他並沒有被委出任那個職位。他也應該在大戰後再由該職位調派往馬來亞；假如他被派到那裡的話，我不相信那國家會發生共黨叛變。我這樣說並非因為他曾經在馬來亞服務過，我說的是他具有遠大的目光及富於想像的能力。除此之外，他是個堅強的總督，假如情況需要的話，他會很強硬的。

他很了解做事程序以及儀節，但是這些並沒有阻礙了他到達後才幾天便應工人領袖畢士塔蒙特的邀請去對一個大的勞工集會演說。總督在目前這個多事之秋的時候「降格」去做這樣的事的確使到社會上穩重的人士產生一種恐懼。我必須承認我自己也感到意外，可是當時我並不了解我的總督。他是個卓越演說者，不管是有備或無備的演說。有時他偶然間會說些譏諷的說話，使到被抨擊的人對他產生惡感，但是我從未聽過他說過一些難聽而不該說的話。

罷工和暴動的根由是因經濟而起。在香蕉尚未成爲一種經濟商品之前，牙買加的經濟是依靠糖作爲支柱，而糖產在十九

世紀的初期已經到了高峯，當時奴隸的數目超過三十萬人。園主認爲一八三三年的奴隸制的解除會令到他們破產，而整個工業也受到牽連。可是他們和那些已被解放的奴隸在新的關係上漸漸互相適應了。假如英國不是採取了自由貿易政策而取消了一直以來只給予西印度殖民地的關稅特惠的話，牙買加的一切便會相安無事的。在廿世紀初期，香蕉業的發展成爲牙買加經濟的第二支柱；可是人口的增長超過資源所能夠給予的支持；因爲雖然香蕉和糖的生產可以大量增加，但是它們的銷路却不能增加。英國所給予的關稅和配額的特惠是有限的，超過一個程度便不可以，而牙買加在世界市場上和別人競爭遇到困難。情況愈來愈壞而失業隨之上升。在鄧咸時代的暴動只不過是一連串危機後的最高發展。其他西印度的殖民地也遭遇同樣的困境，也發生了暴動。英國的政府知道要做些重要的措施來解決問題；除了委派一個由莫爾勳爵做主席的調查小組去研究西印度的整個經濟和勞工問題之外，採取了比一向以來更有幫助性的做法：撥出款項去救濟失業工人，因爲這些殖民地都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這工作。結果，情況較鄧咸的時代有些好轉，但是罷工，示威和火燒蔗園的事情仍然零星地發生。不過僅有一次是要出動到軍隊，用來保護碼頭和船塢。

畢士塔蒙特

畢士塔蒙特——現已被封爲爵士而且是現任的總理——是一個多姿多采的人物，他是最出名的勞工領袖。他那些似鷹的面部特點和向後梳起的白髮給人一個深刻的印像。他的敵人說他只不過是個煽動份子，但是我不同意這種講法。不管人們對他的說法怎樣，我在殖民地任職的三年內是要常常和他接觸的。他可以對着一羣人做訓斥性的演說和影響他們，這些都不外

是他對人類，尤其是對窮苦工人愛心的表達。他的支持者對他很忠心，而且對他乘坐汽車一部和喜愛香檳酒一點也不介意。雖然我和他時常站在敵對的陣營，但是我很喜歡他。

當我快要調職離開牙買加的時候，我向他告別；雖然當時他是因為發表煽動性的演說而被引用防衛條例受到拘禁，但是他並沒有發出怨言，也沒有提出指責。我們像朋友一樣話別。

他的堂兄弟和政壇對手，羅文·文利，是一個出色的律師，而且有較好的頭腦，不是人們所說的「冷血的知識分子」。不過他缺乏了像畢士塔蒙特的那種博愛。兩個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獨立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但是我相信性格上的不同是使他們兩人不能好好地合作的原因，而兩人現時都是兩個不同政黨的領袖。在最近這幾年，他們兩人必有一個出任總理，而不做的那個便成反對黨的領袖。在我看來，文利似乎有不滿的情緒；我或許會看錯；不過或許這種情緒會隨着牙買加的獨立後而消失了。我可以預見當他們的政治生涯完結之後，畢士塔蒙特會成爲總督或者立憲的總統，而文利會專心於他的文化事業。

立法局

畢士塔蒙特和文利都不是行政局或立法局的成員。前者是比較興趣於勞工或工會的運動，仍然未組織自己的政黨，而後者不願在當時的政制下參加競選。他情願在兩局之外工作。行政局的組合和香港及百慕達的一樣；由總督任主席，其他的成員是當然成員或是被委任的成員。在委任的人員來說，高斯達爵士算是最傑出的了。他是來自一個猶太家族，這個家族在克倫威爾時代被人由葡萄牙經荷蘭送到這個地方。他們之中有許

多在專業和生意上都有輝煌的成就，也有不少人參與公益事業，然而他們是不參與政治的。高斯達爵士是個聰明和精明的人，他對行政局內的討論有很大的貢獻。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很吸引人的人。

行政局的十四個席位都是選舉而產生的，每個教區有一個席位。假如有九票反對政府的一項財政措施的話，這個措施便被否決，假如十四票都反對，這項措施的命運也是一樣，不過除非身爲主席的總督宣佈這是一項至爲重要的措施。在議會方面，政府有十五個議席，有些是當然議席，其他是委任的。詞鋒犀利是民選議員重要特點；由於他們都這樣善言，政府要特設一項規例規定：除了在預算案的時候每人最多可以演說三小時之外，其餘的事項不准演說超過一小時。坦率和猛烈的抨擊是很常見的事，不過議員們都很少強烈地攻擊部門首長，不然主席會立即制止他們的。這種情形主要可能是和茶點小息有關，那時我們大家都真正友好地在一起。這與個人的性格當然也有關係。

對民選的議員來說，最不喜歡的是某一個部門的首長；他是位勤力，有責任感的官員，不過不知怎地他和那些議員的關係總是攪得不好。在另一方面，庫務署長霍澤斯和他們的關係攪得不錯。他會擺動肥大的食指指着他們，好像老師對一班既頑皮又笨拙的學生訓斥一樣，而他們一點也不介意。醫務署長夏理南是一人粗劣的演說者，不過他用另外一種方法來應付他們；他懂得送雪咖煙，或者委派給他們的親屬到政府醫院做些比較低下的工作。他曾經向我建議，爲了要使那位專找麻煩的議員緘默，應該送給他一個 O. B. E. 勳銜；我回覆他說，我相信總

督不打算推薦他獲授勳銜。民選的議員不但演說流暢，即如西印度人也是一樣，他們還會適當地運用自己的情緒。當辯論政府的動議，把那虧本的「永遠噴泉」酒店賣給一個天主教機構時，一位議員聲淚俱下訴說在中世紀的時候人們如何地遭受宗教法庭的折磨。

在一年之中，立法局的會議佔了差不多六個月的大部份時間；每次開會是由早上十一時開始至下午五時，假如我沒記錯的話，一星期有三天。這些都佔了一個公務員很多時間，同時他還要兼顧其他工作。況且，輔政司作為政府的領導人常常都要出席，不能置那些辯論於不顧而去做自己辦公室內的「家課」；可是其他的部門領導人就可以這樣做了。當散會的時候，我還要多花一個鐘頭或更多的時間去聽這個或那個議員的申訴：這裡需要些救濟工作，那裡又須解決一個土地問題，或者為一個親戚謀一份公務員職位。所有這些都需要耐性去聽，而大多數的情形都是不能讓他們得償所願的。反過來說，假如拒絕去傾聽他們的申訴會導致他們不合作，對政府運作的功能反而收到反效果，這樣做也對那位議員不好，他也不過是受到選民或者親友的壓力，而且甚至假如他甚麼也得不到，最起碼他可以回覆對方說已和輔政司商討過那個問題了。財政預算案的工作是最辛苦的，它需是要四個月的時間，最先是財務委員會的工作，然後提交到立法局公開討論。由於這是個一貫古怪的做法，負責這個殖民地的預算案是由輔政司擔當，而不是庫務司，這件工作非常艱苦，我從未，甚至以後都不會嘗試做那麼多工作。輔政司署人員的工作能力有好的，也有不太好的，但是總的來說他們的品格都很好，而且有團結的精神。雖然人手不足，但是向立法局申請到增加人手的機會是很微的。為了這個理

由，我要自己掏腰包支付我辦公室裡的冷氣機安裝費用。這筆花費是很值得的，因為在這之前，甚至早上我的辦公室內的溫度到接近華氏九十度。另外一個對我有幫助的因素是總督的了解，雖然他沒有說出，可是我却感覺到。

「皇家谷」和其他美麗的地方

出了京士頓半哩外的「中途樹」就是「皇家谷」——一間美麗房子的一個美麗名字；它是座古老「大屋」，納爾遜將軍曾在那裡居住。慕蓮按照她那一貫的風格，將房子重新佈置，用白或淺白的顏色；在熱帶地方，這些色調看起來較政府用的那種棧色舒服多了。原來的面積很大；後來有一半的土地被撥回作公用的樹林，現在剩僅有七英畝。一年之內我們把整塊地方夷為平整的草地。在樹林被取回之後，我們發現一些令人驚奇的東西，一棵可愛的石榴樹，樹枝上長着一束束的槲寄生植物，供給我們一些味道鮮甜的水果。在草坪的周圍是些老的羅望子樹，愈創樹；它那協調的形狀使它在開花時好像一些富有法國特色的花園，還有大如深紅色傘子般的蝴蝶屬植物。此外有些菊屬植物的花朵好像懸掛著的一束束葡提。而柿屬的樹木在下雨之前兩三天便開出橙黃的花。酸橙樹和葡提使整個花園充滿香氣，同時我們也有水果可吃，它們和孟買的芒果和椰子樹真是不遑多讓，那奇妙的雅枝（ACHEE）樹；它的青翠綠葉和梨子一般的深紅色果實，果實煮過後吃起來好像炒蛋一樣。

在花園末端，花木有權和開花的樹叢。還有一個比較標準的花園，它的位置較其它的花園稍高，只走幾級石階即達；它的圍牆滿蓋白花。裡面長有白色的百合和最美麗的戟屬植物。有一種稱為「中國帽」的灌木，因為它的紅黃花朵形狀好像中國苦力

的帽子。很多這些灌木生長在通道上，各樣顏色的蜂鳥都喜歡在這裡落脚，其中有些的尾巴長得好像鳳鳥一樣。一隻藍色的蒼鷺站在粉紅色的樹下超過幾小時。紅頭鵑不太受我們歡迎，它們有時蹲在屋頂上，有時在草坪上徘徊。我們的狗史柏每次都會狂吠及追撲，那時它們才懶洋洋地飛走。

在月色下的花園更逗人喜愛。它顯出了晚上迷人的景緻。在銀光照耀下，大樹的影子、花草和在樹下的水池輪廓，都比平時美麗百倍，甚至那小徑也活像仙境般美麗。棕櫚葉發出閃爍的光澤、清涼的空氣夾雜着曼陀羅和茉莉的香氣與樹下飛舞的螢火蟲交織成一個如夢般的幻境。

「皇家谷」和那些花園是舒服的享受，彌補了我辛勤的工作。在走廊上與慕蓮一起，我會暫時忘却所有的顧慮和辦公桌上需要處理的文件。在牙買加，社交是一件樂事，而那些人也很友善，但可惜得很，由於工作的關係，極其量每星期祇有兩晚的社交應酬。我也說不出參加別人的宴會或自己所舉辦的宴會，那一個好。我們幸運地聘請了奇里福作為我們的管家；他長得高大、黝黑、面貌不錯，而自重。工作效率也高。他喜歡我們請客，不過有時也不大喜歡某一位人客，認為他的地位沒有資格應邀作客。事實上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勢利的。

我習慣每週把上週發生的一切拋諸腦後，星期日的早上五時我便起床，乘着晨光熹微我會駕車到山中去，然後棄車牽着狗兒史柏，踏上既崎嶇不平又傾斜的路上。史柏會暈車浪。我們嘗試了一種做法；有次有蹟象顯示牠快要嘔吐時，我便打開車門讓牠走走，然後在路嘔吐，吐完後牠跳回車上，繼續行程

。有一次我載了兩個農婦，她們都暈車浪。我不能用史柏的方法去對待她們，唯有忍受一切了。在這時候散步實在是賞心樂事。熹微的晨光照在青蔥的蕉葉上，農舍的柴煙、巨大的紅木樹、小徑旁那滿蓋露珠的草以及使人感覺清涼和提神的空氣，令我精神舒暢。

史柏是一頭雜種狗，是由一個衣衫襤褸的人帶來的。我們抵抗不了小狗那雙懇求的目光，很明顯牠需要一個家，所以用五個先令從那位衣衫襤褸的人處買牠回來。牠身材細小，毛色淡黃，和牠的名字頗為相稱。有一天，我們把一隻跑來我們家的貓收養了。傭人都喜歡牠。我本擬為她起個「羅莎蒙」的名字，但廚子說，她已為牠起了個叫「明莉」的名字。史柏和明莉成爲了好朋友。不久明莉產下一胎小貓，我們只養了一隻，改名碧蒂這是因爲我們的傭人對英文（Pussy）所能發出最接近的音的緣故。明莉喜歡到處遊蕩，後來失了踪，其後碧蒂生了兩隻小貓，一隻叫傑米里，另一隻叫湯金斯。

我們喜歡駕車到北海岸的「蕭柏」花園酒店過復活節和聖誕節。途中經過「西班牙」鎮、「酸果夢徑」山谷；「谷霸」河所流經過的峻峭岩石帶、在櫻櫚樹和毛竹等等，其間奇形怪狀的雀鳥在樹林中飛翔。緊沿着河流的道路上，有些騾子拖着車卡，穿着花布的赤脚男女，輕鬆地搖擺着身子緩行，她們頭上頂着一籃籃水果、一束束的香蕉和用罐裝的水。那條路也穿過了用泥屋或用波紋鐵片造的房子。也經過種滿鱒梨樹、橙樹和酸橙樹的果園，裡面也有生長在隱蔽處一堆堆的香蕉樹。過了「蒙力」便開始向下行到北海岸，道路直通往「蕨樹谷」，這是一個狹窄的山谷，兩旁峻陡的山坡長滿了蕨類植物和蔓藤，

樹幹在靜寂的空氣中已變成青綠的苔色；這些樹木在頂上交錯地遮蓋著天空，只讓微弱的陽光穿過，綠得使人感到恐懼，但却美麗異常。「蕭柏花園酒店」前身叫「大屋子」；現在已經改建了。一條小溪流過露天的餐廳，溪邊生長著肉豆蔻樹，陽光從它那些茂盛的葉子中穿過。在淡水池裡浸水、或在海灘游泳、或是躺在沙灘上都給人一種舒暢的感受。看着瀑布的水流過石頭進入山谷，再流向大海，同樣令人舒暢。晚飯後，在柔和的空氣中散步，椰子樹的葉子反射出月亮的光線，向下望則可以看到那被樹葉遮擋了的市鎮燈光。

我們也喜歡到「費斯特」渡過一、兩天的假期。它從前是一個咖啡園，現在已成爲一間賓館；雖然食住比較簡單，但由於它座落高山之上使它顯得非常壯麗。我們喜愛在清晨和晚間那種寒涼的感覺，這樣使我們想起酷熱的京士頓；而且也喜愛用古老的油燈照着我們上床就寢。史柏也喜歡在那裡散步。那位女經理也喜歡史柏，當我們離開牙買加時，她樂意地收留了牠。

工作不忘娛樂，我們偶然也趁機去遊覽牙買加島其他的地方。「安東尼奧」港是以前西班牙人定居的地方；它有兩個相連的海港，被一座海角分隔開，這座海角由海灣直伸出海面。在較低的山邊和山谷長着許多淡青色的香蕉，使到空間好像夾雜着一陣柔和的綠霧——畢竟這裡是個香蕉王國。

從前，富有的園主在他們的蔗園過着帝王的生活，現在還可看到它們的遺跡。最值得人留意的是「玫瑰大屋」，是在牙買加所遺留下來最精緻的建築物。這間用石做材料的建築物主

要的成份是在海角石岩上，面對大海；它的樓梯向東西方分叉而上，頗有十八世紀建築的風格。它的左右兩翼和屋宇兩旁的拱廊已全部毀壞，它們過去的存在帶給了這座屋宇一個清雅與隱蔽的設計。那些木工藝術已被拆去，而那條著名的紅木樓梯已被搬到那間離京士頓不遠的「無斷噴泉酒店」。花園裡所見的都是些衰落的痕跡。大概一百五十年前，這間偉大的屋宇是屬於約翰·帕米的；他的第二任美麗的妻子精通巫術，被人稱爲「玫瑰大屋的白女巫」。帕米是她的第四任丈夫；前面那三位都神秘地死去，而他自己也遭遇相同的命運。她對她的奴隸並不過分殘忍，不過最後他們也是把她勒死。聽說這座屋子有她的鬼魂作祟。雖然應用巫術是犯法的行爲，可是迷信的農民仍然有用它，不過這種情形也漸漸消失了。

在島西部的「蒙特哥灣」，有茂盛的牧草場和巨樹，頭角特別的牛羣就在這些樹下吃草。這些莊園和甘蔗園一樣，也有各自的「大屋」。在「魏斯麼蘭」教區，產糖很早便在這個地方開始了；至今糖和糖製的「寐」酒仍然從它的主要市鎮——「西溫拿」運出。離這裡不遠的「黑河」，是鱷魚棲身之所，這些鱷魚過去作家描述的對象。

牙買加多姿多彩的風光是連綿不絕的享受；那些高山、平原、蔗田、香蕉園、洋蘇木樹、椰子樹、咖啡樹及木薯等，實在數不勝數。除了眼睛所見，牙買加還有它的氣氛——以往羅曼蒂克的色彩感受，西班牙的風格，那些「大屋」的日子，以及對它未來的希望等。在月色的晚上沿着北海岸由「蒙特哥灣」駕車返家，一面是大海的邊緣而另一面滿佈密林的地帶，我對這裡過去發生過的事物有強烈的感應，使我幾乎相信了鬼魂

之說。反之，我的司機白朗，受了「寐」酒的影響，昏醉得不省人事。坐在車子的後排，對一切都毫無感覺。

京士頓高處的一座高山坡是「紐加索」的地方，這裡一些建築物是軍方於十九世紀所建成的，現仍然被用作屯兵，使部隊到這裏避開平原的酷熱。山坡像梯形般向下伸展，由一條多窄彎的險路而與外界連接。晚間由京士頓望上去，那些閃爍的燈光好像一座充滿小星的星座。再遠些是「格林威治」，那裡有些房子本來是留給軍官住的，現在已渺無人煙，祇留下頹垣敗瓦。假期在戰時的溫帶地區是不可思議的事。李察斯夫人和一些其他的人，包括慕蓮都建議將那些破落的房屋修好用作夏季渡假的地方，那兒的氣溫較京士頓低得多。我們那間小屋就在懸崖的邊緣，由走廊望去可以見到較低的山脈、海港、四千呎下的「皇家港」和大海。慕蓮帶了我們的小貓來住，而史柏則在「皇家谷」和我在一起。週末我們一起往「格林威治」。慕蓮會走一段路來迎接我們；史柏一見到她便會向她衝去，告訴她我來了。在「格林威治」散步令人十分舒暢。我們喜愛攜帶三文治作短途遊覽，並步行到「金鷄納樹」，它的命名是因為奎寧藥是由它的樹皮而來的。那裡有一個很大的果園，在往「格斯谷」的路上有一個棄置了的咖啡園和用來烤乾豆用的混凝土大爐灶。在山谷對面巍峩地突出的是牙買加最高的「藍山頂」，它給予人遙遠和宏偉的感覺，散發出那種龍胆屬植物的深藍色澤。在這高山上，視野特別清晰，遠處的事物如在咫尺。安東尼·陶立比在一八五九年曾經來過牙買加，在他的《西印度羣島和拉丁美洲大陸的見聞》一書中，他說：「無論在色澤和組合方面，藍山宏偉而壯觀的羣山山脈都是無與倫比的。」

星期日的傍晚，吃過晚飯後，我和「史柏」在極不願意的心情下駕車返回「京士頓」；不過當想到我們數天後又可舊地重臨時，心情也好得多了。

戰爭

起初牙買加沒有受戰爭的影響，但是在航運越來越少的時候，經濟問題馬上就接踵而來了，主要是人口方面，而影響更大的是該島產物的出口。糖的出口並沒有什麼困難，由於它是必需品，一定有船隻來裝運的。香蕉就不屬於此類必需品了，而香蕉是佔牙買加出口貿易的半數。爲了避免農民破產，政府利用英國庫房捐出的款項來購買那些無法出口的香蕉。爲了彌補這些費用，將這些香蕉用一束六個便士的價錢賤賣。可是這樣做帶來的麻煩比所得回的利益還要大，結果所買的香蕉都拿去倒掉而浪費不少！但是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爲了要積存麵粉，政府建了一座麵粉廠，用當地生產的玉米作料。爲了應付戰時的緊急需求。其他類似的計劃都做了。假如委派一個當地的商人去做工商署署長的話，此舉會導致與其他的商人發生磨擦，對這個機構的運作並沒有好處；可是從外面請來的人却缺乏對當地的認識。幸好在公務員中有一位叫F. E. V. 史密夫的農業化工專家，他對商業有獨到的才能，這些才能對一個公務員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史密夫是一個應付牙買加和北美洲商人的談判能手，他決不是主動去籠絡立法局議員的那類人，但是他們對他都十分尊敬，一般都通過他所提出的計劃，給予他所需的款項辦事。

戰爭帶來的許多問題中的一個是要接待直布羅陀來的九千

個難民，但是我很樂意悉力以赴，因為這樣間接戰爭有幫助；而其他人却要在戰場上作戰，或者受到突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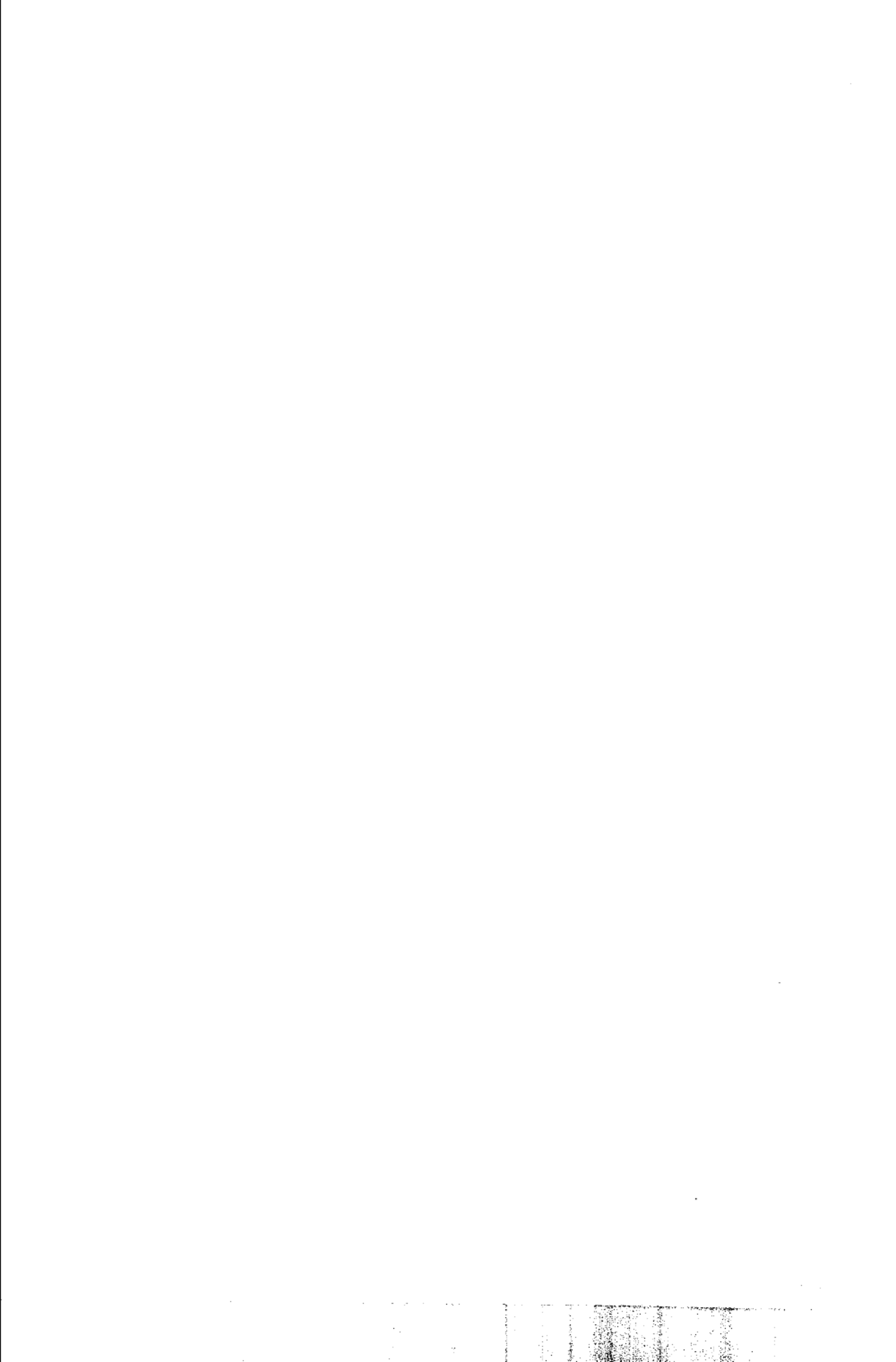
在美國和英國共同訂定的「基地換潛艇」的協定之下，牙買加被美國選中作為加勒比海的基地之一，這些基地用作交換十艘舊潛艇。羅斯福總統乘了美艦「特斯格路莎」號來牙買加巡視基地。總督，李察斯夫人，我的太太和我應邀陪他巡視。在一個早上，我們陪他登上巡洋艦，抵達那個基地的海灣。這位總統予人好感、友善、活躍而熱情奔放得像個學生一樣使氣氛很輕鬆，沒有官式化。我們路過的地方，雖然他從來都沒有去過，他也能一一把那些海島和一些地方的標誌說出來。他對宏大的基地和設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李察斯開玩笑說：「這真是太好了！我在這裡的海港比你在京士頓那個還要好；整隊美國艦隊都可以容下。」李察斯就反唇相譏說：「等你接管了牙買加才說吧！」總統舉起了一隻手，抗議說：「不，我們不會接過英國這些頭痛的問題。」

在戰爭期間，我們不能期望調職或晉升。當有一個早上我被召到「皇室行」看一封由總督交給我的電報，說殖民地部委派我到尼日利亞出任布政司一職時使我感到意外。我常常說我不願到西非去做事，但是我也說過，無論被派到那裡，我也會去；所以在和慕蓮商量過後，我接受了委派；當然和她說的是要搬家的問題，要離開我們的屋子，花園，還有史柏，碧蒂，傑米里，和湯金斯；對慕蓮來說，問題更麻煩，她還要負責收拾和搬運。我提醒她，十六年前我向她求婚時已警告過她：「嫁給我後將使她變成流浪者。」那時她答道：「要是到廷巴克圖^⑨她也會去的。」現在我們真的差不多要去到那個地方了。

很遺憾地我們向許多朋友告別。總督和夫人給我們開了一個告別晚宴，李察斯還在宴上講了很多很恭維我的說話，這些都使到我們深深的感動，尤其是當我們想到以後不會有機會跟他一齊共事了。慕蓮所收到的禮物之中有一束鮮花，是畢士塔蒙特送來的，那時他仍被拘留在獄中。由於戰時的管制，除了總督夫人和總統的副官以外，沒有人可以到船上給我們送別。靜靜地船從駛離碼頭，經過「皇家港」，我們看着「藍山」漸漸地隱沒在黑暗之中，直到消失……

第二篇

戰爭的年代



第四章

尼日利亞，1942—1944

十一月中旬我們到達紐約後，馬上注射黃熱病、天花、傷寒、霍亂以及其他預防熱帶病的疫苗。同時我們爲着安排船運到尼日利亞——在戰爭期間，這種事情講起來就容易，做起來卻比較困難。最後我們只訂到去拉各斯的輪船上的床鋪位，船隻屬於一家叫Grace Line的航運公司。很可惜，我們被泛美的一位副總裁說服了，準備乘坐他們的飛機。飛機定於十二月九日起飛，而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日子是十二月七日。由於美國已經進入戰爭狀態，所有民航的班機都停飛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最初要乘坐的輪船已經開航了，我們就這樣被困在紐約。我們纏住英國總領事和一些其他我們認爲可以幫忙的人，足足纏了幾個星期，才安排我們乘坐火車到邁亞米，他們保證那裡會有一班機開到「拉各斯」去，而且爲我們訂好了坐位。可是，在火車到達目的地前一個小時，有人送來一封電報通知我班機已經取消了，當時我們覺得非常絕望，但是也沒有什麼法子，唯有每天在街上閒逛，等候乘坐下一班火車回到紐約去。唯一使我們感到高興的一天就是慕蓮買了一頂很便宜的帽子，我們叫它做「慕蓮的三百美元的帽子」，因爲這是我們花了那麼多錢到邁亞米的唯一收穫。

最後我們登上了一艘叫「塔里斯曼」的挪威船，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辟邪之物」，表示會帶來好運，由紐約開到西非。一九四二年的二月的日子裏，輪船沒有領航而橫渡大西洋是不合時宜的，還好我們的運數不錯，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件發生，最好當然是這樣；因爲船頭甲板上裝着一箱箱易燃的酸垢，

頭尾甲板上裝着一桶桶的汽油，假如我們的船被魚雷擊中的話，整條船會被爆成碎片，沒有人會有機會坐上救生船逃走的。我的太太是船上唯一的女性，乘客之中有一個比利時人，他為剛果一個動物園找一隻狒狒。我心裏頭忍不住向他發問：「你這個旅程是必須的嗎？」

在海上十二天後，我們駛進「弗里敦」的海港，一個不平凡的景象出現在我們眼前。已經差不多有兩個禮拜沒有看到一條船，現在四處都是船。我們數數看，一共有四十五艘大船，還有很多較小的船。而且還認得有兩艘是我們在比較快樂的日子裡曾經乘坐過的。「弗里敦」是航運船隻的匯集點，到這裡來的船顯然很快就會開出的。

離開「弗里敦」後，船繼續沿着地勢低洼滿佈叢林的海岸駛往利比里亞的首府「蒙羅維亞」，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破爛的市鎮，想不到原來還是個首都。那條所謂大街到處都是大洞，商店是用破爛的波紋鐵片蓋起來的，大多數人都穿得很差，看來是非常窮困的。由於「塔里斯曼」號要在這裡停留幾天，我們接受了英國領事的邀請在他家中作客和接受他的幫助，改乘飛機去「拉各斯」。機場離「蒙羅維亞」約有五十哩，那裏有橡膠園和「蒙羅維亞」很不一樣，到處都講究整潔和效率。道路都很乾淨，工人在橡膠園裏忙着，他們的宿舍和衣著都一樣整齊和清潔。幸運得很，我們訂到了坐位，這部飛機飛往黃金海岸的「阿克拉」，裏面裝的全部都是軍人。在「阿克拉」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我便乘坐一部貨運飛機到「拉各斯」——尼日利亞的首都——我們的目的地。

尼日利亞的名字來自尼日爾河的名字，這條河和它的一條支流把這個國家分成三個部份。在三角洲和沿岸的地方有很多咸水湖及紅樹木沼澤區，這裡蚊蟲滋生，容易染上霍亂，這種地理結構使得交通方便；內陸是森林地帶，再往內進是空曠的地方，地形向上發展仍成了一個離水平面二千呎的大平原，這裡的山高達六七千呎。這個國家最北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和「乍得湖」。尼日利亞的面積總共是三十五萬平方英哩，一九四二年的人口是二千二百萬，是大英帝國最大的殖民地，由很多個部族和人種組成，西南部是「拉各斯」的所在地，住的是「尤魯巴」部族，相信他們是來自埃及北部，現在已經完全成爲黑種人。尼日爾河和它的支流以南住着「伊博人」，是「尤魯巴」族的死對頭。聚居在平原上的是原來的土人，是尼日利亞最原始的民族；北部住着「豪薩」族人和「富蘭尼」人，前者是黑種人，後者的膚色比較淡，顯然有阿拉伯血統。「豪薩」人和「富蘭尼」人的宗教和文化是回教的，他們的酋長都叫做「伊馬」或者「蘇丹」。

早在一四七二年，葡萄牙的船隻已經開到西非的海岸，第一艘英國船來到「尼日爾」三角洲是在一五五三年。由於當地的氣候酷熱，一百四十個船員之中有一百個死於高熱；那時候並沒有「尼日利亞」這個名字，整個西非都被稱作「奴隸」海岸，因爲運到美國的大部份奴隸都是從這兒來的。對內陸的情況當時了解得很少，直至十九世紀倫敦的非洲協會撥款補助到「尼日爾」河流去探險的工作情形才有所改善。探險的歷史構成了令人感到恐懼覺得有胆色的故事。一八〇五年，文高·柏加給甘頓爵士寫信說：「離開剛比亞時健康良好的四十四個歐洲人之中只有五個生還……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一點也不

感到失敗，我決定乘船向東面去找「尼日爾」河的盡頭——除非我半途死去……」。他最後真的死在「畢沙」的急流地帶。

一八〇七年，（英國）國會通過法例禁止英國船隻裝載奴隸和禁止把奴隸帶到英屬殖民地。跟着，奴隸貿易便漸漸受到壓制，代之而來的是棕櫚油貿易。在一八六一年，英國佔領了「拉各斯」，一八八六年在海岸成立了一個保護國，叫「油河河流域保護國」；次年，「非洲聯合公司」獲得專利權後，成為「皇家尼日爾公司」，這和以前成立「東印度公司」的手法一樣，英國勢力穩步地發展直至遍及整個尼日利亞，政治控制方面由政府取代了公司。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南北尼日利亞終於合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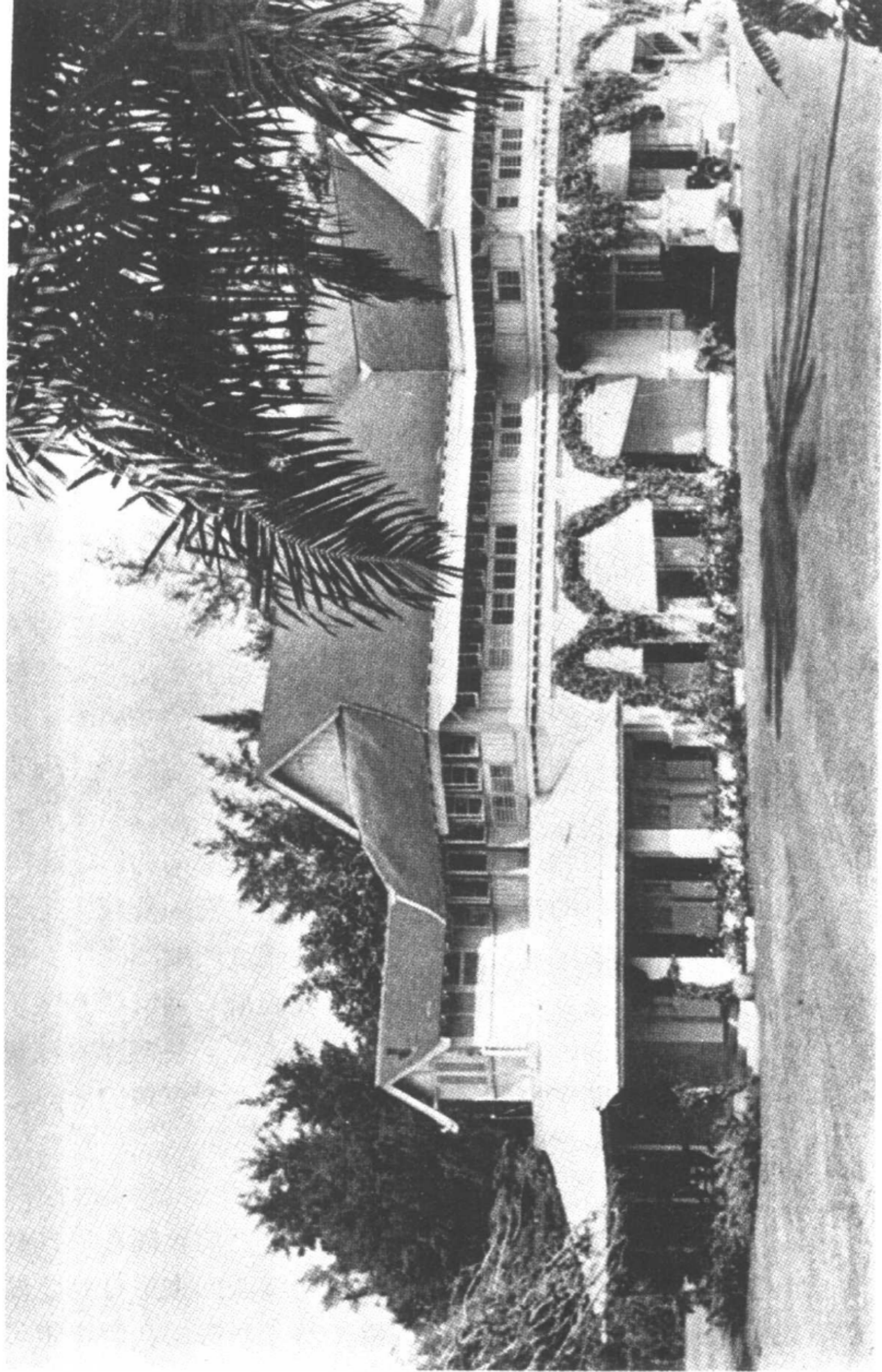
由於氣候的關係，西非有一個名符其實的壞聲譽，叫做「白人的墳墓」。醫學的成就和政府的醫療服務使到情況大大的改善，歐洲人的健康受到的威脅比以前少了很多。不過，假如有一個歐洲人對我說他已經「走遍這個國家」的時候，我知道這是他應該去一些溫帶地區生活的時候了。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歐洲人在西非生活兩年已經是夠長的時間，有些人勉強可以多住一點時間而沒有不良的後果，只不過有點腦力衰退的感覺；假如完全受不了那種氣候的話，便要馬上回家去。我和太太在尼日利亞住上兩年多，在這段期間健康已算很好。不過，在回家之後，慕蓮需要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能夠回復過去的精神。而我在快要期滿離任的時候，間中有突然的暈眩，有時使我十分困窘，幸好在離開以後很快就復原過來了，不過要定時服用金雞納或者其他預防劑。在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所用的藥叫Mepacrine，服後皮膚呈現黃點，好像毛茛花一樣。遠離市鎮的

地方，人和牲口現在還有感染高熱病的情況；種種體內的寄生蟲疾病，雖然並未導致死亡，卻是影響着患者的工作或者活動。這種情況其後也慢慢得到改善。

我們和得到總督的副官及署理布政司陪同，從「拉各斯」外大概十二哩的飛機場乘車到在「拉各斯」的總督府，這座官邸是在一個小島上，有一條橋連接着大陸。這個城鎮是在一片平坦的陸地上，比水平面高一點。一排排的醜陋的木屋及店舖差不多全是破舊的。赤身的小孩、小鷄、山羊以及狗隻看到我們的車子駛來便四散奔走。街道愈來愈擠塞，行人懶洋洋地走着；男的都穿着寬袍或是類似睡衣的服飾，大部份是藍色的，而女人穿的都是印花綿布。在島的另一面，樓宇和街道都比較整齊。有一條鋪碎石的路沿着咸水湖伸展，那裡泊了船隻，岸上長滿青草樹木的斜坡一直伸到水邊。我們沿着這條叫「馬連拿」的路行駛，經過一羣堂皇的紅磚樓房，那就是我將來掌管的布政司署，跟着便到達總督府。這是一間三層高的白色建築物，有拱廊以及綠色的百頁窗簾，很像一座皇宮，看起來也很優美，它給高牆圍着，有漂亮的鐵閘，我們進入閘門時，一個尼日利亞軍團的守衛立正向我們行禮。我們沿着通道轉到屋子門口，看到樓門前面的方形塔頂被植物遮蓋着。一個穿着紅黃色制服的勤務兵打開了車門。署理總督夫人在客廳親切地迎接我們。阿倫爵士染上了瘧疾，我上樓去見他。

阿倫爵士在未出任英屬洪都拉斯的總督之前曾經在尼日利亞服務過，他在黃金海岸做總督的時候給調派回來尼日利亞做署理總督，原來的總督賓納博迪倫爵士請了病假。我們決定了開始的幾個月內我不做署理總督，直至我對這裡有了認識為止

在拉斯各斯的官邸。



，這也符合我的意見，因為我從來沒有在西非生活過。阿倫·班士是一個令人喜歡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是一件樂事。我跟他學了很多東西，因為他對尼日利亞的認識非常豐富。每天中午我都到他的辦公室，向他報告我所遇到的難題，我發覺這個做法很有用，尤其是有關的事情還未發展到要用正式文件來處理的階段。後來我當上了署理總督，我便採用了這個方法，而這個方法在我做總督以及做布政司時同樣有幫助。

布政司的官邸就在總督府隔壁，對着「馬連拿路」和咸水湖。總督府花園的一道閘門可以通到我的官邸花園，我的房子是一所兩層高的建築物，漆上黑白的顏色，前面有走廊和一個在樓門前供車輛停放客人下車的地方。它只有兩間睡房，其中一間是主人睡房，外面是一個平台，我們可以躺在露營用的床上觀看星星，下雨便跑回屋子裏。在兩個書房之間——就在停車用的地方樓上面——是一間書房，從那裡可以看到咸水湖。客廳和飯廳還算夠用，但是內部的佈置就不成了，尤其是到處吊着像花牌一樣的電扇。慕蓮馬上開始整理地方——她的確很落力地做。外部全漆上白色，裡面就比較難辦了。工務局替我們修葺，傢具則由慕蓮來佈置，她只靠一些家庭雜誌和兩個縫衣女工來幫忙。還幸我們從牙買加運來幾百碼的布料、地氈、一些傢俬、畫和瓷器都安然抵達，而且使到我們鬆了一口氣的是我們從「皇家谷」帶來的地氈剛好合用。現在房子是全白色的，看上去好像大了，有點美洲的殖民地風格，效果很好，住的人和訪客都看出整座房子煥然一新；而且我想這樣說，它比之古板的西非建築風格漂亮得多了。

花園也需要重新整理，它比不上「皇家谷」那麼吸引人；

但是在整理過後，還是那麼令人喜愛的。這裏種的樹和鋪好的草坪是它的特點，有按樹、棕櫚和藍花楹，是我喜歡的樹；還有黃蝴蝶（粉紅色和白色的都有、茉莉、木槿屬植物等；一大片的美人蕉正沿着圍牆開花。高高的籬笆把菜園圍起來；因打仗時物資缺乏，我們就因著菜園而滿足需要；不久我們所種的蔬菜還有剩餘，可以送給朋友。我們還養了雞、鴨和珍珠雞，給我們提供了禽類食物和蛋。傭人宿舍住了不少人，好像一個小村落；因為這裡的習慣是，工人帶同家眷都住在主人的莊園裏。我們規定每個工人只准帶着一個太太和她所生的孩子住進來；因為這裡行多妻制的只好這樣限制入住人數。不過他們都喜歡這個安排，因為這樣他們可以迫使其他的妻子回家助理農務；起初我們發現有種種的陌生人在工人的宿舍出入，後來我們制止了這種情形的發生，因為我們不想家裏有些閒雜人。我們的工人來自不同的部族，又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些是異教徒，兩個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兩個屬於基督教長老會，還有些是回教徒，他們都相處得很好，彼此都能容忍。廚師阿山里十分能幹，很有辦法，我們招待過境的朋友時，他都幫了不少忙，他是一個回教徒，當初來這裡工作的時候有三個妻子，不久之後娶了第四個太太，一共付給她父親十一鎊。看來這個妻子脾氣不大好；有一個早上，他出來工作時手上縛了繃帶，原來新娘子在前一個晚上差點把他的姆指咬掉，他十分憤怒，聲言要把「她送回去讓她父親照顧她」，並且向她父親要回十一鎊。由於岳父不願意退款，他唯有要了那個女子。然而他倆後來相處得不錯，據我了解，他們生活得很快樂。

和以往一樣，我們都養了寵物。其中有一隻小狗，很難說清楚牠的樣子，我連牠的名字也忘記了。還有兩隻可愛的貓兒

，一隻叫「慕絲」，一隻叫「邦邦」，是「自由法國團隊」司令送給我們的，所以都起了法國名字。還有一隻十分有性格的西非鸚鵡「佐治」，我們都教牠說話，但是沒有成功，不過從牠說話，但是沒有成功，不過從牠發出的聲音，我們能夠了解牠的意思：「咯」的意思是高興，吹口哨是呼喚我們，不高興時便尖叫。我們不喜歡把牠放在籠內，或用鍊把牠鎖在樹枝上，因此我們把牠的翼毛剪了，好讓牠喜歡去那裡便去那裡，但卻不能進屋子裡。我們曾經試過讓牠到屋子裡去，牠就把一些剛收到的信撕成碎片。牠喜歡的地方是屋後的走廊，工人都在那裡清潔銀器、洗衣、或做其他的雜務。因為這裡總有事情做，牠愛聽人家閒談；養了六個月後，牠變得脾氣暴躁，而且不愛說話，初時我們還以為牠生了病。突然有一天，牠生下一隻蛋。「佐治」和我一樣驚奇，把它反過來看，把自己的頭轉過這邊，又轉到那邊的仔細地看清楚，牠的興趣很快就消失了，一個不小心便踏上去，那隻蛋就這樣完了。之後我們曾試過用陰性的名字稱呼牠，但卻改不掉以前的習慣，最後就放棄改用雌性名字了。不過，我們到底把牠的名字「佐治」改為「佐姬」。「佐姬」後來死得很慘，我們離開尼日利亞時，把牠送給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像我們一樣地喜歡牠。不幸得很，有一次由於好奇心的驅使，牠爬上了一棵樹去察看從那裡傳來嗡嗡的聲音，那裡原來有一羣蜜蜂，牠就這樣被刺死了。

我任署理總督時，到一個地方視察，回程時，我的副官帶了一隻香貓回來。我不喜歡將野生動物帶回自己居所，然後變成寵物來飼養，但是牠畢竟被帶回來了，我和牠唯有接受這個事實。起初牠十分野性和緊張，不過很快便變得馴服和友善，成為一隻十分溫和的動物。牠長着灰色的毛，身上的條紋使牠好像一

隻獾，與半成長的小貓差不多大，鼻子是尖的，頸子較長，腳很精細。玩耍時就像一隻家貓，叫聲也一樣，高興的時候會發出「咯咯」的聲音。慕蓮喜歡帶着牠到花園散步，這隻香貓可以用兩隻腳撐在地上垂直站起。牠喜歡到花叢裏去，喜歡嗅着地上的濕泥。我們用香蕉、奶、和糖果餵牠，看來牠很喜歡。「邦邦」有時拿牠沒法，唯有裝作無聊的樣子走開。

行政工作

我發覺我的工作比之在牙買加時容易得多。沒有政治上的言外之意，有的是直截了當的行政，工作時間差不多，但是通常都沒有精神上的壓力，那時候尚未要求獨立，如果有的話，就沒有公開表示過。立法局開會也沒有那麼頻密。再者，非官守議員在人民的心目中並沒有像牙買加的那樣重要，比較重要的人却是酋長——不管他們的銜頭是什麼。倘若酋長有投訴或者要求，他們會去見民政官，或地方官，或者是總行政專員，看情形而定，他們不用見布政司。

尼日利亞在殖民地時代是「非直接管治」的地區，換言之，政務通過當地的酋長執行，從一個村的村長以至掌握了近乎王權的蘇丹。我們可以注意到，所用的名詞雖然是「管治」，而事實上行政官一般來說是尼日利亞的管治者，不過他們是通過那些酋長來實行管治吧了。實施這個制度通常都有利於當地人，而且令他們滿意。管治二千二百萬的人，行政服務人員的數目並不超過五百，他們都是一羣熱心的公務員，許多人生活在遙遠的地區，沒有什麼生活的設施。

尼日利亞是那麼大，大量的權力下放是無可避免的，東、

北和西部的省分各設一名總行政專員，說起來可算是真正的副總督。在管治的省分裡，他們的權力僅次於總督。在管轄地區之外，他們的地位僅次於布政司。總部和派在外面的代表之間不時發生磨擦，但是我很稱心地說，在「拉各斯」的布政司署和東、西、北三個地區的總政務專員的關係一般來說是和諧的。總督在巡視時偶然間被一位總政務專員越級上訴、說服他做一件總部強硬反對的事情的話，我們會處於尷尬的局面。這可能是我們錯在沒有預先提醒過總督，假如因為這樣而使到總督不愉快的話，我們也沒有什麼法子，頂多是盡力說服他改變原意。他當然很不願意改變原意，因為這樣看起來似乎是布政司——而不是總督——才是真正的統治者。

軍事活動

人們在尼日利亞對戰爭的感覺比之在牙買加要多；因為有西非的兩個師團爲了要到緬甸作戰而在這裡受訓，所以軍事活動也比較多。西部毗鄰的地區是維希——法屬的達荷美，有時候會在那裏搞些特務活動，或者從尼日利亞派人過去突襲，這些活動都使到將軍懊惱。

「誰負責這個殖民地的防衛，是你或者是我？」

「我只不過想……」或者

「我以爲這樣做會有好處，假如……」

將軍會這樣反駁說：

「假如你真的是這樣想的話，你最好不要想了。」

將軍通常會辯勝的。

盟軍登陸北非後，大部份法屬的非洲殖民地——包括達荷

美——都加入盟軍作戰。爲這個緣故我邀請了同級的法國官員和他的太太從達荷美的首部「波多諾伏」來和我們住上幾天。在他離開的時候，我送給他一瓶威士忌作爲十分特別的禮物，因爲我知道他會喜歡的。他說：「非常謝謝你」，不過他比較喜歡馬鈴薯；雖然馬鈴薯並不比威士忌那麼缺乏，供應却也不很充足的，不過我們還是找到幾磅送給了他。

除了爲前綫提供步隊之外，西非還是個重要的物資來源，如花生、棕櫚油和棕櫚核，這些都是製造食用油和脂肪的材料。橡膠、乾椰肉、可可和錫等也是極爲需要的物資，因此，民政部屬下各科部都集中力量去增加這些物資的生產——鼓勵農民多種一些，保證道路和鐵路運輸不會因擠塞而就誤了把大量的物品運送到港口裝船上。所有這些工作都需要有關的單位互相配合，這包括了四塊西非殖民地之間、各政府的部門之間、政府與商人之間的合作等等。在尼日利亞，這種配合做得很好，我相信其他的殖民地也是做得同樣的好。我常常跟西非商人協會在尼日利亞的高級負責人員舉行非正式的會談，地點在我們其中一個人的家裏。我們發覺這樣比之在辦公室裡會談使我們大家更爲了解對方，關係更爲和諧。四個殖民地之間在工作上互相配合跟一個殖民地內部各單位之間的互相配合是一樣重要的，但却做得不太好。後來解決的辦法是委派一位內閣部長長駐西非，對四個殖民地有工作統籌的權力，這樣安排是成功的；他不但能使四位總督——岡比亞、塞拉利昂、黃金海岸及尼日利亞總督好好地合作，而且由於他是個內閣部長，可以直接向首相報告，辦起事來比一般的做法——由總督向殖民地部匯報——快得多了。這個部長是史云頓勳爵，他那充滿活力的性格和幹勁帶來了很多非常有利的效果，他與總督和總司令

們所舉行的會議都是有建設性的，比之以往同性質的會議還要省時間。可是有時候我們也免不了給他逗得樂起來，當他說：「紳士們，全世界的人都看着我怎樣做的，……」他已經忘記了面對的是一班實幹的司令和單調的公務員，而不是發表政治集會的演說。他最大的弱點是在巡視的時候去聽信一些比較低級的行政人員的話，我讚成最高的領導人不限於聽取高級人員的意見，也去聽取較為低級官員的意見，這樣有時候可以掌握到一些有用的資料。事實上，關心事情的「大老闆」會大大提高士氣，不過他應該對所有聽到的東西都當是一成不變的真理。

西非的戰事會議是由史雲頓勳爵在「阿克拉」的地方召開的；任署理總督的時候，我出席過這些會議。有一次，我帶同慕蓮到開會地方去，我們都很高興再見到阿倫爵士和他的夫人，就在黃金海岸他的「基士津堡堡壘」總督府作客。我們乘坐轟炸機，飛過達荷美和多哥地帶，我們可以看到在下面僅有數百呎的密林一直伸延到河流和支流的邊緣，或者把一些小村落密密地包圍起來，好像一有機會就連這些村落的地方都要佔掉似的。

「基利津堡」相信是丹麥人在一六六一年建造的，作為一個販賣奴隸、運輸象牙和黃金的基地，於一八五〇年賣給英國。它屹立在大西洋的海岸上，圍牆不時給巨浪沖擊。裏面雖然使人覺得舒服、覺得像一個家，它仍然給人有如棲身大海的感覺。

社交

社交通常沒有在牙買加時那麼頻密，其中一個理由是在這

裡的女士們比較少。政府官員的太太是不准跟着丈夫從英國來到這個殖民地生活的——除非她能夠在這裡得到一份工作，所以家眷的數目很少，而到這兒來整天都爲自己那份工作忙着，根本就沒時間去搞那些橋牌會、或者類似的聚會。我們的社交生活都只是一些非正式卻相當有趣的聚會，以及每星期一次在「艾高意俱樂部」的舞會，或者到不很漂亮卻有危險的海灘去沐浴；星期六晚上，「拉各斯」人都去露天電影場看一些古老的電影，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享受，有時候在回家途中更忽然大雨而走避不及，即使這樣我們也一點都不放在心裏。我們或是步行，或是騎單車，因爲我每月所分配到的汽油只有兩加侖，當然是不夠用來遊車河的。威士忌、毡酒及啤酒的配給也很少，到別人家裏作客的人大多對主人家的酒很有興趣，但是他們也會酌量而飲。

星期六、日的午餐都是規定的，主菜是由北部運來的煮用花生和用棕櫚油配製的肉排——南部是棕櫚油的產地。我們用棕櫚酒來配棕櫚油煮的肉排；這是一種使精神爲之一振的飲料，有點像羌啤的味道，有顏色，甚至有泡沫，而酒精含量很低，假如讓它發酵的話，含量會變得很重。非法取用香蕉、菠蘿和其他生果來釀酒的情況很普遍，有一次我在市場就看到一瓶牌子上寫着：「私毡酒——三便士」的酒。煮用花生和棕櫚油煎的肉排起來吃很有味道，但是在熱帶氣候地區，這種吃法在份量上是多了一點，吃完之後有睡午覺的感覺。

有地位的非洲人的婚禮——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英國聖公令的儀式，都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但是由於氣溫高——不要說濕度了，要等待姍姍來遲的新娘子半小時，再忍受冗長的

儀式，就簡直是一項耐力測驗；假如沒有女士們那些顏色鮮艷的衣服和其他引人入勝的服飾的話，這情形不是一般人可以捱得過去的。在一個婚禮中，新娘子的三個長得結實的姑母都穿着一樣的粉紅色薄綢長裙，還戴上配合拖裙裾的帽子，大搖大擺堂堂皇皇的進入教堂，吸引着所有人，她們就坐在我們的前排；而其他的賓客則穿着燦爛深紅色的天鵝絨或長毛絨，和她們的黑皮膚配襯起來很美麗。我相信，自滿使到她們表現得很從容大方。

一個比較令人愉快的聚會就是每月一次的晚宴，出席的非洲人和歐洲人各佔一半。這種聚會通常是死板和令人尷尬的，可是在「拉各斯」就沒有這種情況，那是快樂和輕鬆的，這並不是因為大量酒精在作怪——一點都不多。兩位聖公會和天主教的主教——維寧和泰勒來——都很吸引人，是十分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都是俱樂部的會員，他們到我家來吃飯的時候，都喜歡打完橋牌，為比較嚴肅的職業增加點輕鬆。

唯一的官式晚宴就在立法局會議的期間舉行——當時我是署理總督，一共舉行了兩次，每次大概有四十人參加，由副官和我們的私人秘書迎接客人，跟着便開雞尾酒會，接着他們在客廳裡由高級官員開始成半圓形的排起隊來——連太太在內。當一切準備就緒後，副官便在客廳門口宣佈：「總督閣下和葛量洪太太到了」，我們進來後便跟各位賓客順序逐一握手，完了以後，我把手臂伸到地位最高的女士後，而我太太的就伸到一位地位高的紳士處，馬上隨着花園裡的樂隊所奏的「英國的燒牛肉」的樂曲聲，一對一對的步入飯廳。桌子上擺設着用銀器盛着的珊瑚花，九盤秀麗的花使氣氛十分幽雅，再配襯着

點起白臘燭的銀製燭台，便交熾成一幅美麗的圖畫。飯廳裏還有一棵長着大葉的大葵扇樹在搖擺着，十多個穿着白色制服和帶上肩帶的侍者站在椅後招呼客人，整個晚宴都有音樂伴奏。晚宴後，我站起來，宴客也跟着站起來，然來我就舉杯祝酒說：「天佑我皇」，跟着樂隊便奏起國歌頭那六節，跟着便喝下祝酒。女賓先離席，男的跟着她們進入客廳，然後分成兩人或三人一組，輪流由副官引領到我和我的太太跟前，使到我們有機會跟每一個客人談話。到了十一時，樂隊便奏起「英皇」樂曲，這表示賓客離開的時候到了，我和我的太太走到門口和賓客一一道晚安。

在非官式的宴會裡，一切從簡，就好像在家裏的聚會一樣，唯一例外的是會為英皇祝酒，而且最先為總督上菜，後者的做法當我出任港督後便取消了。

騎馬

騎馬是我心愛的消遣，奧雲少將幫忙我才如願以償。他是技術精湛的騎師和馬球好手，他擁有一羣馬匹。我喜歡騎馬並非因為這項活動上益於健康，或者為了達致人馬相通的境界，部份的原因是想享受鄉村的景色——不論是英國的塞撒斯郡和威爾特郡的鄉村、或者是在中國的乾涸稻田、又或者是在「拉各斯」的滿佈沙塵的小徑上的景色都使人陶醉。同樣使人感到滿足的就是馬鞍所發出的聲音、揮動馬繮所給予的快感、從馬耳之間看到前面的景物、很協調的慢跑節奏、和疾馳所帶來的歡騰，還有馬蹄在草地上發出「達、達」的聲音，以及一陣陣的風呼嘯地吹起着頭髮的感覺，都使人感到滿足。

天還沒亮，奧雲便在他的車子裡叫喊，我們乘坐他的車到馬房去，由那裡騎上馬匹，在鋪了沙的小徑上越過樹林，小徑兩旁佈滿散發芬香氣味的灌木、棕櫚和一些被瀑布一樣的藤蘿纏着的樹。出了樹林之後，我們便在草原上騁馳，通常在日出的時候到達咸水湖，在陽光的照耀之下，湖心像一堆黃金般閃耀着，岸上的鬱金香樹則炫耀着盛開的深紅色的花朵，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對金冠鶴，有時看到一對白鷺，有時看到翠鳥。我們會騎馬到水裡去，直至浸過馬膝。然後在瀰漫着潮濕泥土氣味的空氣中騎過滿蓋露珠的草地返回馬房。慕蓮從來沒有騎過馬，少將教曉她後，她也常常和我們一起騎馬，不過她覺得這會使她非常疲勞，她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一九四二年的聖誕節

在尼日利亞渡過的第一個聖誕節是最令人快樂和最不平凡的一個節日。總督博迪倫和夫人邀請了我們坐上他們的「勇敢」號艤明船——類似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小型輪船，除了其他用途以外，它還被用來送總督及其他高級官員到陸路不能通達的內河地方去巡視。船上的總督套房陳設得非常豪華，讓我們住的房間也佈置得十分完善，甲板寬闊，客艙還用來做飯廳，船的頂甲板上裝了一個撞木柱遊戲場。

這次聚會的人數不多，有總督夫婦、總督的兄弟、到「拉各斯」來旅行的一位醫生、駐尼日利亞「自由法國」部隊的司令亞當上校、總督的副官和我們夫婦兩人。「勇敢」號停泊在總督府的着陸台前，裝好供應品和行李之後我們便全部上船。當「勇敢」號駛離總督府的時候，留在總督府和我的官邸的其

他沒有旅行的人員在岸上向我們搖手送行。很顯明，他（她）們都和我們一樣期望着這樣的假期。結束了令人快樂的午餐之後，大家都來一個非洲西岸非常需要的午睡。之後，女士們都忙着把客艙佈置得十分漂亮，讓它看起來真的有聖誕節的特色，還擺出一棵應節的人造冬青樹做聖誕樹、槲寄生植物、臘燭，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東西、使到客艙充滿了聖誕氣氛。

船靜靜地緩駛着，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咸水湖，黝黑和有瘴氣的湖面上長着尼羅河種的新鮮捲心菜，短短的菜根在水中浮動着，被微風吹到各處，水流把它們帶到東之後又帶到西，湖邊到處都是這類植物。再走遠些便看到燈心草和巨型的大傘沙草，在它們上面的是棕櫚樹和其他的樹木——有印度扁桃、木棉、野蕉、波斯丁香屬植物、檳如樹和一些溫帶地區從來沒有的樹木；夢藤纏着樹木，形成巨大的遮蓋物；整個世界就都是青綠色的青黃色的植物和深墨綠色像天鵝絨的湖水。我們拋錨的時候，太陽正隱沒在森林裡；我看着陽光慢慢消失時，我們不期然產生了生活在巫術世界的感覺，被這個正在形成的神秘世界所吸引着——那就是這個黝黑大陸的神秘。

晚飯充滿了歡樂的氣氛，正好是平安夜，沉悶的工作遠遠的離開了我，我們知道明早起來會是休閒的日子，可以繼續娛樂，總督也變得無拘無束，大家都無拘無束交談，我們喜歡做的事就做，不喜歡的就不做。最後副官用風琴奏起聖誕歌，之後大家回艙睡覺。我們在非洲慶祝第一個聖誕節，有了一個好的開端。

第二天的早餐桌上，每人的坐位上都有一份禮物，博迪倫

夫人爲每人預備了一件很有趣的禮物，打開來的時候，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傭人亦覺得非常有趣，黝黑的面孔流露了笑容。此外，他們也得到了禮物。

觀賞鳥類是博迪倫爵士的嗜好，早餐後，他和夫人，以及法國部隊司令一同坐了小汽艇上岸去觀鳥。我們則決定去到岸邊的小村落去看看，發覺那裏的人過着原始生活，就和他們在一千年前的生活一樣。我們走近時，婦女立即抱着嬰孩跑回茅寮，不久之後她們探頭外望，然後慢慢地走近，仔細地打量我們。雖然彼此不能交談，但是微笑便是大家的共通語言。我們沿着一條小徑往內陸走去，到了一塊小空地，那裡種了高粱和甘薯，還有捕捉的魚、香蕉，和一些野生的水果，相信就是他們的食糧。我們又看到一些可愛的雀鳥，才知道觀鳥的好處，也希望自己帶了觀遠鏡。

晚上我們吃了一頓傳統的聖誕餐，有火雞和火腿，還有葡萄乾布丁，然後玩猜謎遊戲。往後的幾天裡，我們都忘記了「拉各斯」和它以外的世界。我們爲眼前的快樂而生活，喜歡做什麼就去做，例如釣魚、射擊、或者只是耽着養神，間中和一些同伴聊幾句。我們還記得那個單純宜人的日子。可是「勇敢號」忽然起錨了，又把我們帶回來每天都在工作的世界裡。在我們回航返「拉各斯」的時候，唯一的安慰是我們遇上了一陣由撒哈拉沙漠吹來乾燥的和涼快的風，把熱浪和溫氣都吹散了。

訪客

客人絡繹不絕的來到「拉各斯」，有些是因公事而來的，有些是路過的，戰時從英國和美國去埃及，印度及中國的唯一正

常飛行航線要以「阿克拉」和「拉各斯」為中途站。乘客以至有優先權的人通常都要等上幾天才能坐上接駁的班機。酒店的數目很不足夠應付，而且住宿設備甚差，因此政府只好為路過的乘客設立臨時接待站，比較重要的人物就接到總督府或者到我處住下來。我們空着的那間房間很少時候是沒有人住的，假如總督出外巡視，我們便把客人安置在總督府，吃飯的時候就請過來我們處；一般來講總算安排到令他們舒服和愉快。一班剛到的客人站在大堂等着離開的客人搬出房間的情形常常發生，假如班機延誤或者取消，麻煩的情況就來了。食用方面只發生了一次真正的困難，那次是總督出外，四位印度人被招呼到總督府住了兩個星期，由我們負責接待，兩個是印度教徒，不吃牛肉；另外兩個是回教徒，不吃豬肉；剛巧找不到羊肉供應。我們唯有用家禽頂替，從那時起我們真的再沒有勇氣去面對雞隻了。

這都是我們額外的工作，不過我們一點也不介意，因為受招待的大部份都是很有趣味的人物，由國王、公爵，以至劇作家、作家、總理、首相、外交部長、將軍，以及不同國籍的高級政府公務員都接待過。有些還跟我們交上了好朋友，而維持到現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駐華大使維奧莉·西摩，她是位令人感到趣味盎然和喜歡的人。

奧利華·史丹利在我當上署理總督時來到尼日利亞，我相信這是殖民地部大臣第一次來到這塊殖民地，故此是一件大事，我從來沒有直接接觸過部長級大臣。他是非常令人喜歡，他的逗留也非常成功，而且有用。雖然他頗為了解尼日利亞，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給我們來個瞎指揮。所見的人他都採取了友

善和同情的態度，但是他不要聽廢話。他在尼日利亞各地巡視十天，剛到時，在「拉各斯」兩天，以及離開前在「拉各斯」兩天都使人覺得他得到了親身的了解，這鼓舞了我們的戰時工作。

爲了能夠在社交場合裡和他見面的人盡量多，我們舉行了園遊會，一共請了八百多人。那真是一個輝煌的日子，陽光普照，清風送爽，每個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非洲人就穿了本土的服飾，很是好看。其中一位酋長還全副武裝，像國王般坐在椅上，他的隨從則圍着他坐在草地上，真是一個生動的景象。我相信每一個人，包括史丹利在內，都爲園遊會而感到愉快，發覺它是在比較沉悶的戰時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一個轉變。

另外一位客人我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一位W. R. N. S. 的高級官員，到西非各處巡視，我們都認爲她浮誇和令人厭倦。有一條一條小蟲在她的敏感處咬了一口，大家却樂了，那是令人十分討厭的小蟲，在皮膚下產卵，卵舍孵成蛆蟲，出現在皮膚上，會使患者感覺輕微的痛楚。

官式巡視

在尼日利亞的官式巡視儘管有時使人疲倦，但到底是一件樂事，我做署理總督時有不少視察機會。總督必須要知道殖民地事務的第一手資料，而且要熟識那個地方。要做到這點，唯一的方法就是定期視察，與不同的人直接接觸。視察可使人民知道那位「總督」閣下是真正在位，而並非純粹是在遙遠的「拉各斯」或任何一個首都的某位人物，又會振奮當地的官員。了解這一點，視察時我也感覺問心無愧，因爲我履行了我的職責。

有些只用車輛便可以到達視察地，汽車走過碎石或紅土鋪成的路，兩旁是平整的草堆，或者整理過的樹林，使森林地帶沒有侵佔公路。這麼多種森林中，我覺得絲光木棉森林是最好的，樹身由地面向上升至六十呎後才有樹枝，高高在上的樹葉似乎凌駕了整座森林。

其他的旅程或者只坐火車、或者坐飛機、或者乘坐「勇敢號」，這要視乎視察地點而定。坐「勇敢」號沿河而上是最舒服和最寧靜的，有些河道窄得連兩旁的樹木碰到船頂，有時候走出了狹窄的河道後便是一個豁然開朗的咸水湖。沼澤地帶的兩岸有許多長竹或木支架建造起來的小屋，小孩子在走廊上嬉戲，那裏還有雞、狗和貓。每次到達視察的地方時，當地酋長便會在堂皇的隨從陪同之下，到來表示敬意。我還記得其中有一位酋長所戴的是一頂由十四世紀傳下來的銀皇冠，可能是來自葡萄牙。晚上拋了錨之後，我們都被輕輕打在船身上的水聲慢慢送入夢鄉。

乘火車視察是最奢侈的了，總督有自己的列車，一共六個車箱，本人就有一個自用和一個客廂和兩個睡房，其中一個是給副官和私人秘書用的，另外的有一個是給僕人用；有一個是用來做餐卡和廚房，還有一個行李車廂裝載着總督的座賀覺、行李和供應物品。那六個車廂會由一個貨運列車拖着，所以行車速度絕對不會超紀錄的。有一天早上剛要用早餐，列車突然中途停了下來，查問之下有人對我說：「因為總督閣下在吃早餐時車子不能顛搖。」

乘飛機視察用皇家空軍的雙引擎飛機，相信是D. M. 89A型

，只能載六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僕人預先乘坐火車或貨車到目的地去。

無論我們到那一個城鎮都受到歡呼，和接受大批羣衆出迎，跟着便會見酋長和他的議事會人員，然後發表合時宜的演說。有一次，我到北部省份的「沙里亞」地方去，酋長勳章給他們的伊瑪（酋長）頒授勳章，見到了一個十分動人的景象，皇宮前面帳幕旁邊的大道上，來了一批小地區上的酋長，各人都帶了隨從，其中一位騎着一匹披上顏色鮮艷服飾的馬匹，和率領着一批紮着色彩美麗的頭巾及穿起寬袍的隨從，一同以最快的速度在跑道上向我們奔馳過來，手中舞着劍和長矛，快要接我們的時候，馬兒突然一起轉身跑了開去，不久之後又來了另一隊，這樣一直重復了十五次。

那次出巡，我們還視察了「卡諾」城市，這是位於沙漠邊緣的重要市鎮，建於公元九九九年的，到現在還是重要的貿易中心，大約在四百年前，來自廷巴克圖的旅客帶給他們回教的文化和宗教，現在的人口仍然以回教徒爲主。這裡用泥做的房子是正方形和平頂的，正面有類似幾何圖形的設計，顏色光亮奪目；在這裡所見的是被太陽烤乾的泥土，陽光猛烈、乾燥炎熱、許許多多的駱駝和騾子商隊穿着白色寬袍而膚色黝黑的人慢條斯理地在街上走着。

我們剛好來得合時，「卡諾」城正在慶祝歡樂的時節，剛好是齋戒月份^⑩，我們被帶領到一個有遮蓋的屋頂上等待伊瑪酋長的來臨了。看着下面熱鬧的人羣，下面的人羣有步行的，有騎着馬或駱駝的，有兩個小丑正在爲我們表演魔術。跟着我

們看到遠遠的地方有一大羣人向我們走過來，中間打着儀仗用的大傘，金色的傘杆旋轉起來使到金銀色的布頂在陽光照耀之下閃閃生輝，好像打亮了的金屬一樣。大傘之下騎着一匹白馬的是伊瑪酋長，穿着一身黃白色的袍，頭上紮上一件大的頭巾而下半部被一條領巾遮蓋着，騎着馬匹的隨從都穿上了甲衣，而步行的也穿着得十分漂亮，形成了堂皇的景象隊伍停下來之後，酋長下馬，我由屋頂下來，大家行禮，握手，跟着互相問好。伊瑪酋長騎上了馬之後整個隊伍就離開，而我也返回了下榻的官邸。

那天晚上我在官邸舉行了宴會，伊瑪酋長是上賓，他有六呎多高，身型魁梧，他的寬袍和頭巾使他的身軀看起來更加高大，看他面部的特徵便知他是有阿拉伯血統。雖然我們要通過翻譯來交談，他的儀表仍十分吸引人。慕蓮很讚賞今晨廣場上的一隻裝飾着珠寶的白駱駝，但她這樣做可有點不太聰明。伊瑪酋長接着說：「夫人，那匹駱駝是我的，我十分樂意送給您。」雖然慕蓮婉拒他，但並不成功。因我們的飛機確實裝載不下這龐然大物，酋長打算用火車把牠運給我們。還幸這裡的專員以戰時的管制是不准用火車裝載牲口為藉口解救了我們，而這隻嬌生慣養的畜牲也不可能步行八百哩到「拉各斯」。

在「卡諾」市期間，慕蓮被酋長邀請到他那住了有四位妻子的後宮拜訪，她回來說那地方活像「天方夜譚」的景物一般。慕蓮有專員的太太做傳譯，門外迎接她們的是位長得極高的太監，他把客人帶進一列很高的圍牆內，再穿過了一些迷宮樣的黃色庭院、黑暗的房間和通道，看見房內有些婦女和小孩子，還有長沙發、靠墊，及地氈。牆壁和高的拱形天花都裝飾各

樣的浮雕，配着生動的銀色輪廓。最後她們進入了一間歐洲式設計的房間。每位酋長的妻子輪流進入房間，次序是地位最高的和最不漂亮的最後進房。最少的那位叫「姬絲亞」，意謂「使人妒忌的女人」，是個十七歲可愛的女孩子，她的手和腳都染了一點點的靛藍和沫花染劑，使她那溫暖和棕色的皮膚產生了美艷的效果。她穿著十分漂亮，帶了金手鐲、腳鐲、和耳環，她害羞到幾乎不敢張開眼睛看人。最後來的是酋長的弟婦，一位中年而肥胖的婦人，飽滿的面孔氣定神閒，她很喜歡這樣場合，因她可以控制了整個場面。這些婦女在這種諸多限制的環境中也還快樂，她們可以在這優閒如夢境般的氣氛中找到各自期望的東西，比方閒言閒語、爭吵、懷孕及養育孩子——跟着古老的文化傳統去做。她們無意離開這裏，反之，這樣的提議會使她們吃驚。慕蓮對我說，她們看起來是滿足的。這位酋長的家庭有六百個婦女，大得可以成爲一個多姿多彩的團體！

最後要巡視的地方是「索各圖」，那裡的酋長是全尼日利亞的回教徒中地位最高的。在離開專員官邸作官式訪問的途中，車子突然被一羣穿着顏色鮮艷的騎士團團圍着，他們大叫、大嚷，手中舞動長矛，當我們還未從驚愕中回復過來以前，他們已在我們的車子兩旁排好了護衛陣容，送我們前往宮殿的大門。那位年青英俊的蘇丹剛登基不久，儀表看來有點像長老的儀表，儀態極好，使人覺得他是個十分精明的人。

總督府

博迪倫爵士的健康每况逾下，後來醫生說他必須退休。一九四三年五月，他和夫人離開尼日利亞，由我任署理總督。不管誰來接任，新任的人一向都會在數個月後才到任，因此我們

便住進了總督府。這樣又需要來一次大裝修了，因為自從博迪倫在八年前搬進以來，這裡從未裝修過，現在是時候了，而去工作的人就是我的太太。當我們知道新總督是李察斯——我以前在牙買加的上司時——我們歡喜若狂。除此之外，李察斯夫人和我太太在室內佈置方面的風格都相同，所以慕蓮知道她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佈置，因她知道這會適合李察斯夫人的口味。

總督府的傭僕也要整頓一番，他們有些是總督自己聘請的，有部份是由政府僱用的，而特別是後者，他們比較懶惰、效率低和不整潔，經過幾次的警告之後，我們解僱了兩人。他們都在總督府工作了廿年，以為做不做事也可以在這裡過一輩子。不過我們請他們離去時都付給了他們應得的退休金。

工人宿舍的地方好像一條村落那樣大，不時有閒雜人等進去，我們傳令驅逐這些人。並在某一特定的日期裡我們前去視察。他們不相信自己在這裡的利益會受到干預，結果經過重覆的警告後他們才完全離開。跟着我們做了一個調查，發覺整個宿舍的人口比從前少了一半。

在一次談話裡，一位朋友告訴我們，她的僕人說總督府內的賭場已經關門了，這對我們來說真是新聞，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曉得這裡有一個賭場存在。很明顯總督府的傭人曾經開了一個賭場，賭客是其他來自「拉各斯」市的傭人，因為他們知道在總督府裡開賭很安全，警察不會來查禁。現在那些滋事份子已經接到警告，和現實而解散了。

鄉假

我任職兩年便屆放假的時候，雖然不知道在英國休假期間我是否會接到調任的通知而不用返回尼日利亞，我們認為最好還是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好，這樣假如我們被調職的話，便可以把行李運到我的新任所。假如是返回尼日利亞的話，頂多是把已收拾好的東西從新打開。由於「拉各斯」沒有專業的裝箱工人，我們就自己動手，並由傭人幫忙，因為他們不大會做，結果差不多全部由慕蓮動手來做。有一天我剛吃過午飯回家，看不到慕蓮，我便跑到屋後的走廊找她，我看到一雙小手從一個巨大的、用來裝瓷器的箱子內伸出手來，而我們那個第二號男僕，湯，則站在外面，懶洋洋地把碟子、杯子、和茶碟遞過去。我走過去看看，原來那雙手是慕蓮的。無怪在離開尼日利亞後，她需要一年時間才能恢復健康。

我們向朋友告別了，還有要為我們的寵物安排新的家。同時我們也決定，只要有一天我們還是過着流放生活的話，我們就不再養寵物了，我們這樣做法似乎是對那些動物太不仁慈了，因為牠們都把一切給了我們。

慕蓮提前幾星期離去，返回加利福尼亞。我後來到那邊跟她會合，然後一齊返國。

我們對離開尼日利亞覺得很遺憾，因為我們喜歡這裡的工作，那些友善和快樂的人以及那種生活，而且我們還非常喜歡這個國家。可是每一個人的野心都是爬到一棵特定樹的樹頂，而我那棵樹就是殖民地工作，總督的職位就是它的高峯。

第五章

斐濟和南太平洋，1945—1947

我常常都希望有一天會被派駐在斐濟，我的興趣來自李察斯爵士對我提及那些嶼和那些他喜歡的居民，他曾經在當地任過總督。斐濟的總督菲力·米曹爵士已經駐在那裡僅兩年，而正常的任期是五年。怎知無法預料到的事發生了，肯尼亞的總督職位出缺，他被派去那裡，而他的遺缺就由我來補上。除了因為第一次獲得總督的職銜而高興外，我也為可以到斐濟做事而興奮，此外，斐濟的總督亦同時兼任西太平洋的專員和西太平洋的總領使，並兼管在湯加的英國領使和官方派駐的代表。當委任令來到的時候，慕蓮仍在三藩市，而我在英國，因此我要再往三藩市和她會合，由於戰爭仍在繼續而沒有民航服務，我們乘坐着美國軍用航空運輸機到斐濟的首都蘇瓦。在那兩次的飛行中我們兩人是僅有的乘客，其他的都是貨物。在由檀香山飛往蘇瓦的那程之間，飛機在英、美共管的CANTON ISLAND過了一夜，這也是由美國西岸飛往澳大利西亞途中一個必定停留的口岸。這是我們初次見到的一個南海的島嶼，也是我管轄的領域，因為Canton Island是吉爾伯特羣島和埃利斯羣島殖民地的一部份，而在這個殖民地是受西太平洋專員管轄的一部份一個珊瑚島，大約二十哩長，五百碼寬，它圍繞着一個梨形的咸水湖。它不是一個典型的南海島嶼，因為那裡的植物長得十分疏落，而且很少棕櫚樹。在進入斐濟的領域時，我們坐在駕駛艙內看到「瓦努瓦」島嶼（大約二千平方英哩的面積），是斐濟兩個較大的島嶼中的一個，另一個是「雞提」島，它是「瓦努瓦」島的兩倍，而在南面的是蘇瓦。飛機飛行的

高度低至使我們看到那些密佈森林的山脈，山頂從水平線或翠綠的平原向上升起三、四千呎。在斐濟着陸後，來迎接我們的是輔政司約翰·尼高，（現時的尼高爵士），他們是自菲力·米曹離開後一直任署理總督，還有其他的重要官員和社團的代表。之後我們檢閱了斐濟軍隊的儀仗隊，他們都是外型壯麗的隊伍。跟着我們乘車沿着一條繞着咸水湖的道路前往總督府，進入大門後便是一個花園似的地方，汽車駛上了一條彎曲和種着棕櫚樹的小路，到達一處小丘，那座長方形白色的屋子和它的拱廊看起來十分幽靜和令人欣喜。

原來的總督府已被一場颱風吹毀，當新的房子圖則正在準備的時候，總督剛巧路經哥倫坡，那裡的一座博物館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就這樣他寄了一張那座博物館的明信片回斐濟，在背後寫上指示，要新督府的設計和博物館一樣。那張明信片現時仍在總督府保留着作為有趣的紀念品。建築物的設計是根據他的指示而興建。不過，內部就不一樣了。那個七十呎長的客廳和隔壁另一個較小的客廳有法國式的窗門，外面是一條走廊，穿過了大堂是一個比例均衡的飯廳，可適用於大、小的宴會，上層是一系列的睡房，總督的套房設在最尾的位置，那間套房很寬敞，空氣流通，可一覽窗外美麗的景色，由海灣以至遙遠的山。我們不時在走廊上和一隻友善的夜鶯共進早餐，牠蹲在盛糖的碗的邊緣，有時用嘴去啄一粒巴婆果。黃昏時，我常不厭地在走廊上望着警衛放下旗杆上的旗。他們穿着白色的緊身上衣和一條像蘇格蘭裙的裙子，整齊地操到旗杆前停下，當士官開始降旗的時候，警衛便舉槍致敬，號角手跟着吹出降旗的樂曲，儀式完畢後，警衛便把槍枝掛在肩上，赤着足，靜靜地操着離開——一天又這樣地過去了。

雖然屋子的外型是好的，但若要內部的裝飾合乎一間總督府和我們自己的要求的話，那還需要大量的重新裝備。慕蓮負起了這個任務——由於缺乏熟練的室內佈置技工，工作十分艱辛。過了一些年後，她收到了那時在當地任總督的夫人的信，讚賞慕蓮在總督府佈置方面所下的工夫，此信慕蓮感到稱心如意。

總督府距離我的辦公室不遠，只須穿過一條兩旁都有藏紅花的小徑，而我的辦公室比鄰就是輔政司署，這都是原來總督府的用地。

總督府的用地大概有五十畝，有廣闊的草坪和漂亮的樹木，有些船型的蘭花開得非常燦爛，還有許多種種不同的花床和花圃，全部都盛開得很美麗，建築物被開花的攀藤所遮蓋着，而在一些地方，百合花正在展示它的美姿。在網球場的附近有一堆熱帶花，全部為高樹所遮蔽，使陽光不能穿透。在這個昏暗的氣氛裡，生長着帶香氣的特種百合、精巧的厥樹、蘭花和奪目的各式各樣花木。

有一個園丁是位矮小的印度人，他有一雙像聖徒般的眼睛，他不能忍受有任何植物被人拋棄。假如吩咐他拔掉一棵植物的話，他會把它移植在花園較遠的地方，這樣做只是為了保存那棵植物的生命。他叫穆罕默德，曾經是個囚犯。有一天我問管家他曾犯的是什麼罪。「啊！」這位管家，阿星，淡淡地說「他殺了他的妻子，還把她碎屍後放在一個袋裡」。不過她曾經對他不忠。

花園較低的部份常被水淹，主要的原因是「蘇瓦」是多雨

的地方。我們想假如有好的排水系統的話，這個沼澤般的地方不難變成一個寬敞的花園，使已經美麗的花木和棕櫚看起來更美麗，因此我們自己設計了一個改善計劃。工務署長的人品算是不錯，但他是一個頑固的蘇格蘭人，他極端地反對我們的計劃，可是我比他更固執，結果工程如常進行。可幸的是這項工程事後證明是有用的。

傭人裡有斐濟人和印度人。巴拉是個印度人，是我們的第一廚子，負責管理廚務工作，他是個文靜的人，眼神給人一種幽默的感覺，而且很討人歡喜。管家，阿星，也是印度人，為人能幹，有時喝酒會喝至酩酊大醉。比蒂是高級女傭，是個討人喜歡的女士，能幹和友善。她喜歡告訴別人有關她曾經陪過一位前任的總督到倫敦時的見聞，以及有關別人怎樣幫助她的故事。維加是我太太的近身女傭，較比蒂年輕得多，她也很令人歡喜和做事忠心，不過有時她的戀愛生活使她惹來麻煩。

忠心

在離開倫敦之前，殖民地部已經和我說過斐濟和西太平洋專員管轄區的事情，而且也拜會了不少曾經到過這些地區的人，此外在去程的途中，我也盡量閱讀了不少有關斐濟的東西。所以當我在第一天會見輔政司，尼高，和專員夏利、維士格斯的時候，我對這裡的情形已經有了些認識。約翰·尼高是個十分能幹的人，外表有點像十八世紀的貴族，因為他有一個長而大的鼻子。假如他穿着那時代的衣服和戴了假髮的話，他看起來會近像那些貴族。他絕不會容忍無能和低效率的情況，所以他的下屬只是尊敬他而不喜歡他。我仍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夠有他在香港做我的副手，出任了輔政司幾年。之後他便被升調往

星加坡出任總督，他是很值得晉升的，在星加坡的時候他曾經到過北婆羅洲訪問——他在三十年前就是在那處開始了他的事業。當地的總督問他是否留意到有些什麼改變，他回答說：「有，鐵路軌上的草都比從前長高了。」

當泰甘寶國王在一八七四年把斐濟割讓予維多利亞女皇時，他送了他那枚權杖給她，還有一項傳聞說：「除權杖外，他也把國徽和愛送給了女皇陛下，還說他信任女皇和她的後繼人，會治理好和照顧他的人民的福利」。他所提到的過去是指那時酋長之間的戰爭，還有當時仍然存在的食人制度。維多利亞女皇的孫，佐治五世，將權杖送給斐濟，作為立法局的權杖。泰甘寶所說的「愛」並不是虛言，因為斐濟人對英國的君主的愛和忠心是深遠和真實的；甚至在僻遠的村落，我們可以見到屋子裡都懸掛着皇室的畫像，把他們看作尊敬的父母。假如我對一個斐濟人說，英皇希望他跑到海裡將自己淹死，我很相信他會這樣做！我們可否從英聯邦內其他的國家地區找到像斐濟這無可置疑的忠心呢?! 事實上，在參與英國對外戰爭中，斐濟的紀錄是良好的，蘇金尼瓦魯伍長在死後獲追贈一個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一位曾經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斐濟酋長曾經問我是否認為英國和蘇聯會有一天打起仗來？因為他想參加這一場戰爭！

斐濟人對我的太太一次為英國征募糧食的呼籲的反應使我也吃驚。數以噸計的糖、罐頭菠蘿及其他食品都一一運到英國去應急。其中一次，一些住在一個細小而並不富有的島上居民送來了一千英鎊。我的太太正確地認識到他們根本就負不起這項捐贈的，所以將九百鎊退回給他們，附有一封措辭謹慎的信函。他們說他們不能忍受在英國的人缺乏糧食，最後他們將整

整一千鎊用來購買糧食運到英國，雖然這意味着他們自己會缺糧。但若他們認為自己能和英國人一樣地（為戰爭）而犧牲的話，他們會快樂的。

斐濟人不但是好的戰士和性善的模範，而且好客和慷慨。他們有西太平洋羣島美拉尼西亞人的仁慈和友善，也有中太平洋羣島波利尼西亞人的堅強，斐濟人就是這兩者的混合。在斐濟東面「留」島的人是比較接近波利尼西亞人的性格。

斐濟人最喜歡聚會但最討厭工作，事實上他們何需工作呢？天然環境為他們提供一切所需的食物——香蕉、椰子、麵包果、芋頭、木薯、雞、野豬和魚等。甚至做房子的木樹和芳草也俯拾即是。加上氣候適宜。根本毋須穿很多衣服或生火取暖。他們喜歡歌舞，那名叫「麥嘉」的又唱又跳的聚會真是令人極視聽之娛。有些舞蹈是傳統的戰爭舞，那些男人都穿起一種名叫「蘇魯」的上衣，它是用又長又寬樹葉造成的。他們套上臂環、腳鐲、用樹葉和花製成的首環、塗黑了臉孔、用有光澤的油塗滿自己棕色的身軀、手舞木棒和長矛。使人望而生畏。女的舞姿十分優美好看。但不管跳舞的是男是女，節奏都很完美。有些舞蹈是要跳動的，舞者擺動上身，雙手隨着音樂的奏節擺動，與音樂的節拍十分協調。但有時也要視乎舞的性質，有些歌詞是有主題的，尤其是那些受波利尼西亞強烈影響的地方。由此可想像斐濟人很喜愛運動，英式橄欖球是他們心愛運動，斐濟人對這種運動的熱情就和英國人對足球一樣。除了最佳球隊外，其他的都很少穿著球鞋，不過令人驚奇的是隊員能赤着腳將球踢至很遠的距離。很多個星期六下午我都為警察第十五隊打氣，因為我的辦公室勤務員，力其伍長是這隊的隊員。直至

戰後我在馬來亞任職爲止，斐濟的軍團除了一年之外，每年都捧走冠軍盃。

勞工

不幸得很，這樣貪圖安逸的生活與現代的世界並不相配。製糖是斐濟的主要工業，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成立這個工業後不久便發覺到，蔗園的工人對園務漠不關心。雖然也曾試用其他來自太平洋羣島的勞工，但效果欠佳。後來便從印度引進了合同勞工。假如當時的政府能洞悉這做法的後果，他必定會三思而後行的，因爲時至今日，這裡的印度人口已經超過了斐濟人。假如這兩個人種能通婚，或者有大量的土地的資源的話，問題便不會發生的，他們彼此保持距離，劃清界限。斐濟人討厭和懷疑印度人，而印度人則看不起斐濟人。與此同時，人口的增長迅速爲土地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爲了使餘下未賣出的土地能留給土生的斐濟人，土地便交由一個「土著的管理委員會」管理。假如沒有這樣的委員會，那些無憂無慮的斐濟土著已經將大部份自己的土地賣給印度人了！印度人的自辯說：除了人種不同外，他們也是斐濟人，因爲他們是生活於斯，長於斯的，事實上，他們大部份也視斐濟爲他們的老家，而他們比較土著更能利用大地種植。不過這種說法解決不了日益嚴重的問題。工業化雖然是落後國家的所需，可是在斐濟並沒發展的前景，除了小規模的工業僅足以應付當地的市場。最好的土地都已用盡了，雖然新的土地可以開發，但是費用日益昂貴，而且越遼遠的地方，土壤越差。雖然情形如此，但是這種做法似乎是事在必行的。由於斐濟人負擔不起開發費用，只有請英國提供大量的援助。英國在名義上不是欠了斐濟的麼？因爲在泰甘寶國王所簽的割讓的條約上寫着：「……而我們對她（維多利亞女

皇)有信心，她會公平地和有愛心地統治斐濟，使到我們能夠繼續過着有愛心和平和繁榮的日子！」

在政治方面，印度人也較斐濟人活躍，而且渴望獨立，最低限度有個內部自治和一個普選的立法局，這種制度可以代替了目前由歐籍人（包括歐太籍人），斐濟人和印度人擁有相等數量代表的制度。這樣的普選會使印度人凌駕在斐濟人和歐洲人之上。當然，斐濟人不會同意這個構想的。這情形與馬來亞聯邦制時勤奮的中國人和貪圖逸樂的馬來亞人的情況一樣。不過當時馬來亞人在數目上佔盡優勢，所以控制了大局。在這兩地，人們希望能達到的目標都是將比較落後的土著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與移民一樣，使他們雙方可以公平地競爭。無論在那一個地方，比方印度人返回印度，或中國人返回中國。這樣開歷史的倒車是不可能的。斐濟問題的產生可能是由於長久以來奉行的政策，將斐濟作為一個博物館的展覽品看待。而帶動斐濟人走向現代化的工作却不足。

旅行視察

假如我要了解對斐濟和那些人們，我必須旅行視察。當然這做法對了解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不過在一個農村和非工業化經濟的地區則更為重要而已。雖然金是她第二大的出口，但斐濟低是一個農業國家。我很多時都出外視察，有時住在最大產糖區的中心，「留達加」。在那裡的鎮外，總督有一間用茅草做的「官邸」看起來很悅目，那住起來也很舒適。市鎮裡的茅舍已由木和波紋式鐵片的屋頂所替代了，因為後者在建築方面比較容易和便宜。糖業是被一間名叫「殖民地煉糖廠」的澳洲公司所控制，這間公司的效率高，與蔗農的交易也公平。由於

斐濟的兩大重要工業都由澳洲的公司所控制，它和澳洲的經濟關係是密切的。可是在其他方面，斐濟和紐西蘭的合作更大，因為前者與他們較為投契。

我最感興趣的兩次視察是騎馬越過了維提島和瓦努瓦島，每次須五天時間，這裡遠離公路和電訊服務，位於斐濟鄉村的中心。每次都由一位當地的專員和幾位斐濟官員陪同。但是每當我們到達一個村落的附近，那裡的斐濟人便跟着我們走一段路，所以我們的隊伍很少時候是少過五十人的，而跟着我們的人有很多是赤背騎着馬，大笑、大嚷，與我們一樣覺得好玩。

每到一條村，我們都與村長會面，或會見那些領導幾位村長的領導人。有時也參加當地的一種叫「恩剛拿」的儀式。這是一個古老的儀式，倘若來訪者是總督，或是一位首長的話，這儀式便是一個效忠的表達方式。「恩剛拿」是一種非酒精的飲品，相等於英國人社交場合上所喝的紅茶一樣，「恩剛拿」是用一種同樣名字的樹的樹根壓成粉末後釀製的。在唱歌和拍掌聲中，將粉沫和水混合，由一隻由樹幹割下來做的碗盛着，而再經木槿樹的纖維濾清，搖勻後，便將它倒進一個椰壳裡，接着手持椰壳的人兩手向外伸直，轉身而向來賓慢步地走到他面前。在他緩行時，除了他自己在步行時身上穿着由樹葉縫成的披衣所發出聲音外，全場鴉雀無聲，當客人喝那壳飲料的時候，有的人都突然拍起掌來並喊出「噯、噯」的聲音，聲調越來越高直至客人喝完為止。其他的賓客也依地位的高低依次受到同樣的招待。在較小的村落，儀式便沒有那麼隆重，而將飲料奉客的人可能只穿一件舊襯衣和一條卡其短褲，不過儀式的精神就沒有什麼不同。儀式中還會說些效忠和祝賀的話，並贈送來

賓鯨魚牙齒一隻。儀式結束後，每人都可以自由行動，大家再喝些「恩剛拿」和談天說地。這時候，那位高級的地方代表會和我談談當地的事情，或者其他一些我們都想討論的問題。

在這些場合裡，我們通常都被邀請嘗試一些土製的食物。我承認大部份食物都不能引起我的胃口，那些甘薯沒有味道，而雞肉又韌又多筋——那些雞隻是經人追遍了整條村後才捉到的！並在開餐前幾分鐘才宰掉的！有一次，我被迫吃三次早餐，但還未把我在出發訪問前所吃的那頓計算在內。我覺得味道最好的是吃了一隻小龍蝦，它和一隻對蝦般大小，是從村裡附近的一條山澗中捉回來，用椰汁烹調，然後放在一塊蕉葉上吃的。

若在村落過夜時我們便睡在茅屋內，屋內通常沒有一張很大的床，並鋪上草墊，這樣睡也蠻舒適。騎了整天馬，我們都想洗澡或游泳，要是海灘或小溪距離很遠問題就來了。有一條村落的唯一的花洒是在村的中央，洗澡間是用齊胸的茅草籬笆做的。當我表示想洗個澡時，村民將所有的龍頭關掉，讓我先洗用，流水雖然很慢，但也還足夠，我也須小心不要太浪費用水。

我用工務局工作艇「德奇號」巡視「牙沙蘭」羣島——《藍色的咸水湖》（The Blue Lagoon）那套電影便是在那裡拍製的。西北部的「維提島」、「肯達瓦」島，以至南部的「維提」島。「牙沙蘭」有些充滿羅曼蒂克氣氛的島嶼，翠綠的高山由水邊往上爬。我們曾經潛水，在水下一條大石的豁縫穿過，跟着跑到大石的另一面，進入了一個藍色石窟，就在那清

晰如鏡的湖裡沐浴，那景緻既美麗，不過氣氛卻使人不寒而慄。

在這次的視察中，村民送了一些海龜給我們，在回程時把牠們反過來放在前面的甲板上，看牠們的情形也着實可憐。由於總督府也養不了，我們便把大部份的海龜都送到「戰爭紀念醫院」。

我很難忘記在訪問完肯達瓦而要離開的一刹那，那時工作艇在黃昏中慢慢駛離，在一片棕櫚的背景下，居民站在海水及腹的地方，唱着家傳戶曉的斐濟曲調——「依莎莉」，悅耳的聲音由下而上傳來，是我平生所聽過最悅耳的音調。

我通常乘坐由拿拉·蘇崑拿爵士駕駛的皇家紐西蘭空軍的「加都連拿」型飛船訪問「留」羣島。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蘇崑拿仍是個學者，他被拒絕加入軍官服務之後，他便參加了外國軍團，後來還獲得了軍人的榮譽獎章。他對以前所受的侮辱並不介懷，反之在回到斐濟後，參加政府的工作，隨後被晉升為斐濟政務司。雖然在各方面看來他是一個斐濟人，不過他仍是一位牛津學者。他和他的太太，愛蒂·瑪利亞，都同樣討人喜歡，他倆都致力於社會福利工作，瑪利亞也精於撒斐濟式的魚網。我對蘇崑拿唯一的不滿是他在飛機上時堅持要抽雪茄煙，那煙味十分難聞，而他會說：「爵士，我希望你會喜歡這些雪茄的煙味，它們都是本地出產的，而且一點也不昂貴」。我說：「蘇崑拿，你也很清楚那味道簡直就像一條壞了的溝渠所發出的氣味一樣，不過請不要爲了我而影響你的享受」。他會繼續抽他的雪茄，而我們兩人都忍不住會微笑起來。

陸奇是總督府排名第二的廚師，曾經在一艘紐西蘭的船上當過服務員，他有時會陪我一起去出差。他是個令人愉快的傢伙，從容地擔當雙重角色——既是家僕，又是個「小嚮導」。在總督府裡他每清早都把椰汁送來給我飲用，當我開始喝時，他使用斐濟人對人表示尊敬的方式；屈起雙腿坐在地上，輕輕地拍着手。

在「維提」島和「瓦努瓦」島之間的「馬角皆」島上有一座由一名醫務官監督的天主教麻瘋院。我和慕蓮曾數次探訪該地，對那些修女的辦事效率和患者的樂觀心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的患者大多是斐濟土著，也有些來自南太平洋其他地區，其中還有一兩位天主教神父，他們被傳染了。可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沮喪；無疑他們是受了自己的信仰所薰陶，加上從他們住的小屋外望可以看到怡人的大海景色。院長是位性格剛強的人，她有一對粗眉。我曾問她曾否與其他修女產生過節？她回答：「很少，不過假如有的話，我會將眉毛對着他們挑一下」。

我曾因公事前往澳洲和紐西蘭幾回。對陌生人友善是澳洲和紐西蘭的共同特點，相對起來他們的國家之間的差別就很大了；印象中，澳洲的衝勁仿如一間開動機器的發電廠。反之，紐西蘭是個相當平淡的國家；每間屋子的大小都是一樣的，這樣說當然是有點誇大，但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沒有窮人，也沒有大富之家，雖然它缺乏了澳洲那種刺激作用，它却是個令人感覺得舒適的地方，而還有很偉大的天然景色，加上奇妙的釣魚和其他運動設施。

西太平洋專員公署

西太平洋的專員轄區包括了「吉爾伯特」羣島和「埃利斯」羣島殖民地、英屬「所羅門」羣島保護國、英法共管的「新赫布里底」羣島、湯加王國和「皮特克恩」島，而專員的總部則設在「蘇瓦」，離開北面的「吉爾伯特」島的首府「泰拉蘭」大約一千二百哩，與西北偏西的「所羅門」保護國的首府「霍尼亞拉」的距離相同，而「新赫布里底」島的首府「維拉港」，則位於「蘇瓦」和「霍尼亞拉」之間；在「蘇瓦」東南面四百五十哩的是「湯加」的首府，「努庫阿洛法」，而「皮特克恩」島則在東南面三十哩之外。「皮特克恩」島只有幾百個居民，全部是Bounty船上叛變的水手的後裔，據我了解，僅有一名專員曾經去過視察這個島，那次他還是一艘英國至紐西蘭郵務船上的搭客，在那島上僅逗留了幾個小時。

自從我離任之後，斐濟的總督與西太平洋專員的職位已經被分開了，現時的專員總部是設在「霍尼亞拉」的。我認為這種改變沒有什麼好處；在地球物理學的特徵方面，「所羅門」羣島和「新赫布里底」羣島與「吉爾伯特」——「埃利斯」羣島和「湯加」島完全不同，而民族與困難也不同。「吉伯爾特」羣島，「埃利斯」羣島和「湯加」島在這些特徵和經濟問題上都是一樣，而「埃利斯」羣島是在這個殖民地的南部，它的島民與湯加的島民有血緣的關係，大家都是波利尼西亞族人，與在斐濟東面的「留」羣島的居民一樣。在另一方面，英屬「所羅門」和「新赫布里底」是「澳大利亞所羅門」羣島的延展，而海峽將「澳大利亞所羅門」島與英屬「所羅門」羣島最北面的一個島嶼分隔開來，因此將它們放在同一個轄區內是比較合邏輯的。既然它們從整個太平洋來看對澳洲是那麼重要，甚至較

對英國更爲重要，那麼英國在「新赫布里底」的權力和英屬「所羅門」羣島是否應該轉移給澳洲呢？一旦將這兩個地區的權力由西太平洋專員處脫離後，專員的總部便會順理成章地設在「蘇瓦」，而斐濟的總督又再可以兼任這個專員的職務了。我曾經向管理「所羅門」事務的英國官員提過這些意見，不過他們反對，認爲由澳洲治理不如英國來得好；在沒有論據支持這論點之前，我是不會接受這個看法的。況且，澳洲政府對它的太平洋島嶼更爲關心，而且所用來做建設的費用比之英國對她自己的太平洋島嶼所關注和花費的還要多。

不過，無論專員的總部繼續留在「霍尼亞拉」或者遷回「蘇瓦」，領土之間的交通困難仍然存在。戰前，班士·菲比開過一個船運服務來往「悉尼」、「所羅門」及「新赫布里底」之間，而英國磷酸鹽事務管理局——這是個澳洲，紐西蘭及英國的代表所組成的集團——有輪船行走由澳洲到「大洋」島（「吉伯爾特」——「埃利斯」羣島殖民地戰前的首府）運載磷酸。今天已經沒有船運服務來往這些地方了；除了偶然間有些貨輪泊岸運載一些乾椰肉外，唯一的交通便要依靠一至兩艘的政府船隻；在極不舒適的情況下接載少量的乘客，其中一隻這樣的船是「亞蘭厚」號，它是「吉伯爾特」——「埃利斯」政府買的第二手船。這條船非常殘舊，它的煙囪看起來就像一紮鉛筆一樣，樣子一點也不美觀，結果在被賣掉後在「塔斯馬」海沉沒了，船上無一生還。摩特太太是位有文化和現實的專員夫人，她找人在甲板上做了一個狗窩；她搭船時就睡在窩裡，這似乎是唯一的辦法不使自己被拋出床外或受船艙下面的熱氣焗昏，因此她可以好好地睡覺。當「吉伯爾特」——「埃利斯」的教育署長和他的太太乘一艘六十呎長的船由「蘇瓦」去六百哩外的

「芬拿夫迪」時，航程要二個星期，但由於受暴風雨的破壞，有幾天船上廚師的爐灶不能生火。

其他地區之間的交通同樣不足，由於船隻很細小，乘客本身不是一個好水手的話是很難適應的。由於島嶼之間的交通貧乏，駐在島上的官員的生活是十分淒清的。那些小島可能只有幾平方哩的面積，人口只得幾百，沒有歐籍人士；假如每年有四隻帆船來過的話，他應該感到自己幸運極了。那裏找不到新鮮的菜蔬和肉類，而當時這些島嶼尚未有雪櫃的設備，也沒有收音機設備，使他們能收聽紐西蘭、澳洲或斐濟的廣播來尋找慰藉。有些官員便和當地的婦女攪在一起、酗酒或自殺等等，都是司空見慣的。

「甲」君是個「吉伯爾特」——「埃利斯」的行政主任，他有著對女人和酗酒的壞名聲。政府決定將他調到「所羅門」的地方，希望新環境使他改變。後來戰事爆發，日本人佔領了一些島嶼，他像其他幾位勇敢的人一樣，留在森林擔當海岸監視員，把敵人的飛機和船隻的行動用無線電拍回基地。日本人到處搜尋他，而「甲」君和他的同伙，都是「所羅門」島民，也到處襲擊日本人，前後殺死或傷了差不多二百人，後來「甲」君獲贈D. S. O. 獎章。日本人被趕跑後，他復任民政工作，派駐在「蘇瓦」的總部。可是由於過去在「吉伯爾特」島的孤獨生活把他的正常生活完全破壞了，他的行爲越來越差，終於最後被革除了。我曾嘗試爲他爭取一份優厚的退休金，理由是他精神上的衰退是在他年青時被迫所過那種生活所做成的；不過，殖民地部不同意，因爲規例並沒有包括這種情況，而規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現時，在這些孤島上生活沒有像從前和外界那樣分隔，而且還有了用火水發力的雪櫃；此外，戰後殖民地部有一條不成文的慣例，駐在專員管轄區的領土上的官員都會每七年調任一次；這是個聰明和有人道的慣例。

雖然斐濟殖民地和專員的管轄區的總部都是設在「蘇瓦」，它們的行政總部却設在不同的地方；專員公署的輔政司署的主管是夏利·維士格斯，他是在位地道的澳洲人，在我來到之前已擔任了輔政司的職務十六年，所以對這地方是無所不知的；不過他的認識差不多是來自在總部時的工作，由於交通困難，他很少到其他的島嶼。他在總部的責任使他對三位地方專員產生懷疑——這些專員是駐在「吉伯爾特」——「埃利斯」、「所羅門」、「新赫布里底」——他認為要嚴加監督，防止他們有意或無意地不依足指令辦事；可是那些專員也反對自己被人像小孩子般地對待。然而我發覺維士格斯是個非常好的助手，是位討人喜歡的同僚；他辦事，我放心。

我利用日本人被盟軍趕跑之後、盟軍撤離和空軍基地被關閉之前的那段時間，情商皇家紐西蘭空軍同意用「加都連拿」型飛船載我前往斐濟和「吉伯爾特」——「埃利斯」各島嶼上視察。「加都連拿」型有兩個固定艙位，每次慕蓮和我一起去的話，我們都坐在自己搬上去的藤椅上，她會把陽傘縛在艙座位上來遮擋猛烈的陽光。她跟過我去視察了幾次，而且還是第一個專員夫人去過那些地區；她到場使那些人數很少的歐籍駐當地的人員高興，因為那時已經有一些太太隨丈夫派駐的了。皇家紐西蘭空軍並沒有收我的費用，但是慕蓮就要付六個便士一哩；由於從「蘇瓦」到「泰拉蘭」或者「霍尼亞拉」有二千四百哩的

航程，所付的費用十分巨大的，不過我也不介意，因為慕蓮的在場是可引起一定的作用的。慕蓮在「蘇瓦」和悉尼替人買了很多東西，有槌子、釘、化粧品、平鍋子、水壺、甚至廚房用的爐子，都是些極普通的東西，可是在「泰拉蘭」和「霍尼亞拉」是買不到的。「加都連拿」飛船飛得較慢，不過安全可靠，很少飛高過六千呎，這樣使我們看得很清楚那些被藍綠色的水圍着的珊瑚島，而雲層的景色也是超凡脫俗的。

「吉伯爾特」——「埃利斯」羣島

即如它們雙重的名字一樣，「吉伯爾特」和「埃利斯」是兩個分開的羣島，連島民也不一樣；「吉伯爾特」人是「麥克羅尼西亞」種，有直的頭髮和一點蒙古種的特徵，而「埃利斯」人則是「波利尼西亞」種，有點「湯加」人或夏威夷人的特徵。他們兩者在性格上的不同就如在外貌上的不同一樣。「埃利斯」島民比較快樂和外向，而「吉伯爾特」人則比較嚴肅和個性獨立，這不是說他們並不友善，而且事實剛剛相反。這點可能由於島上的土壤貧瘠，而雨量又不固定，以致生存的鬥爭較「埃利斯」人更厲害。這兩個羣島合起來所形成的殖民地的邊界線橫跨赤道兩側，海岸的總面積超過一百萬平方哩，而土地的面積則僅得三百五十平方哩。這些珊瑚島鋪滿了一層薄的土壤。芋頭、椰子、棕櫚大概是唯一的植物。它的總人口只有三萬五千人，其中二萬五千是在「吉伯爾特」人。任何一個南海島嶼都是羅曼蒂克的；棕櫚樹一直生長到水邊，白色的海灘被咸水湖圍着，離開珊瑚島幾百碼的地方，海洋的怒潮像瀑布般地打在礁石上。飛船着陸時，整個景象增添了島民的歡笑和歌唱，他們通常都穿着棕櫚葉造成的裙，頭戴槿屬植物的花環。

在一個南海島嶼上住上幾天當然是賞心樂事，不過孤單單地生活幾年而沒有同族的人則屬例外。我們應該同情那位「甲」君。羅拔、路易士、史提芬遜曾經在「吉伯爾特」的一個小島上住過一段時間，那種羅曼蒂克的氣氛結果也掩蓋不了那種寂寞，結果他搬去了西索馬里的首府，「阿皮亞」居住，他在那裡逝世並下葬的。有少數的歐籍人士，多數是海員，在那裡住下來，與當地的婦女成婚，他們的後裔是歐太混血兒，其中Bounty船船員在「皮特克恩」島上的生活和所娶的大溪地婦女便是一個好例子。在視察「埃利斯」羣島的「芬拿夫迪」島的時候，我們發現，在那五百多名居民之中，有許多的名字叫「柯布連」，他們都是那位精力充沛的柯布連船長的後裔；佩蓮·柯布連是其中一位，她跳舞時的臀部扭動，眼睛好像說：「過來吧！」她可算得上是南海島嶼上的美人。現時，她可能已經是個臃腫的婦家娘，但是我相信她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充滿歡笑的。有一次在「芬拿夫迪」的島上，當地的政務官，羅拔士給我太太做了一個用消化丸來代替烘粉的餅，做出來的效果也非常好。

除了磷酸是「大洋」島的主要生產外，所有其他的島嶼都是靠生產椰子乾作為主要的經濟作物，那些植園都是土著經營的。戰前，購買和運送這些產品都是由商人來做的；戰後，他們認為這些生意不好做，所以現在所有的商業都是由土著在政府的監督之下經營的。

「大洋」島是離「泰拉蘭」島西南偏西處二百五十哩的地方，面積大概為二十一平方哩，所產的磷酸實際上是這個殖民地的「金礦」，收入差不多佔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到這個世紀末的時

候，所有的磷酸都被採完後，它便會變成一個灰暗色，沒有植物和不能居住的珊瑚島了。在一九四六年，那一千名左右的居民被遷離往斐濟其中一個叫「藍比」的島嶼上，那裡的土地比較肥沃，現時在「大洋」島的工人都是來自其他地區的。最後，到那個島已經沒有用處而被放棄時，將它交回予所屬國家便容易得多了，不管那個國家是「吉伯爾特——埃利斯」、澳洲或香港。「吉伯爾特」——「埃利斯」羣島的居民都是基督徒，而且十分虔誠，在戰前曾經發生過血腥的打鬥和殺人事件。唯一可以防止這類事件的辦法是禁止天主教與基督教在對方的區域內設立組織。

「吉伯爾特」的首府「泰拉蘭」是我首次巡視的地方，它位於赤道以北一度半的地方，是一由許多個小島組成的珊瑚島，其實這些小島都不過是珊瑚礁露出水面的脊峯；「泰拉蘭」全長是二十五哩，闊度頂多也不超過一哩，而最高的地方離水平線僅有八呎。那些相連的小島看起來像個側放的“V”字，開口的那頭是一個沉在水中的珊瑚礁，那個缺口可讓船隻進入咸水湖裡；在潮水低的時候，可以從一個島步行到另一個島。假如相隔較遠的話，則用艇或獨木舟代步，島上有大約六個村落和幾百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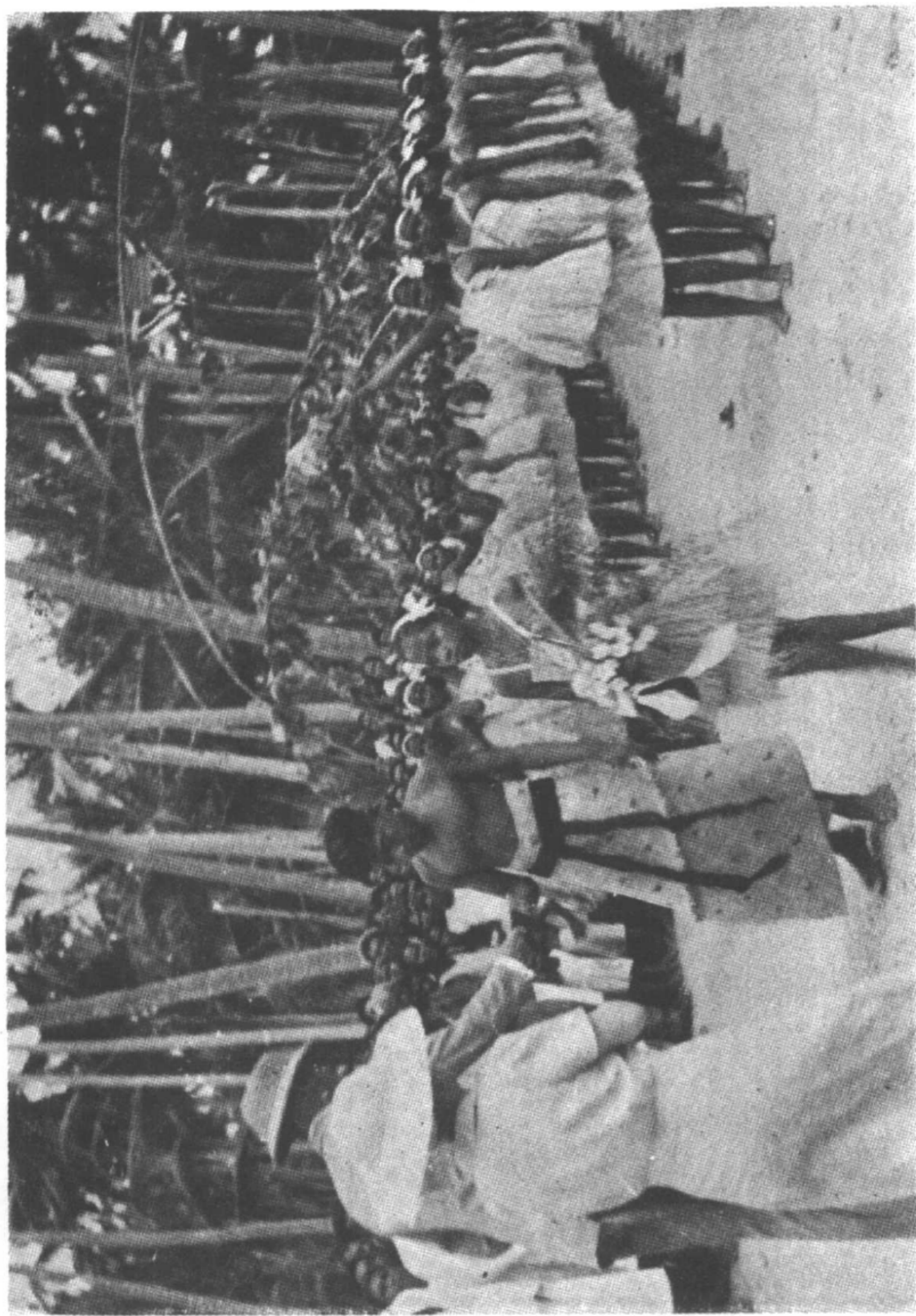
「泰拉蘭」曾經是太平洋戰爭中一個戰略據點，曾發生過一千一百個美國海軍陸戰隊陣亡而只換來幾名日本守軍受殲滅的事蹟；在「碧迪濱」小島上有些石碑是做來紀念陣亡的美軍和二十二個被日本人殺頭的轄區和歐太籍人士。

當地的專員，霍士、史莊偉的工作並不容易做；戰時的工作

仍然十分重要，不過不能太過分強迫當地的土民。同時殖民地政府在敵人退却後，要將幾個島的生活回復舊觀。史莊偉很適合這份工作；由於「吉伯爾特」和「所羅門」都是戰區，所有的文官都有軍隊的官階；雖然史莊偉所佩戴的是個上校軍階，但比他高級的美國軍官都尊敬他。在民事工作方面，他却是個熟練和能幹的行政人員。他長得英俊、有禮貌和有幽默感。我覺得他為人隨和，每當我住他那間向着咸水湖用整齊葉子搭蓋的房子時，我都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島上的居民並沒有受到英國的殖民者的欺凌必定使那些美國人感到驚奇的。他們對我的批評，是非參半。有一個地方的政務官對我說，一個美國軍人指責他說，這地方既沒有國會，也缺乏有規模的學校和醫院，最後還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到底為這些居民做過些什麼事？」那個官員這樣回答他：「我們就讓他們自己管自己。」——這是個很好的答案。這裡沒有國會，也沒有立法局，遲些或許會有，不過行政是由地方議會以及土著的官員在民政主任的監督下管理的，類似尼日利亞的間接管治。那些議會人員，尤其是在「吉爾伯特」的那些，都敢言，甚至對專員也敢說話。有規模的學校及醫院不但不適合他們，而且是有點殘忍的做法，因為這些和他們那些原始式的家居生活十分不配合。最重要的還是讓他們感到快樂。不過我也承認，戰前為居民所做的事是不夠的。除了在「大洋」洲的磷酸之外，並沒有其他礦物生產，農業的發展實際上沒有這個可能，這裡沒有外來的少數民族，沒有國家以貪婪的眼光看着這個殖民地；這些居民可以和他們的祖先一樣，過着同樣快樂、無憂無慮的生活，而現時多了的好處是他們享有教育和醫療服務。為了使他們懂得平靜生活，我們不希望這些島嶼成為旅遊勝地！

在「碧迪澳」的第二天，我和史莊偉渡過了咸水湖到了一個叫「亞包格樂」的村落。那是個多麼強烈的對比啊——「碧迪澳」是個充滿白人軍隊的軍營，而「亞包格樂」是個南海村落，一些戰爭的痕跡也沒有。由於水淺的關係，我們的艇要停在離岸較遠的地方；假如我不是以一個專員的身份來作官式訪問的話，我們必會脫掉鞋子和襪子涉水上海灘。後來由四個島民用縛在兩條長棍上、配有花環的椅子把我們抬到上去。在岸上等候我們的是位土著裁判司以及該島的議會議員。介紹過後，我們被引領沿着一條珊瑚小徑前行，上面築有拱門，門上掛着露兜樹和其他樹木的纖維編成的裝飾物。紙製的英國旗到處可見，整條村落的人都穿了他們最漂亮的衣服來歡迎我們。我們的目的地是個社區活動中心，大約有六十呎長，四十呎寬，樓頂很高，茅草蓋的頂一直伸到人頭的高度，中間和兩旁都用棕櫚樹做的柱子支撐着，四圍沒有牆壁，它給人一種教堂獨有的寧靜和清涼的感覺。我們就座後，村民便屈脚席地而坐，土著裁判司致歡迎詞，而我則致答謝詞。然後他們贈送紀念品給我，其中有草席、長筏的模型以及編織的扇子，而我就送給他們多箱肥皂——這是一件很令他們珍惜的商品——及香煙。我們主要談了一些有關當地的問題，而我盡力在史莊偉的幫助下向他們述說最新的戰爭發展情況。接待儀式完畢後，我們由麥加地小姐陪同下進入了休息室，她是位學護理的歐太混血兒，也是個非常好的即時傳譯，她的父親就是被日本人在「碧迪澳」島謀殺的二十二個平民中的一個。晚間，我們返回社區活動中心，出席了一個以歌舞表演為主的晚會，全村的人都來參加。「吉爾伯特」人比「埃利斯」人的舞蹈和歌唱有風格，也反映了「波利尼西亞」人和「麥克尼西亞」人不同的性格。所表演的歌舞可以說是民族舞和民歌，用掌心拍在一隻木制的箱



訪問期間，受古伯爾特島學童的歡迎。

子上所發出的聲音來伴奏，雖然很奇特，但是却很配合。在非「波利尼西亞人」所住的島上，有時可以看到「結他」，它必定是由歐洲和美洲傳來的。不管是「馬利尼西亞」、「麥克尼西亞」、或是「波利尼西亞」的舞蹈我都百看不厭。

在其中一個較小的島嶼上，我遇到一位法籍的天主教修女，我忘記了她的姓名；她是在半個世紀前抵埠後，一直沒有離開，她在法國之前還未有汽車，所以她不曾見過一部，但是她見過日本和美國的飛機。

「所羅門」羣島

「所羅門」羣島與「吉爾伯特」和「埃利斯」羣島形成強烈的對照，最大的「所羅門」島嶼有二千五百平方哩，而最大的「吉爾伯特」島嶼才不過十平方哩強；「所羅門」羣島多山，滿佈森林，而「吉爾伯特」——「埃利斯」羣島——除了大洋洲之外——最高的地方海拔才十多呎，沒有密林。「所羅門」的氣候炎熱和潮濕，使人覺得窒悶，瘧症十分流行；而「吉爾伯特」——「埃利斯」雖然是炎熱，但是氣溫平穩，也沒有瘧疾。

英屬「所羅門」羣島保護國分別由兩串羣島組成，位於赤道之南，由西北至東南伸延九百多哩，其中有六個島嶼的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哩；島上的山路十分崎嶇，而且密林滿佈，要深入這些地方很困難。

土著都是「馬利尼西亞人」，或稱「黑島民」，但也分幾類；有些十分黝黑，有些膚色較淺，有點「波利尼西亞」人的血統；有些土著十分原始和凶惡，是真正的「生番」，不過他們的堅強和與生俱來的智慧使人相信他們有好的潛質——尤其是那

些來自「馬尼達」島嶼的人，凶惡的性情表現於充滿好戰好鬥主題的舞蹈之中，不過他們並不很沉迷於舞蹈，在生活上差不多和「吉爾伯特」和「埃利斯」人一樣的愉快。

「所羅門」羣島的居民沒有共同的語言，一條村的居民通常不能夠用自己的語言和分隔只有數哩的另一條村的居民溝通，不過這數哩路有時被無法穿越的森林高山所分隔開。許多經常和歐洲人接觸的居民都會講一種由土話和英語合成的混雜語言；這個保護國要自己的官員通過混雜語言的考試，相信世界上很少有這種規定的國家。①不習慣這套語言，便不會明白那些對話的。

雖然南太平洋其他的英國領土居民都是基督徒，但是「所羅門」的基督徒卻不超過半數，其他都是異教徒，在傳道上比較失敗的原因在於不容易進入內陸地帶以及土著們本身的獨立意志。

「所羅門」羣島上雀鳥種類繁多，如白鸚、鸚鵡等；不過，情形跟其他森林區一樣，通常是很不容易見到牠們，唯一的例外是叫聲十分之難聽的長尾小鸚鵡。這裡也有各種各樣的蘭花；有一次他們知道了我太太想要些來配襯總督府的樹木時，便搬了一噸蘭花上了我們的飛機，差不多把整個機艙都佔了；稍為整理之後，蘭花在「蘇瓦」總督府開得很好，都為訪客欣賞。

「所羅門」的經濟依靠着椰子乾，椰子園都是由外國公司擁有及經營，最大的要算「利蘭斯」公司，總部在悉尼；戰時椰

子園都被遺棄了，勝利之後我最關注的事是找「利蘭斯」等公司返回這個保護國。這些公司都逐漸回來復業，政府同時需要設計引進食品和其他主要供給品的貿易計劃。澳洲人早在戰前已開始在「瓜達根奴」的地方採掘金礦，情形和在斐濟開金礦的公司一樣。由於交通極為不便，一間公司的主腦西奧多先生因為交通不便，在不大願意的情況下同意恢復開採工作；但不幸的是殖民地部堅持要一些他認為不能接受的條件，白費了我的努力，而金子仍然留在地下。同時，這個保護國的財政入不敷支，要英國國庫的補助。

「所羅門」曾經是海、空激戰的戰場，最激烈的是珊瑚海之戰，日本人一共損失了十二隻戰艦，包括三隻重型巡洋艦以及一百架飛機，而盟軍損失了一架航空母艦和七十架飛機，還有其他的戰役雙方都損失慘重。陸上的戰事也十分激烈，最厲害的是「瓜達根奴」地區，日本人守了幾個月後才撤退，這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所到的最南面的地點，戰況到高潮的時候，差不多有二十五萬美軍駐守在「霍尼拉亞」的地方。

和以往的做法一樣，我乘坐紐西蘭皇家空軍的「如都連拿」飛船由「蘇瓦」出發到各地去視察，這次飛船降落在「吐拿基」島上，它離首府「霍尼亞斯」二十哩，接近「瓜達根奴」島。地方專員O.C.諾埃爾來迎接我，他的主要職責和「泰拉蘭」的專員一樣，負責和美國司令部合作，以及使這個保護國在戰後恢復正常生產。他為人不錯，卻不會鼓舞別人，也缺乏衝勁；不過，他和美國人的關係則搞得非常好。在這個關頭，這正是他的主要工作。後來爆發了名叫「前進的統治」的反歐洲人運動，他便沒有那麼幸運了。

當地首府「吐拿基」已經因為戰爭而被破壞了，我們登上叫做「吐拿基之最」的小山上俯瞰這個小鎮；從前這裡是「歐洲人的俱樂部」，戰時做了美軍官的俱樂部，現在已經沒有人住了，呈現了一片荒涼的景像，但見破爛的枱椅，印有女人像的牆紙給撕毀了。因此決定了以「霍尼拉亞」做這地區的首府，這跟「吉爾伯特」——「埃利斯」地區的情況一樣，讓臨時首府「泰拉蘭」代替「大洋洲」作為永久性首府。既然我有份參與這項決定，當然會認為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我們從「吐拿基」乘坐一隻相似於美式M.T.B的快船——就是積克·甘迺迪中尉（後來成為甘迺迪總統）曾經在上面英勇地執行服役工作的那種船渡過海峽；「瓜達根奴」的山在黃昏日落時呈現深紫色，使坐快船的我們感覺到一幅令人生畏的景像，我們在「顧甘」地方一個美軍建造的暫用小碼頭上岸後，乘吉甫車到地方專員的平房——後來總專員和總督分職，由兩個人擔任，這個房子便成了總專員的官邸；它的確是間少見的官邸，不是用混凝土或石頭建造的堂煌大樓，而是用棕櫚木建造的。我的「挑夫」是保護國警隊的伍長，叫「蘇那尼」，制服就是一條黃斜土裙，配有皮帶和有套的匕首，他沒有穿着上衣，赤腿和赤腳。十二年後我陪同菲臘親王到「所羅門」訪問時，再見到他，我很高興當時他是「馬立泰」議會的主席，穿着一條深黑色的土裙和一件白襯衣，配上深藍色領帶，外披西裝上衣，腳穿涼鞋，這都用來配合他的身份。

因為生活尚未恢復正常，我們在保護國總部的餐廳用膳，公務員仍然以軍銜稱呼軍官——尤其是美國式的軍管的好處在於供應冷藏食品及其他物品，包括「可口可樂」、有限量的威

威士忌、「毡」酒和啤酒。我覺得劣質的威士忌或者「毡」酒和水或者「蘇打」水混起來喝，味道比混合「可樂」來喝好得多。這個飯廳的特別飲品不是葡萄酒，而是用醋腌的胡椒和酒精釀成的飲品，叫「森林之味」，它代替那些粗劣的湯來增加我們的胃口，用愈細的胡椒所釀的酒就愈辣。

勝利前我到這裡訪問時，還駐扎很多美軍，氣氛也很不同；而這次訪問正好戰爭快要結束，基地的駐軍越來越少，及至完全撤軍後，整個地區變得十分荒落，棕櫚木建成的臨時房子很快便破落，還見到戰時留下一堆堆的垃圾：一堆一堆的有刺鐵絲網、舊汽油罐、掉了發動機的貨車以及壞了的洗衣機和冰箱——全是一支軍隊離開時留下來的垃圾。道路和橋樑失修，較深入的離岸地方有遺棄的槍械以及燒毀了的日本坦克殘骸。保護國政府向美國購買了許多當地美軍倉庫的物資來重建首府。

我巡視斐濟工兵營的時候，他們見到從自己地方來的人感到十分高興，他們的聲譽很好，因為他們分得開太平時候的工作不同於為戰事而做的工作。「所羅門」來的工人也很好；另外有些是來自「吉爾伯特」羣島的，不過他們抵受不了思鄉病和氣候。

在這個保護國，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並不如在「吉爾伯特」——「埃利斯」的容易，因為那裡有太多地方不宜使用水上飛機，乘坐政府的船隻則要花很長的時間。最後我還是到達了「馬尼達」的重鎮「奧奇」；在那裡第一次聽到一篇由英語譯成「混雜語言」的演說，我從未聽過這樣奇怪的演說。大

衛·戴麟趾（即現在的戴麟趾爵士，後來做了西太平洋的總專員，現在出任香港總督）爲我傳譯。雖然地理和時間限制了我的旅程，我還是能夠在兩年的任期內見了大部份的地方行政官——假如不是全部的話；這是因爲我每次出巡都要求地方專員把他的行政官帶到總部和我見面，以防抽不出時候到他們的地區時見不到他們，這樣可以直接了解他們的意願和不滿的地方。

「新赫布里底」羣島

這塊英、法共管的領土是成立於一九〇六年，曾經被人毫不尊重稱作「無法無天」的地方，因爲那裡有英法兩個地方專員，兩隊警察，其他的也同樣重覆，這當然不是最有效的而又耗費巨大的行政方法。法國政府比我們更關注這個共管區，更鼓勵法商到這經營。兩位地方專員的官邸是在「維拉港」對開的「艾發特」島上，彼此向着對方，建築物及旗杆的高度都差不多。「維拉港」的市鎮就像一個法國殖民地的小市鎮，比之英國一般的殖民地市鎮較爲吸引人；我在亞洲、非洲以至南太平洋都留意到的這一點。

「新赫布里底」位於斐濟和「所羅門」羣島之間，它和「所羅門」一樣由兩島嶼組成，由西北向東南伸延四百五十哩長（等於「所羅門」羣島長度的一半），而人口大約也是「所羅門」的一半。島嶼上山嶺重疊，有些是火山；但是土壤卻比保護國的好，雖然椰子乾仍然是主要的產品，它還可以種植多樣的農作物。土人是「馬利尼西亞人」；不過，「波利尼西亞」的混血則較「所羅門」的爲多。

理察德·布蘭特出生於英倫海峽的島嶼，是這裡的英國地

區專員，他幹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很合適；由於曾經在印度和「月吉爾」當過警察，他知道應該怎樣和「外國人」相處。我們很喜歡住在他那間美麗的房子。

「新赫布里底」跟斐濟一樣，沒有像「所羅門」和「吉爾伯特」那樣一下成爲大戰時的戰場，不過它和斐濟都是美國和英聯邦軍隊的重要基地，最大的基地在最北面的島上。在那裡我看到了被水雷擊沉的「胡佛總統」號郵輪的船身，它的船底向上。在戰前，慕蓮和我曾經乘過這條船由三藩市到香港。

有一次我們在強勁的陣風和巨浪襲擊下的「維拉港」乘坐「加都連拿」飛船起飛時，的確懷疑它是否能夠抵受得住；可是幾分鐘後，它安全地飛離巨浪而進入安全的飛行地帶。抵達斐濟之後察看飛船，我們發覺機身被撞凹了。飛機就和人一樣，不時需要補給。英聯邦和美國都在「吉爾伯特」——「埃利斯」或者「所羅門」羣島等地方保留空軍基地的話，「加都連拿」就可以在這些地方加油，但是撤走這些設施的時間來了；因此，我安排了一次旅程，乘坐保護國從「利蘭斯」公司買來的二手船，由「蘇瓦」到「霍尼亞斯」。我將這項安排在總督府的一次午宴上告訴了史葛·依力奧中將，他是「紫水晶」號護航艦的船長，這艘船後來因爲「長江事件」而出了名。他說：「你可以乘『紫水晶』號的，我會向總司令提出，相信他會同意的」。他真的同意了。慕蓮和我、還有管家阿星、廚子陸奇等依時上了『紫水晶』號，史葛·依力奧好心地讓了個睡艙給我們；慕蓮睡在床上而我則睡在地上。由於她比我受得船浪，我們後來交換地方睡覺。陸奇和船上的水兵很合得來；在「霍尼亞拉」時收到了不少軍隊留下的剩餘物資。史葛·依力奧從未

去過「所羅門」羣島，他十分喜歡那個地方，喜歡到退役之後在「直蘇」的地方買了椰子園，在那裡定居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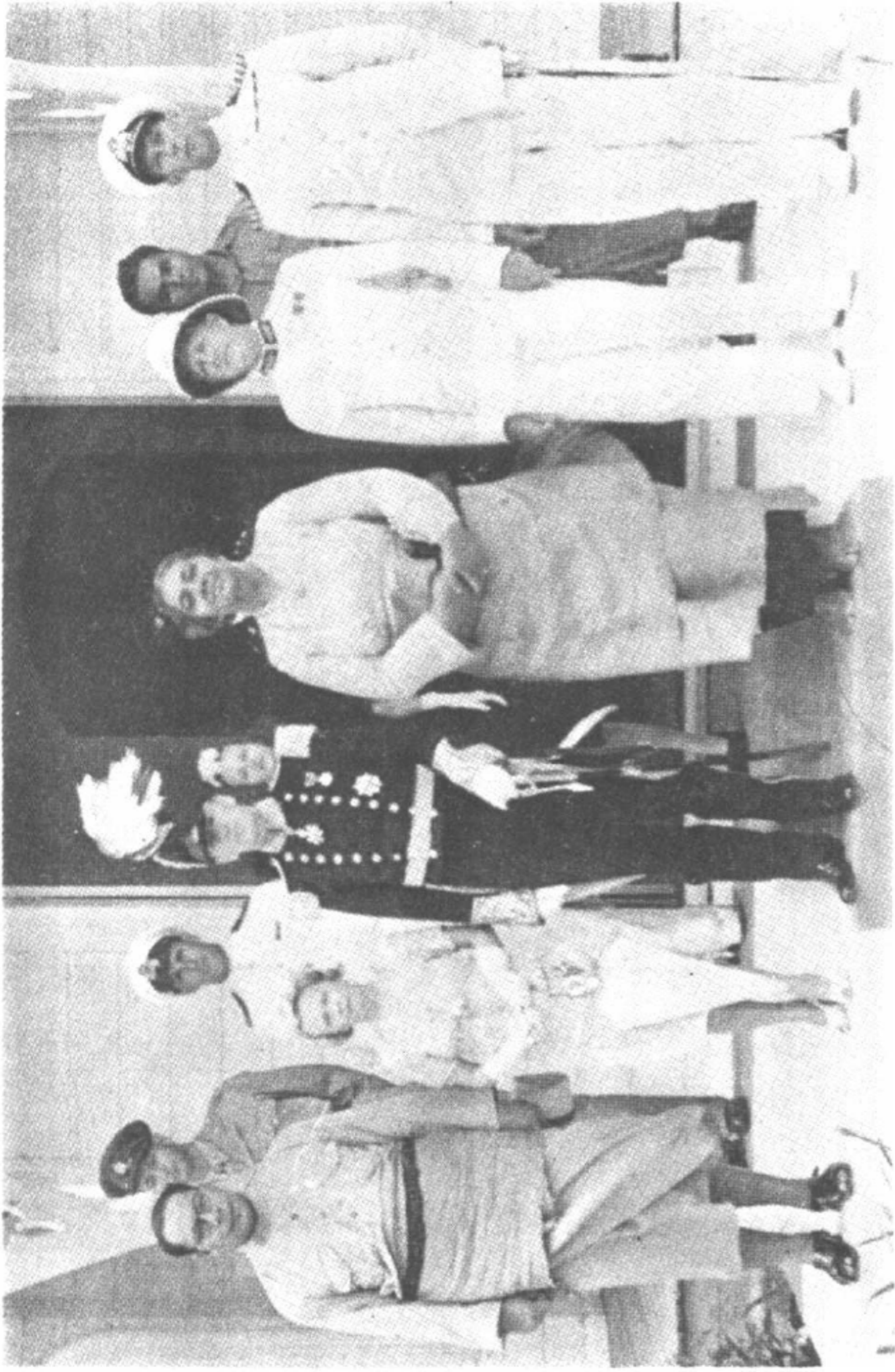
我們先到「維拉港」，在海上下錨後，專員輪流上船作官式拜訪；英國地方專員來的時候，一切如常；拜訪後，他登上了自己的艇，在「紫水晶」號發禮炮時立正敬禮。可是法國的專員離開時，艦上發了六枚禮炮之後突然沉靜下來，而那位看來十分尷尬的專員還在自己那隻被海浪打得左搖右擺的艦上立正等待；原來禮炮的槍杆壞了，要到史葛·依利奧命令發真炮來補救時，緊張的氣氛才消除。

我們也訪問了「所羅門」的「奧奇」，還舉行了船上鷄尾酒會，然後到「霍尼亞拉」去。就在宴會快要開始而我還在岸上巡視之際，突然收到了一封急電，要我立即登船：暴風突然來到，大浪沖擊着船錨，船隻要馬上駛出船去；這是非常不幸的，尤其是那些被邀的人士，他們却渴望在英國戰艦上參加鷄尾酒會的，可惜我們的安排不能夠使我們在第二天駛返「奧奇」。

「湯加」

羣島的土名叫「湯加」，不過谷加船長却把這地方叫做「友善之島嶼」，因為他在一七七七來到這裡，受到居民熱情和友善的款待；這個稱呼居民可以當之無愧，我們見過的民族沒有一個比他們更友善。谷加船長送給他們的一件有生命的紀念品現在還生存着，就是他送給當地酋長的烏龜，現在仍然到處爬行。居民還有時把豬隻叫作「谷加船長」，因為他為居民傳入了豬隻而得到居民的懷念。

「湯加」王國由三組島嶼組成，共約二百個島嶼，許多是無



與湯加女皇莎露德（左四）會面時合攝。

人居住的，多數是珊瑚島，像「吉爾伯特」——「埃利斯」一樣，有些島嶼——包括最大的「瓦胡」島——是因火山活動而形成的；有時島嶼突然沉沒在水中，之後又再出現。「湯加達寶」島上的首府「努庫阿洛法」離開「蘇瓦」大約四百五十哩，但是這個王國最西的地方和斐濟最東的地方相隔的總面積是二百五十平方哩。位於南回歸線地帶，是亞熱帶氣候；主要出口是椰子乾，第二位是香蕉。

土民都是「波利尼西亞」種的，全部是基督徒，其中大部份屬於美以美會，他們都十分虔誠；除了戰事之外，星期日都是主日，例不工作，也不玩無意義的遊戲。

這個王國行君主立憲制，但是君主的權力比之這種制度的其他君主還要大。英國在一九〇〇年時在這裡成立了保護國，由一個代表或總領事控制，他向總專員負責；代表或領事的工作在於顧問而不在於行政，「湯加」可以享受內務的自治。

目前的君主「莎露德」皇后在一九四一年她丈夫逝世時繼承王位；她可以因着自己是千年以來世襲酋長的嫡系而感到自豪，但她卻不是一個這樣的人；她的為人謙謹；在智慧和儀態上很少人可以匹比。說她是屬於「皇室」的似乎把她形容為高傲的人，她真不是這樣的，或者我可以說她「真有女皇風範」；怪不得在出席英女皇登基的典禮時，她留給英國人這麼好的印象；她在紐西蘭受教育，她時常到那裡去，不過她仍然生活得像個普通人。她有兩個兒子，年長的太子是王位的繼承人，在澳洲受教育；他學成回國後便擔任了部長級的職務，他極有音樂天才。



在湯加的官式宴會上。

首相魏達是「湯加」酋長，他有很好的儀態和才智。英國派駐的代表或總領使是齊和·莊遜，是個有具備普通常識的獨身漢，生活隨和，而且是個鋼琴能手；在他的美麗平房裏作客永遠是件快樂的事。

「湯加」人民在「莎露德」的管治下是快樂的；雖然她不願意她的國家永遠停留在被視為博物館的階段，但是她也知道不是所有西方文化都適合「湯加」。毫無疑問，這些島嶼由於交通便利而可以發展成為旅遊勝地，但是她認為——誰還會不同意她的說法呢——旅遊業雖然可以帶來很多收入，不過對島民會帶來不良的影響。結果，她的政策是吸收西方的技術，如醫藥、農業科學及教育等——強迫教育施行到十四歲為止——但是外國人則不准擁有土地或經營酒店。「韋基基海灘」或「大溪地」都不是她所希望「湯加」要變成的樂園。

「努庫阿洛法」是在「湯加達寶」島上的美麗小鎮，有鋪滿綠草的街道、草坪、類似杉樹的樹木和一個歐洲別墅模樣的皇宮。島上還有古時國王的墓堆，以及神秘的「三合石」——一塊大石鑲榫接合在另外兩塊大石上，形成了拱門，約十七呎高；沒有人知道誰在什麼時候因着什麼緣故砌成這座拱門。另外一個令人難忘的景象是「海水穿洞」，巨浪由海洋衝過來，打在礁石上，迫進礁石頂的缺口，由於衝力過猛，巨浪向上翻騰六十呎。比較沒有吸引力的是「飛狐」，他們是一種蝙蝠，數以萬計的「飛狐」在白天會飛到「努庫阿洛法」數哩以外的小樹林裡，倒掛在枯死的樹枝上，晚上則出來尋找水果來吃。

訪問「湯加」給我們留下愉快的回憶，窗外傳來大自然發

出的悅耳聲音，使我們感覺到夜的平靜，很容易使人墮入睡鄉。這是個特別的時節，「湯加」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爲她的一個最偉大的國王舉行了百週年紀念儀式，這個國王是佐治·吐寶一世。舞蹈表演毫不遜色於我在「波利尼西亞」人居地所看的任何一次表演。宴會是野餐式的，客人彎着膝在一張矮長桌兩旁分坐着，桌上擺滿了用蕉葉盛着的烤肉和魚；大家都用手吃。餐後便聽演說；有一位講者最近去過檀香山，在博物館裡看到夏威夷最後一位女皇的皇冠。他說：「這是夏威夷皇室剩下唯一的東西了——一頂放在博物館裡的皇冠；可是我們「湯加」人民仍然有自己的女皇和獨立，那是全靠英國國王的保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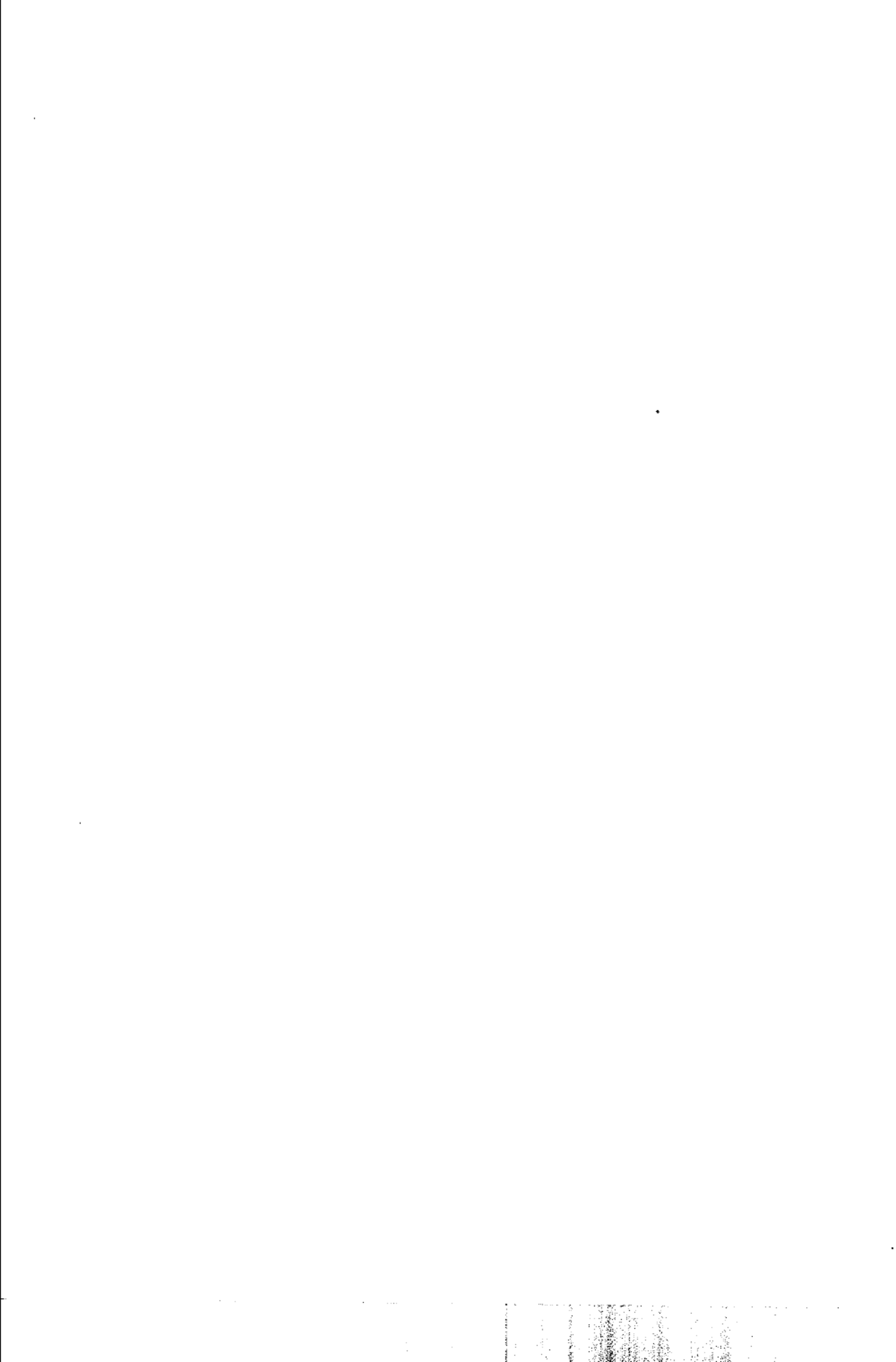
爲了慶祝這次百年大典，英國頒贈給「莎露德女王」O.B.E勳銜；連「依利亞勞斯」號戰艦也派來參加慶祝，海軍基地也鳴放禮炮四響；而在十二月四日中午，巡洋艦上的人員由於過於興奮鳴放了二十二響禮炮，而不是規定的二十一響。

向南太平洋告別

我在南太平洋的生活是有興趣味和充滿挑戰性——尤其是在戰時和戰爭剛剛結束後要使破壞了的地方復原和開始爲各個領土落實新發展計劃的時期。在那裡既然工作了一段日子，當然渴望看到發展成果，或者看到它們有個好的開始，所以我們期望放完假後會回來這裡最少再做三年。然而，命運假借殖民地部的力量，不作這樣的安排。慕蓮已經去了三藩市，十日後我也會到那裡和她會合，然後一同返回英國。就在她離開後，我便收到了電報，提議我到香港接管總督的職位。假如是其他地方的話，我可能不會接受這個提議，或者說：「對不起，還是遲些才說吧」；可是香港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況且香港所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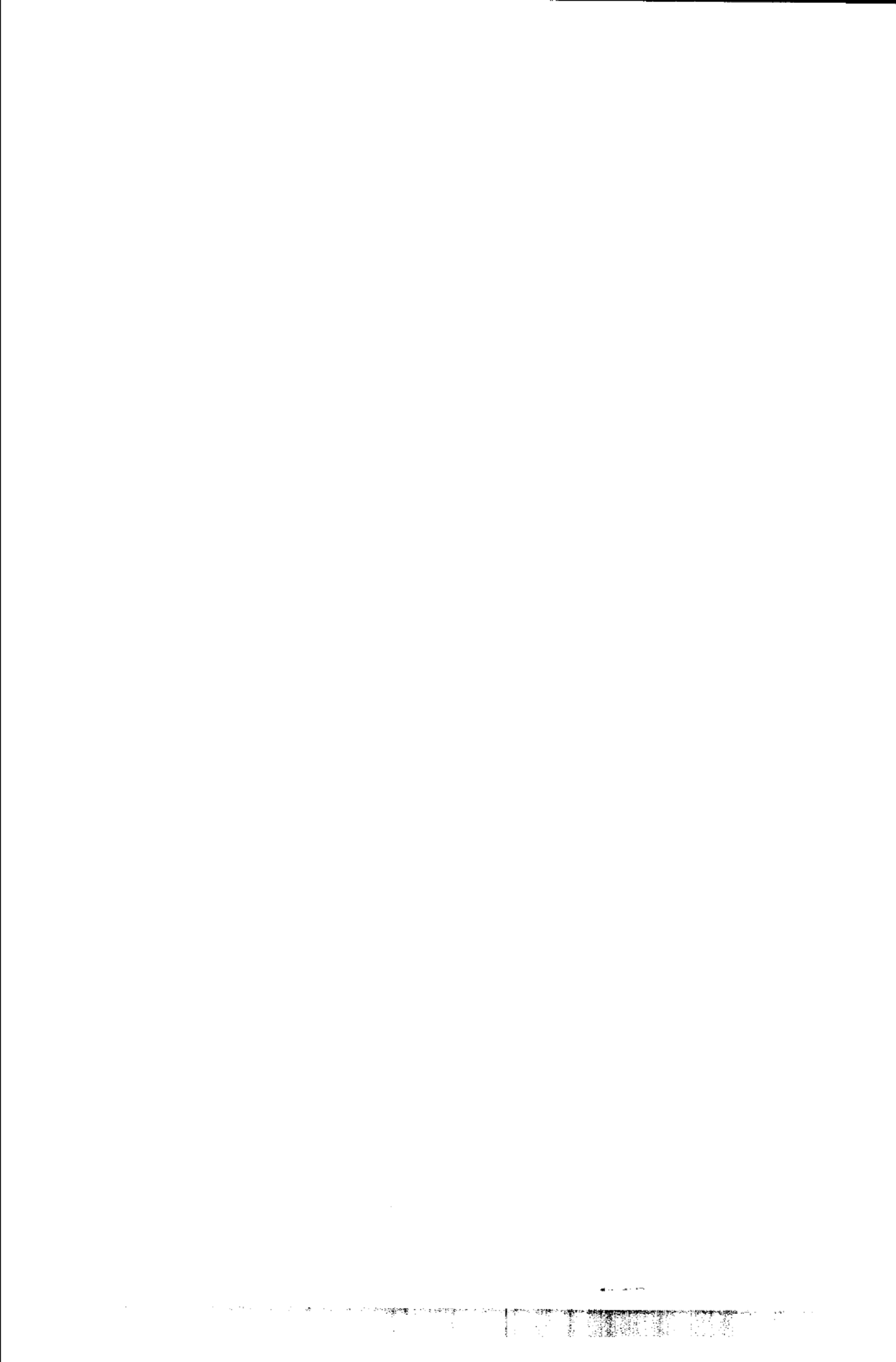
予我的挑戰比之斐濟及西太平洋還要大。因此我覆電接受提議。在「蘇瓦」最後那幾天忙個不亦樂乎，尤其是自己要負責將所有的東西包裝好，後來才發覺我做得多麼差勁。由於太忙的關係，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去惆悵和懊悔了，但是我最後去「南迪」機場的那程車卻是繞道而行的，那真是令人有點傷感。在「留托加」舉行告別招待會結束之後，我和地方專員夏理·諾特和他的太太一起吃了一頓既平靜而且對過去很有感觸的晚餐。他說：「假如你不想誤了班期的話，應該是起程的時候；許多朋友齊集在機場送別，其中有休爵士及雷格夫人。」雷格對斐濟有過很大的貢獻，而且還是行政局和立法局裡一位明智的成員。

在南太平洋地方旅程就此結束；現實比之夢想還要美麗，遠遠超出了我自己的期望，那裏的島嶼和民族的可愛之處是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第三篇

香港，1947—1957



第六章

返埠，1947—1957

我們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離開倫敦，不過和四分一世紀前我到這裏來的時候不同了，現在乘坐的「船」在空中飛行。五天的旅程真令人愉快，沒有碰到特別的事情；可是在快要到達之際，我感覺有點興奮，祈求我能夠應付這殖民地所面對的許多問題。

一九二二年我來這裏的時候，正好陽光普照，藍天碧水，香港的山頂和九龍的山脈清晰可見，在這個七月的日子裡，飛機滑向棧橋的時候，雨下得很大，山頂和「九條龍」的山脈被迷朦的霧氣蓋着，僅僅偶然地隱若可看。深黑的海水和周圍陰沉的的色調使整個景色帶點「蘭納」式主題的氣氛。

在九龍下機，迎接我們的是輔政司麥道高，他是我的老友及老同僚，他向我介紹三位三軍的司令——陸軍將軍、海軍將領以及空軍司令，跟着便進了機場的要員接待室；慕蓮在那裡換上了一套配合場面的衣服，而我則換上套晨禮服。

渡海的時候，我發覺得好像少了些東西；後來才醒覺到海港已不像從前的繁忙，來自世界各地各種型號的洋船及郵船都不見了，只有幾艘漆上戰艦顏色的破舊貨輪，喧鬧的聲音都消失了，除了些歡迎新總督的禮炮聲之外，一切都顯得沉寂。

皇后碼頭張掛着錦旗，鋪上了紅地毯，看起來有些歡樂的氣氛；列隊歡迎我們的有殖民地的知名人士，包括兩局議員、法官、領事、聖公會和天主教會的主教以及其他人士等。有些是熟悉的面孔，以前在香港時已經認識。比爾——現時的威廉士爵士——穿著着深紅色的大法官袍，以前和我一起做行政官的，他的常識廣博，心地又好，使他勝任這個職位，他不會容忍陰謀詭計的行爲。亞里孖打現在是葡萄牙團體的領袖，我還在當裁判司時，他代表過被告出堂，那件案子當時是十分轟動的；當時我很肯定被告是有罪的，由於控方的證據不足，我唯有將他釋放。印度團體的領導，J. M. 律敦治先生也在歡迎的行列裡，他是我所認識的一位最仁慈及最好的人；「律敦治療養院」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該院是由他創建來紀念他那被肺病奪去了生命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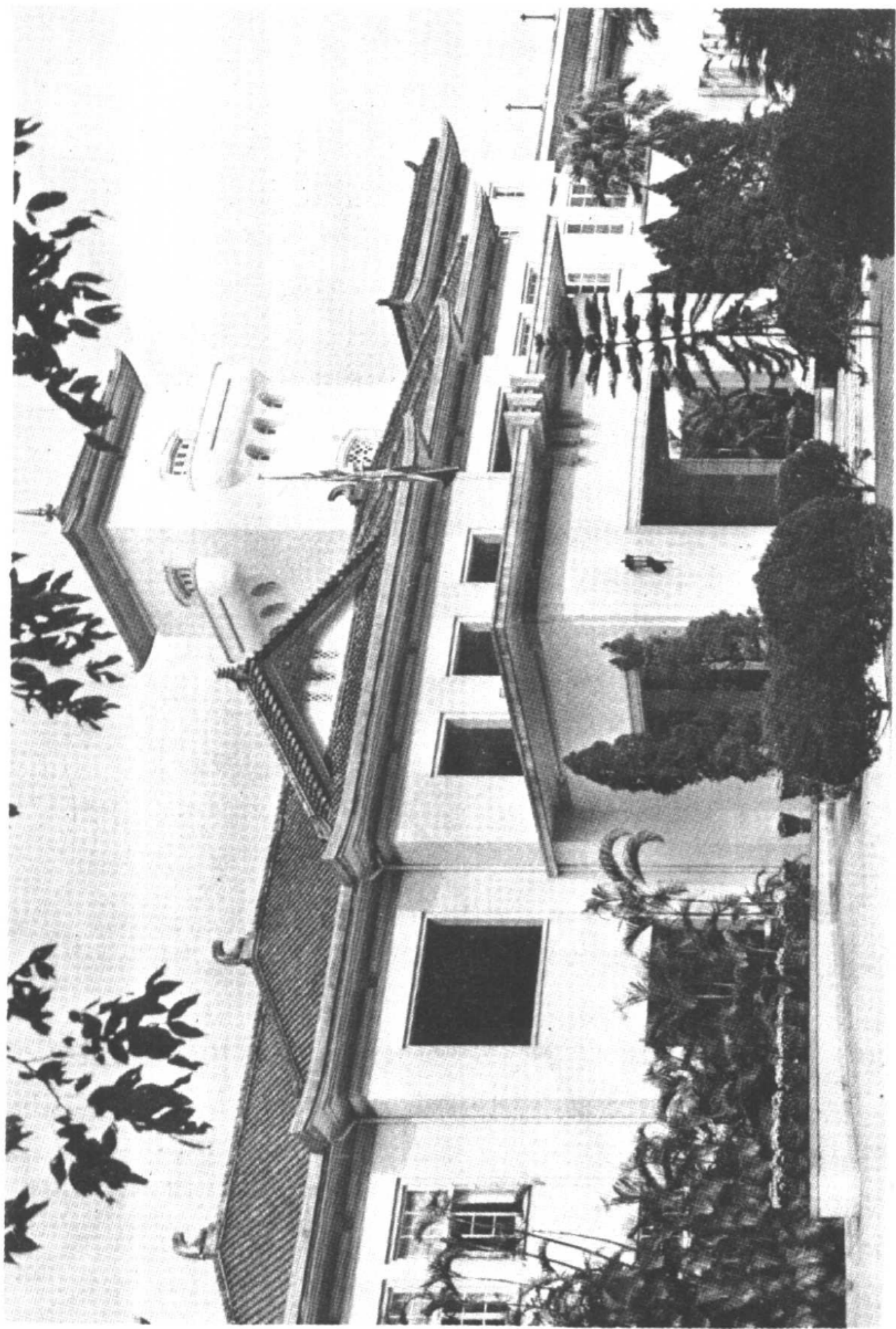
另外一位老朋友是聖公會會督何明華——我戰前在香港做低級官員時所認識的一位崇高的主教；大戰的期間，他曾經到過尼日利亞和我們一起住了一個星期。何明華會督是謙謹忠誠的基督信徒，十分關心窮人，有些無耻的人有時爲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的同情心及政治上的單純想法；不過，和他的基本仁慈心比較起來，這不過是他所付出的微小代價。抵達總督府時，我收到了他送來的便條，請我星期天到教堂做禮拜；我拒絕了，因爲我知道假如去了一次之後，以後都要去的。

不是所有的朋友和舊同僚都擢升到重要的職位，不少人仍然留在比較低的位置；不過能夠和他們再續友誼使我感到高興。那三位職員甘麥路、金寧咸及利榮深^⑫三位職員在三十年代在輔政司署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快樂。我擔任裁判司時陳國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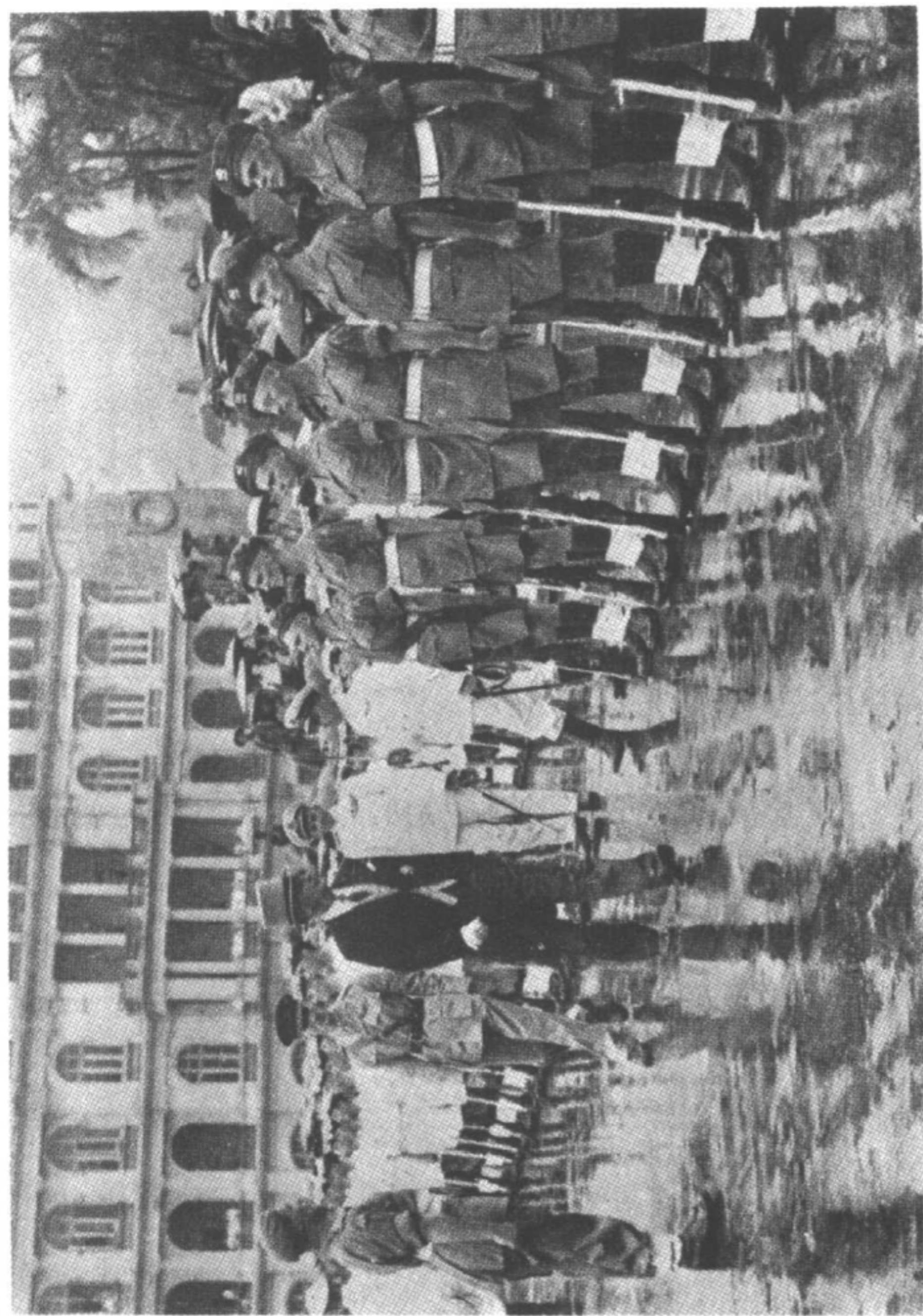
和我一起做過傳譯，他是很能幹的傳譯員，他現在被調派到警務署反貪污組工作。曾經替我做事的「僕役」、廚子及轎伕很快便找到了我；後來為他們找到了工作，這使我感到高興。一九二二年做我的第一位廣東話老師也找到了我，他這個人很好，不過是位無能的教師，那時我們相處了六個月便分手了。在我回來後他希望能夠在一間官立學校教書，並想就此成為他的終身教席，不過我不願意這樣做，因此安排他領取長俸，直到他年老告終為止。能夠回到個人事業開始的地方做總督是令人快慰的，不過此舉也產生問題。

就任儀式告終之後，我乘車到督憲府，這間是日本人在原址上重建的，其實早就應該重建的了。這座堂煌卻不美麗的建築物有座高的塔樓，閘門有守衛室，府邸門前有一座供停車上落乘客用的亭子；大堂相當寬敞，直達屋子的另一面，可以看到下面的城市和海港，客廳和飯廳外是拱廊，有雙重石級直達花園。港督的辦公室以及私人秘書和副官的辦事處都在樓下；還有一個舞池，這是舊官邸所留下唯一的東西，另外還有兩幢樓梯直達二樓，一幢由大堂而上，另一幢就在港督辦公室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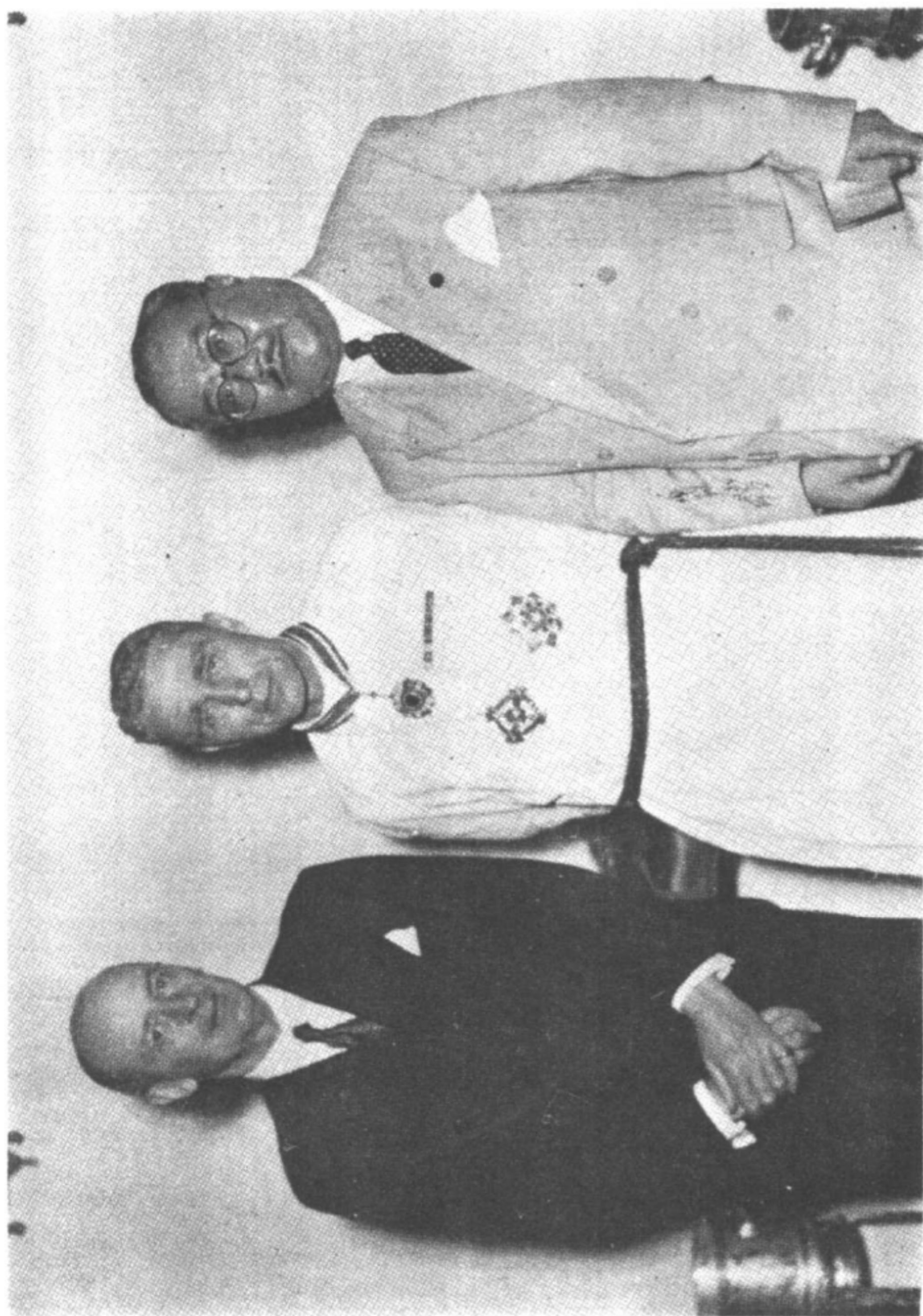
靠海港的那面有寬闊的草坪，開園遊會用的，也是夏天吃過晚飯後休憩的地方，從這裡經過一幢有梔子屬灌木夾道的石級可以走到低層的花園，那裡有花床、灌木、喬樹木及彎曲的小徑。屋子正門前，在守衛室和停車樓之間，有一片橢圓形的草坪，種有西谷椰子屬的棕櫚，靠近守衛室和沿着車路種有一些開花的植物，而最令人喜愛是在我辦公室外的大花瓣的木蘭。這個花園沒有被用為替督憲府培栽蔬菜和植物，後幾個星期才知道，原來在離督府幾哩的地方有一個督府的蔬菜及植物園；



位於港島之督憲府。



1947年，作者抵達香港時，檢閱儀像隊時之情形。



作者、何明華會督和郭德華合攝。

前此我們都是從外面買蔬菜和鮮花，直至有一天慕蓮看到管廚的食品室有一些紅蘿蔔，追問之後，他對慕蓮說：食品是從「掃桿埔」督府花園來的。後來我們前去察看，發覺那裡有十個園丁；他們一直都在賣掉那裡所栽的花和蔬菜，而且也有在外兼職的。我們很快便制止了這些活動，其後我們便獲得所需的花及菜蔬，並可將剩餘的送給朋友和醫院。

我的前任祇有時間改裝那些日式睡房為歐式，因此要改動的地方很多，慕蓮花了整整一年去做這些工作。這裡不像尼日利亞和斐濟，因它有好的技工，不過物資仍然缺乏，因此慕蓮要寫信到三藩市訂購做窗簾的緞布和其他物料，當裝修完畢後，督府成了一座港人可以自豪的官邸。

重建

在一個國家來看，十二年雖然不太長，但是在我在一九三五年離開和在一九四七年返回來之前這段期間，香港曾經發生過許多事情。這裡在日治時期有過艱苦的日子，由一九四一年的聖誕日開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英國的平民和戰俘捱過難以形容的苦難。沒有被禁錮在集中營的人生活也十分困苦。在英國太平洋艦隊使殖民地重光之後，那些為重建這個殖民地的人的努力是使人驚歎的，我們還要考慮到當時物資缺乏，人們的健康極差呢！

在我返回香港之前兩年，這裡的人已經做過了許多工作。英國人回來後的頭六個月，香港是個軍管政府，首長是海軍上將，夏慤爵士。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民政隨着楊慕琦總督回任而恢復；當日本人在一九四一年佔領香港時，他還是港督，

所以由他復任是合適的。一年後才由我來承繼這個職位。夏愨上將的華民政務司是麥道軻，他在民政恢復後出任輔政司，他早於一九二八年來香港開始他的事業的。在殖民地淪陷之後，他隨着中國的海軍將領陳策，及其他一些人逃入內地，在香港淪陷期間，他在倫敦出任殖民地部香港事務計劃組的主管，這個組的任務是策劃香港的重建工作。策劃本身知易行難，尤其是政府機構的官僚架構效率奇慢，而大受束縛。

香港幸運地獲得夏愨、楊慕琦和麥道軻等人的策劃，加上其他政府官員，中、英社團領袖的幫助，特別是摩士（現時的摩士爵士）的幫忙至大，他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經理；摩士的指導思想是「對殖民地有利的事就是對滙豐銀行有利」。他是位聲音響亮、個子高大的愛爾蘭人；從他那套十分稱身的西服和袋錶來看，他是個典型的資本家，雖然他是帶有點貴族性的樂善品格。我相信他會不同意有人用「樂善」這個形容詞來描寫他，但是人人都以「叔叔」來稱呼他。他十分了解香港的情況，做事求實際，他不相信經濟理論家，而且直率地拒絕了他們那些較為空想的理論。他不但花了很多時間辦公益事業，而且曾經毫無抵押下貸出款項，救助不少社團組織。無怪他在一九五三年離開時有人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餞別會。

這些人都知道什麼是實事求是，不論是找尋米的供應、訂購渦輪機或者是一間發電廠，他們都是很出色的一羣。再加上中國人的足智多謀，香港在戰後的復甦比之其他受過戰事蹂躪的地方為快。

香港所受的破壞是十分嚴重的；比方有百分之七十的歐式

住宅及百分之二十的房屋在戰後是不宜居住的，框、地板、屋樑——任何可燃燒的東西都被搬走了，使到建築物其他的部份受到災難性的破壞，這些破壞一部份是由於盟軍的轟炸，一部份是由於搶掠，後者多是飢民所爲。復甦較快的因素是由於中國回流香港的大量勞工，還有政府的不參予政策，因爲這樣會拖慢工作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反之，由私人企業帶頭，基於有利可圖，他們做得很漂亮。當然政府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做些買賣，尤其是在米方面，因爲政府還不容私人公司或個人參與買賣主要食品。然而香港和其他英聯邦地區不同，它可以直接由美國、加拿大直接訂購銅鐵和其他材料，這些都較從英國訂買容易得多；不過，也招惹其他沒有這些便利的地區的攻擊和妒意。給予這項自由的理由是：假如中國產品經香港轉口美國，而被迫將美元外匯兌成英鎊的話，他們便乾脆直接由中國出口了，這樣便引致香港損失了美元收入，而其他英鎊區也因此而損失。事實上，香港是個重要的美元收入的地方，而它的生存有賴轉口貿易；僅在過去那幾年工業才比較重要而已。作爲一個轉口區，它必須以廉價收費提供最好的設備，否則其他東方口岸會取去它的貿易。所以基於傳統和需要，香港是一個政府最小干預的自由貿易港。

偏狹性

「勢利」在社交場合的顯著減少是我這次回來後所留意到的事，那些「大班」及高級政府官員已不再被人看作，或者把自己看作「半神半人」一樣地崇拜；他們的資歷及地位是使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不同種族間的交往也增加了，不過香港不像非洲的殖民地，從來都沒有種族的問題，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的自豪是不遜於歐洲人的；他們不滿一些歐籍人士

對亞洲人在意識上的傲慢，這些不滿是絕不低於其他有形的侵略——如成立殖民地及治外法權等。這種傲慢建基於歐籍人士自以為比亞洲人優越，這種思想所表達的形式是把亞洲摒除於各類會所之外，並以粗暴或鄙棄的態度對待他們。然而這種屬於極端死硬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在領導地位的歐籍人士及中國籍商人的偏狹性和地區主義心態，雖然此現象已經存在了很久，但是我上次在港任職時並沒有留意到。這種狹隘的世界觀在一個世界性的貿易中心來說似乎是不正常的，可是這種觀念却沒有妨礙他們成為跨國商人。由上海來的歐籍商人對香港的淡淡輕蔑是頗為令人側目的。在共黨統治之前，上海彷彿東方的紐約或巴黎，相形之下香港僅是一條小村落。大部份香港的中國人都是廣東人，他們對來自上海的同胞在這裡生活和經營也有微詞，廣東人認為他們過於精明、機智和狡猾，不過香港的經濟重建主要是得力於上海人帶來的資本和工業技術。因為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商業在美國和聯合國在一九五〇年實施的禁運後，使它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大為減縮，受到了莫須有的損失。我們遲些再談這個問題。

香港的統治

與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是一個對中國關係的問題^⑬。因此我的見解是香港應該隸屬外交部，而不是殖民地部；它的官員可以由殖民地部調往外交部，因為他們都有過行政上的訓練。在中國政府積弱期間，此種需要是不太顯著的，因為中港當局並沒有經常發生嚴重的磨擦。早在一九二八年，那時我僅有幾年的服務經驗，

我寫了一份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導致我撰寫那份報告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一九二八年前的一兩年，香港受到中國的杯葛。（見附註——譯者）。倘若中國有了一個強大而有敵意的政府時，這種需要便表露無遺了！不過現時要改變已經太遲了。

實際上，幾乎需要向倫敦請示的香港問題都是外交問題，而我們却要去和殖民地部商討；這樣不但費時失事，而且對問題的基本了解也少了。此外，我們以為在與其他英國的政府部門發生意見時，我們會在外交部得到有力的支持，而不是在殖民地部！不論正確與否；我們相信英國的其他的部門根本不理會殖民地部。

外交部的一名人員被調派作為港督的政治顧問是某種程度上承認香港是要涉及外交事務的。我在一九四七年抵達前數星期，第一個這樣的人員已經到任了。雖然這種做法不錯，但我有點懷疑實際上做起來會是怎樣的，我憂慮政治顧問會「重覆」了華民政務科的工作，這個科是由港府一名高層官員出任的，而華民政務科的憂慮比我更甚。不過我們的恐懼是不必要的；原因之一是政治顧問並無行政和執行實權，其次是他主要關注的事項是殖民地的外交問題。結果我們有了好幾位一流的政治顧問，他們都很小心地避免干預華民科的事務。我發覺有一位有經驗的外交部人員作為港督的屬員是十分有幫助的，我相信在南京的英國大使，以致後來隨着中國的首都搬到北京後的英國代辦，也對此等政治顧問感到滿意。在共產黨統治之前，政治顧問都經常過訪南京大使館，或者在發生了涉及大使和總督職責範圍的問題時，他都會到南京的英大使館。當共產黨執政之後，這種往還便停止了，不過在我任期快要結束時，又有恢

復的跡象。

這種在大使和總督之間的相互諮詢和信賴，與往日我在香港時廣州的總領事和香港總督之間那種不能溝通的情形是十分強烈的對比。這並不意味着大使或代辦和總督之間的意見是一致的，雖然大多數的情形都是一致的；不過，他們的工作有協調，有意見不合時也尊重對方的意見。

有一次他們之間在意見上產生了顯著的分歧，那是關於中共政府委派的一名外交代表到香港的問題。美其名爲特別專員，此等代表在戰後國民黨仍然執政時曾經有過一名，但在一九五〇年英國承認了新政權後撤走了，他的職責和權力並未詳細地明確表示過，不過若要這樣做的話將會使各方面都感到尷尬，而香港政府也會處於一個尷尬地位。然而那位特別專員郭德華，與我們交往時也曾採取合作的態度，但有一次是例外的，因爲他過份地使到了香港和倫敦與南京的關係受到衝擊——遲些我會詳述。「T.W.」是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他是個講究飲食和世故的人。他的太太，姬麗絲(譯音)，漂亮和吸引人的，她是個出色的鋼琴手，更鼎力支持女青年會。在郭家赴美數年後，我向姬麗絲在港的一位姊妹打聽他們的近況。她說：「啊，姬麗絲自己打理家務，而T.W.則應酬多多」。事實上，我相信他是在一所大學內任教。

「是的，督憲閣下」

當我在一九三五年離開香港往百慕達時，我在輔政司署還是個較低級的官員，相信那時我的銜頭是「特別助理輔政司」，現在我以總督的身份返回舊地。在這個英國直轄下的殖民地，

總督的權力是僅次於上帝，當他抵達每一處地方時，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況下，誰也遵從他的意願——永遠都是：「是的，爵士」、「是的，督憲閣下」。不過太多的恭維是沒有多大益處；因此，在放假時，一位港督能夠在人羣中排隊或者試試擠在—列擠迫的火車上，被人踩着腳趾的話，對他有好處的，因為這會使他認識到他祇不過是和普通人一樣，而那份尊嚴是屬於那個職位而已！作為女王的代表，他應受到應得的對待，他應該有尊嚴而不應裝腔作勢，平易近人而不流於過分稔熟，因為倘若他與任何人或團體過分友好，人們都會不問情由指摘他有偏心。他也不應該局限於和「上層」的人交往，因為他是屬於這個殖民地的每一個人的，由最高以至最低的。在他舉辦或接受邀請的社交應酬中，他應該要選擇，而不應持排斥的態度。許多港督，包括我自己在內，已習慣了不接受私人款待的邀請，而僅限於兩局議員，三軍的領導人，領事團體的邀請。倘若他接受了在社會上沒有特殊地位的甲先生和甲太太的邀請，他便同樣要接受乙先生和乙太太的邀請。一位港督在社交上這樣隔膜並不意味他在其他方面也是這樣的，或者意味着除了官員和顧問外，他便不應或其他人接觸。我認為，在徵詢意見方面，他要把網撒得越闊越好，同時對不同地位的人的意見都要顧及，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很快他便會知道那些人是他值得接見的，這樣不但可以掌握民意，而且對在殖民地所發生的事情瞭如指掌。

總督在殖民地部和殖民地之間和在一個像香港一樣沒有民選部長的屬土任職實在不易為。假如政制容許民選總理的設立，這樣他便會為這領土說話，而總督便成了殖民地部的代表。可是在一個英國直轄下的殖民地，總督的應該對殖民地部還是

殖民地效忠呢？正常的情況下是沒有抵觸的，但是偶然也會有，這情形也不會因殖民地部慣於把殖民地作為自己屬下的部門而有任何的改善。我知道殖民地部的官員是誠心誠意地工作，不過那些只不過是工作而已，他們處理這個殖民地的事務的時候是沒有歸屬感或者效忠於當地的心態。他們雖然盡力而為，但自然而然地他們是效忠英國的。倘若在最後的關頭，產生利益衝突的話，便要犧牲殖民地的利益。我不認為在英國的人了解到，英國留在香港的主要目的是要為了貿易，她因此要負責香港人的福利和保護他們。無可否認，香港居民也有他們的責任。可是大多數在英國的人都認為香港人很幸運——因此他們應該對英國履行義務，前者沒有錯，後者在某個程度上也沒有錯；不過基本上還是英國應對這個地方履行她的義務。

行政局

行政局分別由六個官守和非官守議員所組成的，而立法局則分別由九個和八個（現時分別是十二個和十三個）^⑭。非官守議員都是社會上有領導地位之士，包括中國和非中國籍的人士，他們由港督提名予國務大臣委派。總督是兩局的主席，而官守議員必須跟隨港督的意願投票；看起來似乎是獨裁，但實質上並不是這樣的。在出任港督的十年內，行政局的會議，所有的官守議員和非官守議員所投的票是一致的；在立法局裡，投相反票的情形只發生過一次，而那兩位非官守議員後來對我說，他們是在無意之間投錯了票。雖然這裡是沒有政黨，不過用國會制度的術語來說，這裡在投票方面不是基於黨性的方針，不過在立法局裡所有的官守議員甚至在沒有指示之下，在投票時都是一致的。

當非官守議員有意反對某項措施的時候，他們都比較喜歡在議會以外首先達成協議。舉個例來說：假如政府打算增加收入和溢利稅——那是相等於所得稅——由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五，非官守議員會極力地反對說：「商業會停滯不前」、「殖民地會被摧毀了」諸如此類的話；會議的辯論便會押後，而非官守議員和政府官員們會一起舉行閉門會議，最後達成一個增加至百分之十二點五的協議，辯論隨即恢復，在耍了一輪太極之後便一致通過加至百分之十二點五了。

減少對業主的租務管制是我任內期間唯一造成激烈爭辯的事，也引起廣大市民的強烈抗議，甚至非官守議員內部也為這個問題而意見分歧；他們之中沒有一人是業主，而這個立法對他們在財務上並沒有影響。他們這樣做的部份動機是基於原則的問題，而其餘的是怕失去了聲望。我一貫的意見是那項建議是公平和合理的，而且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困難。假如當時我指示所有官守議員投贊成票，便會通過這項法案，在政制上這做法是完全正確，而且有些非官守議員也會附和投贊成票。可是在公眾強烈反對一項措施時，我們是不會一意孤行的。除非所涉及的問題是本質上極為重要的。但那個情況並不是這樣，因此政府只有對公眾的意願低頭。

要政制運作成功，政府決不可在兩局內強行通過法案，這樣會使非官守議員極度不滿；事實上，假如政府知道一些措施會受到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反對的話，它是不會提交立法局討論的，因為根據政制，在議案未提交立法局前須經行政局同意，而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和官守議員是各佔一半席位的。

在一個英國直轄下的殖民地政府模式來說，殖民地充滿官僚色彩的危險是固有的，不過香港沒有這種情況出現，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有極少干預香港自由企業的傳統；公務員不能管理一切；有些公務員偶然過分干預，不過很快便被制止了。居民和報界對他們自己所享有的權利都會提高警覺的，不過最理想的監察人員還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這些人之中羅文錦爵士是最為超卓的，他在一九五九年的逝世是殖民地的重大損失。他有一流的頭腦、充滿辨別是非的勇氣，也有能力去詳細斟酌問題而不會失去了問題的重心。舉例來說：正當另一位議員在解釋他的觀點時，從文錦閃動的眼神以及從他嘴唇的跳動，我便體會他有些有力的話要講，我會急不及待地在那位發言者說完後，便請他發言。另外，當有一個複雜而又不引起人的興趣的問題用文件傳遞的方式交給議員在文件上提意見時，我會先閱讀文錦的意見。這樣做通常省了我不少閱讀所有細節的麻煩，因為他提的意見不時都是一針見血的。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沒有盡量利用他們會議時的權利去提出質詢而使政府各部門獲益；我們都不時提點他們提意見，這樣會使我們做到最好，尤其對一個直轄殖民地政府來說更是重要。我留意到有些部門的主管，由於從未在其他地方經歷過殖民地立法程序的波折，便不滿非官守議員對他們的部門的質詢。然而非官守議員那有禮貌的沉靜却引致公眾把他們看成木偶或「唯唯諾諾」的人，雖然他們却不是這類的人。

當殖民地部要做一些有損殖民地利益的事時，他們這種恭敬的不利之處便完全暴露出來了。他們不應順從殖民地部的「吩咐」去做，在這方面港督可能也只不過是殖民地部一個不大願

意的傳聲筒而已；反之他們應該用盡可能最強硬的言詞去抗議，假如需要的話，大肆宣傳地派一隊人到英國去，他們絕不能對港督說：「我們都知道你是好人，和我們的想法一樣，我們要攻擊的只不過是殖民地部而已」，反之他們要連港督也攻擊才對。這些可能都不為一般市民所了解的，而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報刊便會說話了。假如香港和其他的殖民地都有民選的部門首長的話，英國將會更為注重這裡有代表性的民意；可是這種政制會帶來太大的危險——這點我會在下面解釋清楚。到底還是不要有任何改變為好，不過殖民地部却應該多點注重兩局非官守議員的意見。

較之立法局低一層的組織是市政局；顧名思義，市政局主要是處理市政事務：街市、公園、漁農的資源保護等等，後來的小置區——有關這個問題，我遲些還會再講講——及廉租屋都交由它管理，這樣便增加了市政局的工作壓力。由於香港地方太狹，中央政府和有規模的市政府很難並存；這是新加坡的經驗，它的面積和香港的差不多。戰前和馬來亞是一個整體的時候，新加坡設有市政府是適當的，但這兩個地方分開後各有政府時，新加坡的市政局便顯得沒有被容納的必要了。這個組織帶來了重覆（重疊和增加了整個行政的支出）。香港的市政局是中央政府在某些市區服務方面的代理，它沒有權力去課稅，而那些職工都是中央政府的僱員。相對之下，非官守議員和官守議員（公務員）有大多數的席位。我離任時，有一半的非官守議員是由總督委任的，而另一半是民選的，不過人們對那些選舉沒有興趣。對選舉漠不關心的理由之一是市政局所處理的問題是無足輕重的，雖然這些問題在市民每日的生活中也相當重要，而該局的處理效率也很好。

政制改革

政制改革是戰後殖民地部和香港政府積極進行的事情，不過當地的人民對此並不感興趣。當時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是以民選立法局議員代替委任的立法局議員，而民選議員的人數應該超過官守議員，而且還會成立民選的部長制度，以期達到在英聯邦內或以外的自治制度。但是香港的問題與其他殖民地不同，因為香港永遠不能宣佈獨立；它祇可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或被中國收回成爲廣東省的一部份。此外香港的人口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一般來說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只要政府能維持治安，不過分課稅，而法院又能爲他們主持正義的話，他們便願意將管治的事務交予專家和一批數目較小的市民去做；這些市民是基於爲公衆服務的精神以及這些服務所帶來的榮譽而願意出任各局及委員會的職務。大部份在香港的中國人對香港都沒有歸屬感；像歐籍人士一樣，他們來香港工作，直至退休以便返回中國的家鄉。香港也曾經被人適當地譽爲火車站，而它的市民就好像進進出出的乘客。能一輩子在這個殖民地終老的只不過是少數而已，正確地說他們才是真正的香港市民。自從共產黨執政之後，情況有些改變，香港的中國人已很少返回家鄉，而成爲香港的永久居民。

影響香港政制的另一個危險情況是：在民主選舉的立法之下的中國的政治影響，這是與殖民地內部的政治是不同的——它終會成爲一個問題而產生不良的影響。這困難和潛在的危險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彰顯出來；基於此，我們決定不能把政制大肆修改；在那些歲月裏，有許多改革的計劃被提出過，同意過，或者修改過，最後並達成方案，我們認爲它應該可以避免了那些預期危險，也可以爲殖民地部所接納。可是當我要馬上離開

香港休假之前，兩局的議員要求我說服殖民地放棄整個政制的計劃。他們說：「那是太危險的做法了」。我們應否將一個只是適用於其他殖民地的理論用於香港而危害它的未來呢？我贊成他們的看法，所以當我到了倫敦後便到殖民地部公然反對那個計劃。他們不喜歡這種臨時的改變，他們也認為國務大臣亦不會喜歡的，因為他剛剛獲得內閣同意了那份政制改革的最後草案。可是國務大臣却十分願意放棄香港的政制改革計劃：理由是英國選民對此問題是沒有興趣的。

香港的鄉村地區

香港是真真正正的一個城邦之地，大部份的人口——在三百萬人中有兩百五十萬都擠迫在港島上「維多利亞」港的市區及九龍半島市區；近年來才有些市鎮在新界村落成立（新界是中國在一八九八年租給英國九十九年的地方）。因此，香港的內部行政主要就好像英國的曼徹斯特——集合城市的管理：街市、道路、醫院、學校、水的供應等等。在這方面，香港與其他大部份以農業為主的英國殖民地不同——應該說是未獨立前的英國殖民地才對。但是這並不是說香港的鄉村和地方行政是不重要，雖然在戰前，這方面的工作的確是被疏忽了。一位香港大學的生物系高級講師何格樂博士在戰時被日本人拘留在集中營的期間想出了一個鄉村地區發展計劃，在戰後他便當了發展科的主管；在他的催策之下，新界在我上任之時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何格樂是個使人振奮的人，他充滿幹勁，而且很有見地。在集中營的時候，他拿了一罐蕃茄裡的種子種出了蕃茄。在此之前，香港是沒有農林署的，現時已經有了，而且還有它自己的部門管理漁業、林業和獸類服務。

配合農民將產品較易地運到市場的道路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都正在發展中。在這些發展裏，值得一提的是嘉道理農業援助協會。像許多猶太人一樣，嘉道理家族在生意上是高瞻遠矚和有善心的；他提供了這個協會的基金，使許多農民渡過難關，甚或獲至成功。嘉道理在協會的管理方面曾擔當過一個積極的角色，我相信對他來說此等興趣比生意還大。

協會也幫助農民及漁民組織自己的市場，而毋須被高利貸和中間人剝削。漁、農互助署的工作是使到他們可以自立，自主經營合作社。開始時，署的部門需要直接參加管理的工作；現在這些日子已成過去。

有時農林署的署長對我說漁農互助署是應該歸他的部門來管，反之漁農互助署的主管也說農林署是該歸他管轄的，這些聽起來也相當有趣。兩位都是各有各的道理，不過我從來都不喜歡擴展勢力，而且兩個部門分開工作的效果也令人滿意。新界政務專員——是這個殖民地的唯一的專員職稱——對這兩個部門都不十分信任，他恐怕那些內行政官員會過分熱心而使農民不高興。可幸還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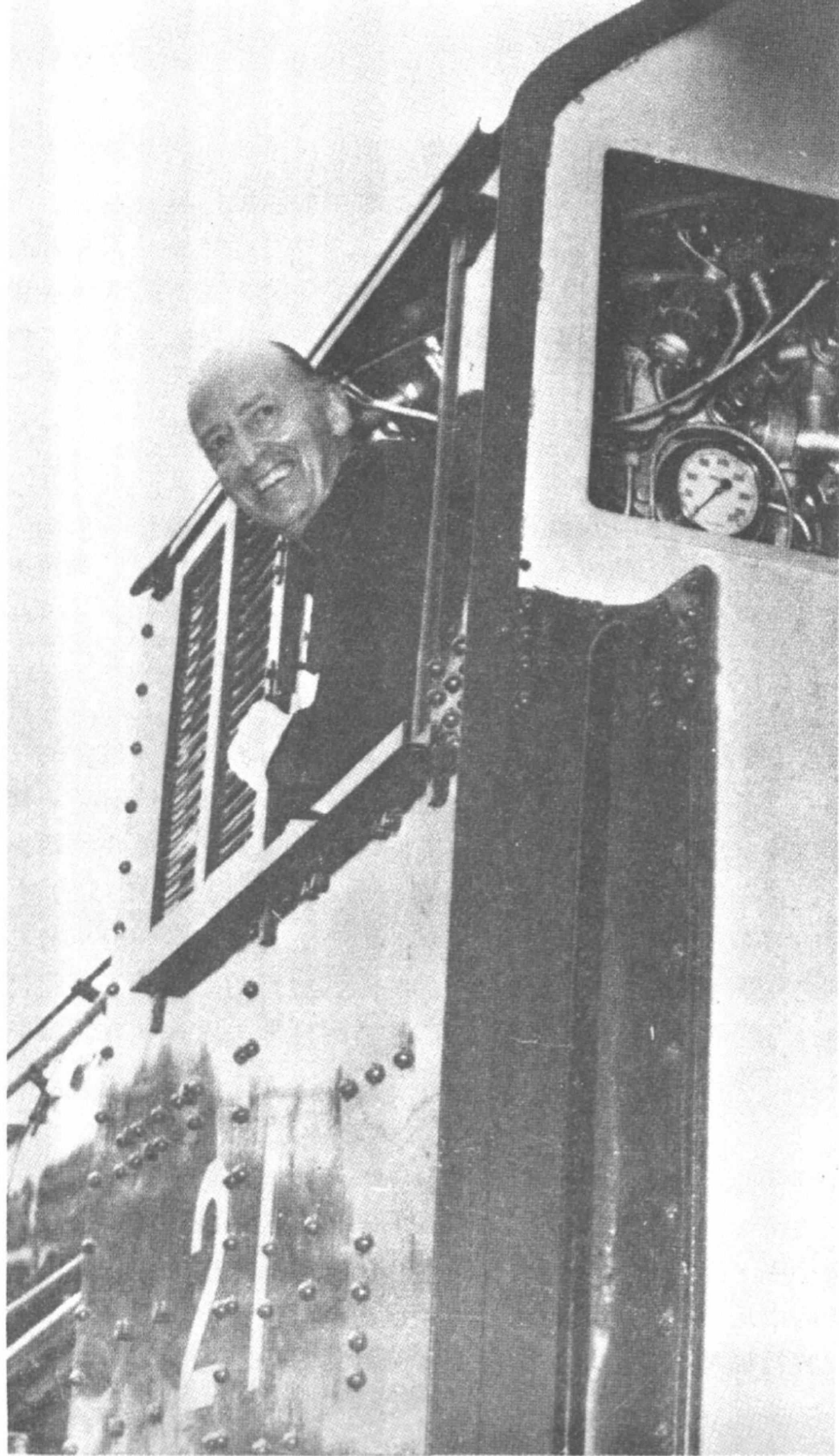
每當在郊區和這些部門的人員渡過一天後，我在精神上和體能上都倍覺舒暢。官員們的工作熱誠，與及他們與農民及漁民良好的關係是令人鼓舞的。合作社的領導人員中有一個農民引起了我的興趣，他和來自阿巴丹的那位麻煩多多的前任總理英沙迪看起來十足一樣。

新界居民的生活是寧靜而充滿古老傳統的風氣，似乎廿世

紀的事物對他們還沒有大的影響。那些村民與他們世世代代的祖先一樣，過着同樣耕種的生活；雖然他們像世界各地的農民一般守舊，不過他們也是很現實的，對那些經試驗證明良好的耕種方法、種子或育種，他們都會接受的。所有的舊風俗和習慣仍然存在；在處理殖民地的民族方面，英國都秉承了尊重傳統的原則，所以這裡的中國社會色彩與中國內地比較是毫不遜色的。不過新時代的事物發展是阻擋不了的；一個增長中的城市需要更多土地、更多工廠，城市的人需要鄉村僻靜的居所，水塘需要大如幾個村落的面積的土地，所有這些需求都是無止境的。衝突時常都會發生，沒有任何事情會比土地爭端更能影響人們的感情。氏族之間的衝突在新界也相當普遍，這些衝突是自古以來已經存在。新界政務專員並不容易處理這方面的工作。可能由於對土地擁有權方面不安的情緒而使鄉議局曾經一度起過風波。鄉議局可以被形容為各新界鄉事委員會的一個中央機構，鄉議局並沒有官方地位的——現在已經有了一條鄉議局法例。可是在新界事務方面，它還算是一個重要的組織，而它是受政務專員諮詢的機構。曾經有一次，局內分了不同的派系。當時也有對政府不滿的地方；有些理由充分，有些却是無理取鬧的。我已記不清那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不過整個事件却是十分複雜的，需要小心和有耐性地去處理。在我離開香港時事件還未平息。

中、小學校及大學

當一九四五年英國人重回香港執政之後，許多校舍已經破爛不堪，課室缺乏的程度很嚴重。雖然政府已經加速增建新校舍但由於大量的中國人由內地湧進香港而使情況更為惡化；因此實行種種臨時的措施來應急，例如每日分三班上課，在同一



嘗試駕駛九廣鐵路的火車頭。



1952年6月12日，葛量洪接受港大校長所頒的榮譽法律博士學位。

座校舍內，一班早上上課，另一班下午，而晚上又有一班，每班都有不同的教師和學生。另外一個措施是成立了工人學校，由何明華會督所創辦。在理論及實踐方面，這個主意令人欣賞的，不過在實際方面，那些學校便成了一個憂慮，因為它們成了共黨滲透的焦點，有些還完全為他們所控制而成為共黨的反英中心。這些學校要被迫關閉，而一些較為嚴重的情況則連老師也被遞解出境。

要關掉一間學校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們不想學生們沒書可讀。因此，唯有另辦新的學校——這樣做會影響當時發展學校的計劃——另一是把受影響的學生都擠到其他的學校去。我們兩種做法都有用。初時我們要說服會督有關那些學校所發生的事時確實遇到了困難。顛覆活動在其他學校也曾發生過；要偵查出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雖然所有學校都需要受檢查，而它們的課目都要先獲批准，甚至雖然有時家長會向教育當局報告，但觸犯條例的學校會在督察來之時響起警鐘，並把那些共產黨的書籍及教材收起來。

由於學校數目的增加，訓練教師也成爲一項需要，我們已經有了一間訓練政府學校教師的學院，不過只這一間是不足夠的，因此又要籌備興建另一間了。我對教育司建議這間學院用他的名字命名。他說他不願意這樣做，因為現有的那間是以從前一位港督的名字來命名的，假如這間不是以現任的港督來命名的話，它在名氣上會受到影響。結果便有了一間我引以自豪的葛量洪師範學院了。而現時已有了第三間這樣的學院，是以接我任的港督來命名的。

不過我們要小心地不可讓這類命名的事件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這認為我是做到這點的了。即如我對葛量洪學院的命名引以自豪一樣，我對葛量洪醫院也有同樣的感受，這是間非牟利、志願團體興辦的肺病醫院，是遠東最好的之一。我太太也以荃灣慕蓮、葛量洪夫人健康中心的命名而引以自豪。香港最先的兩部「九廣鐵路」的火車頭也是以我們來命名的。我一直以來都喜歡火車及內燃機車，駕駛一列火車由羅湖至九龍的二十二哩的全程使我十分興奮。我也曾經享受過駕一部舊式的蒸氣壓路機沿着九龍的其中一條大馬路行駛。不過使我在國際上享有不朽名字的却是用我的名字來為在新界發現的一種山茶花命名。⑮

自一九一一年起，香港便有了一所大學，與其他許多的建築物一樣，大學的校舍在戰時也遭到嚴重的破壞。我還記得戰後第一次在大學所舉行的畢業典禮。那天是冬季寒冷的日子，畢業禮舉行的大堂仍沒有屋頂；因此學校不但要重建，還要計劃它的未來發展。我們曾為這個問題頭痛，直至一九五三年Sir Ivor Jennings 及霍謹先生（現在是霍謹爵士）完成了一個報告後才有一個大學的發展藍圖。我從未見過一個這樣好的計劃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好。我也因為能堅持邀請這兩位人士來做這份報告而叨光不少。

港督是大學的當然校監，但這並不是行政的職務，而大學也不是政府部門，它只是由政府撥款維持而已。政府有權過問大學的政策，不過這僅限於主要的政策而已，它不能像對政府機構那樣干預它的行政，而大學當局也曾憂慮政府會干預它的行政。不過，此等憂慮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財政司及立法局一些

非官守議員不滿意學校的行政而要求緊縮它的財務管制。最後雙方得到了諒解，自那時起，學校的行政在Dr. Lindsay Ride的能幹管理之下已日趨完善。

Ride是在一九二八年到大學出任生理學教授一職，他也服務於香港義勇軍團，他看來像一位溫和的軍官多於像一位大學教授；他參加了香港的戰役，殖民地淪陷後，逃入中國內地，在那裡參加英軍援助團而名聞遐邇，為此他榮獲C.B.E. 勳銜。他在一九四九年時被委任為校長，他是個十分和善的人，很適合大學的職務。

飛機場及水塘

在我上任之時，政府已正在研究興建一個飛機場及一個大的水塘，我到任後，這個研究還是繼續着。當地的政府要負起全部的費用，不過財政只不過是問題之一，另一個則是地點問題。地點的問題比較簡單，後來便建了大欖涌水塘，建費超過一千萬英鎊。這個水塘雖然很大，不過由於需要，還要建造一個更大的水塘。在我離開之前這個計劃的草擬已經到接近完成的階段。

由於多山的關係，要找一個飛機場的地點就比較困難了。我們初時以為在新界的屏山找到了適合的地點，後來才知道飛機的起落都要在中國領空上盤旋，而極可能會受到射擊。最後我們還是用了香港最常用的辦法，把一、兩座山鏟平來填海，這樣便建成了一條伸出九龍灣海面的跑道，這條跑道可以承受現時及將來預見到的最大型的噴射機。在我剛離開後不久這條跑道便完成了。

社會福利

在我回來上任之前這裡剛成立了一個新的社會福利部門。政府和居民都漸漸感覺到社會福利的需求，而這些需求是與日俱增的。社會福利事業已不是華民科和志願團體的服務所能應付的了。開始時它是華民科的一個小部門，幾年後它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部門。雖然這個部門也因需要而參予很多福利工作，但是它謹慎地避免取代或控制志願慈善機構的工作。這個部門主要是提供指導及統籌工作。社會福利活動有顯著的擴展：包括男、女童軍，照顧盲人、聾啞人士、傷殘兒童及濟貧。服務愈來愈多。當一場木屋大火或其他天災發生後，社會福利署便會立即派發食物、衣服及其他物品給災民。

社會福利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立街坊福利會。街坊會是中國自古以來已有的制度，它在香港未能發展的原因可能基於人口浮動太大；實質上街坊會是在同一個地區居民的自發組織，自行管理和經過民主選舉，而社會福利署則從旁協助。這些事務後來撥歸了華民政務司管轄，因爲它們的活動除了福利之外還有其他事項，每當有天災發生時，街坊會都會挺身而出。當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令五萬人無家可歸——我稍後還會談談這個問題——我曾到災場視察，我認識其中一位街坊會首長。他是位穿着長衫，令人尊敬的中國人，那種長衫現時很少人穿着了。我慢慢地、清楚地說：「你會講英文嗎？」；他同樣慢慢的，清楚地回答我說：「我只會講一些，我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這位黃栢堅^{①⑥}是位超著而有公益心的市民，他還有一份惡作劇性的幽默感。

街坊會面對兩個危險：其一是它們可能有顛覆份子的滲入

，其次是有些沽名釣譽的人會利用它們來爲自己作宣傳。但這些危險是值得冒的。

我有興趣於社會福利工作，我認爲最好的辦法是公開支持這些工作，顯示港督本人也贊成它的發展，因爲雖然不少中國人都在這方面出力，或者捐贈善款，但仍然有很多沒有這樣做的。有些社會名流，尤其是女性的，使我十分惱怒，他、(她)們托詞說管不了那麼多，甚至懶得去管。這種使我惱怒的情況就像歐籍主婦說她們不入廚房一樣。無論怎樣，我已經成功地使社會福利服務爲一般人所接受，立法方面也較以往樂意多撥款項進行福利計劃。

公共關係主任

政府新聞署也是戰後成立的一個部門，不過好的公關主任並不容易找得到，尤其是在一個殖民地政府內工作。我知道，我們在香港曾經嘗試過不只一次的失敗，不過有時好的東西也是從壞的事物來的。這次的壞事是廣州的英國總領事館被燒毀，這個問題我遲些會再講；而好的東西是因爲這樣我便遇到了 Jack Murray，那時他是被派駐在總領事館工作，隸屬外交部而不是殖民地部。我想：「我找到合適的人了。」我花了兩年時間才找到他。他工作出色，爲香港做了不少事。他和本地的報界及駐港外國通訊社都相處得好，在殖民地的觀點來看，兩者都十分重要。我不認爲非官守議員了解到這項服務對香港何等重要。Murray 在這方面也未能很好地說服他們，有些部門主管也非常懷疑這個公關的好處，不過漸漸地他們便認識到服務的目標是幫助他們的，假如要這服務成功的話，他們必須合作。後來政府覺得新聞處長出席行政局會議會是有用的，那裡是

最高層的決策地方，這樣可以使他了解政府決定政策的背景，沒有這種背景的話他是很難向公眾解釋政府辦事的原則。

一般來說，我不會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在香港的內政方面，港督沒有必要出席記者招待會，而對外方面，有關與中國關係的問題却又過於敏感而不便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然而我與兩份英文報刊的總編輯定期會面，也不時會見岑維休先生，他是香港一份華文大報——華僑日報的社長，一位中肯和令人喜歡的人。在沒有定期的情況之下，我也有為外國通訊員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過這些談話內容都是保密的；在對本港報界的主編方面，我可以告訴他們政府的施政，也可以從他們的談話中了解殖民地所發生的事情及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政府也希望部門的負責人舉行記者招待會談論公眾利益的事，我相信報界是歡迎這個做法的，雖然起初有些部門主管需要敦促才做。

香港電台是在大戰爆發前幾年成立的，它後來是隸屬於政府新聞署。兩個部門之間時常發生磨擦，政府新聞署被指責干預電台的節目，而這個署則認為自己要負責電台發佈的所有新聞及公佈——事實兩個都各有理由。後來香港電台便成為另外一個部門，不過它所廣播的新聞是由政府新聞署提供的。這種安排解決了問題。我上任後一、兩年，香港電台便有了對手——私營的「麗的呼聲」有線廣播電台，這個台的收入是靠廣告維持的。這兩個台和英國的B.B.C和ITV一樣。競爭相當熱烈，B.B.C的主管曾經對我說，與一個商業性的電台做競爭對B.B.C.並沒有好處，香港的廣播處長也認為有「麗的呼聲」的競爭對他們也沒有好處。專利事業，尤其是政府辦的，通常都會感到自

滿，以爲自己是最了解情況的。

我懷疑是否政府一開始便應該資助有線廣播，使香港的大部份人口都因廉價的收費而願意每月繳付少量的費用收聽有線廣播，這樣他們便不會購買收音機收聽來自中國的宣傳。新界的鄉村有公用的播音器，不過這個計劃是否實際就不得而知了。

販毒及貪污

販毒一直以來都是受關注、而不太容易對付的問題，因爲海洛英已經代替了鴉片的地位，而海洛英比鴉片更爲有害，但偷運則更爲容易。這個問題可以分兩方面來看：第一是它危害癮君子，其次它是經香港偷運的。販買或者藏有鴉片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毒販和癮君子都送進監獄的話有什麼用處呢？他們一旦出獄後便會再犯！而且毒販在入獄後，他們的家人通常都由勢力較大的毒販照顧。那位開明的監獄署長，Norman，想到開辦戒毒中心作爲監獄的主意，我離任後這個中心便開始收犯人，此方法後來証實是成功的。國際販毒獲得大量資金支持販毒活動；我們的証據顯示，泰國政府的高級官員與此等活動有牽連的。不過我必須指明，那個政府已經跨台了。我們曾經想把一些收集到的証據公佈出去，不過上層指令基於高層政策的理由不能公佈。美國的官方反毒機構時常指摘中共政府出口毒品，不過我們一直都找不到這方面的証據；也懷疑這些只不過是反北京政府的宣傳。

貪污一直以來都是嚴重的問題，現時警務署內已經成立一個特別部門處理這個問題。大多數的案件都是小貪污，不過間

中也有高級官員牽涉在內。處理貪污案件的困難處是要找到爲法庭接受的証據。有人會向警方舉報後，因懼怕報復而拒絕在法庭公開指証。但是這方面我們曾成功地把一位部門的署長送進監獄。最困難的時期是在中國參加韓戰後，香港禁止向中國大陸出口戰略及半戰略性物品。而使走私大爲增加，另一方面要查明海關官員是否受賄也是不容易。比方，私梟可以用銀彈政策，買通那位需要在甲乙兩點穿梭巡邏的緝私員，當他在某一特定的時候到乙點巡邏時，走私物品則由甲點通過。假如有某緝私人員受到懷疑，要解釋銀行戶口的巨大存款時，他便會說是贏馬得來的，並且說出日期、開跑的場數及馬名。後來只好按部就班地整肅海關部門。曾經被檢獲的最大宗走私物品是黃金及毒品。緝私的成功通常是用於線人通風報信，若線報正確，線人便會獲得巨大的賞金。

應酬

在香港任職，較任何其他地方的應酬都多。督憲府簡直忙個不了。慕蓮是這些事情的策劃人，幸好傭人都很能幹，阿丘是他們的主管，這位令人讚賞的管家也是位好心腸的人。話雖如此，我們仍不時監督工作，而不可因循地以爲既然週一的晚宴做得不錯便假設週二的也一定會好的。因爲那三位廚子必須加以督促才有好的表現。而那些侍役也不例外，稍爲鬆懈一點，他們便會穿着骯髒的制服侍候客人，或者在午宴或晚宴時，站着發白日夢，忘記爲來賓加添酒水。爲此慕蓮必須定期性地和阿丘作事後檢討，告訴他那些做得對，那些做得不對，若非如此，我們便不能維持高度的服務水平。

宴會中的座位安排是由我自己決定的——副官會首先把座

位的安排圖表給我修改和批准。這些聽起來好像毫不重要；不過許多人，尤其是那些女仕，對就座的先後是頗為敏感的，這做法也使賓客不會沒有被小覷的感覺！有時要安排最先就座是個棘手的問題，一般的解決方法是安排某一對夫婦中的男士優先就座，而他的太太則安排就座於次要的位置上，而另一對則倒過來照樣安排。晚宴後的小聚開始時，夫婦便會合並重新調動他們的位置。這樣做可使賓客能到處交談，增加接觸機會。我們的做法是希望宴會，甚至官式宴會，都能使來賓覺得輕鬆和有趣，同時在他們離開督憲府時，因為受到女皇的代表的邀請而感到榮幸，並認為那段赴宴時光是一種享受。我想來賓有義務使到一個宴會達至良好的氣氛。我沒法牢記每一位參宴者的個別脾性，尤其是那些甚少被邀請的人，這些都要由副官記了下來，以他們的名字作編排放入紀錄卡內。在宴會裡，首席女賓是首先帶頭辭別的，這種情形在午宴時並不會有麻煩，因為當飯後我們由飯廳回到客廳用咖啡，而賓客過了一會後都會告辭；可是，晚宴時就沒有這樣的慣例，而很多時首席女賓多因為什麼時候該告別而感到頭痛。最後解決的辦法還是由我自己主動站起來，對客人說現時已經很晚了。假如有些特別的人物來港訪問，我們會安排一個小型的晚宴，邀請一些適合的本地人士參加。晚宴後我們會到書房小聚，而女士們則自由活動去做自己所喜歡的；要是宴會是全男性的，則慕蓮也不會出席，若必須出席的話，她也會在吃過飯後便離去。

我們曾經遇過一、兩次頗為尷尬而有趣的情況。正當人們對日本侵略香港還記憶猶新時，我們在賓客抵達前一小時猛然醒起將會坐我右邊的首席女賓是日本總領事的太太，這樣可能對其他女賓有不敬之處。我自己也不知事前為什麼沒有看到

這點。因此我們要找到一位地位上高於那位日本太太的女士。結果由慕蓮打電話邀請了海軍司令的太太，Mrs. Unwin，告訴她我們的窘境，請她來幫個忙。她很樂意地接受了！皇家海軍的確可靠！

最令我們頭痛的一次經驗是伊拉克王子突然到訪，而我們不能招呼他到督憲府下榻。因為那時我們已經安排了一個告別晚宴招待英國海軍總司令，其他賓客還有剛好在港的Michael Todd（八十日環遊世界）、他的太太和伊麗沙白泰萊，伊拉克王子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參加那個告別宴。在宴會那天的早上，我獲悉在前一個晚上，伊拉克王子在另一個宴會中弄很不愉快因為當時席上有一位猶太人。在我的宴會裡，Todd本身是猶太人，當天下午他剛巧在我的辦公室內，我把那事情告訴了他，希望在晚宴時，他能自認是蘇格蘭人或其他人種，他大笑之下接納我的建議。那宴會開得不錯；那位英俊的王子穿着華麗的服飾，看起來十分吸引人，而伊麗沙白泰萊則打扮得十分漂亮，Todd也十分活躍。會後，我和慕蓮都覺得鬆了一口大氣。在以後的幾個月內，那位王子被刺身亡，而Todd則死於飛機失事。

曾有某一次宴會是比較輕鬆的，在每次有神職人員在場時，我都請牧師做宴前禱告，那次當牧師進入客廳時，我便向他提出要求。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況是可有何等令賓客們覺得突然。

另有一次，一位來自北達科他的小教派神職人員與我會面，我送他到門口時，他突然對我說：「讓我們一齊祈禱吧！」結果我們便一起跪下祈禱。

每年八個月賽馬期間，每隔三、四星期我們便會邀請三、四十名賓客到我的包廂來吃午餐。這些都是令人興奮和充滿愉快的宴會，可是一般慣例是客人要逗留至用過下午茶後才告辭，使我們感到筋疲力倦。賽馬會是個非牟利機構，加上中國人都比較豪賭，使它有大量的收入資助興建醫院、學校、公園和其他公益事業。

女皇壽辰的督憲府園遊會是每年的最大活動；曾經過訪督府的客人都在被邀請之列，名單是參考督憲府的留名簿上。有時我們很難記起一些我們想邀請的人的名字，而這些人通常因為胆怯而沒有到訪或在冊上留名。有一次，一位素未謀面的年輕女士打電話給副官，質問為何她沒有被邀請參加園遊會；副官問她可曾到訪過，她說沒有，不過她特地為參加園遊會而買了一頂帽子。結果我們也邀請了她。通常我們會與到場的客人握手，由於應邀嘉賓一次比一次多，曾經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半小時內不停地與約兩千名賓客握手。不僅我們受苦，來賓自己也要排隊久候。接着便在草坪上交談。食物都是由督府的人員準備的，我們都以此為榮；因為這是一點也不簡單的，任內最後一次主持女皇壽辰園遊會時嘉賓多達四千五百人。參加侍候的人員包括：三軍的三位名譽副官、正規警察、輔警和聖約翰救傷隊。他們看起來都是很精幹的年青人，我向來都留意總督或將軍們的副官，我發覺他們很多是沒有效率的年青人。在香港時我一共有九名副官，全部是經由警務署長親自挑選的。假如他們做得不妥的話，除了受我責怪外，還要向警務署長交待。副官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但也是個好的訓練機會，離開警務隊兩年是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我每至兩年便會換一次副官，並且在沒有酬酢時，我會盡可能讓他放假。

我們很少在外面吃飯，也僅限於參加軍方領袖、領事和兩局議員的宴會；我們也不參加雞尾酒會，除非是由公共團體或者是由官方舉辦的。要是去的話，我們必定準時到達，例如七時就是七時，分秒不差，早到便是極大的錯誤！抵達後十五分鐘，副官便會走來對我說：「請您原諒，總督閣下，你還有約會，現在是離去的時候了。」這樣對主人家還會好，因為只要一刻港督還在的話，他不能自行招待其他客人。他們請港督到會旨在增加宴會的氣派；慈善舞會的情況也是一樣，這些舞會差不多在冬季期間每個星期都有，假如贊助人說港督會到場的話，人們會爭相搶購入場券；由於這些善舉是值得支持的，我們也不介意被用來作餌。我們不會因為高興而過份久留，因為主人家也不能整天招呼我們，而且與會嘉賓也有不少老人家希望早些回家休息，而他們亦不會早於港督離開的。

我為自己及領事們做了件有益的事，那就是取消了慶祝國慶酒會時所發表的演說。每年都要找些新鮮的東西來演說是困難的事情。一位加拿大的商務專員每年在自治日都背誦出加拿大有多少公路和鐵路，實在沉悶極了。但依照新的做法，我只需為慶祝國慶那個國家的元首祝酒，而那位領事則向女皇祝酒。

太平紳士

我喜歡每年為中國人太平紳士舉行官式宴會，對那些中國人來說，被委任為太平紳士是件榮譽的事，我相信在他們的眼中，太平紳士比O.B.E.的勳銜還重要。我也不清楚這種太平紳士的銜頭被視為一種對良好服務的獎勵是創於何時，相信這是發生在我任港督之前的事了。我對太平紳士銜頭的看法則不同；我認為太平紳士是用來巡視監獄、擔任某些案件的裁判司，



1954年2月，作者和太太在駐港外交人員的舞會中起舞。



作者與何東爵士交談。

或者擔任一些仲裁職務而已；當然只有負得起責任的人才會被委派的。在這方面，中國人和我的看法就不一致；他們以為這個銜頭是對服務後的獎勵，而我認為是爲了要做某種服務才給予的。我們的爭論從來都不沒有發展到白熱化的階段，原因可能是我自己作了些原則性的讓步吧！一年一度的官式宴會有七十五位太平紳士參加，由於督憲府的宴會廳不能容納他們，我們決定在府裡的舞池舉行，會場用鮮花來佈置，並由警察樂隊在場演奏。與會嘉賓身穿晚禮服，胸佩勳章。差不多所有的中國人都穿着長衫，而中國女仕也穿旗袍，女太平紳士是戰後才有的，爲這事當時招來了不少妒忌。在此宴會中坐在我旁邊的貴賓是兩位地位最尊崇的太平紳士——李寶貴先生及周壽臣爵士，其中又以李先生地位最高。他不曾講英文，而我的廣東話也有限，不過我覺得他是位很有風度和氣派的人。

周爵士的家族落籍香港已有不少世代，他曾開玩笑地說，他的祖先是海盜出身。也許這是事實的，因爲當英國人最初到香港時，這個地方的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而海盜是貧苦漁民的一種兼職。周爵士是最早到西方升大學的中國學生之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他在哥倫比亞唸書時，他和我的繼父，文迪將軍，同時在駐高麗的中國海關服過務，當時高麗還是中國的一部份。另外一位資深的太平紳士是何東爵士，他們兩人都很不相同。何東爵士比較拘謹，管理家族嚴謹。加上他的精銳的眼光，令他擁有十分巨大的財富，他也是香港最大的個人慈善捐獻者。他們兩人都過了九十歲才逝世。

到廣州、澳門及南京訪問

出任港督必須做的事情之一是要到澳門和廣州拜訪同級的

官員。我第一個去拜會的是張發奎將軍。張將軍是位有名的司令，有人對我說廣州在毫無抵抗之下被共軍佔領與他無關，因為補給不足，再加上蔣介石統帥的阻撓。他現時在香港過着平靜的生活。無論如何，我認為他是位精明的人，也是位體貼的主人。官式訪問並不容易應付，但我總算應付得來。在廣州期間，慕蓮都忙於購買十六世紀枝形吊燈的梭晶，為督憲府做吊燈，那些東西可能是東印度公司時代的遺物。在張將軍到香港回拜我之後幾個月，宋子文博士被調派廣州，全權負責華南事務。英國總領事和我商議，假如宋氏先來訪問，會使他失去面子，情況尷尬：因為以宋博士的權力，加上當過財政部長、外交部長和總理的職務，要他先行拜會我，不難使人嘖嘖稱奇。因此我同意先到廣州拜訪他。日後，在宋氏駐廣州期間，我們時有往還，直至一九四九年後期，廣州被中共佔領為止。

有一次，我們在中國銀行一位經理陳先生的家中作客，他的房子在深水灣，就在遊艇會會員泊艇的地方。宋博士問陳先生他是否時常到遊艇會，他說沒有，因為那裏不准他入會。這事使我十分尷尬，不過使我高興的是，數年之後，遊艇會便開始招收非歐籍的會員。在我離開香港的期間，唯一不招收非歐籍會員的會只有石澳鄉村俱樂部。這事使中國人十分不滿，雖然這種不滿都沒有人向歐洲人表示過。不過，有一次在我主持的一個討論建造房屋給木屋居民的會議時卻發生了一件事，其中一位中國籍社團領袖建議石澳作為這個住宅區的地點。石澳是個極不合適的地點，他只不過藉此表達他對那個俱樂部政策的不滿。

新的中國銀行大廈工程是由國民黨開始興建的，但在未建好前共黨已經統治了中國。我們的人員疏忽了這點。有一次我

對那位陳先生說：「陳先生，我相信你會在銀行大廈的樓頂掛起共黨的旗吧！」他便說：「我知道你不想我這樣做的，所以我不會做。」他的確沒有做，但不時都會到北京去。倘若我在回來後碰到他時問他是否已經被洗了腦，這個玩笑使人很不好受，我始終沒有提過。

宋氏訪港使警方必需考慮他的安全問題，因為有很多人企圖刺殺他。他和我在公在私相處融洽，有些可能發展成爲不愉快事件的小事都能圓滿地解決了。宋氏是個精明的人，是遇到一個地道而思想似西方的中國人。有諺語說：「東西各有別」，但思維方面卻並不一樣的；在東方住了一段時間的西方人會了解一個東方人在某種情況下會有甚麼反應，反之，亦然，不過基本上，他們是有不同的地方。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喜歡和互相尊重對方的優點，反之，這樣會增加人們的興趣。有些西方人在思維方面變得像東方人，不過，雖然他們不再有歐洲人的思想，但是他們也不能完全成爲亞洲人，變了非亞，非歐種族的人士。不再有一個種族願意接受他們了，而可悲的是他們自己對此沒有感覺。

我們也到過南京拜訪蔣介石將軍、蔣夫人和英國大使施諦文爵士，我們住在施爵士家中，施爵士美俊得酷肖西班牙人，他的漂亮太太和他很相配。施太太把使館佈置得很有風格。聚會卻是愉快的，不過我覺得在他周圍的一羣人沒有把所發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訴他，蔣氏在中國大陸已失了勢，假如將來在中國他的名譽沒法恢復的話，我將會覺得很驚奇，因爲雖然他犯了不少錯誤，而且最後也失敗，不過他爲國家也作出過偉大的貢獻。

作爲一國之都，南京和北京實有天壤之別。比如，新的政府大廈無沒有甚麼顯著的特色，甚至建在山腰上的中山陵也沒有應得的輝煌。⑰我未到廣州拜會之前，有一位重要訪客來訪，他就是中國的總理孫科先生和他的夫人，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天。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無怪他能做這麼高的職位。他的拜訪只是私人性質，不過我們爲此舉行了一個官式晚宴，邀請了當地的名人。宴會上，我犯了一項儀式上的錯誤；本來我是應該引領孫夫人進入宴會的，不知怎麼攪的，我引領了次首席女賓。還幸行政局議員周俊年（現時的周爵士）看到後馬上招呼了孫夫人進席。那情形十分尷尬。第二天在一個公共的場合裏，孫先生無禮地批評了香港的問題，但我不認爲這兩件事是有關連的。

周俊年是個令人喜歡和有點精靈的人。顯然他是在牛津受教育，他卻並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討厭的西化中國人。事實上，居民都喜歡和信任他，他很了解人們的感受，所以他在行政局的服務是有價值的。

九龍城寨事件

話分兩頭，讓我談談一九四七年的時候；那時，正當香港忙於重建，而商人忙於賺大錢的時候。行政比較上容易，而政治卻潛伏着我們看不到的危機。第一件是九龍城寨的事件，它後來導致英國領事館被焚毀。

根據一八九八年的條約，中國租借新界給英國九十九年，而中國方面則在九龍城寨保留了一些權利，那是在新租界區一個有六英畝左右的地方，周圍有牆圍着。這些權利被英國在一

八九八年的「樞密院頒佈的關於新界議會」所廢除；自那時起，香港當局便把這個地方當成和香港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一樣看待而行使了管轄權。中國政府並沒有抗議，即使有的話，也沒有受到英國理會。⑱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日本人把城牆及裏面一些建築物拆去，以騰地加建機場。戰後由於戰時的破壞而使房屋極其短缺，許多跑到殖民地的人找不到住的地方，因此他們在廢墟上重建一些簡陋的房屋，而九龍城寨是他們選中的地方之一。雖然在這些地方建屋的人數大概只有二萬五千人，較後來殖民地所收容的一百萬難民是個小數目。這些木屋都必須遷拆，因為會產生火警危險和衛生問題，同時也需要用這些地方展開重建工作。因此若他們繼續重建時，工務局便展開有系統的遷拆工作。

沒有人曾經考慮過九龍城寨，以及它那潛在的爆炸性的問題。它不是在半個世紀以來被當成香港殖民地的一部份嗎？可是當清拆隊來到城寨時，一羣敵對的人羣反抗起來，他們說九龍城寨是中國的，而不是英國的地方。這是對政府直接的挑戰；要是我們讓步，便會示弱而失去民心；要是我們一意孤行，則可能導致流血衝突。沒有一個政府會在失去民心而能夠繼續統治的，香港當然也不例外。這裏涉及另一基本問題：政府在它的土地上行使管轄權。然而中國政府可能會干涉的。因為雖然羣衆都是一般百姓，但是他們以中國政府的名義行事，而且中國的報刊已經大嚷「英帝國主義」及「中國神聖的領土」。當時英國大使施諦文爵士正和我一起。我對他說，我正向英國請求授權使用武力清拆木屋居民，假如有人受傷的話，施大使亦可能被殃及，因為中國政府一定會抗議的。施諦文同意我的做法。我不認為南京政府會給予麻煩，不過中國在香港的特

別專員，郭德華，則認為迫使港督讓步的話會為自己帶來榮譽，因此我相信他不但沒有阻止滋事者，反而指示和鼓勵他們行事。

我們要表示權力，最低限度也要嘗試這樣做。這行動交由警方負責。可惜警務署長休假，而署理署長卻把事情弄糟了——羣衆頑強反抗，弄至一人被殺，幾人受傷，而警方卻未能清拆所有的地方。而中國大陸內的報刊則嚴厲指責英國政府，事件傳到廣州，使暴動羣衆舉行反英示威，那時中國的內部政治也發生了作用，宋子文負責華南地區，他欲控制暴動事件。但是反動的右翼「C. C.」集團（是以陳氏家族命名的）則推行反外和反宋，盡量爲他帶來麻煩。他們鼓動暴徒攻擊和燒毀（英國）總領事館，幸好總領事和職員能及時逃命。

城寨清拆及燒毀英國總領事館卒成爲中英政府的爭端。中國政府和所有懦弱政府一樣：害怕向對方讓步而有辱國體。因此堅持擁有城寨的管轄權，而我們卻不承認該項擁有權。惟有提出不同的妥協安排，例如把那六英畝土地變爲一個公園等。但由那一方面來管理公園又成爲另一個不能妥協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直拖了好幾個月；留在那裏的木屋居民也不願搬出，而我們又不想因趕走他們而使中、英關係惡化。結果問題變成了死結。不過對香港政府來說，我們並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無論對方用暴亂的方法或依中國政府行事。香港居民並沒有失去信心。不過懸疑未決的問題引致很多人不滿意；城寨成了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裏面有海洛英毒窟，妓寨及所有不良的事物，雖然我們定期派警察入內巡邏，但是我們不願起訴壞份子，恐防被捕者會提起管轄權的問題。我們情願把在城內犯法的人

遞解出境，這是個行政，而非司法的行動。自然我在一九五七年底離開香港後，情形已經有了改善，法庭可以審判城寨發生的嚴重罪案，而沒有不良的後果。

在一九四八年時，九龍城寨是香港政府的重要問題。另外一個和南京政府產生磨擦的是香港的政治難民問題，他們辱罵蔣介石和他的政府，而這樣則有違我們讓他們繼續在香港居住的好意。難民中最厲害的一位是李濟深元帥，他在一九二五年曾策劃杯葛香港的運動，也曾經在蔣的政府中任要職。我曾多次斥責他，但他每次道歉後，不久又故態復萌，最後在共產黨佔領北京後，他便投靠他們，離開時也寫了封禮貌的信給我，感謝我對他的款待。假如把這些人送回當時的國民政府，他們定會受到處分的。情況也適用於今天由共產中國逃來的難民。他們行爲良好，沒有謾罵北京政府，起碼沒有公開地這樣做。對他們來說，遞解出境的目的地不外是台灣，那裏的獨裁統治，如中國大陸一樣，毫無吸引力。這些人都有自由的思想，比方從前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他追隨蔣介石到台灣去，後來意見分歧而遠走美國。我曾經在上海極缺乏白米時爲他做過事，由香港運一大批去。

馬來亞的告急及其他

馬來亞發生了共產黨叛變。這事對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由於共黨在大陸發展不錯，使我們關注馬來亞的情況。我自己則較爲直接受到牽涉，因爲東南亞的總專員開始了他們的定期會議，在新加坡總部的三位總司令，所有的英國大使，總督及來自卡拉奇，至東京及威靈頓的專員都來參加。奇倫勳爵曾是東南亞的特別專員，而麥克堂納曾是馬來亞聯邦及英屬婆羅州的

總督。奇倫在一九四八年退休，而麥克堂納則要全部負責一切，因此我和他的接觸比較多。奇倫可算是個名符其實的大人物，他在東南亞幹得很好，受到亞洲人的尊敬和了解。我就厭惡那些庇護左翼人士的心情，就和厭惡傲慢的保守份子一樣。這類人會說：「可憐的小傢伙，讓我來保護你吧。」，這樣他們才顯得優越的。不過奇倫卻不是個保守主義的人，也不是個善意的左翼人士。

我仰慕麥克堂納並對他很有好感，他最成功的地方是消除亞洲人心目中英國殖民地總統的浮誇和自私、自我優越的形象。把自己看作是個不折不扣的亞洲人。他從前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位內閣部長，因此他也了解亞洲人的問題，他和那些部長都有共通語言。我以為戰後以來，他比任何英國人更能贏得亞洲人的信任和信心。他們愛戴他，並不因為他的才智，而是他的人格和其他因素。他並不喜歡傲慢的守舊主義份子，這類人在新加坡獨立之前是很多的。每次到新加坡訪問，我也被歐籍人士的領袖那種的態度及語言所震驚；可幸的是新加坡獨立之後，這類人大都返回自己的老家去了。

雖然在新加坡舉行的會議在某些方面來說是費時失事的，不過它們到底給予英國在這些地區的代表一個機會去彼此認識，並且了解大家那些不同的問題有些什麼關連。那些正式的會議佔了最多的時間，沉悶到極點。出席了兩三次之後，我都全部記熟了；因此我整理一下我的黑眼鏡之後便可以安詳地睡上一覺；假如不是因為座椅不舒服的話，我可能會睡得更甜；由於太擠迫的關係，會議廳裏只能放置最小而最硬的椅子。然而我感覺在香港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我很少停留

在整個會議開完為止。

到北京懷舊的旅程

在一九四八年的九月，慕蓮和我去北京作了一次懷舊的旅程；一九三二年以來我們便再沒有到過那裏了，我們希望在共產黨未來到之前再去一次，而共產黨進入北京已是隨時都會發生的事了，那時在城裡已經聽到遠處的槍炮聲。我的繼父數年前在北京逝世了，而我的母親戰前就返回英國去了；因此我們便下榻於一間叫作Wagons-Lits的酒店。剛巧遇上極佳的天氣，我們有了七天快樂的及懷舊的旅程，重訪了舊時常去的地方——宮殿、廟宇及市集等。我們從窗外望進頤和園的宮殿，那裏我的母親常常租下來住的，我們也住過幾天，那時尤其喜歡在黃昏時關閉之後在宮殿的四周散步。不過北京已經和舊日不一樣了，大使館已經搬到了國民黨定都的南京，大屋也失修了。共產黨後來再在北京定都。那些商人也顯得沒有生氣，似乎有些憂慮，因為不知道將會怎樣。然而，那裏還有故舊的氣氛。我們以為這是到北京旅遊的最後一次了，不過我們的想法是錯了。

第七章

共產黨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宣佈爲中國的合法政府。爲什麼中國會走共產主義的道路呢？有些人說，那是因爲中國被出賣了，不過那個答案却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被誰出賣了呢？是否被美國的民主黨政府呢？其他的人則說責任應該歸於國民黨。也許我們太過接近這段歷史而不能下一個客觀或者定論性的答案；或者我們現時也很難肯定地說，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是必然發生事。

十九世紀時，滿清皇朝已經無可避免地失去了大局的控制，愈來愈腐敗；具有人類歷史上最長而無間斷的文化的中國漸漸的進入了混亂的情況。剛巧這時西方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中國和日本不同，似乎沒有能力使自己適應現代的世界，或者說沒有能力去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那時只不過完全因爲列強和日本彼此妒忌才沒有把中國瓜分爲殖民地或是成爲他們的勢力範圍。歐洲的國家有意把中國劃分爲她們的勢力範圍，不過她們的計劃被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所挫敗了——這個政策的目的是使大家在同等的地位上掠奪中國。這種情況使中國人感覺到很受侮辱，比之其他的亞洲人還甚；因爲中國人在對待外人的時候，曾經比其他民族更爲自傲。中國從前是中原，是宇宙的中心，不過現在却被那些低劣的野蠻人所侮辱——這是極大的恥辱。對西方的憤怒是不足爲怪的——雖然是由於中國自己的失敗才受到了別人傲慢無禮的對待。日本初時比之中國還要荏弱窮困，它適應了現代的發展而站了起來，贏得了西方的尊敬。無論怎樣，中國現在是站起來了。在適當的時候

，中國在國際的團體裏恢復了自己的合理的地位而成爲一個強國；在新的一代成長後，他們從未嘗試過治外法權及只有外國人才有特權的滋味，那時這種憤怒無疑將會減少的。

在歷史裏面，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偉大的國家淪落到毫不重要的地位的事例：如埃及、希臘及羅馬。有些永遠毫不足道，有些則重振了聲威。一九一一年的革命^①給我們有些甚麼啓示呢？它是否意味着一個無能的民國替代了一個無能的王朝呢？無疑在成立民國最初的幾年似乎是這個情況了，國家受到內鬨所分裂。不過在一九二六年，隨着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政之後，秩序漸漸地恢復起來，國家也穩定起來了。不過有些人仍然認爲，國民黨在三十年代初期已經開始失敗，貪污腐敗成風，沒有做過土地改革的工作。不過日本人則不同意這個看法，他們預見到——或者應說是以爲自己預見到——中國正在把自己建成爲一個強國。他們認爲這樣對日本是一個威脅，而決定在中國成事之前把它毀了。這樣就導致日本對中國的一連串侵略，最先由一九三一年侵佔滿州開始，這項行動是在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在日本投降之下結束而完了。這裏有一個有趣的猜想：假如日本不嘗試毀滅新的中國，反之努力於她的現代化，會有些什麼情況發生呢？不過她並沒有這樣做，她走了軍事侵略的路子，而不是友好合作的路子。

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全面侵略中國，中國進行了全面抗戰直至一九四五年，一共八年。英國和美國才和日本打了四年仗，而她們都是有紀律和工業化的國家，反之中國兩者都不是；這樣說來，在戰爭結束時，中國在體力上及精神上已到了十分疲

勞的地步應該是不足為奇的吧？領導人對國家每況愈下的情況似乎是無能為力的，政權愈來愈衰退，直至淪為無能及腐敗。而在一旁等着的是一羣甚有組織、甚有紀律，願意獻身的人——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給予國民黨致命的一擊而取代它的地位。中國走共產主義不能怪責任何人的，也不能怪國民黨；假如不是日本政府的錯誤的政策，這種情形可能不會發生的。大部份的人民都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在那個時候，對他們來說任何事物都會比之失去民心的國民黨為好。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四八及一九四九年勝利地席捲全國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新政權建立——不過是建立一個清廉公正的中國人政府。這個歷史悲劇或意外，根據個人的觀點來說，便成了一種想法，即是中國的再生應該是走共產主義的道路。

作為香港的總督，我最關注的是共產黨在中國當政後對這個殖民地會帶來些什麼後果。比之這個政府是個共產主義的政府還要重要的事是它成爲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香港是「屬於中國而被他國統治的地區」，這點對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無論是共產黨或非共產黨的政權，都是一樣的。宋子文有一次在我的辦公室對我說（那時國民黨的政權似乎還是十分穩固）：「二十五年之後，我或者我的承繼者會要求收回香港的，而我們一定會收回的。」假如中國不是積弱的話，是不會把香港割讓予英國的。而後來的各個政權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收回這個地區。反之，中國還被迫在一八六〇年多放棄一塊土地——九龍半島，而在一八九八年時租讓了新界。太平洋戰爭結束時，蔣介石可能希望收回香港，他要求由中國的司令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而不是由一個英國司令去接受這個投降。假如這點被接納的話，合邏輯的做法是，這個中國司令官會說我們不再撤

走的了。當每個人在戰爭結束之後被戰事使到厭倦之時，誰還會動干戈把他趕走呢？不過，邱吉爾無論如何不同意這樣做，因此香港是由英國太平洋艦隊的一些單位來光復，而日本人的投降則由夏慤上將來接受。

往後的年份，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一般來說也算得上友善；嚴重及不太嚴重的事件不時發生，不過這些都不曾影響到我們的地位，而邊界也不用設屏障。由中國來的中國人來去自如不需要出示護照及其他證件；英國人到中國內地也不受到限制。這些中國人對他們的出生地還是忠心的，但是他們服從香港的法律，以及付稅給香港政府。在中共當政之前，即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的雙十國慶日在這個殖民地舉行了慶祝，而這天是公眾假期——雙十節是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政府的週年紀念日；在許多慶祝的場合裏，中國及英國國旗雙雙掛起，十分觸目。總的來說，這個情況是可以令大家滿意的；不過，中國的自豪及自尊曾經是受到這樣深刻的創傷，以致中國的當政者都奮力使到他們在殖民地的人民懷有愛國心；因而形成了反英的情感，顛覆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工會及學校。為工會帶來了一些不幸的後果，因為他們不專心去為會員謀福利，而致力於政治的問題。戰後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時，這種情形在工會裏更為特出，以致工會分為親共和親國民黨。一般來說，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怎麼奏效，他們會製造麻煩，有時是很大的麻煩；不過他們對這個殖民地不能構成威脅，因為基本的原因還是中國政府仍然沒有能力向英國的地位挑戰。

中國有了一個強大的政府之後，這種情況便完全不同了，

而且這個新的政權是極度反對西方的、反英及反對香港的。⑳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主導政策原則是什麼呢？一方面我們不願意製造挑畔的行爲，另一方面我們却也不能去討好、或者做出看來是討好對方的事，對不合理的要求讓步。香港的人知道內地的政府是不友善的，不過是有力量的。假如我們去奉迎的話，我們會失去人們的信心及支持，他們還可能反過來反對我們。我們時時都要小心翼翼——尤其是當發生某類的事件，如封閉一間共黨的學校，遞解一個滋事者出境，或者因發表煽動性的文章控告一間共黨的報紙等。我們只能夠靠搜集到的資料（通常是些含糊不清的資料），以及靠我們的估計和推測我們的行動可能會產生的後果而作判斷。回想起來，我現在所能說的是，我們總算應付過去了。

香港人一般的態度是最先贊成這個新政權，就好像中國國內的人一樣，他們爲國民黨的失敗而鬆了一口氣，祈望代之而來的是一個仁慈和公正的政府；事實上這情況當成爲一個新的開始。

「紫水晶」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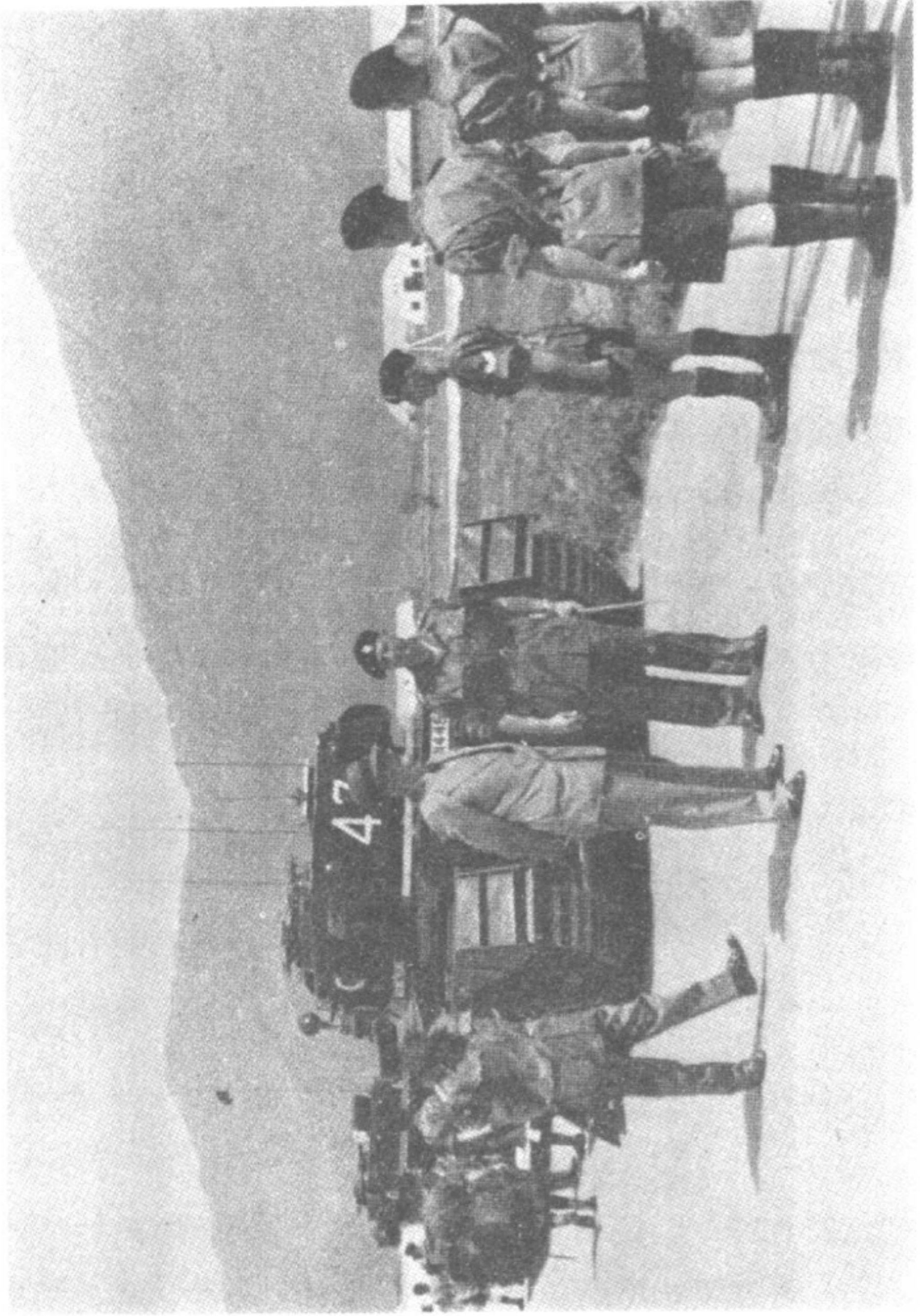
共黨的軍隊南下抵達長江時，他們停了一會才渡過這條偉大的河流，就是在這個中國內戰的階段裏便發生了「紫水晶」號的事件。應駐南京英國大使的要求，「紫水晶」號驅逐艦駛往南京，那是上海一百英哩多的河道航程。在長江南面的國民黨當局——當時還是中國的政府——已接獲通知，而在彼岸的共黨軍隊則沒有。「紫水晶」號駛達南京之前，共軍用炮火襲擊，船長及一些船員被炸死，還有一些人受傷，這隻船也擱淺了。另一位船長，尤德中校，是南京英大使館海軍參事，被

派去接替船長的職務。在這個夏季最酷熱的幾星期內，這個年青的海軍官員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之下支撐着船員的士氣，又要同共軍的司令舉行冗長談判，使「紫水晶」號脫離險況。他根本不能和人討價還價，因為他手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討價還價。最後，嘉倫斯得到的結論是除非他接納共軍所提出那些使他蒙羞的條件，否則唯一的辦法就是突圍，這樣戰艦會遭到擊沉的後果；他就選擇了這個決定。情況對他極為不利，不過幸運有時會幫助有膽識及勇敢的人，這個事件就是其中的一次了。「紫水晶」號衝出了公海後駛到香港，嘉倫斯和船員受到了英國人盛大的歡迎。他受封了D. S. O. 勳銜，同時晉升為海軍上校。

這是皇家海軍優良傳統的一項創舉；不過人們不免要問，為何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會命令「紫水晶」號駛往南京，而且為何「倫敦」號在岸上優良的炮火之下還受命到長江去嘗試解救「紫水晶」號，以致後來受到人員傷亡之後而被迫撤退。嘉倫斯和他的人員表現得勇敢；不過就整件事來看，英國的策略是失當的，令到香港的中國人也為之不滿，甚至那些不同情共產黨的人也有一樣的想法。

防衛措施

一九四九年十月，共黨的軍隊到達了我們的邊界；幾個月以來，我們一直都向倫敦諮詢，嘗試預測那些軍隊抵達邊界時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英國的政府要我們用鐵絲網封鎖整條邊界，共軍進入英界時使用武力反抗。在香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因為這樣必定會引致流血，而且還會刺激勝利中的共軍向殖民地發動攻擊。假如攻擊不成功——而且是不可能成



參觀石崗軍營之情形。

功的，它仍會為英國政府（香港政府更不用說了）和新的中國政府帶來了不愉快的序幕；我們也不認為戰敗的國民黨軍隊會大量擁入香港。我很高興地說，我們的見解獲得了接納；雖然後來的確有幾千名國民黨士兵進入了香港，他們是不受歡迎的，而且也帶來了不少損失，在我們和中國政府之間造成尷尬，尤其是他們之中有些是從事反北京的活動。因此而被捕的人會遞解去台灣。

把他們全部送到台灣去，我們猜想他們會受到歡迎的，因為他們曾經為蔣介石作戰。可是那裏的政府不願意接收他們，藉詞其中可能潛有間諜；想到台灣已經有了許多這類的人時，我覺得這個藉口是站不住腳的。不接受他們的真正理由是：倘若把這些人留在香港的話，國民黨的政府便可省了負擔他們生活的費用了。有一次我在紐約遇到了剛在那裏的聯合國開會的國民黨外交部長葉公超時，他對我這個看法直認不諱。

在和倫敦辯論邊界是否應該封鎖之時，我們當時認為共產黨在整個中國鞏固了政權時，難民便會由香港返回內地，這是和以往鄰近省份發生內戰時的情況一樣。不過我們的看法錯了；這次他們並沒有返回去。反之愈來愈多的人來了香港，因此我們要封鎖邊界，這件事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時在沒有不愉快事件發生之下完成了。

面對着中國大陸長期性的軍事威脅，很明顯殖民地的武裝部隊需要大量增加，軍事司令部也要重組。結果設立了三軍司令的職位，取代了三軍個別的司令要向新加坡各自的司令官負責的原來制度。

雖然我深信民政的總督不應該干預軍事，我歡迎這個轉變，尤其是我對陸軍司令沒有信心，我認為他對自己也已失去了信心。第一位三軍司令是費斯丁將軍，戰後才來到香港，他帶來了信心及活力；但是一些營級司令官們不能跟着他快步跑上山時便會受到責備。我也是個健步者，不過我却同情他的下屬；因為那時是香港炎熱的夏季。我時常因為在重要時刻而有些能幹的司令一齊共事而感覺慶幸。此外，我發覺很容易和他們一起共事，這點是重要的，因為民政和軍事要和諧共處，而這點要由高層的領導開始做起。

新加坡的陸軍總司令也曾建議過，民政的總督（即是我們的職位級別）應該由軍人代替。這個建議倫敦並不重視，因為只是在多年後在一次私人的閒談中我才聽過有這樣一個建議。後來也有過類似的建議：讓新加坡的總專員在所有防衛的問題上——這是個那麼廣義的定義——有超越香港總督行政權的權力。這就是和他凌駕新加坡總督及馬來亞專員的職權一樣——雖然他很少行使這些權力。表面上看，這項安排是合邏輯的；香港的三軍司令從屬於新加坡的三軍司令，因此香港的民政的總督和民政總專員之間的關係也應該照這樣安排，這是合理的配合。不過我却認為這個主意不好，而且告知了殖民地部。他們的回覆是，這個問題已經由「部長」們決定了——這個如魔術程式般的解釋是用來對付所有辯駁的。不過我並沒有放棄反對。

一次，我和三軍各自的總司令參加了會議，總專員同意了我的看法，他並不是一個愛好權力的人。由於這事情對香港是十分重要的，我通知了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他們強烈地反對

說：「總專員麥克當納這個人也還不錯，我們認識他，而且也信任他，但是他不能一輩子是總專員，原則上我們完全反對這個建議。」我跟着向殖民地部匯報了他們的看法，殖民地部後來派人來討論這個問題。這位官員和行政局成員開會時我並不在場，不過這個建議後來却被放棄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國防部次官亞歷山大勳爵訪問這個殖民地，使我們感到鼓舞，這表示了英國認真地承擔了在香港的責任；這並不是一些含糊和客氣的說話，說過便算了，因為增加駐防的軍隊不久便陸續來到了。一位參加了內閣會議的殖民地部人員後來對我說，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一種看法：假如香港失守的話，對政府在下次大選不利。不過可能他過於冷嘲熱諷才會這麼說。

一九五〇年三月，駐軍增加到最足夠的數量，第四十師整個陪隊來一個檢閱巡行，我相信這是英國在遠東一次最大的部隊集結。新界石崗是十分壯觀的，最高達到三千五百呎的大霧山的一連串山脈，三面圍着石崗。檢閱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來自英國的部隊，也有噶咯兵團的步操，以及裝甲車和大炮。總司令伊雲斯將軍一定會感覺驕傲，檢閱時我就有這種感覺。不過，微風幾乎把我的禮帽吹走時，曾經使我一度驚慌失措。

幾個月前伊雲斯將軍剛到任時，我曾經在巡視新增的部隊時與他見過面；他是一個典型的軍人，能使軍官及士兵對他有信心，而且信賴他；所以後來他獲得了三級的D. S. O. 勳章時，我一點也不覺驚奇。後來他做了三軍司令，我們接觸便多了，我覺得他是個令人欽佩的同事，他談吐清楚、儀態從容、思想敏捷。

大部份的軍用地都在新界，要佔用農民的土地。另一個導致麻煩的原因是軍隊的演習會使農田受到損失；然而，由於政務司及軍隊的緊密合作，在盡可能的情况之下，只要尚未開墾的土地才被徵用，做成破壞後則盡快十足地賠償。一般來說，村民是歡迎軍隊到這些地方來，這樣會為他們帶來收入及製造就業機會；他們沒有理由埋怨，而且也沒有這樣做過。反之，軍方却受到不少損失，用來做防衛工事的波紋鐵片、木材及其他材料被人偷了。他們要修一條供吉甫車行駛直通邊境哨站的路時，有一堆新墳突然出現了；要拆去一個中國人的墳墓是件十分嚴重的事，需要給予很大的賠償。

我到部隊裏去的視察大部份都是非官式的，而且我時常在軍官飯廳用膳，這些飯廳很不錯。有一次我巡視了第七皇家裝甲兵團，他們讓我坐進一輛坦克車，我向着插在地上的木栓開炮，每次我發一炮時，便有一條木栓倒下；我後來對司令官開玩笑地說，一定有人藏在樹叢裏，當我每發一炮時，他使用繩把木栓拉下。在一個飯廳裏，我問一個年輕的士兵，生活過得怎樣時，他很不願意地說生活也還不錯，他唯一的抱怨是，那些鮭魚肉並沒有去骨！

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來了這麼多新增的軍隊做成了種種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住的問題。雖然部隊可以在房舍尚未建好之前暫時住在帳篷裏，但是仍然需要建造許多行政樓、醫院及其他的建築物。這樣又要收地了；在非戰爭時期，這是不得民心的措施。一般來說，收地也還算順利，僅發生了少許磨擦，這點要歸功於軍方及物業的業主了。收地是由政府執行；作為最後申訴的衛道，我要對其中一些案件下判決。

軍方唯一的錯誤和喇沙書院有關，他們需要一間大建築物做醫院；僅有兩間合適，一是喇沙書院，另一是Dominican Priory修道院，而兩處都是教會的建築物。決定徵用兩者之一時，我諮詢天主教主教應該要那一間才對，他不同意徵收，因此我自己決定了要喇沙書院。而教會人士因這個問題去函梵蒂岡，梵蒂岡便向英國政府抗議。不過這份抗議轉來給我時，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幸的是，軍方曾經許諾於某個日子前撤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們到時却辦不到，使一些人很不滿意，以至有人在英國下議院提出質詢。

另一個我要提的問題雖然並不重要，不過却也相當有趣，那是有關軍隊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政府盡量為這些兒童提供適當的官立學校裏的學位，不過軍部却要另外設立自己的教育學位才夠用。我問教育司有關這些學校的情況時，他回答說：「前天我正橫過遮打道時，看到一個大約八歲的金髮女孩也要過馬路，我正想幫她過馬路時，她用那對深藍色的眼睛看着我說：『你想做什麼？你這多管閒事的老傢伙！』」因此，教育司認為這些給英童上學的學校並辦得不好；那是早期的情況，後來成爲一流的學校了。

軍隊的福利也是我們所關注的事。軍官方面沒有什麼困難，因爲他們比較上容易接觸到同類，歐籍的或是講英語的中國人都有。有問題的是下級士兵，那些年輕的士兵離家數千哩來到這塊異地，開始時居住條件差劣，娛樂設施又不足夠。在這方面，香港那互助精神的特點便起到了作用，一個名爲「部隊文娛委員會」便由私人組成，成員包括歐籍及中國人。在獲得政府撥款資助之下，港、九兩地各設立了兩個部隊享用的俱樂部。

部；除此之外，還為他們安排了音樂會、游泳野餐節目等。

我相信大概是在這段時間裏，港督、駐港三軍司令們和總司令們之間沉悶的官式互訪慣例被取消了。殖民地規例及軍部的手冊都指定這七個人之中有人第一次來到殖民地上任時必須與其他六人互作訪問。規例還詳盡說明了港督要穿著的衣服——全禮服或是熱帶用的制服，或者在接受訪問時要穿的晨早禮服等；這些拜訪需時十分鐘左右，之後讓訪客有足夠的時間返回總部時，港督便起程回訪。這些訪問十分講究儀式，包括開禮炮等，不過我們實在太忙而不能做這些事情了。需要時我是很贊成官式儀節的，不過這類的互訪是不能再繼續的了。互訪的習慣取消之後，我會在新司令上任一、兩天內邀請他到督憲府吃飯，大家都覺得這樣做更好，而且更容易促進彼此的認識。嚴格來說，我觸犯了殖民地規例，事前應該先獲得殖民地部的同意才能這樣做。假如我向殖民地部提出，它無可避免地會先去諮詢海軍司令部、戰事部及空軍司令部，而很可能其中之一提出反對，以致小題大做。

在香港的內部方面，政府也採取了措施，防範襲擊。志願部隊得到重組，這個問題其實經過了數年的研究；為了替代過往海、陸、空的部隊各自獨立及沒有統籌的情況，特定將它們重組成爲一支香港的防衛部隊，由三個不同的部隊組成。一九五〇年，這支防衛部隊獲得了「皇家」名銜，表示承認它們在一九四一年時在抵抗日本人的戰役中表現超著。這三支志願部隊由一名志願的陸軍司令率領，這點曾經引起一些不滿，那是與正規的海軍及空軍被撥歸三軍總司令旗下的情況一樣。這種不滿是來自軍隊高層的人員，並非來自陸軍及皇家空軍。我一

直都知道，陸軍及皇家空軍都願意與另外兩個軍種合作，而海軍只希望另外的兩個軍種跟它合作。然而，志願軍團的總指揮官Colonel Ride ——亦即是當時香港大學的校長——對這些不滿一點也不在乎。他身兼的兩種職位雖然是很不對稱，不過他在兩方面都管理得很好。

強制的服務限於每年的一定時期，入伍的包括英籍及華籍人士，被徵調的會編入防衛部隊、輔警或者民安隊的各個部門。後者之所以被稱為民安服務而不是防衛服務，意思是他們也會用於平時發生災難的時候，例如大火、水災等，他們的服務在這些時候是十分重要的。他們的領袖是查理斯·特利，他初到香港時在警隊裏做警察，後來轉而從商，退休後決定留在殖民地。政府還採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包括建造防空洞、重要建築物的護牆、空襲警報系統、重要物資的儲藏庫等。政府採取這些措施時不想引起市民驚慌，以為隨時會受到襲擊，不過他們對這些防衛措施都處之泰然。

儲存糧食涉及龐大的費用，尤其是儲存容易損毀和易腐爛的物品如米及大豆，另外還要在儲藏商品未變壞之前銷出、購買新的商品補充，整個過程會做成損失。不過我們只能把這種損失當作保險費；由於冷藏設備不足，肉類成為十分頭痛的問題，要建造足夠的設備則需時太久，而且費用也十分昂貴。最後的解決辦法是用咸魚，它含有蛋白質，而且中國人都喜歡這種食品。一位耶穌會神父創造了一種方法可以使魚肉長久保持不變；耶穌會的神父們在其他方面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位在戰後還做過署理農業署長，一直到我們找到了合適的人為止；另一位則改良了農田的施肥方法；還有一位是青年工作的領袖

，專職於這方面的工作。在藝術方面，其中一位神父將中國戲劇改用英語演出。

顛覆

即如我們所預料的一樣，國民黨的戰敗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導致殖民地上華籍顛覆份子反英的政治活動大大的增加了；他們以為怎樣做都可以，以為香港政府恐怕開罪了北京而不敢對他們怎樣，他們這樣做是錯了。通過的法例禁止殖民地的任何社會組織與外間發生聯繫，除非他們獲得行政局的允許，而那些組織真有這樣需要的話是會獲得批准的。迄今為止，有一定數量的社團和外間有聯繫，使香港受到損害。最嚴重的煽動份子則被遞解出境。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將不受歡迎的外人遞解出境；而在香港方面，一貫的做法是將華籍的外來人在犯嚴重罪案復滿刑期之後遞解出境，^{②1}禁令的期限是視乎刑期及犯罪的性質。另外，在法庭幾乎完全無法定罪的歹徒也會被遞解出境；這些歹徒都是秘密三合會的組織，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他們在中國內地活動，又在有大量中國人的社會裏活動。我相信現在的嚴峻及有效率的中國政府已經將他們完全清除了，不過他們仍然活躍於香港及新加坡等地。也在遞解出境之行列的是政治煽動者，行政局就是發出遞解令的權力機構。除了在最緊急的情況之外，行政局只會在深入調查之後才發出遞解令的。有關的人士會獲得機會去辯護，譬如他可以表示清白或者表示遞解出境會對他或者他的家庭做成過份的困難。假如他的申訴獲得接受的話，他便不會被解出境的。

政府與顛覆份子真正的對抗起來是為了電車公司一次罷工；這次罷工開始於一九四九年聖誕日。雖然表面看來這僅是一

項勞資糾紛而政府的勞工署在協助調解之外是不應該干預的，但是這個糾紛是有政治動機的。這次罷工一直拖了幾個星期，直至工人懷疑被他們的領袖所欺騙了；這樣做成了工會內部的鬥爭。那些領袖也觸犯了關於嚴重妨礙治安的條例而經過簡單的程序被遞解出境。電車公司合理的建議被接納了，罷工也告失敗。然而這並不是整個事件的結局，被遞解出境的領袖去到廣州後獲得中國當局的盛大接待，還發表了演說指責香港政府。但在接待完了之後，他們便被解散了，他們已經失去了在香港的工作，也不能返回香港和妻子及家人團聚。電車罷工行動及其後果足可給予可能製造麻煩的人做借鏡；這可以顯示到政府在香港是有全權的。同樣重要的是廣州當局對罷工領袖不聞不問的情形使到在香港的人相信新政權下的中國並不是一個他們所相信的工人的天堂，這個沉痛的事實是不需我們加以宣揚而已為人們所知道。

在香港的共黨報紙愈來愈傾向於成為謾罵攻擊的政府^{②②}。許多人——華籍的及非華籍的都有——奇怪為什麼我們不把這些報紙封掉，而且對我們的容忍表示驚異。我們的躊躇是不是懦弱的表現呢？我們怕嗎？不，我們不怕的，不過自由世界所維護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言論自由，以及報刊自由。我們情願依賴司法的程序而不願以行政的行動來鎮壓。再者，我們不願冒控訴失敗的危險，因為要使煽動性誹謗罪成立，那犯法的行為必須是明目張膽般才行。最後其中兩張報紙因超越了報導界限而被起訴及罰款，而其中一張被判罰停刊六個月^{②③}。自此之後，那是在香港的共黨報章比較小心從事了。

邊界事件

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前，中國與香港當局大體上保持正常友好的關係；邊界亦沒有設置障礙，中國人可以自由來往。共黨的力量到達了邊界之後，所有這些措施都為他們所停止了，上游的河運交通中斷了；而他們也阻止、或者是企圖阻止人們逃走來香港；我們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才開始限制內地的人來香港。這樣做並非為了防止共黨滲透，而是難民實在太多了^{②4}。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邊界全長約二十二哩，極東面的界綫是在沙頭角村的一條街道中間；這裏的情況十分古怪，但安排還算可以。共黨的守衛和香港的警察都能辨識村民的面孔，不過間中中國邊防守衛也會防止他們自由進出禁區。快要臨盆的孕婦有時也由華界進入英界的小型診所，產下嬰兒後便帶同孩子返回中方那邊，這些孩子應該可以在香港做出生登記而成為英籍居民的。

由沙頭角西行，邊界穿過一個山谷和一條約六哩長的小河，直至深圳河為止，這段邊界全長十六哩。由沙頭角邊界開始的頭四哩山谷險峻，風景美麗，在乾燥的冬季裏，山上的草是淡銅色的，春、夏兩季所見的都是些青翠的樹木。野牡丹和百合花盛開時是最可愛的時刻。山谷過後是一幅小平地，走過平地便是一羣山脈，再過一些是一幅廣闊的平原，靠深灣那邊的深圳河口是個沼澤地方。由英界沙頭角起有一條路沿着山谷而建，穿過平地後便連接另一條路，由那裏跑約一哩半便看到一度橋，名叫文錦渡。再跑一哩便是羅湖，這裏設有由行人和火車共用的橋可以通往中國。華界的深圳市是邊防軍的總部，它離文錦渡大約半哩和羅湖一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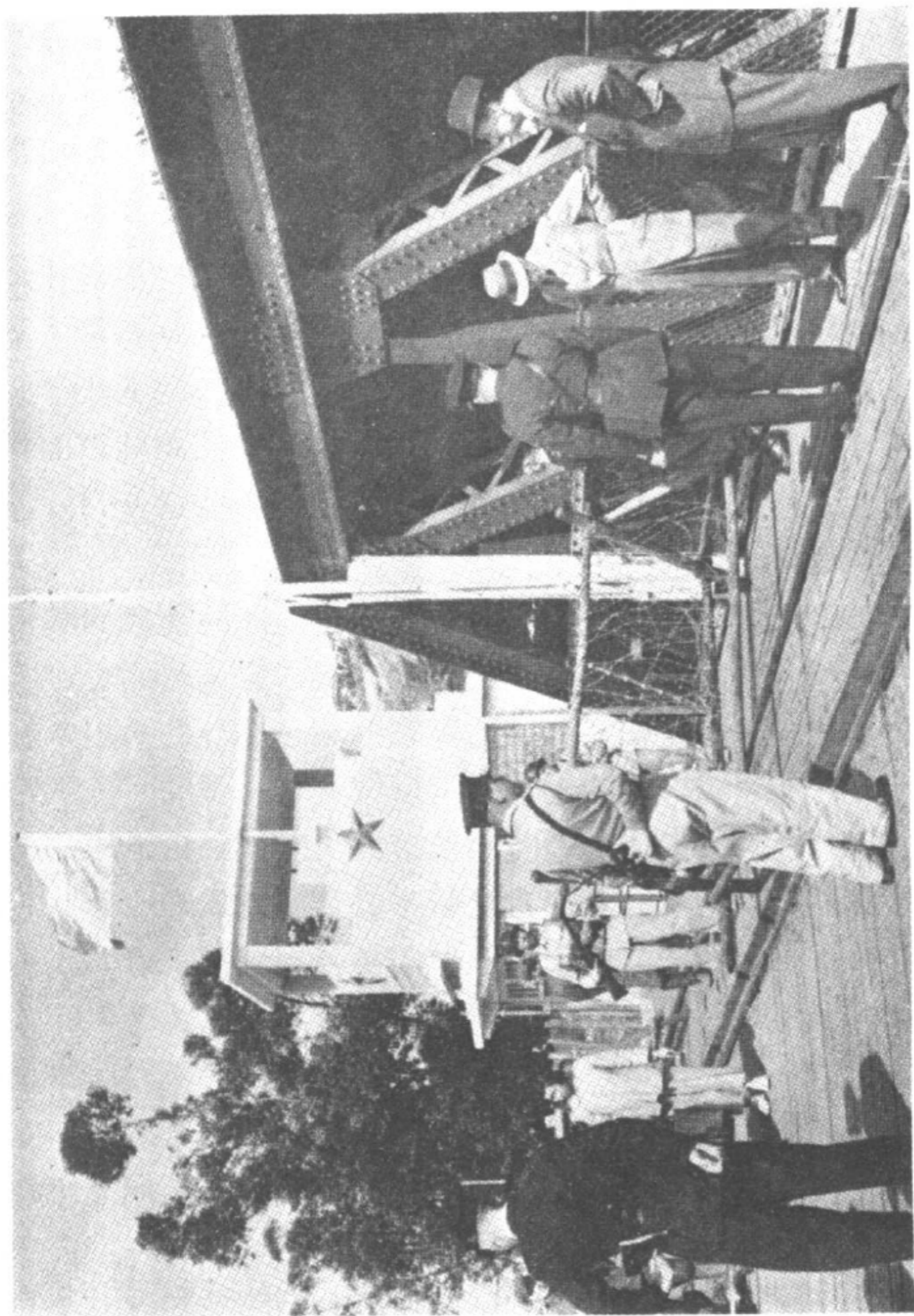
沙頭角和深圳河之間的邊區和沙頭角一樣——有些英、華

兩界的農民，在對方的邊界內，擁有田地。這段邊界築有鐵絲網，閘門每天定時開放讓農民來往作業。在山上具有戰略性的地方都置有警崗，監視全區；軍隊的警崗則設在山後。

早年共黨在羅湖及文錦渡架起了播音器謾罵港英，在人來人往的時候更變本加厲。但是在管制最嚴厲的時候，這裏仍有人來往兩地的。橋頭的兩邊設有鐵藜蒺。雙方的共同邊界設在河的北岸華界的地方，這些障礙物隨時可以移動讓人和火車通過。雙方的守衛站在彼此的邊界內警衛，距離僅有數碼而已。他們從來很少交談，不過有時共軍會對我們的華籍警員說：「我們識得你和知道你家人住的地方，你很不幸了，收回香港後，再來對付你。」我們的人一點也不以為意，我要向他們的勇敢致敬。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時發生事端是無可避免的。共軍會向偷渡來香港的人開槍。有一天晚上，他們槍傷了一個已成功地逃抵英界的男人，那個地方，由於地勢的關係，邊界障礙是設在真正的界綫後數碼的。那些華界的守衛，衝過英界把那受傷的可憐傢伙拖回去。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方的警察當時沒有人在那個地方。但情景却被其中的一個警崗的人看見，我們只能一笑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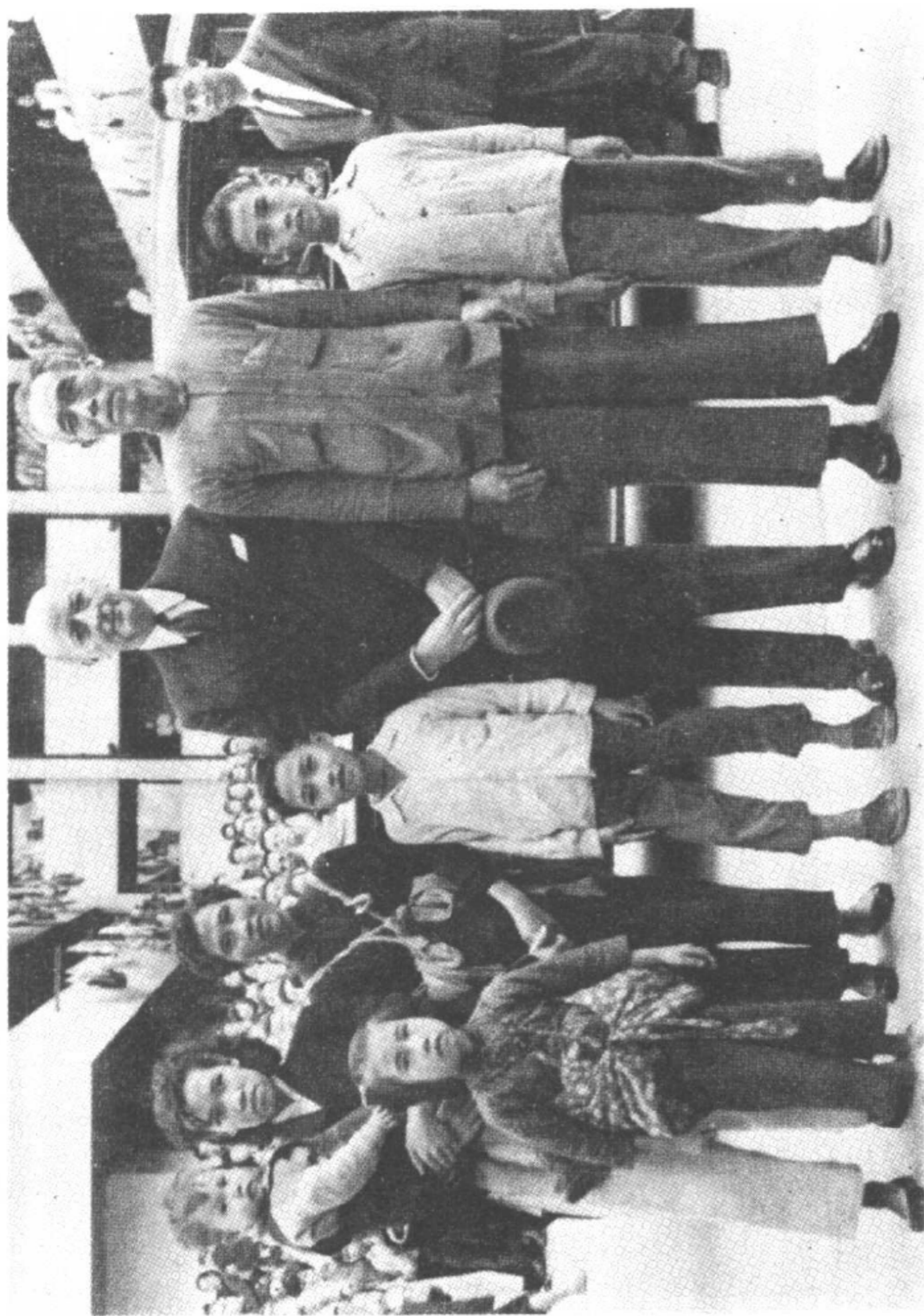
另有一次，一隊英軍警員陪同巡邏，被一批共軍截停和趕回去，這些英軍是由一處沒有設置障礙的地方跑來英界並停留一整天。數天後，由新加坡來的總司令途經香港，視察邊界時却被那一羣共軍以輕機關槍威嚇他。我們實在是不能容忍他們侵略土地，假如我們置若罔聞，他們便會在蠶食我們其他的邊



作者（右二）陪同希臘·丹麥親王（最右者）參觀羅湖邊界。

區；三軍司令、警務署長和我一同商討應付之策，將軍認為如果用武力將闖入者趕出去，他們必定反抗。要是不反抗，他們回去後也可能被槍決的。因此我們決定由負責禁區的警員，透過中間人將一張便條送交華界的守衛負責人，告訴那些強闖者可能不知道那些地方是屬於英方範圍，但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再犯。那封信被退回來，也沒有答覆，不過它是被拆開過的。而此後那些共軍再沒有在那些地方出現過。而我政府亦盡速地在這個地點設置了邊界障礙，此工程由工務局一名華籍管工監督，動工時有一羣共軍把他責罵了一頓。而他則在地上吐了一啖口水後便不再理會他們。我們都為這一事件能圓滿結束而鬆一口氣。倫敦方面也應該感到高興，因為他們可能會多打一場仗。

我不時都會到邊區視察，因為我關心地區的新發展和可向邊區的人表示，我是關心他們的。不過我亦會適可而止，因為重要人物到邊區視察會為那裏的警察帶來了額外的負擔。我覺得離開辦公桌到鄉村幾個小時是可以使身心鬆弛的。我通常都會在邊區的警局用午膳，那時刻是令人快樂和無拘無束的——我喜歡警察作伴：可能因為我是個奉公守法的人吧！每次我到羅湖的橋頭，共軍都給我拍照，他們拍時好像不大好意思的樣子。我不認為他們知道我是誰，因為我衣着和常人無異，而且也沒有很多隨員。拍攝巡視的人只不過是他們的例行公事而已！因為由於禁區許可信是很少發給的，能到來視察的人必定是有地位的人。後來我們改用定期視察的方法，並帶同來港採訪的新聞界及其他人等前去，雖然羅湖及其他真正邊界地區並不包括視察的範圍內，我們還可以從一些有利的地點看看華界，雖然用望遠鏡可以看到那裏的事物，但是我們不想再冒險以防再有事故發生。



作者與前港督府僱員、及其家人合攝於一徙置區。

這點可以舉例說明一下，當那次根德公爵到邊界視察時，他由警務署長陪同前往。在設置障礙的地方，他舉起相機對着華界的守衛拍起照來，那些守衛舉起手槍瞄着他，上了槍膛。在警務署長的要求下，公爵把相機收起來。假如真的發生了事故的話，警務署長和我都要另謀高就了！

另一宗較根德公爵事件更為嚴重的事是，我們邊區的其中一名警察誤闖華界。事情是這樣的：一般只是貨運列車才使用羅湖橋，英方的火車頭會被推過華界，或者把貨運的車卡由華界拖過來英界。其中有一次，我方一名警察被人用槍指着背部押走了。我相信他是在火車轉運的工作時誤闖進了華界。假若我們不能把人要回的話，便會影響警察的士氣。中國當局和我們沒有正常的接觸，循正常途徑要求釋放該人是不會成功的，可是倘若嘗試去搶救的話，便會造成極端嚴重的後果。幸好我們有一位能幹和精明的警務署長。他與廣州方面有些聯繫，由他們辦這事實是最好不過，結果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人便釋放回來了。中國方面的其中一項要求是我們的探照燈不要射向他們的營房，因為這樣會影響士兵的睡眠。我們認為這是個細小的讓步而已。

人所共知，香港欠警務署長Duncan McIntosh 的情是十分巨大的。他在十六歲時服務皇家愛爾蘭警察隊，後來在蘇格蘭警隊服役一段時間，便被調派新加坡，戰時他囚禁於集中營內，一九四六年來香港出任警務署長。他這人頗有威儀，警隊上下都尊敬他。在討論和辯論時，他是個一流的戰術運用者，知道怎樣去令人信服自己的意見，也知道何時讓步，結果是他通常都可以隨心所欲的。這些長處，加上自信心，使政府內一

些同事頗爲不安，我肯定他也知道這種情況。他那友善的笑聲會令人難以抵抗，尤其是在有人想要智勝他的時候。不過在需要時，他可以很坦率和敢言的。除了是一位卓越的警務署長外，他也有能力處理一些十分敏感的情況，他曾屢次在緊急的時刻協助解決問題。他完全不懂廣東話——雖然一般的想法是，一個人假如不懂得當地的語言是不可能把他的工作做得好的。我盡力推薦把爵士勳銜頒授給他，不過沒有成功。我認爲他沒有得到應得的慷慨待遇。

難民

難民問題並不是香港歷史的新事物。無論何時只要華南地區發生內戰或同樣的事情（即如在三十年代經常發生的那些動亂一樣），難民便會從鄰近的省份湧入香港；接受到親友或慈善團體的照顧，政府並沒有供應他們住宿或膳食，因爲它不想鼓勵更多的中國人從內地跑來香港找免費食宿。事實上他們每次都在事件平息後便返回家鄉，唯一例外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侵略華南地區，那次難民抵步後便獲得政府的照料，因爲他們是不會返回內地的了。日本人佔領香港後便強迫他們返回內地去！

在英國人重回香港後，數以千計的中國人又湧入這個殖民地。他們有些在戰前曾經在這裏住過，大部份則是新來找尋工作的，他們都不是難民。不過在他們來以前香港的房屋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前面說過，戰後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住宅房屋是不適宜居住的。那些不能擠進貧民區的人便在被炸毀的地方自建簡陋的木屋或者在山邊建木屋。由於工作關係他們不能跑到鄉村去居住。「難民」並不是一般通用的名詞，「木屋居民

」則較爲通用，不過不是所有的難民都是木屋居民，反之亦然。

在正常發展和中共沒有取得政權的話，便不會有難民問題，同時假以時日房屋的供應是會足夠的。政府並已草擬廉租屋邨計劃替代木屋區，不過隨着中共由北而南，席捲中國，難民也就跟着湧入香港。

一般對難民的概念是一羣一羣無依的人，他們逃離自己的國家，住在像破爛的兵營般的營帳，除了在極貧困中生活之外便沒有其它事情可做。這情形並不在香港發生。香港政府得知這些難民打算在港作永久居停後，便把照顧他們納爲政策的一部份。由於他們的人數高達一百萬，佔當時人口三份之一，可以想像要使人人居有其屋，是需要多年的時間。

大部份的難民都是十分貧窮的，他們隻身逃離家園，他們需要金錢，他們必須工作換取金錢。雖然他們可以到難民救濟中心取免費的食品，但是他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和過獨立的生活。有一技之長的人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不過難民中很少是技術工人，他們能夠找到散工算是幸運的了。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過活的，不過他們確實做到了。居所是他們所需要第二件必須品。數以萬計的難民睡在街上，小心地防守着這個對他們及家人來說的家。很多爲自己做了屋子——假如一間僅有數平方呎，用火水罐拆開的鐵皮或木板砌成的建築物可以稱爲屋子的話。數以百計這類的房子堆在一起，屋與屋之間並沒有半點空隙。許多木屋區的人口與英國大市鎮的人口不遑多讓，從遠處看去，那些木屋區，尤其是在山邊上建的細小建築物堆積在一起像圖畫一般。只要到那裏一看便失去了這種雅緻——恐

怖的情形便一覽無遺了。中國人是好潔的民族，不過要是沒有衛生設施，而且水是要由老遠的地方，有時由污染了的溪澗運來的話，還有什麼辦法呢？那些難民唯一引以為慰的是有了自己的居所。我很欣賞他們面對惡劣環境所抱的樂觀態度！

起初，政府沒有為他們做過什麼事，因為我們估計錯誤，以為當中國新政權穩固，而一切恢復正常後，他們便會返回故里。與此同時，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我們實施限制阻止更多的人湧入香港；違反了一貫的政策。我們不希望做得太不人道，首先我們要照顧原居民，不能讓他們被擠到海裏去，或讓他們冒患上流行病的危險。慢慢地我們了解這些人是前來定居的。要是可能的話，把他們遣返中國也是殘忍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因為沒有國家願意收留他們。政府最初所採取的措施是臨時性的；鼓勵志願機構建造一些木造的小型建築物，包括街喉和設有救火通道，這種設計使擠迫的情形更壞，因為它使不少土地失去效用。雖然那些計劃已經到了差不多完成的階段，我們並沒有傾全力去做。

一九五三年的聖誕日，石硤尾發生了災難性的大火，有大概五萬人無家可歸。幸好只有三人因心臟病發而喪生。當務之急是辦好臨時的救援工作、膳食、衣着和居住等等。政府有關的部門、街坊會、聖約翰救傷隊、紅十字會、童軍、軍部，以及其他機構都到場協助。然而石硤尾大火只不過是比較嚴重的火災而已。它標誌着政府處理難民問題的一個轉捩點。那時政府已經確認難民來港不是來港作短暫居停。雖然限制存在，難民仍從其他途徑，如澳門等地湧入香港，從澳門偷渡入境的，多用帆船循水路潛入，以致「屈蛇」事件應運而生，防不勝防

。偷渡客一旦進入港境便和其他的居民混在一起。對他們來說，居住是唯一的問題。但政府却要為他們提供醫療、教育等設施。

臨時房屋計劃之後的下一步是提供適當的住宅。速度是最為要緊的。最快的方法是建造一排排一層的屋宇，不過這樣做在土地缺乏的香港來說是十分浪費的。向高空發展則比較經濟，但需要較長的時間。結果我們找到了折衷的辦法，決定興建兩層的臨時屋邨。在火災後七個半星期之內，第一批這類的居屋便可以隨時入伙了，這種名為Bowring平房的屋子是因這個意見是由工務局長Bowring先生所提出而命名的，這項工程包括了清理災場，排去污水以及建設道路。這項工作如果沒有軍部的協助是辦不到的。進一步的工作是要為其他木屋區的居民提供合適的住宅。這是一個長久的計劃，非三數年不能完成。

香港政府並沒有一個部門來應付這樣龐大的新問題，需要成立一個新的部門，那就是徙置事務處，最重要還是找個合適的人來領導這個部門，他必須是位優秀的行政人員，一個熱心的實幹家才可以激勵下屬的士氣。Holmes 就是合適的人選了，他是第一任也是成功的徙置事務處長。

那些平房式的屋邨現時已經被七層高的徙置大廈替代了，不過它們曾經起過作用的。每個新的屋邨大廈可以容納二千人，間隔是每單位有一百二十平方呎，每五個成年人共處一室。雖然這些是低水準的建築物，但是與從前人們所棲身的那種擠迫、骯髒的環境則好得多了。它們不易引起火警和比較清潔，居民喜歡這種住宅可以從居民的笑臉看出他們是如何喜歡這種

住宅，而且沒有依時交租的住戶是微乎其微的。每一個單位的租金是四先零六便士一個星期，地下是店舖，也是從前木屋居民所開設的。大廈的平頂有上蓋的部份，用來做設備簡單的學校，或做青少年的會所，兩者都辦得很成功。這些大廈所組成的地區叫做徙置區，每區可多至六萬人。這樣問題便來了，居民不能像從前穴居人一樣自困於斗室，我們必須為他們提供學校、診所、社區中心、空地，以及其他環境的設施，凡此種種我們都要從經驗中學習。

清拆木屋徙置居民漸漸地成爲了一項經常的行動：選擇要清拆的地區、調查及登記那裏的居民、建造新的徙置大廈來安置他們、剷平已搬空了的房舍，以使用來建造另一座徙置大廈來收容其他地區的木屋居民。徙置事務處的職員們需要十分辛勞地工作，不過他們一點也不介懷，他們結合了實際的效率和同情心來工作。這個徙置程序仍在進展之中。住進了徙置區的前木屋居民和其他人一樣，過著奉公守法的生活；反之在過去或在現時的木屋區內都時常發生火警、疾病、罪行等問題。現時這些地區的情況已逐漸受到了控制，雖然生活環境還是極待改善，但在其他方面的確進步多了。此外，木屋區的居民還可以期待有一天會輪到他們搬進徙置大廈居住的②⑤。

本地、外來的、宗教及非宗教的志願團體，它們的工作令人驚嘆。他們提供款項為難民建造木屋，也為他們開辦學校、提供免費膳食、診所，以及開辦青少年會所。他們在參與所有各種各類的救援工作。但是那些繁重的問題則由政府承擔。

在立法局一致通過撥款救濟石硤尾災民時，也贊成政府對

徙置木屋居民的新政策。這項政策所費不菲，因為每三個人之中便有一人需要徙置；以一個殖民地的屬土能擔負這項工作是件十分超著的事。殖民地大約三分之一的開支，直接和間接的都和難民有關。在這方面，香港每人平均收入僅是英國的五分之一，這種比例是毫不重要的，因為維持及照料難民的責任並非全是香港的責任，它是整個自由世界的責任。我曾經懇求、發電訊和寫信，請求英國政府給予經濟上的幫助，也曾經直接向一些官員和部長們提出，但這些努力全部白費，我們一點援助也得不到。

雖然英國政府不會長期地資助難民計劃，但是它在石硤尾大火後曾撥過一筆可觀的款項給我們。要是我沒有向他們發出緊急的呼籲，他們是否會這樣做呢？不得而知了。美國總領使曾到我的辦公室說，他的政府願意捐出一筆款項，我欣然接受並十分感激他們。一個外國政府竟是第一個捐出款項者是不大好看的，而且北京也可能會捐出一大筆的救濟金。因此我發電報給殖民部，告訴實況，他們覆電說願意撥出款項時，我才鬆了一口氣。

共黨要利用這情況來在難民中製造麻煩也並不容易，因為這些人都是因逃避共產主義而來的，對中國政府也不喜歡。可是共黨是善於利用每一個可能或不可能的情況，每當一場火在木屋區內發生之後，災民苦不堪言時，他們便會指責香港當局對中國在香港的人民漠不關心，他們不理會這些居民寧願在香港風餐露宿而不願返回故里的事實。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場大火燒毀了東頭村木屋，造成一萬人無家可歸；食物和衣服等緊急的救援物資已經派發給災民，不過他們要搬到其他的木屋

區居住，因為那時徙置政策仍未施行。這樣便產生了極度不滿和怨懟，這是共產黨夢寐以求的事。他們的報刊大力攻擊政府，不過最危險的事情是他們有意派遣一個由廣州來的「慰問團」，其後果是很難預料的。到埗後，它將會藉演說猛烈攻擊「帝國主義者」，另外「祖國」還會答允提供援助；這些事情都會發生在香港的。假如慰問團裏有人受傷或被捕的話，便會產生暴動而造成火上加油的情況。

共黨方面一直加強這項運動直至問題到了要解決的地步，政府堅決拒絕慰問團進入香港，廣州接受了這個決定；不過很明顯，這個團在粵港兩地的聯絡人並沒有默契，因為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那天，香港的籌備者在對九龍的一羣羣衆說，慰問團是會來的，而香港的歡迎隊伍代表會到邊境迎接他們。那些人到達邊境前，被警察截回了。與此同時，正在等待的羣衆開始騷動了，當代表接不到慰問團而截回時，暴動便開始了。它蔓延迅速，幸好嘍囉兵和警察及時把情況控制下來，有一名騷亂份子因傷致死。而左派報章則繼續抨擊政府，不過它們不是全力出擊，可能是不想重蹈慰問團失敗的覆轍吧！

其他問題

其他的困難也因中共當政和它的敵意態度而接踵而來了。例如瘋人及痲瘋病人與監管的問題。在共黨管治之前，我們將痲瘋病患者送往一所由天主教教會在廣東石龍開辦的痲瘋病院，費用則由香港政府支付。精神病患者也會被送至一間政府開設在廣州的病院，費用也是由香港政府支付。香港精神病院的設備並不足夠容納香港的英籍華人及非華籍人士，後者通常是被送回自己的家鄉料理的。中共政權卻不願從香港接回這兩類病

人。在精神病方面，我們已經有了一間規模簡單的精神病院，由資深的葉醫生打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一間更好的精神病院來代替它，新院需要大肆擴充，最後終於建成開業，那能幹的醫務署長，K. C. Yeo醫生建議這間醫院以我的名字來命名。

我決絕接受這個榮譽，直至現時我還不知道他是否想開我的說笑。

至於痲瘋的問題，我們並沒有經驗自辦瘋人院，不過一些宗教及半宗教團體在世界各地都有過這種經驗。我們決定最好由一間這類的團體來做這件事。終於一個醫治痲瘋病的團體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他們也做得很出色。不過在找適合地點時卻困難重重。我們初時認為，最好的地方是在遠離人口中心的新界地區。新界政務司及主辦機構的費爾沙醫生在新界到處找尋地方，不過都不成功，各村的丈老及村民都說他們會殺了那些痲瘋病人。費爾沙醫生在無可奈何之下，同意去看看那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一個小島。他擔心那小島並沒有足夠的水源來供應病院（香港一年內有六個月是天旱的）。我們在島上的溪澗做了些實驗；真感謝上帝，水源證實是足夠的，因此痲瘋病院便在喜靈洲成立了，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獲得治療幸福的島」。志願的人員，包括皇家工程人員也來幫忙，一個有魄力的當地社團也成立來參予其事。想像中痲瘋病者在社會上受到排斥後，會感到孤獨及沮喪的；事實卻相反，那裏的病人都很樂觀，這點要歸功於那裏的工作人員。

大陸的醫生及教育發展

難民中有幾百人具有醫生資格，他們也是一個問題。他們在大陸所獲得的資格在香港是不獲承認的；雖然政府仍然可以

僱用他們，不過他們卻不可以私人執業。由於香港缺乏私人執業醫生，我們不僱用這些人便會顯得荒謬。但讓他們掛牌行醫便需要修改法例，可是本地的醫學界卻極力反對這樣做。我在香港及其他地區的工作使我認識到，各地的醫學界都為私利而主張限制執業。不過，他們也有點道理，因為中國內地的醫學院水平參差不齊。經過多次的商討之後，我們在英國醫藥當局協助之下，設計了一項簡單的考試，甄選有水準的內地醫生，讓他們掛牌行醫。這些有中國資格的醫生本來是可以通過香港的正常考試來獲得承認的，不過以他們那樣的年紀，尤其是對那些英文程度有限的來說，要考這樣的試是超乎他們的能力的。

在教育方面，中共當政之後，華籍學生因英文程度未能進入香港大學也造成問題。在這之前，這類學生都會返回內地的大學繼續攻讀，他們現在很少這樣做了，他們也不願到台灣去。為了適應這個需求，不少用中文教學的私人專上學院也相繼地成立了^{②6}。這些學校的質素參差，它們都希望有「大學」這個魔術般的名銜，以及可以頒授學位的資格；不過香港大學則極力維持自己是唯一有此資格的學府。另一方面，香港是需要有一間用中文教學，有水準的大學，而且共黨的資金會到香港來成立一所可與香港大學分庭抗禮的大學的危險是存在的。於是首先由約翰·凱瑟克（他是中國貿易的怡和公司的主管人）領導的委員會展開工作，反覆地討論了問題。在我離開時，香港大學，政府及那些專上學院之間還未獲得最後協議。後來在殖民地部的教育官，英國的大學當局及其他人的協助之下便立了另一所大學^{②7}。

中國民航，「Yung Hao」號及其他

有時中國政府會藉一些不滿意的事來向香港政府發難，不過從中國民航及它旗下的一批飛機事件來看，他們的投訴是有根有據的。中國民航公司在中國就好像英國航空公司在英國的地位一樣，而中央空運公司也是一間中國的公司。這兩間公司都有大量的美國人的股份，而且在行政的高層裏還有美國人呢！事件所涉及的飛機大概有七十架之多。當共黨在中國取得了政權時，這些飛機來了香港。我記得很清楚，而且還向兩位坐那些民航機來香港的泛美航空公司副總裁說，這些飛機應該送到台灣的，因為很可能英國政府給予北京政權實際的承認，假如這樣的話，當中國政府提出要回這些飛機時，（他們也很可能是會這樣做的），我們便要將這批飛機交給他們了。那兩位副總裁並不同意。他們說，台灣的民用機場是容納不了這些飛機的——這完全是廢話，因為後來這些飛機就是到了那裏；他們還說，這樣做的話北京政府也會不高興，因為泛美希望盡早開始再把航空服務伸展到中國。

幾個月之後，英國政府承認了中國的新政府，它跟着便要求取回那批飛機。我們的回覆是，由於有兩個團體提出同樣的要求，對該擁有這批飛機的問題應該在法庭上解決。於是訴頌行動便開始了，雙方都請了最好的律師來處理這案子。此外，美國人還派來了自己的律師，其中最有名氣的是當奴雲將軍，他在戰時是戰略部的主管，這部門相等於英國的秘密行動部，它的主要工作是破壞敵人的工作。他怒氣沖沖地跑到我的辦公室，差點兒拍枱對我說話，堅持要立即把所有的飛機交了給他，因為，假如不是美國的話，英國在大戰時已經戰敗了。此外，他還說，假如我不依他的吩咐去做的話，他會到倫敦為我製造許多麻煩。我一點也不為所懼。這個問題必定要循法律途徑來

解決。毫無疑問地，他在其他的事情也用這套辦法，而且很成功，但是我和律政司是不吃他這一套的。

我記不清楚這件案件——或該該說是多宗的案件的詳情，因為其中牽涉了多次的上訴。最後法律站在中國政府那面的，可是美國的利益團體施以壓力迫使美國，國務院便插手這件事，並向倫敦表示，無論如何這些飛機是不能交給中國的。英國政府便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一方面是法律的問題，而英國一直以來都尊重法治的；不過另一方面，這樣做會觸怒華盛頓政府。英國人一慣都是實際的，假如他們幹了一件極可能蒙羞的事的話，他們便會用法律的外衣把它裝飾起來。因此樞密院下了一道法令，推翻了自己所維護的法規，實際上是做了一條新的法規，最終是把那些飛機交給了美國人。我作為一個殖民地屬土的港督還有甚麼權可以反對呢？而且假如我真的這樣做，會有些甚麼好處呢？無論如何，我感到很不高興！總括來說，這件事實在太差勁了！

另外一次事件與那些飛機事件相似的是一艘叫Yung Hao號的運油船。這艘船在戰時是在台灣對開海面被擊沉的，後來被打撈起來——它那時已成了中國政府的財產，泊在九龍船塢修理。有一天（那是正當韓戰期間）美國總領事來找我，他說，國務院很希望中國政府拿不到那條船，因為它會在戰事中對中國政府做成幫助的。我對他說我會調查這事然後再回覆它。調查的結果是，這艘船是中國政府的財產，不過就算是修好後也很可能沒有多大用處，而且我懷疑我是否有權拘押這艘船。再一次，國務院向英國政府施壓力，而我與殖民地部在信件上的爭辯便跟着發生了。我指出，假如我要拘押這艘船的話，船

上的共黨水手是會用武力反抗的，這樣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的，而且北京也會向殖民地採取報復的行動。可是倫敦堅持它的做法；很明顯，它是怕美國會對英國會採取可能的行動，尤甚於害怕中國可能會殖民地取探的報復行動。

因此我們及時拘押了那艘船。在這事件方面，我對法律上所採的行動比我對那批飛機的比較有信心。我較為擔憂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的報復行動，尤其是假如在接收該船時會發生流血的事件的話。可幸的是並沒有流血事件。大批載着鋼盔的警察消弭了可能的抵抗事故了。至於報復方面，中國政府接管了在中國的蜆殼公司來報復，這却不是我們的問題了。那天的早上我看見那艘船被拖離海港去新加坡時，我鬆了一口大氣；據我的了解，那條船仍然留在新加坡，並已到了無可修補的地步。毫無疑問的，北京始終會有一天送給倫敦一張帳單追討損失這艘船的費用。在這個錯誤引導程序的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莫過於九龍倉了，因它被人欠下巨額的維修費用。

我們基本上違反了我們避免在不必要時不可向中國挑畔的原則。英國可能反駁說這是「必要的」，而且由於這是最高政策的指示，香港不能自決的，這項徵用行動也是需要的。

中國民航事件一直拖了三年，導致該航空公司的職員把自己封鎖在航空公司的物業裏而要用武力把他們驅走、還有其他類似令人不快的事件。Yung Hao號船的事件還好，能在短時間內便解決了，也沒有產生極大的不良後果。

在這兩件我剛提過的事件之中，中國是有理由不滿或憤怒

的，不過在其他的事件中，他們便沒有理由這樣做，而且有時候他們的態度是無可寬恕的！其中一項最令人憤怒的是發生在一九五三年的九月，那時一艘正在公海上執行正常的反走私巡邏任務的皇家巡邏艇，在毫無警告之下，受到岸上共方的炮火轟擊，釀成七死五傷。英國政府提出強烈的抗議，不過中國方面並沒有道歉，或者作出賠償。不到一年之後，一艘國泰航空公司的航機在來香港途中被擊落了，做成十人死亡。在這次事件中，中國則作出賠償。

在韓國的戰爭

當共產黨攻擊南韓的時候，我仍在倫敦渡假。我初時以為不出數天整件事件便會完結了，而錘子及鐮刀標記的旗幟則會在漢城及斧山的地方昇起來的^{②⑧}。不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了緊急會議，不過它除了通過一些不為侵略者理會的決議外，還能做些甚麼呢？幾月前我在東京問過麥克阿瑟將軍，為甚麼要把大部份的美軍撤走時，他回答說：因為南韓是無可防衛的。我確信全世界的人都會這麼想，而共產黨的人也肯定這樣想的，否則他們是不會發動攻擊的。不過我們這樣想時，却忘記了有杜魯門總統這樣一個有道德勇氣及決心的人存在。況且蘇聯也犯了一項技術性的錯誤——她杯葛了討論韓國情況的安全理事會特別會議。在蘇聯的缺席時，安理會要求會員國用武力來抵抗來自北韓的入侵。假如不是受共黨阻撓的話，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能作出的貢獻。沉重的負擔和犧牲主要是由美國負起的。然而，我在這裏所關注的不是那場戰爭的本身，或者是國際的情況，而是它對香港所造成的影響。

在戰爭初期，在中國還未派遣「志願軍」參戰，戰爭對香

港的影響是很微小的。香港方面只派了一個旅的兵力參戰，那些部隊曾經受過幾個月與韓國地形相似的戰爭訓練。他們是英國的正規部隊，而我們也因他們而產生一股驕傲的共鳴。雖然香港對北韓的輸出被政府禁止了，但出口是增加多於損失的，這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需求大增所致，香港的出口可謂到了興盛的情況；原因是香港是鄰近戰場的地區，便於交貨。

中國參加韓戰後令情況發生了基本的變化，美國政府對中、美的貿易實行了全面禁運，而這些貿易許多都是經香港轉口的。不久，聯合國實施了所有戰略及半戰略物資對中國的禁運。首先，美國當局把香港及澳門均列入黑名單，恐防這兩個漏洞不被堵塞的話，會使整項禁運失效。然而美國政府並不是意圖致香港及澳門於死地，不過它有時似乎却間接做到了！因此，他們開始實施一些措施，使禁運實施的同時，儘量不會做成損害，而且還可以讓它們獲得一些來自美國的必需品，只要那些貨品不是用來轉口到中國的。這是等於要實施一套管制辦法，使入口物品不會越境進入內地。

可是香港一貫以來是個自由商港，只有很少的緝私員，同時中港邊界雖然僅有二十二哩長，但却有二百五十哩不規則的海岸線，沿岸還有許多山洞供帆船裝載違禁品，只要能在數小時內避過我方緝私員便可以安全地進入中國海域了。走私的利潤十分可觀，那些華籍私梟的技倆是十分出色的。所以，我們雖然盡力而為，但是已盡了力，仍有大量禁運物資越境進入中國，不過數量並沒有那些指責者所說的那麼多。例如，麥克阿瑟將軍曾有一次在美國報章指責我們公開售賣汽油產品給中國，還說，消息是來自官方的。不過假如他有小心地看清楚那段

消息，他便會發覺到數字那一項是個零字，可是我們的澄清却沒有在報章上獲得刊登。那些調查我們物資控制的美國官員却處於窘境了。我相信他們是樂意幫忙的，不過稍有漏洞，他們便會在國內受到非議。漸漸我們也取得實際經驗，同時也投入更多的巡邏艇，聘用了更多的緝私人員，那個制度施行不錯，令美國政府也滿意。

香港出口到美國也受到限制，防止中國來源的貨品用香港的名義進入美國的市場；開始時的確有這種情形發生，漸漸政府建立了一個極其嚴厲的控制辦法，導致冗長的出口程序產生了。英國對這些入口的控制也嚴厲的，但還是比不上美國。最典型的例子是臘鴨。臘鴨是在香港製造，然後出口到美國；但製造臘鴨的鴨子是由中國運來的鴨蛋，在香港孵出後得來的。那麼這些鴨算是共產主義孕育下的蛋所變的鴨子，還是地道的英國鴨呢？這個問題在雙方經過很多次書信來往後才得到解決。條件是在孵蛋的時候要有一名督察在場，他要為剛孵出的小鴨在腳上烙上印，鴨子成長之後再另加記號，這樣才可以把鴨子宰掉，晒乾運到美國。誰還會說官僚們沒有幽默感呢！無論如何，我們算是勝了一仗。

至於有關聯合國的戰略性及半戰略性物資的禁運，應該留意的一點是，它與美國的情況不同，它不是雙邊貿易的禁運，而且應該注意的是，很少物資的來源地是香港，它們都是來自其他的國家，而管制是應該始自來源地的國家。我們不滿意的地方是，管制並不是從來源的國家開始。由於鬆弛及放任的關係，這些物資被運到了香港後，香港的貨主便試圖把它們運進中國了。假如成功的話，那麼香港，而不是貨物產源的國家，

便會受到譴責了，這是極不公平的。其實香港與澳門因禁運所蒙受的損失比任何國家，包括中國，還要大，這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一直以來香港是靠轉口貿易而生存的。它的面積小，而且沒有原料，但是它有一個位於南中國門口的優良港口，是個轉口商埠。一但這些貨物流通被截停的話，香港便變成了死埠。有某些數量的貿易是和中國市場無關係的，不過這個數量是很微小的。香港也有一些本地的工業，然而產值僅佔殖民地出口百分之十而已。

對華貿易是香港的生命線，而現時由於禁運，這些貿易大大縮減了，這情況發生的時候正是香港多了一百萬名難民之時。所以駐港的外國記者在電訊中預言這個殖民地即將面臨崩潰是毫不奇怪的。

不過這些記者沒有想到中國人的足智多謀和恢復信心的能力——他們轉向工業發展。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僅有的兩方面獲益，兩者都是因難民的情況而產生的。第一是資金，從中國大陸來的資本與難民數量一樣多。事實上，在太平洋戰爭剛結束之後，資金已經陸續進入香港了，主要是受中國內亂所影響的，因為香港的穩定對它們極具吸引力。同樣地，資金也從東南亞其他國家流入本港。在禁運之前，這些資金都被用於商業上的發展，由於現時在這方面已經沒有了出路，所以便轉向工業投資，其中有一大部份是向地產發展。另外我們也從難民中獲得技術知識，其中包括管理及工業技術，這些是來自由上海來的人士。上海在工業方面比香港及廣州更為先進。至於非技

術勞工方面，要是沒有難民的湧入的話，香港也是有夠的供應。政府及銀行界了解這個殖民地必須依靠工業的發展而生存，所以盡力去扶持這方面的工作。這樣做是成功的，漸漸地便有了發展，也在某個程度上恢復了香港的繁榮。

工業的發展恢復了香港的繁榮是可以從貿易數字之中看到的。現時來說，香港的工業產品佔這個殖民地的出口的四分之三，這是自力更生的一個顯著例子，也可以說是戰後成功的事例之一。這項超著的成就當然也帶來了困難，因為紡織品是佔最大的出口，而英國是最大的市場，這樣却對英國蘭開夏郡的紡織業帶來了壞的影響。當我還在香港時，蘭開夏郡的紡織業已經大聲地抗議了，而問題則在我離任後達到白熱化的階段。基本的問題是，香港的工人比之英國的更為勤力，而香港廠家比他們英國的行家更會利用設備去生產。

在禁運早期，一些禁運物資是無可避免地經香港運進了中國大陸，而美國人抨擊及批評這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的年青人在韓國戰死沙場。不過使情況弄得更壞的是，香港除了是最理想探聽消息的地方之外，它所在的地理位置還可以用來做反共活動，例如宣傳工作，間諜活動，甚至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活動，而美國人想利用這個殖民地來做這些工作是可能的。英國和美國同樣反對共產主義的，不過它却不相信「邊緣政策」或者無謂的挑釁那一套而已。故此英國反對渡過鴨綠江（那是麥克阿瑟強迫華盛頓做的）。英國政府的反對獲得華府的支持，觸怒了那位將軍，他唯有向英國的駐東京大使出氣，而那位大使在這事情上是完全無辜的。但他也同樣地詆毀香港。

麥克阿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這是一個將軍所應有的，阿倫·布魯克元帥曾經把他形容為大戰期間最偉大的司令；他吸引人的這種儀態更加為那像舞台般的姿態所加深了。在這情況之下，我覺得這是極權可使人腐化的一個例子。作為菲律賓軍隊的總司令官、太平洋盟軍最高總司令，以及後來在勝利後成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他這樣相繼地享受了無限的權力及威望。在那些年代裏，他不曾返回過自己的國家，那裏至低限度有總統一人的權力可以與他抗衡，減低他的超然地位。所以他便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是不足為奇的。

在美國人當中，不止麥克阿瑟一人認為一九五〇年一月英國承認北京是要保障它的商業利益，和避免了中國襲擊香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新的政權是實際上控制到整個中國的；這點却不為人們理會。作為英國的屬土，香港無論同意與否也要跟隨英國政府的政策。除了真真正正的華籍國民黨人士之外，在這個殖民地的每一個人人都同意這點。此外，香港有它的脆弱的地方，假如有任何一些反中國的挑釁行為是起源於香港的話，香港便會首當其衝受到中國的報復。前面談過，我們在香港的政策是既不討好，也不挑釁。所以，香港當局與美國總領事館及其他美國機構在意見上分歧的可能性是不算小的。我們不會冒險去做很多美國想做的事情。

比較上說我們的分歧不大，彼此之間從沒有磨擦是有賴於那些能幹的美國總領事；雖然他們需要按自己政府的指示辦事，不過他們也了解香港的複雜情況。我們只偶然抗議他們那些正在做或已做的事，不過這只是偶然才會發生。名義上總領事館是控制了所有美國政府的機構在這殖民地的工作，但實際

上的控制權通常是很少的，他很多時也不清楚那些機構正在做些甚麼事。事實上，初期有些美國機構是做得樂極忘形而過分的。

我相信美國總領事館在香港的人員總數較該國在世界其他各地任何一間領事館的人員還要多。北京一直以來都以這點作為宣傳的主題說：這點正證明香港是美帝國主義的基地，而英國僅是美國的走狗。該領事館的人員數目的確是十分多的，我們不止一次要求他們削減人員。不過我們應該記着，香港的總領事館是美國在遠東許許多多機構的地區總部，也包括消息發放的機構。他們需要大量的人手去翻譯來自中國的報紙及其他刊物，以及調查申請前往美國的中國人——他們的翻譯工作比我們的還要大。同樣一件工作一間英國領事館要聘請一名僱員去做的話，美國的便會聘請兩名，這點事實是不容忽視的。

一九四九年，也可能是一九五〇年吧，美國總領事館勸告美國婦孺離開香港時，我很不高興。當然，那是完全要由他自己去決定的事情，不過我認為他事先應該通知我，那麼我們可以預先發表一項令人安心的公報，譬如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一導人發問的問題，從而減少了對公眾的影響。我們事先沒有得到通知，對這事完全感到意外。可幸的是公眾的士氣並不曾動搖，而每個人，尤其是美國人，都覺得勸予婦孺離開這個做法是相當愚蠢的。

在美國講學

正如我說過，在美國，香港的名聲很壞，主因在於認為香港是走私到中國去的地方，再加上普遍地誤解了我們的情況和不

賞識我們的立場以及所做的工作。事實上沒有人喜歡受到朋友的苛待，也不喜歡美國國內針對香港形成的心理結癥使華盛頓當局產生了針對我們的偏見，結果爭取美國當局批准輸出香港工廠需用原料碰上了很大的困難。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們已收到在任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外交使節羅拔·史葛爵士——即繼烏爾科姆·麥克唐納之後出任駐新加坡的東南亞總專員——的信，內容要點在於說明他不論甚麼時候在美國演說時都被問及香港，因此他認為港督應該到美國去巡迴演講；我推搪說，到外國去巡迴演講不是殖民地總督的工作，總督的工作應該限制在提供有力的論証，讓大使和他的隨員去辯說，他們應該去辯說；不過我終於同意年底從倫敦回港時到美國去。

行程六週，到過十幾個城市，在每個城市演說兩次或以上，並且接受電台電視訪問，又跟挑選過的團體討論。我以前沒有這樣做過，這是新鮮的經驗，雖然吃力，卻是刺激和有趣。自始以後，在英美兩地我還繼續做了些演講；美國聽眾比英國的更為活躍，他們喜歡坦白的談話，不喜歡吱唔拖拉，而且樂意接受針對美國人那種陳辭濫調的批評。我最關心於營造殖民地的良好形象，以及清除假象，我以《香港——在東方的柏林》和《香港——自由的堡壘》等為題做了報告。

有多成功——就算只衡量題目涉及的有限範圍內的成果——我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有一兩次因為輕率的言論和英國政府發生磨擦——是的，我提出過一些輕率的言論。不過，我僅僅受到殖民地部的友善責備；而且在下議院提出質問時，該部還為我提出了體面的答辯。行程結束後我馬上從三藩市飛返香港。在美國要裝作和朋友要好，巡迴演講肯定要這樣做。回到

香港坐上受尊敬的位置，充當“港督閣下”時，情形就很不相同了。

在美國常常向我提出的問題是：殖民地能夠有效地抵擋中國的軍事侵略嗎？問題提出的方式通常都意味着她沒有能力，提問者會引述日本人三週內吞沒香港一事來支持他們的觀點。我一如既往地指出我不同意他所包藏着的意見：今天的情況跟一九四一年時不相同，當時的敵人控制着海空領域，而今天的對手就不是這樣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比較起來，更多受訓過的軍隊駐在香港，像中國方面駐在邊區的部隊一旦發動突擊，軍團足以應付突擊，如果對方集結軍隊——顯示快要發動大規模的攻擊時——我們會及時知道並且從駐有大量可用的英兵的新加坡和馬來亞調來增援軍隊；最後，我會指出，儘管英美兩國的軍事同盟和防衛公約沒有把香港包括進去，不過，依我的看法，我肯定強大的第七艦隊，以及駐在台灣、菲律賓、克拉克基地和沖繩——後者距離廣州並不遠於到北韓去的距離——的龐大的美國空軍會支援香港，他們不僅是當了保衛英國殖民地，也是爲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在於阻止中國共產黨人伸向東南亞。我談到香港和馬來亞兩地可調用的軍隊有足夠的抵禦力量，並不是憑借我的想像力虛構出來，而是根據香港的英軍司令和新加坡三位總司令所提出的軍事評估報告。

回答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會維持多久時，我會說一九九七年是決定性的一年，因爲新界租約就在這一年屆滿，而我無法想像會有一個中國政府把租約延長，我也無法想像殖民地的剩餘部份——港島和九龍半島——繼續作爲可行的政治團體而存在；大量的食水供應就來自新界，而租借和割讓地區之間

的分界線又正好橫過啓德機場的新跑道，這些都說明了問題。從中國方面的觀點看，可以看出他們不大可能會在過渡期間發動攻擊；即使假定他們認為攻擊會成功，併吞了香港，他們所得到的不外乎是空殼。香港沒有天然資源，她甚至不能夠自給，而英國人在撤退之前肯定會破壞發電站、船塢和其他的設施；如果中國依據自己的利益同意等待到一九九七年，這到底不是很長的時間，而且可以預期英國會歸還完整無損的香港，這豈不是更好嗎？目前他們可以繼續供應殖民地居民一半的糧食和其他的必需品，來賺取大量的外匯；我會提出統計數字——相信是正確的——指出除了芝加哥之外，香港所屠宰的豬隻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要多，而90%的豬隻要從中國運來。

讓我談談一件有趣的事情，作為英國巡迴演講的花絮報導，事情發生在芝加哥，不過，事發當時卻是不好受的。當時我們從車站乘坐出租車到旅館去，皮箱就放在汽車的行李箱內，一輛路過汽車裏的司機大聲的告訴我們說有一件皮箱從汽車上掉了下來，我們把車子停下來，然後沿着來路回頭找尋，還問了沿街의商店，卻找不到箱子；真「夠」運氣，掉了的皮箱正好裝着我太太的珠寶、皮大衣和晚裝。我們報了警，奇怪得很，他們表現得無心理睬，後來還變本加厲。同一個晚上和英國總領使一道出席晚宴的有《芝加哥論壇報》的麥科馬克上校夫婦，他們是我的舊朋友，知道這件事後就讓論壇報去調查，當時在芝加哥顯然沒有甚麼有趣的新聞。不過，不管是甚麼的原因，我們遺失了皮箱成爲當地報紙的新聞，大字標題報導說：「英國爵士的妻子遺失了珠寶」，還有類似的標題，我們成了名人，在當時的情況底下，我們並不欣賞這種榮譽。

第二天晚上警方打電話給我們說，另外一位出租車司機檢到皮箱，剛剛拿到他們那裏去，要我去辨認，我於是到警察局去。到了那裏，一幅奇異的景象就呈現眼前，擠在一堆弧光燈、電影攝影機和記者中間的是斯衛探長、檢到皮箱的出租車司機托尼和那個皮箱。在這種情況之下，直截的辨認皮箱和把它拿走顯然是不合適的，於是三個人站在一起拍照——我站在中間，伸出雙臂搭着其他兩個人。我自然想給一點報酬給托尼；因此，我問斯衛要給多少才合適，是五十美元、一百美元，還是五百美元？他說一百美元，我便照着辦，托尼很高興。給在旁邊的記者聽到我問斯衛，次日早晨的報紙把我向斯衛提出的問題報導成這樣：「老友，我應該給這位朋友一些甚麼的東西呢？」。鎖好的皮箱沒有打開過，裏面的東西沒有碰過，我們真夠運。

重要人物和其他訪者

中國受到共產黨人統治之後，外界對香港的興趣大大提高，來訪的人也相應增加，有新聞從業員、政治家、海軍將領和將軍，他們來這裏或者是爲了做生意，或者是爲了進一步認識地球上他們很不熟悉的一片土地而親身前來考察。許多美國人到這裏來，韓戰爆發後更多。旅客一旦不再懼怕於香港受到中國襲擊，到這裏來的人數也增加起來。遠東的英國大使、駐新加坡的總專員分署人員，以及倫敦殖民地部和其他部門的部長和部員經常川流不息。有些人住在港督府，其他的人則受到午宴或晚宴的款待，或者到我的辦公室來見我。

殖民地部和白廳各部門的官員來這裏訪問通常是有用的，這樣可以讓他們親自看到我們的問題，當場討論又可以使我們

清楚說明各人的觀點。

殖民地部部長在教育、衛生和勞工等各方面都有一些顧問，我們發現這些顧問或者他們的副手到這裏來訪問——特別是剛提過的三種顧問人員的訪問很有助益，因為他們都是有廣泛經驗的人。幫忙得最少的要算警務顧問人員的來訪，原因可能在於他們從未沒有碰上像香港一樣的情形。有一次我得知警務顧問人員要來，剛好我們要處理一些敏感的事件，所以我要求取消訪問，並且提出了我的理由。儘管我提出了要求，他還是來了，而且帶着不滿的心情，因為殖民地部讓他看了我的電報，這是愚蠢的。不過，我們還可以把他安撫下來，可惜這次訪問浪費了時間，是一件討厭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軍事情報第五部門的主管訪問我們很有價值。

這種訪問不宜太多，訪者也應該明白他們關注的部門所負責的主管要處理平日的事務；不要以為可以整天跟着他們，而且可以騰出半個晚上來陪伴他們。

大臣的訪問跟官員來訪就很不相同，除了少數的例外者之外，大臣們認真地對待殖民地，而殖民地部大臣更是認真，因為這樣可以表示英國政府的高官真正關心着殖民地。如果不是，這些大忙人又怎會踏上九千哩的路程來到香港呢？我的任內就有兩次殖民地部大臣的訪問：一九五一年來訪的是奧利弗·利特爾頓先生（即現在的錢多斯子爵）與及一九五五年來訪的倫諾克斯——博伊德（即現在的博伊德子爵）。兩個人都留下了好印象，倫諾克斯——博伊德留下的印象較好，因為他較有人情味地關注着香港和她的居民。他很使我想起奧利弗·斯坦利，



1957年10月，作者太太慕蓮夫人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之情形。

他是前任殖民地部大臣，到過尼日利亞去訪問我們。最初我以為倫諾克斯——博伊德太仁慈和太友善，碰上須要嚴厲對待的事情時會不夠強硬，我看錯了這點。倫諾克斯——博伊德由太太陪着來，這是個優點，她用了很多時間來看望貧童，次年還接受香港的特別請求，回來主持大欖涌水塘的開幕儀式，這可以說明倫諾克斯——博伊德是多麼受到歡迎。

另外一種訪問我認為是有益的，就是外交部主管遠東和亞洲區的永久次長來到香港訪問，我是從外交部的觀點而不是從其他的觀點來衡量有益性的，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是在亞洲工作過，而亞洲在現在的世界事務中變得重要起來；起碼他們要知道亞洲是什麼個樣子，而且應該跟那裏的領導人見面，談談業務上的事情。我任內就有一次這樣訪問，訪者是韋廉士·斯特朗爵士（現在是勳爵），他受命準備出任永久次官，來訪時尚未上任，我相信只有這個時候，永久次官才有充分時間離開辦公桌，讓他到亞洲各國首都去訪問。

我們和部門首長打交道，發生過兩次不幸的意外事件。在第一件事裏，有位大臣和斯利姆陸軍元帥（當時的帝國總參謀）同住港督府，我們為他們安排一次歡迎會，這位大臣聽說迎賓隊列裏斯利姆會站在他的前頭，便很氣憤；我告訴斯利姆這件事，他覺得很有趣，他又說自己站在迎賓隊列那一處都不會介意。從禮節上講，這位大臣是對的，不過陸軍元帥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將軍啊！

一兩天後，同一位大臣和我一起乘坐飛機到新加坡去，同行者還有東京來的英國大使。馬爾科姆·麥克唐納的副官到新

加坡機場來接我們。由於新聞界要訪問這位大臣，副官便先用汽車把大使和我們送到「塞里山」的總專員官邸，看起來這是合乎情理的安排。然而，儘管副官費盡心思打點，仍然受到部長狠狠的訓斥，說什麼「難道他不知道部長比大使或者總督還重要嗎？」等等。他當然知道，大使和我也知道，我們很懂得在轄區以外我們是毫無地位的。副官只不過想讓我們離開機場，免得我們滯留在那裏。

另外一位部長也住在港督府，在蒞臨當天便得到了一份行程表，他說過可以接受。行程安排包括了一次僅有男性參加的晚宴，特別挑選過的本地人士被邀參加，我認爲部長會有興趣和他們見面。當天剛到黃昏的時候，我見到港督府的一輛汽車停在出口的地方，問過司機在等候誰人，才知道部長要了車子到放映共產黨電影的電影院去。他沒有告訴過副官或者我，說他不出席晚宴，不幸得很，他弄錯了放映的時間或者地點，結果既錯過了電影，也錯過了晚宴。

尼赫魯是一位替人設想的嘉賓，我仰慕他，認爲他是本世紀的一位傑出人物，而且不計較着殖民地統治的日子裏他們所受到的束縛和蔑視，在亞洲和非洲的政治領袖之中這是少見的，他對英國和英國人的感情是真摯和深厚的。在我心目中，他的形象就這樣塑造起來，或許我的想像可能是錯的：剛好相反，我發覺想像和事實吻合起來，這位哈羅公學和劍橋聖三一學院的東方產物出生富裕家庭，有着自然的純樸，不過，我卻很相信他會發脾氣的。

非官方的訪客之中，有好幾位是老朋友，像擔任過紐約州

州長的托馬斯·杜威。第一次認識他和他的太太弗朗西絲是在戰前的百慕達，當時他是紐約的地方檢察官，他的勇氣很大，成功地檢控了紐約的犯罪頭子和歹徒，並因此而聞名全國。對於杜威太太來說，這是精神受到損害的時期，因為她本人、她的丈夫和孩子們經常受到槍手和綁架者的威脅。到這裏來的時候，他正好展開了親身認識遠東的旅程，回去以後他要寫一本深入的書，講述自己的印象，後來他寄了關於香港的一章初稿給我，我認爲寫得不錯；不過，採用的角度我卻不同意，當然，這也是一種意見，我不會予以批評抵抗的。我隨意問問慕蓮，看她要不要閱讀這篇初稿，她表示想看看，後來她說：「我認爲他給人一個錯誤的香港印象，我寫信告訴托烏斯你會介意嗎？」我回答說不會，又說：「我不知道他會怎樣想？」；她馬上寫了一封長信給托烏斯·杜威，即使書稿已經送到印刷人手裏，他還是要了回來，根據信的內容修訂了稿件。

按照我的習慣，外國使節或者部長來到港督府參加晚宴時，我在遙祝女皇健康之後會遙祝有關國家元首身體健康。有一次我問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是否要我向巴基斯坦總統祝酒時，他回答說：「謝謝，不用了！向女皇祝酒就很夠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理蘇拉華地正好住在我們這裏，我們剛聽到以色列進攻埃及，他說：「如果以色列攻到運河去便是好事。」第二天早上（香港比格林威治早八個小時）我們聽到英法也展開攻勢，我說：「總理，這會使您碰上困難。」他回答說：「是的，不過我不會給英國找麻煩。」前一天晚上的晚宴裏有一位嘉賓是新加坡政界人物大衛·馬歇爾，他訴說着殖民主義的邪惡，蘇拉華地忍受不了，於是把身子

前傾，向着桌子對面的馬歇爾說：「馬歇爾先生，你知道印度人（意指印度國民和巴基斯坦國民）在英國人統治時比現在還要快樂嗎？」

我們邀請殖民地訪客出席午宴或晚宴時，通常都會派車接送，有一次我們派車去接理查·梅森，他是《蘇絲黃的世界》一劇和電影的原書作者，派出的車子按時駛到他住的旅店，後來我聽到一些意見，不滿意於港督府的汽車給派到近乎妓院一樣低級的旅店去；這正是戲劇所描寫的旅店，梅森就住在這裏搜集寫作材料。在不同的日子裏，我們接待過好幾位電影明星，有一次，有一位被認為很有魅力的著名男演員來參加午宴，我的助理秘書問我是否同意讓她靠近一點看看他，我說：「當然可以。」她便設法在他抵步時走近門口，第二天我問她對自己心目中的男偶像有什麼觀感，她很失望地回答說：「一點也不迷人——跟其他的中年男仕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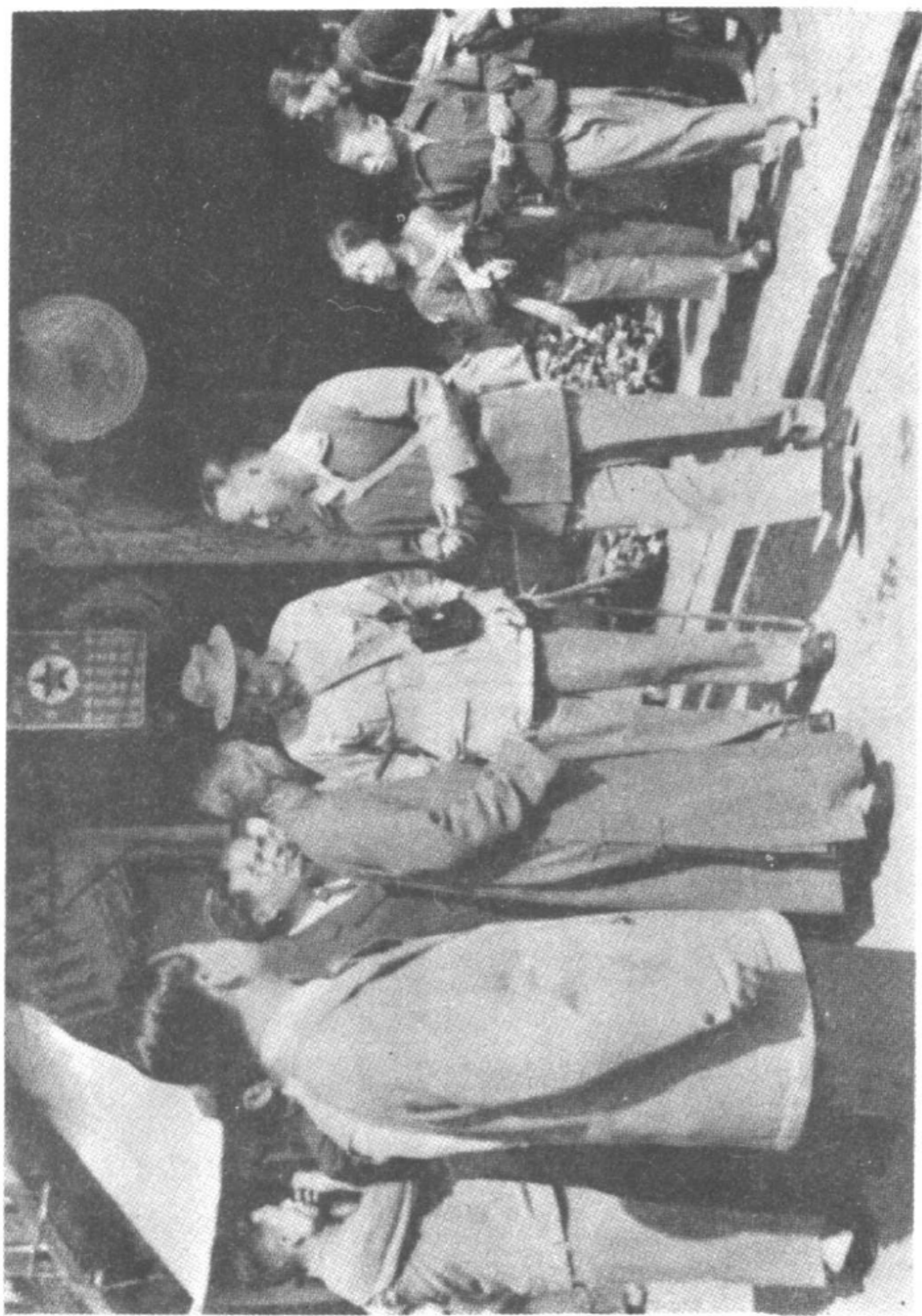
當時出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遜訪問了香港，他處事喜歡不依從一般的做法，交朋友的作風則表現得豪情洋溢。他到港島去瀏覽，有一次便和小販聊天，通過傳譯員問過彼此的健康和家庭狀況之後，尼克遜先生問小販是否知道尼克遜先生是誰人，小販回答說：「噢！我知道！您是香港總督。」尼克遜也喜歡到一些行程表沒有安排過的地方去，跟小販閒聊之後一兩天，他來到一所學校分給他們自己親筆簽名的照像。不幸得很，他挑選的學校受到監視，借以確定是否有共產黨的活動，就在他訪問之後不久，有些教師便被遣回中國，我真想知道他們有沒有帶着照片回去。

我和尼克遜先生的交談很有趣味性，提及中國這個題目當然不是不自然的事，他表示西方和中國保持交往是很重要的，我向他所指的是什麼交往，他回答說：「思想上的交往」，並且跟着表示一個最好的方法是貿易；因為訂立合約之前，中國人和美國人因此而（或者英國人、法國人會在執行這方面的事務）會見面。

遠足

從接待客人而享受到愉快的生活之餘，我們一家人喜歡在週末跑到外面去幾個小時，過着成爲嗜好的鬆弛生活方式——到郊外去散步。星期天早上天亮之前，我們從港督府出發開車到西灣去，那裏有軍人墳場，裏面有保衛香港的犧牲者的墓葬，墳場座落在漸漸傾斜直到海裏去的山坡上，而且可以望到將軍澳和在它後面的山嶺。日軍佔領時期在拘押中死去或被處決的平民則葬在港島南面的赤柱墳場，這裏的景色也很多，面臨浩瀚的太平洋，在墓地上的松樹爲離開了的靈魂而嘆息。見到曙光的時候我們會從西灣步行出發，越過山坡到大浪灣去。初到香港時，是我們喜愛這個海灘，現在我們還認爲它是全港最漂亮的海灘；這個時候，沙灘上沒有人，我們便會游泳，整個海灘都是我們的；然後我們回到家裏，吃一頓運動後應該得到的早餐。

後來我們有了港督用的機動遊艇「慕蓮夫人號」，她最使人舒適，而且粉飾得迷人，我們乘坐這條遊艇到香港水域爲之生色的離島去，登岸後我們會從離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遊艇就在另一端等待我們，我們再登上遊艇，穿上泳衣，跳到清澈的深海裏去游泳。我們感到毫不拘束，船慢慢地駛進恬靜的



作者與大澳居民交談之情形。



作者與太太參觀大嶼山一間修道院。

小海灣，在那裏下錨過夜，吃過晚飯後，躺在甲板上的折橋欣賞晴朗的天空，或者欣賞從島上山嶺升起的圓月，這種情形我們不會帶來任何人，甚至不帶副官，我們需要離開人們的寂靜時刻，當然，船員和侍從都在，不過，有需要時他們才來到眼前。

我們喜歡借着遠足或攀登而到大嶼山高山之上的佛寺去。開步時比較容易，走過古老的一塊花崗石鋪成一段經年使用而變得平滑的古道之後，便是沿山鑿成的石階，這段路變得吃力，幸好間中有一段段或緩或急的斜坡，和緩一下疲倦的感覺；我們不時停下來歇口氣，觀賞一下美妙的景色；我們看到遠在下面的「慕蓮夫人號」，像水上的小點。山上的一處峽谷，在某一個季節裏——我相信是聖誕節——我們會停下來欣賞一株從石崖伸出長得很大的白色一品紅，一大束的花朶向下垂，像一幅玲瓏的小瀑布；我們的朋友布魯克·伯納基在近山頂處有一塊渡週末的地方，有時我們會和他共進午餐。不過，通常我們都會往前走到佛寺和友善的和尚談話，從這裏走到山脊去的距離很短，山脊兩面的山坡很陡峭，向着海一直伸延下去，壯麗得很：真的在世界的頂峯上了。我們會在高得使人暈眩的休憩地吃午餐，然後下山去。

有人向新加坡總督投擲了一枚手榴彈，幸好沒有爆炸。事件發生後，警務處長要求爲我調配督察級以下的警務人員做隨身警衛員。我告訴警務處長說，如果有人要殺死我，他會得逞，有沒有護衛員結果都是一樣的。我還笑着揶揄他，說他實際上爲自己打通後路，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時他可以托辭，處長只是笑了一笑。事實上，我的「警犬」都是有用的傳譯員，我想

跟脚下的人談話，或者遠足時問路，都爲我解釋。他們也是好同伴，他們帶的左輪手槍是選拔射手時用的。一般來說，我的槍法跟他們的一樣。總的來說，他們都是值得賞識的人。呀？有兩個人後來走上不正當的途徑。一位給同事起了個渾名叫「陳查理」的人，走私時給逮住了，而且被檢控，他請求我書面證明他的人格品尚好，他替我工作時表現得不錯，所以我答應了他。另外一位在中國的大學畢業，比一般人更得人好感和聰明，我以爲他會升得高，而且在適當的時候給提升到處長級的職位，我離港後四年他卻成因爲充當共產黨特務而給遣送到中國去。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中國當局對香港的態度是消極的仇視，不時會爆發敵視的積極活動；好比廚房裏爐灶上的鍋，香港就像這隻鍋；平時這隻鍋放在爐灶的後面，慢慢地煮，讓裏面的東西處於將沸未沸的狀態；不過，廚師——中國政府——不時會把這隻鍋放在爐灶的前面，讓裏面的東西沸騰一會兒後又放回爐灶的後面；我們從不知道這隻鍋什麼時候會拿到爐灶前，把裏面的東西煮至沸騰。有時他們有明顯的借口，有時卻沒有。中國人申訴時有合法的理由間中也有，C.N.A.C. 飛機事件就是正好是這種情形。不過，我們經常謹慎地避免惹怒他們。可是，我們無意不按照自己的方法辦事，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中國政府的確有理由不滿，根據國際慣用的做法，提出抗議或者要求調查就很夠了；但北京方面卻做得過份：發動宣傳和累積政治資本，而針對英屬香港的機會是不容失掉的。

萬隆會議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舉行，一羣中國新聞從業員經

港赴會，英國駐北京代辦接到中方要求，要香港當局保證新聞從業員在殖民地期間不受到攻擊和干擾。這是正常的做法，代辦向我們轉達了這個要求。新聞從業員乘坐火車抵步時起一直到登上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機為止都受到警察的適當保護，飛機上還派了警衛員。飛機起飛了，一切看來都很好，可是幾小時後我們接到消息說飛機墜毀於印度尼西亞水域，有十六人喪生。很快便證實陰謀破壞是墜機的原因，還證實了香港是唯一可以進行破壞的地方。檢查飛機殘骸證實機翼上裝上了計時炸彈，一定是飛機停留在啓德機場時可以走近飛機的人裝置了炸彈，陰謀組織者很可能以爲周恩來在飛機上，不過，他沿別的路線到萬隆去了。

警方的罪惡調查科和特別部門的全部人力都集中於搜捕作案者，十萬港元的賞金（歷來最高的賞金）也提出來了，個多月來全力通緝並經詳細地偵緝之後，嫌疑的目標集中在一名「周梓銘」上，他是啓德的僱員，負責維修飛機，逮捕令發出了。不過，他一定知道了警察緊緊追捕着他，因爲警察在抓他時發覺他已經逃跑了。事實上他在幾小時前偷偷地上了CAT飛機去了台灣。毫無疑問，同謀者幫助他乘機逃亡，調查時發現這次卑怯的陰謀是由國民黨情報組織所策劃的，「周梓銘」本人可能不是組織的成員，只是接受賄賂把炸彈放到飛機上去。英國駐台灣代辦要求引渡「周梓銘」回港受審被拒。由於英國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沒有引渡條例可以堅持，在香港發現的情報機關成員則被遣送。

墜機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當局給予我們一些情報，告訴我們他們所懷疑的人物，如果他們通知我們新聞從業員來港時就

把情報告訴我們——那時他們已經掌握了情報——我們會採取必要的保安措施，也就不會發生災難了。

發生「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時，中國人還很憤慨之際，克里斯納·梅龍先生訪問香港，在我們這裏住上了幾天。他剛去過北京，力圖促成釋放被俘的美國空軍——美國人和他們的政府對共產黨人囚禁美國空軍感到憤怒——他沒有成功。不過，相信如果他能夠提出一些令北京當局感到高興的事情時，也許會同意釋放美國空軍——不過這只是個人的揣測——這樣，克里斯納·梅龍先生便會被頌揚為偉大的和平締造人，使北京高興的事情就是逮捕、審訊、定罪和處決陰謀破壞「克什米爾公主號」的人。梅龍先生又是印度人，固然希望引致印度機員死亡的人受到懲罰。他訪問香港的時候，調查的階段到了集中懷疑某幾個人，但僅僅懷疑他們，梅龍催促我讓警察施加壓力，套取供詞，從而得到我們需要的關鍵情報，這樣做就似乎是實行拷問了，我拒絕了他。

個人方面，慕蓮和我跟克里斯納·梅龍都相處得很好，他是一位十分敏感的人，也許這就造成了他的某種高傲的儀態。他的秘書看上去算得上年青，曾經做過印度公務員。有一天我去到他的房間，友善地閒聊起來，我問他為什麼從不下樓來進餐，他回答說：「克里斯納·梅龍不讓我這樣做。」為我們的傑出嘉賓做菜是有困難的，他是素食者，然而，連芝士或者雞蛋都不吃，似乎是靠着不可勝數的一杯杯茶來維生。喝茶時他會加很多牛奶，並且放進半打方糖。

有一天克里斯納·梅龍和我討論英國殖民地——特別是香

港——的將來時，我說我知道香港最終會歸還中國，並且要求他回到新德里後，在印度外交部的有關檔案裏寫下備忘錄，說明回歸香港的問題成爲大家關注的問題時，印度政府會呼籲中國政府好好地對待香港人。有錢人有能力跑到外面去，這裏的外國人不管怎樣是會離開的，而海外貿易公司早就賺到了錢，正是一般貧窮的人是我所關心的；梅龍先生答應了，幾年後尼克魯先生住在我們這裏時，我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並且得到同樣的保證。印度和中國當時還是友好的。

重訪北京

由於我要在一九五五年年底退休離港，慕蓮和我相信在離開遠東之前再看一看北京是我們的意願，也許這會是最後的一次。這裏順便交代一些事情，訪問北京之後不久我的港督任期再延長到一九五七年底（我總共得到三次延長任期）。共產黨管治時期以前港督訪問中國的首都根本不成問題。不過，訪問共產中國的首都卻是另一回事。北京政府慣於利用非貴賓到訪而撈取宣傳效益。如果他們趁我到訪而爭取這種效益，可能會在香港造成不良的影響。他們即使沒有宣傳這次的訪問，到北京去本身在殖民地裏會不會理解成求和的行動？甚至會理解成尋求處理香港問題的第一步做法？另外一方面，不論那一種中國政府，香港都渴望着和她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當時兩者關係比以前更爲平靜，而且維持了好一陣子，「克什米爾公主號」激起的思潮平息下來了，港督的非正式訪問會不會被北京方面視作友好姿態，從而促進殖民地的利益？

這些不同的香港要予以小心的衡量和估計。我和顧問討論了這件事情，一致認爲訪問不會帶來損失，說不定會帶來好處

。行將訪問北京的消息公佈之後，本地報章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公衆不同的反應，我特別記得英文南華早報程主編，我一向極爲尊重他的意見，因爲他的社論從來不偏不倚，而且言之有物，雖然說話常常不留餘地。他喜歡擺出玩世不恭的樣子，其實他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堅持直言不諱，爲甚麼南華早報的老闆讓他這樣幹，我從來沒法了解。他離開之後該份報章便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如果鼓吹「百家爭鳴」的運動（下面我會談到這件事情）在計劃訪問時展開，我便不會到北京去，因爲趕上這樣的時刻訪問北京在香港會被誤解。

那個時候我要等到外交及殖民地部的批准才可成行，因爲他們可能會反對。幾個月後他們批准了，而駐北京的代辦授權尋求中國當局同意此行，他也贊成我訪問北京。中國方面在兩三天內便同意了，並且取得協議，視此行純屬私人性質，而我要自付開支。他們嚴格遵守諾言，不利用我到中國去這件事來做宣傳。

我們在羅湖登上了到廣州去的火車，在廣州，來自有關政府部門的一位年青的英語傳譯陪同到車站來迎接我們，接待來訪的外國人這並不算是不尋常的做法。由於飛往北京去的飛機要到第二天早上才離開廣州，我們要在愛羣飯店留宿一晚。我們決定到附近的餐廳去而不留在飯店內用晚餐，這點我們做到了。我們知道新中國取消了小賍，因此我在付賬時候沒有給小賍。不過我剩下一瓶喝了一半的葡萄酒，服務員大肆張揚地把這瓶酒包好讓我拿走，我說帶走它很麻煩，請他們做個好心讓我省點麻煩，他們面帶笑容地說他們樂意這樣做，他們沒有觸犯禁止收小賍的法律，他們只不過替一個陌生人代勞，這卻沒有法律禁止的。

在北京時，我們住在英國大使館，和康·奧尼爾代辦及他的太太在一起，他倆經常是我們在香港時的賓客。奧尼爾心思深入敏銳，他發出的急件是具有洞察力的範模公文。我們玩得很高興，特別是到長城或者明陵去作一日遊，更是快事。我不打算詳細講述我們在中國的見聞，其他的人早就說夠了；況且這是八年前的事，現在說起來已是過時了。我們得到的一般性印象是百姓們挺起胸膛，爲他們的國運而感到驕傲。至於北京的建築物，例如宮殿和廟宇，我從沒有見過保持得這樣的好，就拿喇嘛寺來說吧，我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見到它時，破舊不堪。上一次我到北京時是一九四八年，剛好在共產黨進城之前，整座廟宇成了廢墟。一九五五年時它完全恢復了原貌，這種情形也發生在北京其他的地方。然而我們以前所慣見的商店服務員雖然熱情地招呼，卻不像從前的樣子，他們失卻了舊日喜氣洋溢的盛況；價格給規定了，法律不容許議價。比以前清潔整齊得多，北京特有的歡樂已經消失了。不過，她擺脫了一九四八年時的可憐樣子，再一次成爲大帝國的中心；在我心目中，她仍然是世界上七大奇跡之一。

我的訪問屬私人性質，唯一的公事是按照禮節拜訪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我和奧尼爾一起去了。拜訪中我們閒話天氣和家常之際，張先生說周恩來總理要在某天某個時刻見見我和奧尼爾，我又希望奧尼爾太太和我的妻子兩位女仕會參加午宴。我知道奧尼爾就在那一天安排午宴歡迎我，而且邀請了一些外交使團參加。我幾乎可以確定他回答副部長時想說這甚麼，只有一件事是當然要做的，那就是接受邀請，而我接受了。我們接時到了周恩來的府第，一起討論的有周恩來、章漢夫、傳譯員奧尼爾和我。雖然和周恩來一起只有三個小時，他給予我深

刻的印象，就像碰上他的大多數人所得到的深刻印象一樣，他英俊而有魅力。不過，他能夠在一瞬間從表現得惹人好感變成強硬。在碰上他和尼克魯之前，我問路過香港的Dag Hammarskjöld韓馬紹博士他怎樣看這兩個人，誰更偉大？韓馬紹回答說，根據他的意見，周恩來偉大得多。至於我自己的看法，就拿短短三個小時和周恩來在一起以及和尼克魯相處幾天的兩段時間為基礎而衡量，我認為周恩來比較擅於應付現實政治。從道德觀點看，尼克魯更勝一籌。

討論時我的目的在於不讓談話涉及香港的事情，因為談起來一定會引起不愉快。我問及中國人口膨脹的事情，周恩來以為我的含意是指出人口壓力導致中國實行侵略政策，以擴張領土，我提問時並沒有想過這一點，我只想得到一些資料。他重申保證不侵略之後，詳述了新疆和中國其他人口比較稀少的地方的發展；我問了政府的節育政策，他說政策在於鼓勵而不強迫。幾個月後這項政策卻變成強迫性的，但維持不多久，為甚麼恢復鼓勵的政策卻沒有適當地解釋。台灣問題給提出來了，一直以來所有的宣傳都集中在台灣省回歸祖國和攆走「蔣介石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者」上，看到周恩來提起這個問題時顯得分外平靜，我不禁吃了一驚。周恩來說時間對他們有利，台灣島會投過來的，並且舉出不久前一位國民黨將軍變節投共為例。英國對中國的態度以及在聯合國裏沒有投票支持中國取代台灣的席位他都說了很多話。不管我有甚麼看法，這不是我要關心的問題，當然樂意讓奧尼爾去應付這位偉人的責難。

我希望「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不會提出來，可惜它給提出來了。雖然周恩來語調強硬，但不暴躁，而且似乎接納我替

香港提出的申請。談到從香港遣走的共產黨滋事分子時他變得有點激動，這一點我要堅定下來，遣走不受歡迎的異已分子是應有的權力，我一定要維護，不讓分寸，並且告訴他我們不會放棄這項政策，而且同等地用於對付親國民黨份子和親共產黨份子上，還舉出「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驅逐國民黨份子爲例。

午餐聚會純粹是社交活動，我以爲這次聚會也不外如是，周恩來太太的身體不好，沒有參加。奧尼爾和我的太太之外，章漢夫太太也參加了聚會，她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說話之間有問她當共產黨員有多長時間，她沒有回答——我注意到共產黨員的作風是不回答尷尬的問題，反而問我當保守黨員有多長時間。她顯然不相信我告訴她的話說我不是保守黨員，我相信共產黨員不可能明白共產黨和民主國家的政黨的差異。

午餐聚會一直很愉快，突然周恩來轉過來問我是否聽說過澳門的葡萄牙人快要慶祝澳門殖民地成立四百週年。看到主人家的心情還好，便回答他說我聽說過，並且告訴他由於自己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出席典禮，所以覺得這是一件討厭的事情。事實上，早些時候我聽說要舉行典禮時，就覺得不安，有一位部長會從里斯本來，而差不多可以肯定會說出「葡萄牙的神聖領土」的字眼，這會惹怒北京。周恩來採取了嚴肅的態度，表示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喜歡這種典禮，澳門和香港的中國人也不喜歡。最後一句說話有點露骨，威脅要讓兩個殖民地上的共產黨人搞事，而且可能會很嚴重。我提出意見後，如果典禮只限一天，也許不會有甚麼問題：「不！整個典禮要取消。」我堅持了一陣子，卻發現自己不得要領，所以放下了這個問題，然而

沉鬱的氣氛籠罩了午宴。

餐後我們換個地方繼續交談，我不願意看到剛才的話題還沒有討論得令人滿意便放下了，所以我再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一次周恩來比較溫和，同意舉行一天的簡單典禮不會惹起反感。這些談話的主要內容在當天下午便由奧尼爾打電報通知了外交部；毫無疑問，外交部轉告了里斯本。我回到香港後，我告訴了澳門總督周恩來和我之間的談話內容。葡萄牙當局很明智，整個典禮程序取消了，也取消了準備好要發行的紀念郵票，拆除了興建中的紀念碑，而且沒有部長會從葡萄牙到這裏來。顯然澳督一直反對舉行典禮，不過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否決。

取消典禮所提出的理由是澳門正要渡過經濟困難的時候，花費大量金錢搞慶典是不對的。看看慶典和規模，就知道這個理由很不充分，不會瞞過任何人，人人都知道背後有中國的壓力。人們會估計到北京這樣施展力量，左右澳門的事務，會大大打擊香港和澳門的士氣，但這卻沒有發生。

葡萄牙沒有承認北京，在澳門還駐有國民政府的外交代表。即使這是事實，我常常以為澳門政府或者政府中某些人士和中國當局建立的聯絡方式或者非正式的接觸渠道，要比我們的好。在香港，我們根本沒有這種橋樑，我相信原因在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比較刻板 and 冷淡，沒有拉丁民族那樣靈活變通。澳門和香港的關係一直都是友好而真摯，最少我們是同一條船上的人，而且戰時澳門人民——他們所謂的生命危險和付出的代價並不比別人的少——向香港逃到澳門的人伸出援手一事永遠留在我的心坎裏，我擔任港督期間港澳之間不巧發生了一件

小事，和大米有關——我忘掉了事情的經過、甚至發生的年份，不過很快便得到解決。

在北京我們訪問了清華大學，它本來是美國人資助建立的大學。校長到外地去，所以由副校長接待我們，他畢業於香港大學。由於港督是香港大學的校監，他把我當作散失已久的兄弟來歡迎，不過我們談話時很謹慎。我們見到的教授中有一位是建築設計院院長，我問他說，北京和別的地方多了很多新建築的，他們是否能夠使到屋頂微曲優美的中國舊建築物所構成的美和實用的現代建築物彼此協調起來，他說還沒有但希望將來能夠做得到。事實上舊風格的建築物造價昂貴和浪費空間，而新型的建築物則沒有風格。讓我們暫時忘記共產黨，並且希望新中國培養出起碼能夠比擬舊式美的風格。

我們回到香港，馬上給記者包圍，問我有沒有見過中國政府的成員——我造訪了周恩來，中國的報章和電台都沒有報導。記者們得悉我見過周恩來之後，便鬧哄哄地提出許多問題。我盡力滿足他們，依據真實情況答覆，就是沒有提過澳門。隨後和外國新聞社代表舉行不留談話紀錄的聚會，我詳細地說明了和周恩來討論澳門事務的內容。這些聚會內容絕對保密，我說過的話都不可引用，甚至不能夠印刷出版，除非得到特別許可。聚會的目的在於讓代表們知道香港發生過的事情的背景和快要發生的事情，這些人全都明白，從來沒有人破壞過對他們的信任，不過這一次就有人破壞了，幸好沒有大碍。我沒有向新聞社的總辦事處提出責難；不過，他們開除了那個人，這樣做也許是對的。一旦有個同業不守信，獨自發佈新聞的時候，其他的代表一定會很憤怒。以後沒有再發生這種事情，外國新聞

社駐港代表是一羣明智可愛的人。

我最後快要離港之前，間接地接到蔣介石邀請訪問台灣，他甚至說要派自己的飛機來接我，我謝絕了。如果我去，恐怕會惹起很大的爭吵。

「百家爭鳴」

從北京回港後不久，中國政府發動了「百家爭鳴」的運動，這時正提倡萬隆精神以及和平共存五項原則，也是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向代表們擺出和藹講理的面孔的時候。一直以來中國當局對香港抱着敵視的態度，不設法爭取民心，不建立討人喜歡的形象。當時卻改變了，他們仍然保持着對待香港政府的強硬態度，對邊境防衛軍照樣冷淡。不過，卻有一股強勁的動力務使香港居民的心目中形成一幅圖畫，裏面描繪了有很大進步的一片樂土，描繪了愛護他們以及受他們愛戴的祖國——中國。著名的居民被邀請到中國去，一切費用代為支付，許多人去了，不過，中國人是不易受騙的，某些物質上的成就使他們有了深刻的印象。不過，一般而言他們對所見到的東西並不喜歡，引人的餌也伸向歐洲人，有一位大學教授吹捧中國的事物而使自己出醜（還使副校長感到尷尬），他受到另外一位訪問過中國教授的反駁，後者是較為精明的觀察家，並且在隨後的語言交鋒中取得勝利。

對付這種性質的狡猾運動並不容易，不准中國方面在殖民地舉辦藝術展覽或者表演看起來是不合理的，不過我們知道展覽的目的在於建立紅色中國的形象，並且破壞我們的形象。展覽和表演無疑會是精采的，不過會被利用作親共和反英宣傳的

武器。在英國，這樣做沒有什麼危險，但香港卻處於容易受到侵害的地步。我們拒絕了申請，理由是他們可能會刺激親國民黨份子或者一些反共產黨份子起來破壞和平——這個理由是真正的。殖民地有各方面的份子，而且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會設法攻擊表演者。我們破了一次例，讓一團剛在倫敦取得極大演出成功後，返回中國的舞蹈員在香港演出，不過，我們限制了表演者在戲院外的行動權——這是為他們設想而實施的，我們又禁止舞台上出現有宣傳意圖的東西——禁止表演道具或項目根本不會在英國發生。我接到邀請出席觀看，不過我拒絕了。有人告訴我女皇出席觀看了在倫敦的表演，表演者還被引見女皇。我回答說香港不是倫敦，我也不是女皇。如果我去了，有人便會從中得到損害香港的政治資本。不能夠出席使我感到抱歉，因為我相信這次表演是十分精采的。

我不認為北京發起的運動有很大的收益，最少在爭取香港人這一方面不算成功。如果我們沒有採取措施抑制，也許它的收益會很大；不管怎樣，運動慢慢平息一下來。幾年後強奪西藏，使亞州輿論界大為震驚，北京終於決定輿論可以忽視，恐懼比愛更有效力。

「百家爭鳴」的時期，本地出現了重新開放邊界的強烈要求，指出南中國的情況正常化；又指出如果開放邊界，進入香港的人再不比離去的多。我們懷疑這種講法，不過試辦一下沒有妨害，因為我們可以再關閉邊境。有關措施安排就緒後，從中國來的中國人只要持有中國當局發出的回國入境証，便准許進入香港。從一九五六年二月份至九月份共七個月，一共有六萬入境者沒有返回中國，和香港居民溶合起來，而中國當局拒

絕在他們的那一方控制往香港的入境者，因此我們再次關閉邊境。香港和中國鐵路局也舉行了會談，希望重開直通客車，技術上的細節已經商討。不過在協商雙方有權限定被認為不受歡迎的人物在七天之內遣回的問題上，中國方面不接受，而使整個協議破裂。

來了一架國民黨人的飛機

剛剛在「百家爭鳴」的運動期間，國民黨空軍的一架飛機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底下於一九五六年一月裏的一天降落在啓德機場，這次事件和運動沒有甚麼關係。這架飛機沿着中國海岸偵察拍攝時給共產黨的飛機追截，爲了擺脫它的追蹤者，便降落在香港。當時的問題是怎樣處理飛機和機師，中國當局似乎還不知道飛機降落了啓德，不過，他們很快就會知道的，因爲有人看到飛機抵步，香港的共產黨特務很快便會向廣州報告。我們決定最好讓機師趁着第二天的首班飛機的起飛時間駕駛自己的飛機，這正是機師所希望的。港台之間的距離很短，受到共產黨飛機攔截的機會很微。

這裏我做錯了一點，我應該先遣走飛機，然後把這次事件報告倫敦，倫敦方面會因爲不用負責而感到高興。我沒有這樣做，卻打電報給殖民地部，告訴他我們所建議的做法。按照平日的做法，電報會在飛機開後才處理。可是，我不夠運氣，半夜便收到電報，告訴我在接到更進一步的指示之前不要讓飛機離開，因爲這次事件正由部長們去處理，我知道這意味着沒完沒了的拖下去。希望讓飛機回到台灣去又不惹起北京的抗議風暴已是不可能的了；況且，中國空軍會戒備，趁着飛機離開香港管轄範圍時便把它擊落。當時，北京透過英國代辦提出了一

連串語氣激烈的抗議，要求交出飛機和機師，並且指飛機執行了襲擊中國大陸的任務。這種斷言是假的，因為飛機沒有武裝。曾經向北京政府指出根據既定的國際做法，是容許飛機和機師離開的，北京方面沒有接受這種講法。

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得到通知可以讓飛機離開。這時，扣留在機場的機師表現得意氣低沈。通知他可以走時，他不停嘔吐，而且拒絕離開，我不怪他；他說飛機在這段時間裏給放在空曠的地方，不能飛了。他說得有道理，而這又意味着要碰上更多的麻煩，怎樣安全地送走飛機和機師呢？我終於靜靜地把機師送上一艘開往台灣港口的治航船，船的名字記不起了，不過還記得是在星期六下午五時啓航，因為我看着他離開，這算是送行吧？不久之後，在沒有其他事件發生的情況底下，一艘國民黨商船來港運走飛機。這一切無疑是無聊的。然而，對當事人來說就夠他們憂慮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的暴動

比一九五二年三月的暴動還要厲害的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的暴動，有六十多人喪生。這次暴動不是由共產黨人挑起的。十月一日是中國共黨政權的國慶日，而十月十日則是國民黨的國慶日。這兩天殖民地上旗幟飄揚，親共份子掛起共產中國的五星旗，親國民黨份子則掛起國民黨旗；後者的數目遠遠超過前者，特別是木屋區和徙置區更是如此。因為住在那裏的大多數人都是來自紅色中國的難民。警察常常在這兩天裏戒備，隨時阻止兩方面的宣傳者大打出手，一直以來沒有發生嚴重的衝突事件。

引起一九五六年十月的暴動的火種是政府官員下令拔去徙置區大廈陽台上的一面國民黨旗。從此以後發生的事件看來，他的行動可能（算得上）是受到錯誤的引導。不過，情況已經很緊張，羣情已經很洶湧，很可能隨時爆發。暴動到底發生了，像野火般蔓延，匪徒和流氓也參予搞事。九龍是風暴的中心，基本上發生在徙置區內或周圍的地方；不過，情況最嚴重的一個地區倒是在新界的荃灣，那裏有幾間工廠。工人的工會分成親國民黨和親共產黨兩派，前者的人數遠遠超過後者。在軍隊奉命開到這裏之前，警察已經不能控制局面；所以有好一段時間歹徒們大肆搗亂，許多共產黨工會的工人被殘暴地毆打，在恢復秩序之前有些人被殺害了；港島則沒有發生過暴動。

暴動開始時我正結束假期準備回港，在我抵步時最惡劣的時刻已經過去。不出所料，北京的反應很強烈，抗議香港當局沒有保護無辜者。共產黨報章也展開言論攻勢，指責沒有給予親共的犧牲者足夠的賠償。事實上，爲了這次事件而任命組成的仲裁會小心地審議後，所有沒有參予暴動但卻在生命上、身體上和財物上遭受損害的人都得到賠償，而審議時不考慮申請賠償者的政治立場。^{②9}

十月暴動使遣送問題的爭議推進高峯。我說過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前的日子裏，某類裁定有罪的中國籍異己份子以及其他不受歡迎的人物經常受到遣送，這種做法得到中國當局的接受。共產黨人掌權之後，遣送到中國去的做法愈來愈難於執行；因爲受遣送的人被拒絕入境。中國當局唯一會破例看待的是政治性的被遣者，那些因爲參予顛覆活動而被遣走的人會被接納。結果我們要接納成千上萬最壞的犯罪份子。

其中造成最嚴重惡果的是三合會或黑社會份子，這是因為他們的犧牲者雖然願意向警方舉報，卻沒有胆量出庭作証，結果幾乎不可能在法庭上裁定他們有罪。三合會充分利用這種情況，情況愈來愈壞，終於演變成暴動。因此通過了法案，授權行政局下令關押得到遣送而被驅逐卻無法予以遣送的人。特別關押中心建在大嶼山，環境很好，建築物一點不像監獄。仲裁會每六個月重新審議每個案件，仲裁會包括了合格律師和太平紳士，他們的建議——即是否應該繼續關押審議的人——提交行政局作出最後決定，這個制度在約束三合會勢力上證明有致，而且受到公衆的歡迎。

關閉海軍船塢

皇家海軍船塢落成的日子差不多和成立殖民地的時間一樣的長，它是英國在香港的象徵。三十年代在新加坡設立海軍基地之前，是海軍在遠東的唯一較為像樣的基地。新加坡的基地啓用後，它退居第二位。太平洋戰爭後不久總司令把總部從香港搬到新加坡去，香港船塢雖然做得有效率，不過，在一個地區設立兩個船塢顯然不合算。況且，新加坡船塢又大又比較現代化，所以，倫敦的財政部常常迫着要關閉香港船塢，而我又一樣經常地全力抗拒這個壓力，並且得到繼任的總司令和海軍將令的全力支持。我抗拒壓力有兩個理由：首先，船塢是勞工的大主僱，如果它給關閉了，因為當時難民湧入造成的嚴重失業情況會更惡化；其次，撤走皇家海軍旗幟會被香港居民視為英國全面撤出香港的先聲；即使說明這種做法並不是要全面撤出香港，並且說明這只是爲了財政上的原因，也沒有觸及問題結，因為沒有人會相信解釋，而信心也會受到很大的創傷。

然而，一九五七年英國政府發表白皮書，聲明要關閉包括英國境內的若干船塢，我的反對便落空了，因為到了這個時候，關閉香港船塢被視為整個政策的一部份，和英國維持香港的問題扯不上關係了。再者，海軍又不是完全撤走，某些海岸設施和小型戰艦使用的船塢還保留下來。況且，關閉船塢後殖民地會得到一大塊有價值的土地這個事實使整個事件變得容易接受，因為海軍的土地佔有權妨礙了維多利亞中心的發展。不過，爲了收回海軍放棄的土地，財政部合法但很不合理地要求並且得到香港所付出的一大筆抵償。

好幾千名船塢僱員快要失去工作的困難尚待解決，分遣艦隊指揮官和勞工處長緊密合作以解決問題，並且設立了特別委員會處理這次事件。商會和類似的團體敦促會員聘用這些解僱的工人，得到良好反應。海軍部發出了解僱費，在這種情況底下，發出的數目不算不慷慨，也不算過於慷慨。我們敦促他們開放一點，不過他們拒絕了，理由是這樣做會爲別的地方——例如烏爾地——開了難於應付的先例。英國政府在拒絕做她們知道應該做的事情時每每用上「開先例」爲拒托借口。解僱這麼多工人正是共產黨人不容錯過的機會，而他們的確盡量利用了。不過，委員會的工作做得有效益，船塢工人大體上都感到很滿意，不讓自己受到煽動份子大肆進行的挑撥。更有好些人在中國找到工作，那裏需要技術人員。我們碰到的麻煩比恐防發生的要少得多，我們又越過一道屏障。

一九五七年九月國防大臣鄧肯·桑茲訪問殖民地。上一次國防大臣訪港是在一九四九年，當時的大臣是亞歷山大先生，他到香港來視察，看看這裏需要加強那一方面的防衛。這卻不

是桑茲先生來訪的目的，他來訪的目的在於看看那一方面的防衛可以減弱。那個時候的英國政府正要設法減少防衛承擔，司令們和我都難以接受這件事。我記得自己向桑茲說過：「好！如果你減少駐軍人數，我們便減付軍費。」他回答說這樣敲詐不了他。這個問題在我離任後才得到解決，香港在兩個方面都受到損失：駐軍人數減少，而軍費負擔卻增加了。

第八章

回顧

除了關閉海軍船塢造成一些困難之外，一九五七年是比較平靜的一年，這也是我在香港最後的一年。因此，從這一年回顧我到港出任總督十年所完成的建樹、或者沒有做到的工作，並且回顧我們和中國的關係是很對的。就以內政事務來講，復原工作完全做好了，還有超過以前而又引人注目的進步，學校和醫院比以前多；剛建成的是新機場，可以讓世界上最大型的飛機升降；清除貧民窟的工作有很大的進展；造價一千萬英鎊的水庫也投入使用，還有造價更大的水庫在建造之中。所有這些對於香港這樣一個在發展進步的城市來說，都可以說是正常的進展。海港擠滿了船，而經濟又在興旺中；殖民地培養了以前沒有的社會福利意識，街坊會穩固地建立起來；但憲法改革卻放進了冷藏庫，這不是因為香港官員或者殖民地部是反動的，而是因為香港的特殊情況使到這種改革包藏了嚴重的危險。

一九四七年時預料不到的問題也發生了，這是共產黨人在中國的勝利而引起的。根本的重要因素在於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掌權這個事實，而不在於掌權的是共產黨人。新政權經常是不友善的，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們習慣了這種態度，視作我們的正常生活的一部份。例如我們接受這樣的事實，即中國政府如果喜歡的話，不時會無中生有，給我們找麻煩。共產黨人勝利後引起的最觸目的問題是難民潮的問題，起初我們摸索着應付的辦法，終於形成了一項新政策，而且證明是成功的。這個問題很可能會持續很多年。處理的方法也成爲例行公事，不過，它虛耗了殖民地很大的收入。

當時的一段日子裏，美國和聯合國對中國施行的貿易禁運看來要使殖民地經濟垮台，結果幸未發生。香港轉向工業，成爲香港經濟生活的重要部份，比之於傳說的轉口貿易更爲重要。新的發展帶來了屬於它的難題，而且還沒有解決。我們和美國政府就他們對中國實施的貿易禁運發生了歧見，不過這些歧見都消解了。

我看到美國政策漸漸放鬆了它的僵硬性。甚至在福斯特·杜勒斯去世之前，就不再天天誓言要推行邊緣政策和威嚇着要進行大規模報復，不用拿蔣介石做借口了，中立再不是不道德的，美國的遠東政策變得成熟起來是值得注意的，它也影響了香港——而且是好的影響，它促使英美政策的鴻溝收窄起來，讓身處香港的我們也感到寬慰。

中國和她的鄰邦

這裏我讓自己扯開話題，稍爲談談東南亞勢力分佈情況可能會有的進展，我認爲中國不論是共產黨人的、還是非共的，她到底是強國，很自然成爲這個地區的主宰力量，特別是和弱小的鄰國和近邦所形成的關係上她處於優勢。以往蔣介石就有了現在的當權者的想法：重建舊中國的權勢和光榮，恢復對附庸國的宗主權。一九六一年國民黨政府不是以外蒙古爲中國的一部份而反對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嗎？蔣介石也會像毛澤東一樣征服西藏，所不同的是國民黨人沒有力量去實現他們的目標；同樣，中國痛恨美軍駐扎在中國認爲是領土一部份的台灣，這不是不可以理解嗎？美國人對古巴有着天生的敏感，應該明白這一點；而古巴從來就不是美國的一部份，而台灣卻一直是中國的領土，蔣介石和毛澤東所同意的一件事是中國大陸和台灣

是一體的。由莫斯科控制的古巴使華盛頓當局產生怎麼樣的感受，華盛頓控制的台灣就會使中國產生怎麼樣的感受。美國會喜歡讓蘇聯或者中國軍隊駐扎在鄰近的墨西哥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顯然是否定的，那麼，中國反對外國軍隊駐扎毗鄰的老撾是不合理的嗎？也許有人會說西方國家沒有侵略中國的意圖。我們知道這是事實，不過中國有侵略意圖嗎？他們的無知以及不明白外間的世界是壞得透頂的。

如果門羅主義適用於美國，爲什麼同樣的主義就不通用於亞洲呢？沒有類似的主義給提出來。然而，亞洲人想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台灣的國民黨份子和美國之間只有權宜的結合，並沒有真摯的聯盟，美國政府跟泰國和越南的關係也是一樣。有這樣一個有趣的設想：如果國民黨的中國——而不是共產黨的中國——向老撾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西方強國會有什麼反應呢？這些國家的獨立所受到的威脅還是一樣的。不過，西方強國會跟她們現在所做的一樣去橫加干涉嗎？

中國的鄰邦如果是沒有外國軍隊駐扎的非共中立國家時，我們不知道她會不會設法吞掉她的鄰近弱邦，還是讓她們保持獨立；芬蘭對於蘇聯來說，正處於那種地位，她從來不敢做出使莫斯科不高興的事情，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成了這個樣子並非不可能，柬埔寨就這樣看。甚至是堅決反共的馬來西亞也不參加東南亞公約組織，恐怕這種做法會被中國看作極端敵視的行爲。目前泰國在親西方的陣營裏，不過她會呆多久呢？她不可能得出柬埔寨所作出的結論——就是做一個非共中立國比做一個反共也就是反華的東南亞公約組織成員國要安全得多嗎？南越追隨和泰國一樣的路線，實行親西方。不過，這裏的

情況更爲複雜，這個國家由北緯十七度分界線分成兩截——北越是共產國家，而南越是反共國家。

我們所能夠希望的最理想情況是中立主義。不過，我們要記住，中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爲接近東南亞，就憑着這個原因，中國的影響力比較大是無可避免的。中國一直是鄰近弱邦所害怕的對象，現在和過去都如此，共產主義其實是次要的因素。

香港比較關注的是台灣的前途，大元帥沒有衆望所歸的繼承人，而且台灣沒有人有他的聲望。如果他退隱或不在了，會發在什麼事情呢？北京預料到時台灣島就像熟透的洋李掉到跟前，文武官員也變節投共；如果他們全部或者一大部份人、他們全部或者一部份官員投共，美國會怎樣應付呢？她會出兵干預嗎？我懷疑這一點。美國人跟美國政府不同，他們支持蔣介石大體上是基於感情因素，他是戰時的英雄盟友，不應該眼巴巴看着他栽筋斗。從軍事觀念看，台灣能夠說得上是美國國防的重要環節嗎？根據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的白皮書，美國政府當年就不這樣看。^{③〇}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使美國政府改變了觀點，因爲共產黨人在朝鮮發動的攻擊從北面威脅着美國的利益所在——日本。如果台灣被共產黨人佔據了，同樣的威脅便會從南面伸展過來，美國認爲這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有必要進行軍事佈署，阻止共產黨人進佔台灣。不過來自北韓的威脅已經消除了，或者最少減弱至白皮書發表之前的時候了，那麼，抓住台灣不放的軍事理由便變得無力了。無論如何，蔣介石一旦退下來，華盛頓當局便要痛苦地重估形勢，而中國就趁機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不是可能的嗎？台灣回歸中國大陸

以及國民黨政府瓦解都是美國所嚙不下的苦果。不過，長遠計，這些事情會和緩緊張的局勢，因為兩國衝突的根源給鏟除了。

如果台灣被吸納在整個中國裡面，當時美國駐台的空軍基地便不能夠再用於防衛香港了；不過，沖繩和克拉克基地的空軍以及第七艦隊仍然會防衛着香港。對香港來說，比台灣前途更見重要的是中美的整體關係。

送別

所有這些到底都是將來的事情，這最後一章裏，寫的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七年的事，而現在已經到了尾聲。一個故事裏應該有英雄人物；講述關於香港的故事時我沒有設想單獨的一個英雄人物，卻想到了許許多多出色的人物，他們有的是中國人，有的是非中國人，包括了社會工作者，擅於應變的商人、農夫、漁民、政府官員、英國軍人、醫生、教師和堅忍的難民；那裏還有壞人，有毒販、匪徒和走私販。除了一大批窮得要命的人之外，香港一般來說算是一塊樂土，香港不是地球上的天堂，但它是一塊什麼的地方呢？當然不是共產中國的地方，才有百萬人離開家園到英屬香港來避難。一九五七年裏，殖民地風調雨順，希望長此以往都是順境。和以前的日子一樣，無疑暴風會不時襲擊她，這條船便會搖蕩起來；然而在我們這個充滿暴風雨的世界裏，這正好是人們所過的生活。

要說再見的時間到了，各行各業的無數的朋友給我們送行，是那麼熱情，又使我們感到心如刀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終於乘船離開香港港口，我們是回家還是離家呢？

註解：

- ①事實上，中國第一位總統應算是領導革命推翻滿清皇朝的孫中山先生。他是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後，於同年十二月廿九日經在南京舉行的十七省代表會議選為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宣誓就職，建立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臨時參議院。由於立憲派及其他舊勢力，以及一些外國勢力對袁世凱的支持，孫氏被迫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向臨時參議院辭職，由袁世凱取代。袁氏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改國號為「洪憲」而稱帝；其後遭各方反對，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懼忱而死，僅做了八十多天皇帝——譯者
- ②被英法聯軍於一八六〇年十月六日攻入之後搶掠一空而跟着燒毀的是著名的「圓明園」，位於北京西北郊海淀附近，周圍三十里，始建於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經歷了一百五十餘年的增修擴建，成為馳名中外精美絕倫的「萬園之園」；今天到北京的遊客還可看到那些殘垣敗瓦，這裏已被北京政府列為文物重點保護的地方。「頤和園」是金貞元年（一一五三）完顏亮所設的行宮，明朝時改建為「好山園」。清乾隆時改建為「清漪園」，慈禧改建後叫「頤和園」，一九〇〇年曾被八國聯軍破壞，一九〇三年復修——譯者
- ③作者所指的地方是「頤和園」內著名的「長廊」——譯者
- ④作者所指的是「祈年殿」——譯者
- ⑤葛量洪所指的應該是「五卅運動慘案」。這運動的簡介見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現代史），第二頁，上海辭書出版社。在這次事件中，英國巡捕一共打死了十餘名參加示威的羣衆。
- ⑥新界的租借期將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目前（一九八

四)的中英會談是個英國爲歸還日期快到而向中國提出會談解決這個問題——譯者

⑦英國認爲和滿清簽訂割讓港島和九龍以及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等三條條約都是有效，葛量洪的說法反影英國官方的看法；而中國則認爲這三條條約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迫之下獲得，所以無效；目前的中英就香港前途舉行談判，自一九八二年九月由英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時開始，目的在於一次過解決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這三條條約是(一)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二)北京條約(一八六〇)；(三)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一八九八。)

⑧葛量洪指的是英國海外殖民地的事業，當時世界許多地方還未獨立，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情形才有急劇的發展，許多地區也相繼獨立了——譯者

⑨這是在非洲尼日爾的地方；這裏作者的意思是「就是到天涯海角也會追隨」。

⑩齋月(Ramadan)是指伊斯蘭教教曆太陽年第九個月，該月內教徒白天禁食——譯者

⑪Pidgin English；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英漢字典把它譯作「皮欽語」，是巴布亞、新畿內亞等地用的混雜語言。

⑫M. A. Cameroo, E. S. Cunningham, Li Wing Sum的中譯名字——由譯者定出

⑬由於香港自一八四二年以來便成爲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在政治的概念上，他是把香港和中國大陸劃分開，前者是英國的殖民地，受英國的統治，實際的主權一直受英國操縱；目前的中英談判其實就是爲這個地方未來的主權及統治而談判——譯者

⑭近年來數目又有增加，官守和非官守議員人數分別超過了二

十名——譯者。

⑮花名是 *Camellia granthamiana*

⑯譯音，英文名字是 Parkin Wong。

⑰現時在南京看到的中山陵是經過重修的——譯者

⑱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及共產黨政府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城寨的管轄權；見 N J.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P. 19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2.

⑲作者是指由孫中山先生領導推翻滿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譯者

⑳這是指反對香港的英殖民地制度——譯者

㉑這裏所指的相信是因政治問題而被捕的，根據「英皇制誥」港督可以用行政命令將政治犯遞解出境——譯者

㉒從五十年代的報章可以看到當時親中及親英的報紙幾乎每天都在對罵，這足以反映出當時中、英關係的惡化。

㉓當時中國政府因這個問題曾經提出強硬的抗議，被令停刊的報紙在停刊十二日後便獲得復刊了——譯者。

㉔自七十年代後期，港府把所有非法由內地進入香港的人士全部視為非法入境者處理。

㉕葛量洪的回憶錄是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他所敘述的房屋政策已經在七十年代更改了，分配辦法亦改變了，受清拆的木屋居民大多是遷徙到臨時安置區，然後再等候遷徙。

㉖由六十年代開始，由於香港的大學學位遠遠追不上需求，因此有些沒有能力或不願送子女到外國的家長便把他們送到台灣去讀大學——譯者

㉗作者指的是香港中文大學。

㉘作者意謂北韓會佔領了南韓——譯者

- ②⑨根據一項消息，當時的中國政府曾經向港府提出警告，倘若暴動不能解決的話，中國是會干預的——譯者。
- ③⑩作者指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的“*The China White Paper*”，主要是分析了40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內政的介入及失敗的看法，該份白皮書是由國務院的人員負責編寫的。該書從美國的觀點研究了自一八四四年美國與清朝簽訂了「望度條約」時開始描述美國的對華政策。

